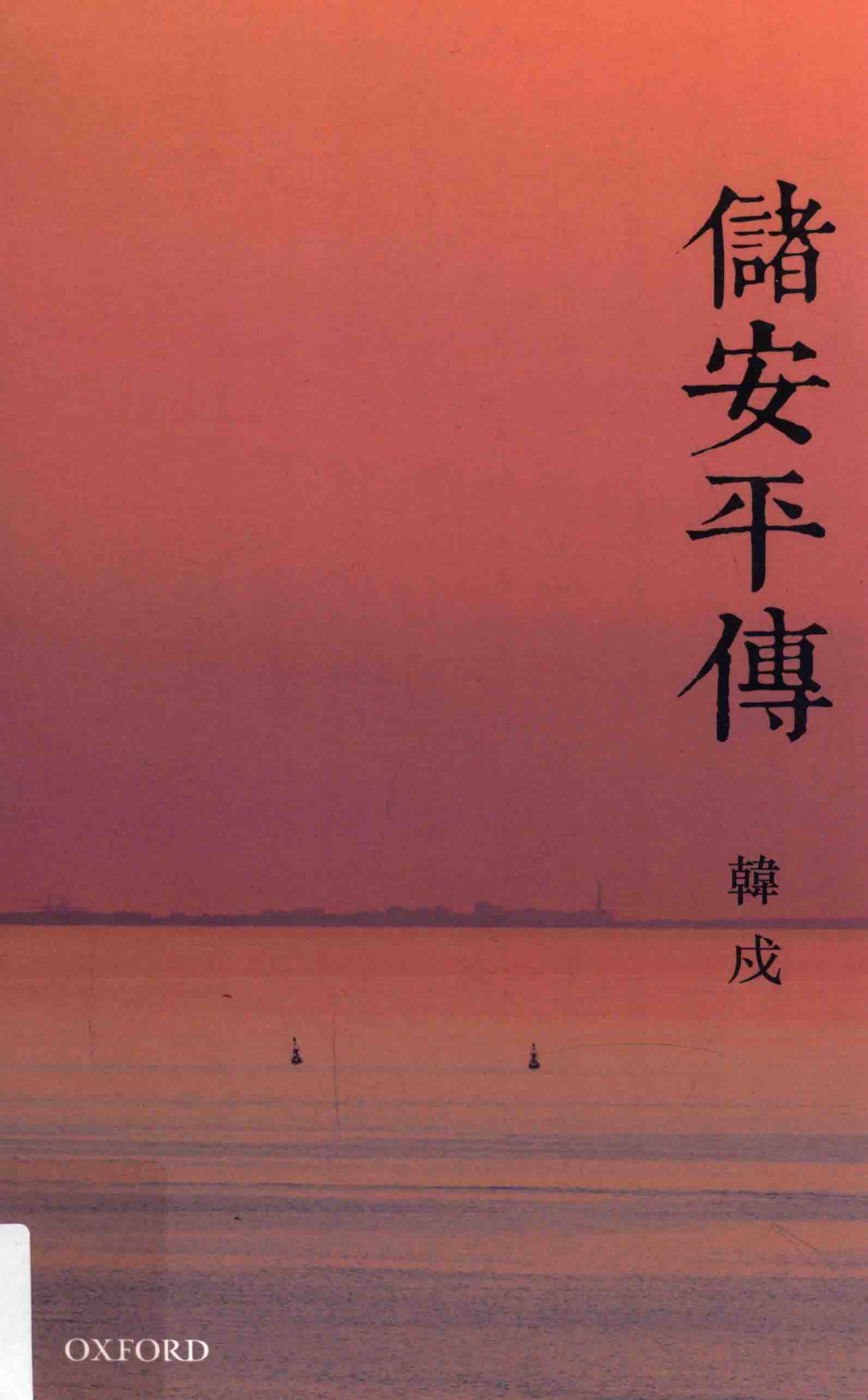
儲安平傳

韓戍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941678-3
9 780199 416783

儲安平傳

韓 戍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941678-3

1 3 5 7 9 10 8 6 4 2

儲安平傳

韓 戍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储安平

目　錄

第一章　從宜興到上海

1　家世
6　幼年生活
10　負笈南京
14　光華附中
18　左翼文學

第二章　光華大學

23　光華週刊
29　良師益友
33　文學轉向
37　情感遭遇
41　端木露西
44　自由主義啟蒙
48　北行散記
53　從散文到小說
55　南京請願
59　北上抗日

第三章　庚桑洞

65　山中對話
69　給小讀者的信

74 初識吳稚暉
75 閒居金陵

第四章 初做報人

81 黨報編輯
85 批判論語社與左翼
90 文壇之鏡
98 最後的文學努力
104 中央日報副刊
112 早期評論
116 家庭關係
124 留學夢

第五章 觀察奧運

131 首批奧運記者
136 歌頌納粹奧運
146 離德去英

第六章 採風英倫

149 愛丁堡暮思
154 再回倫敦
157 英倫見聞
164 歸國

第七章 後方與前線

167 初遇章伯鈞
170 鼓吹抗戰
172 上前線

175 程滄波事件
180 中央政治學校

第八章 暫駐衡山湘水

185 國立師範學院
194 袖珍書店
199 婚變
204 桂林力報
214 逃難與著述
218 中國晨報

第九章 陪都初論政

221 《客觀》創辦
224 議政建言
230 福利政治
233 結怨聶紺弩

第十章 輿論建國

239 籌備《觀察》
243 一個人的雜誌
249 中間路線
253 在自由和國家之間
260 與傅斯年、胡適
264 商業的成功
268 救世主心態
271 批判加劇
277 經濟危機
280 轉向

291 逃亡

第十一章 在新政權之下

295 東北考察
300 政協代表
303 失落的諍友夢

第十二章 做官與出走

311 從新聞到出版
316 黨外幹部
322 新疆行
327 人大代表

第十三章 光明日報總編輯

333 九三社訊
340 上任
346 改版與尋求支持
351 鳴放
359 觸碰禁忌
364 黨天下
370 天下圍攻

第十四章 最後的八年

385 被國家辭退的人
390 歸途何處

397 參考文獻要目
407 後 記

第一章　從宜興到上海

我生下來了六天，我的母親就死了。還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給予我母親的印象，就像白煙一般的淡吧！

——母親，1930

家世

江蘇宜興古稱荊邑。春秋戰國時，荊邑先後屬吳、越、楚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荊邑置陽羨縣，屬會稽郡。漢高祖時，縣令尹靈常因功被封陽羨侯，陽羨改為侯國。西晉惠帝、懷帝年間，鄉人周玘三興義兵，朝廷為表其功，在陽羨設義興郡。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廢郡復縣。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為避皇帝趙光義諱，義興改為宜興。元代宜興縣曾兩度升為府，明代又降為縣。清雍正四年(1726)，宜興被分為宜興、荊溪二縣，縣治皆在宜城鎮內。民國元年(1912)，荊溪縣治撤銷，復併入宜興之內。宜興地處蘇州、常州、無錫三區交界，民國時期區劃更動頻繁，曾隸屬蘇常道、江蘇省政府和武進行政區。1949年後，宜興隸屬於常州、蘇州、鎮江等專區。1983年起，歸無錫市管轄至今。[1]

宜興因盛產紫砂陶而被稱為「陶都」，境內風景優美，山川秀麗。早在西晉時代，就有周處的「旅遊指南書」——《陽羨風土記》問世。明代有沈敕記錄歷代文人學士遊覽宜興的《荊溪外

1　江蘇省宜興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宜興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頁。

記》。宜興自然景觀的一大特色是天然岩洞。尤其是位於縣城東南、西南部的庚桑(張公)、善卷二洞，天然造化，鬼斧神工，為宜興贏得了「陽羨風景甲江南」的美譽。宜興境內多河流湖泊，清末民國的宜興城廂即處於當地著名湖泊東氿和西氿之間。兩湖泊的水由西水關和東水關穿城牆而入縣城，在城內彙集成蛟河。蛟河將縣城劃為面積相等的南北兩部分，其上建有蛟橋將南北相連。宜興縣城又稱宜城鎮，鎮北是西北——東南走向的玉帶河，河流曲折蜿蜒，南與蛟河相接，北從中山門附近的北水關出城。玉帶河的中部有一座青龍橋，青龍橋連接着青龍巷。與青龍巷垂直交叉的是北門巷，因臨近縣城偏北的陽羨門而得名。

宜城鎮人傑地靈，名門望族雲集。大人巷蔣家、白果巷徐家、醬園里潘家、紗帽巷吳家等皆世代為官，人才輩出。其中大人巷蔣家祖上有九人封侯，與溪口蔣家同宗，家中懸有蔣介石手書之「世德清芬」匾額；白果巷徐家為明朝首輔徐溥之後，一門五進士，父子三翰林，民國時期有著名文人徐凌霄、徐一士；醬園里潘家在民國有紅色特工潘漢年，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潘序倫。[2] 位於鎮東的經餘堂儲家亦為大族之一，其先祖可上溯到唐朝監察御史儲光羲。儲光羲第十二世孫儲晏由鎮江遷居到宜興境內，二十世孫儲洪定居於宜興豐義。儲氏從儲光羲開始便以文名著稱，到宜興後亦是如此。儲光羲第二十七世孫儲昌祚為明萬曆年間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南京兵部車馬司主事。三十世孫儲方慶、三十一世孫儲大文均為康熙年間進士。[3] 明清時期的經餘堂，田連阡陌，財產豐厚，家中建有九峰樓，登樓可望見宜興城外煙波浩渺的東氿。九峰樓是儲大文等五兄弟的讀書樓，後五人皆中進士或舉人，一時有「五子登科」之美譽。清代後期，

2　楊曉方主編：《宜城鎮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9–640頁。

3　陳永忠：《國共不容的知識分子：儲安平生平與思想研究》，台北：秀威資訊，2009年，第21頁。

儲家從鎮東遷居到北門巷關帝廟附近，「經餘堂儲家」變為「北門巷儲家」。其後，第三十五世孫儲祖正為嘉慶舉人，三十七世孫儲廷菜為同治舉人。儲廷菜先後娶了兩位妻子，側室顧氏生三子，分別為儲南強、儲炳元和儲林滋。儲林滋就是儲安平的父親。

儲林滋(1886–1923)，又名臨生，字滌之。據傳，年輕時他曾北上做官，後因仕途不順而棄職。他為人頗有俠氣。其妹嫁給湖北道台任邦翰(宜興同鄉)之子任恩培為妻，因婆媳不和，備受欺凌，投井而死。儲林滋與二兄炳元矢志為妹報仇，趁道台夫婦護送其妹靈柩回宜興之際，強令二人在街上眾目睽睽之下吃掉路旁的髒物。其母顧太夫人派人抓回道台夫人並施以懲罰，用繡花針將其遍體穿刺，民間俗稱「種大麥」。道台夫婦受此奇恥大辱，不久便羞憤而死。縣衙派人捉拿儲家兄弟，儲林滋藏於青龍橋下躲避捕役追趕，其後遠走他鄉，得以倖免。[4] 儲安平一生帶有俠氣，這與其父的性格遺傳似乎不無關係。儲林滋娶了三位妻子，第一位朱氏早逝，第二位潘氏係儲安平的生母。潘氏即出身於「醬園里潘家」，世代讀書，祖父曾任溧陽、青浦等縣教諭，父親為候選直隸州判恩貢生。[5] 潘氏是否讀過詩書不得而知，但出身於書香門第，按理說應該聰慧且知書達理。

儲安平出生的時間是宣統元年乙酉農曆六月初一，即1909年7月17日。不幸的是，在他出生的第六天，母親潘氏便因病撒手西去。儲安平對母親沒有任何記憶。當家人們指着潘氏的照片，告訴年幼的安平這就是母親時，他的第一感覺便是疑惑，對母親的輪廓和面貌，始終只有一種模糊、恍惚的印象。因為沒有目睹過真容，他也從來沒有夢到過母親，不知道什麼是母愛。他說：「母愛所給予我的印象更渺茫……母愛真的是怎樣，我自然抓不

4　儲傳能：《儲安平一百零一年誕辰懷念》，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jqxn.html。

5　陳永忠：《國共不容的知識分子：儲安平生平與思想研究》，第24頁。

到一個具體的說述。」只有當他看到伯叔母給予兄弟、嫂嫂給予侄兒們母愛時，他才能「悵然地感受到母愛究竟是怎樣一種可貴的味道」。[6] 有人說，儲安平命太硬，頂沖了母親。不知其父林滋是否受民間迷信影響，也認為其子有克母之命，對他沒有絲毫疼愛。尤其是他續弦第三位夫人常州惲氏後，更是終年在外吃喝嫖賭抽鴉片，十分荒唐，對儲安平幾近不聞不問。安平亦對父親毫無感情。1923年，其父去世。繼母惲氏攜女回常州娘家居住。[7] 儲安平徹底成為孤兒。

儲林滋不負養育之責，儲安平由祖母顧氏撫養成人。祖母給予安平的照顧無微不至。他形容：「我的祖母是世上愛我的一些人之中的最愛我的一個，是世上一些有恩於我的人之中的最有恩於我的一個。」「她什麼地方什麼事，總忘不了她的小孫孫，有糖得先給安平吃，有好看的衣料得先給安平剪一件，上哪兒玩，得帶安平去，在我所有的記憶裏，她沒打過我五次。」[8] 當時，安平與祖母同處一室，自己睡在靠窗邊的小床上，常常夜中驚醒。老年人睡眠較輕，祖母見到安平醒來，便慈祥地和他說話，免其恐懼。在他看來，祖母的功績不只是撫養他成人，還教會他如何做一個人：「她雖然喜歡我，但是愛而不溺；她雖然待我慈惠到無以復加，但是管束我又管束很嚴。她居常所對我說的，總是許多關於為人在世的格言。勤儉、耐勞、能吃苦、有禮貌、不要驕奢淫賤……她所教導我的範圍很廣，差不多包括了一切做人的道理，但是她所說的要點卻又非常通俗單純，使我聽了可以全部領會。」[9] 祖母的慈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安平親情的缺失。祖母教育安平勤儉、禮貌、吃苦耐勞、砥礪品格，對他的影

6　儲安平：《母親》，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上冊，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69–173頁。
7　儲建冰：《憶安平叔》，《宜興文史資料》1990年第18輯。
8　安平：《我的祖母》，《申報》1931年4月16日。
9　儲安平：《自序》，《給弟弟們的信》，開明書店，1936年，第7頁。

響至為深遠，成為他一生中的顯著品質。從祖母曾給道台夫人「種大麥」，間接致其羞愧而死一事可見，她也非民間普通的柔弱女性，而是性格剛烈，嫉惡如仇，不畏權貴，敢做敢為。儲安平也一生都具有這種勇氣和精神。

祖母之外，對儲安平照顧最多的是大伯父南強先生。儲南強(1876–1959)，字鑄農，別號簡翁，廩貢生出身。1905年科舉廢除後，曾任宜荊學務公所總幹事，創有知新小學堂。辛亥革命後，由於深孚眾望，他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宜興縣第一任民政長官。1912年，調任南通縣知事，深受地方擁戴。1918年，當選為江蘇省諮議局議員。1920年，為興修水利事代表江浙士紳進京請願，並受命主持蘇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其後，他回到宜興主持地方建設，測繪縣圖，疏浚河道，開闢公園，興建縣政府，使宜興的市政建設初具規模。1925年，儲南強代任宜興縣知事。從1921年開始，他傾其所有，開鑿整修荒廢已久的庚桑、善卷二洞，工程極為浩大，到1934年才全部完工，成為宜興新的名勝。

儲南強生性節儉，有朋友見其室內簡陋，趣稱：「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簡翁有三寶，破柏、爛凳、破軸頭。」[10] 這種簡樸與其在宜興的社會地位顯然極不相稱。日後，朋友對儲安平的印象也是簡單樸素甚至近乎吝嗇，可見南強先生的影響。儲南強厭惡舊風俗，婚喪嫁娶一概從簡。每逢舊曆年他便故意外出，以示不接受朋友拜年。在他的影響下，儲家是宜興縣城中唯一不過舊曆年的家庭。[11] 他這種不拘舊俗、熱心公益事業、踏實任事的精神，也潛移默化影響了儲安平。祖母、父親身故後，伯父成為儲安平的監護人和良師益友，無論安平滬上求學或遊學英倫，背後都有南強先生的資助、推動之功。

儘管伯父對儲安平關愛有加，遠不能說是寄人籬下，但父母

10　《儲南強傳》，《宜城鎮誌》，第558–560頁。

11　安平：《像一隻老鼠，我跑開了上海》，《申報》1931年3月12日。

雙亡，日後儲安平仍多以「孤苦」自命。在許多文章中，他都着重強調自己的孤兒身份。這種缺乏父母關愛，沒有經歷過正常家庭生活的「孤苦」，對安平幼小心靈的影響不可小視。從一方面講，生於這種家庭的孩子，必然性格敏感，心思細膩，對人情世故有着異常深刻的感知。這種敏感、細膩和深刻，容易使人自然地在情感上親近文學，將文字當作寄託思想、排解感情的最佳方式。儲安平從大學時代便在文學上顯露頭角，一生的事業主要由文字和言論成就，便有這種性格之功。自幼失怙，也常常會激發一個人的上進之心，使其心靈過早成熟，生活提前自立。因此，儲安平在少年時期便具有一種強烈的事功心態，不斷通過各種方式鍛煉自己，讓自己變得堅韌、成熟，以期將來能夠揚眉吐氣，出人頭地。從另一方面講，自幼失去父母的孩子，由於成長中所獲得的關愛有限，極易形成集高度自戀和極度自卑於一身的兩極化性格。即使他天性純良，內心也總會有孤僻、自私、冷酷、多疑、驕傲和唯我獨尊的一面。這種性格缺陷在事業順利、生活幸福的時候表現得並不明顯，卻始終是一種潛在的隱患，常常會在一些人生的關鍵之處顯露出來。我們看到，儲安平一生都不滿於現狀，兩次婚姻皆以失敗告終，後來與子女的關係亦不融洽，都和這種性格有關。

幼年生活

幼年的儲安平，生活在宜興北門巷的儲家大宅中。該宅原來屬於吳姓，傳說經常有狐鬼作怪，極不安定。吳家女婿為儲光羲第三十五世孫儲祖正，嘉慶年間鄉試中舉人第二名，赴岳丈家報捷時，居住一月，吳家張燈結綵慶祝，狐鬼頓時銷聲匿跡。吳家驚訝，以為他是「文曲星」下凡，能克制鬼神，便慷慨以此宅相贈。儲南強之孫、安平之侄儲傳能回憶：「儲家分內外兩院，有

中門阻隔。中門有楹聯為對，詞云『座傾阮嵇，家集機雲』。出中門，為退堂，小兒遊戲之所，亦有歪詩數行，語云『杜牧喜飲陽羨茶，蘇軾待客東坡肉』，小兒輩所書也。外出為大堂，匾額林立。中間兩匾額，一為『五鳳齊飛』，另一方為『十代科甲蟬聯』。」[12] 大堂之外是天井和角門，稍遠處為正門。正門有石鼓一對，是書香門第的標誌，因小兒每天騎坐玩耍，鼓面已磨光如鏡。儲安平每次出入中門時，都要駐足誦讀楹聯數次，常有感於阮籍、嵇康等魏晉名流未得善終的歷史故事，潸然落淚。[13] 大堂的匾額，昭示着儲家作為詩書世家的光輝過去。祖先的功名成就經後輩不斷口耳相傳，對其構成一種無形的激勵，使儲安平很小就有一種中興祖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儲府大門的右邊是青龍巷，狹窄局促，經儲府主動拆牆三讓後，才可以通行車馬，遂又名三讓巷。沿巷前行便是玉帶河和青龍橋。跨橋過河，沿着大道便可直接到達儲南強開闢的宜興縣政府和中央台建築。儲府大門之左為關帝廟，供奉紅臉大刀的關羽，周圍是小集市，非常熱鬧。[14] 1908年，儲南強以關帝廟為址，建立東北社初等小學堂，民間俗稱「武廟小學」。民國後，該校改名為「城市公立城北小學校」，校長由地方教育名流路滌中擔任。據《宜城鎮誌》記載，民國期間宜興最好的小學是由宜荊公學發展而來的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位置在文廟附近，又稱「文廟小學」。[15] 不過，就規模而言，文廟小學並不如武廟小學。由資料可知，同一時期的文廟小學有學生135人，而武廟小

12　儲傳能：《儲安平故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z4hf.html。

13　儲傳能：《儲安平一百零一年誕辰懷念》，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jqxn.html。

14　儲傳能：《儲安平故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z4hf.html。

15　《清光緒、宣統年間縣城內廢科舉創辦小學堂一覽表》，《宜城鎮誌》，第402–403頁。



儲南強



光華宜興同學會（第四排左二為儲安平）

學達到224人，居宜興所有小學中的第二位。[16] 武廟小學為儲南強所建，又在儲宅附近，安平入武廟小學，可謂理所當然之事。

儲安平入武廟小學的時間大概在1916年前後。他在武廟小學接受了哪些教育，由於資料限制，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參考同時期宜興其他小學的課程可知大概情況。位於宜興縣官林鎮的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校，在1918年開設有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理科(觀察、實驗、推理)、英文、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等課程十種。國文課選用的是中華書局的新版課本，加授讀法、綴法、書法三種內容。英文則選用商務印書館的新式課本，教授語法、會話和翻譯。[17] 從這個課程設置可知，即使是地處宜興鄉鎮的小學，其課程設置也已經相當現代化。儲南強本來就是新派人士，地處縣城的武廟小學，在課程設置方面，不會比鎮上的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更為落後。

尤其在儲安平進入小學前後，正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破舊立新、開天闢地的時代。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吳虞等以《新青年》為陣地，高唱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破除舊禮教，呼籲科學和人權，一時間在全國上下蔚成風氣。宜興地處江浙人文繁盛之區，受此風潮影響勢不可免。儲安平入學接受教育，便是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之下，因此他從未讀過古書，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關於中國古時聖賢的遺言，可以說簡直沒有接近過」。[18] 按照許紀霖師對近代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劃分，儲安平屬於典型的「後五四一代」中的前一批人。[19] 這批人入學啟蒙即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知識結構完全為新式，毫無傳統文化的羈絆，亦少有在傳統與現代、本土或西化間的掙扎。從

16　《民國元年至二十六年城內創辦小學一覽表》，《宜城鎮誌》，第404–405頁。

17　儲滄曙：《宜興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校各科教授概略》，《宜興縣教育會彙刊》1918年第2期。

18　儲安平：《自序》，《給弟弟們的信》，第2頁。

19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3頁。

儲安平一生的著述和言論中，可知他基本不具備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知識，對儒家思想亦毫無興趣。他是一個完全受新式思想影響的知識人，這和更早的嚴復、梁啟超，甚至和陳獨秀、胡適等讀過舊書的新文化先鋒亦不相同。

不過，對宜興初級教育的趨新程度也不能過份估計。尤其要考慮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太湖邊小縣的教育水平和上海、南京、杭州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比如，宜興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雖然小學眾多，卻幾乎沒有優質的中學。許多富家子弟在本地讀完小學後，紛紛外出升學，近者考入附近的省立常州五中，遠者要到南京或上海去接受教育。儲氏詩書傳家，儲南強作為開明士紳和地方教育家，對子弟的教育問題極為重視。安平自幼聰明伶俐，也是讀書的好材料。小學畢業後，安平的繼續教育事宜亟須提上日程。儘管當地知名的常州五中距離宜興更近，而且由宜興著名學者、書法家童伯章擔任校長，但儲南強直接將安平送往南京讀初中。1923年，儲安平由伯父的朋友帶往南京。他形容：「家裏像種下了一粒子一樣將我送出大門，祝福我就此開始走上希望的路」。顯然，全家上下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將來能光耀門楣，使儲氏大興大盛。

負笈南京

儲安平生平第一次去南京，路上的一切都如此新鮮，令他心中生出無限歡快。他後來曾經不無眷戀地回憶過這段經歷：「那時我也歡喜，我從來不想到家，不想到家裏的人，旅途上的一切，都給我新鮮和愉快。帶我上南京的是我伯父的一個朋友……他很喜歡我，譬如車子一過了鎮江，看見山，他便會哄着我說：『安平，你看那山，像不像一個老虎足爪！』『咦……真像』，

我跳着說。是的，我就是帶着那樣一顆天真、純潔、伶俐、愉快的心，第一次跨進了南京城的。」[20]

據儲安平的侄女回憶，儲安平到南京，進入的是私立正誼中學。[21]南京正誼中學是一所江蘇地區成立較晚的中學，地處南京江寧申家巷(今白下區常府街附近)，在四條巷李公祠設有女子部，校長楊匡，號覲侯。1923年，正誼中學才獲得江蘇省教育廳的經費補助，以致當年《申報》列舉「江蘇省校最近一覽表」時，誤將該校遺漏，該校頗為不滿，特意來函要求更正。[22]

正誼中學雖然成立較晚，名氣不大，但在蘇州、泰州、宣城等皆設有考點，包括初中部和高中部，建制頗為完備。[23]該校初中部一般為兩年制，高中部實行選科制，分文理商三科，由學生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自由選擇。據稱，正誼「各科科任教員均屬一時知名之士」，文理兩科以灌輸世界潮流為主，注重培養學生的知識和技能，以為將來服務社會之準備。商科是正誼中學非常重視的特色科目，最主要的銀行科，由南京交通銀行行長湯覺無代為籌募資金、規劃課程，主要課程均由中國、交通兩行的主任科員教授，純粹注重實用，以便畢業生將來在銀行服務。[24]由此可見，該校在當時發展程度尚可，且有銀行界背景，在培養商業人才方面有顯著優勢。

不過，偏重商科教育的正誼中學，對儲安平的影響，在學識上和精神上並不明顯。尤其是，儲安平離開宜興來南京求學，目睹廣闊世界，如初出困籠之鳥，很少將精力用在讀書上。他曾經自述：「說讀書，真可笑，由你考時成績還過得(去)，那是靠生就的聰明。我從來就不很會坐定地整整讀一個月書或半個月書，

20　安平：《南京》，《申報》1931年3月21日。
21　儲建冰：《憶安平叔》，《宜興文史資料》1990年第18輯。
22　《南京正誼中學來函》，《申報》1924年5月17日。
23　《南京正誼中學之新氣象》，《申報》1928年2月1日。
24　《南京正誼中學校之新設施》，《申報》1924年7月26日。

我成天的在校園裏、在操場上玩。一到禮拜六，出去。那時我真開心，像一粒嫩紅的櫻桃般，圓，圓，到處滾。」那時的南京，六朝古都風韻猶存，風景名勝無數。每到假日，他都要去南京的紅紙廊或成寶街尋找同鄉一起遊覽：「清涼山、莫愁湖、雨花台、玄武湖、台城、雞鳴寺、明孝陵、秦淮河、燕子磯、白鷺洲、秀山公園，甚至為人們很不曉得的小盤古……所有南京的名勝，全玩遍了。到後來，簡直不是玩風景，是玩好天氣，好伴侶了。」南京飲食便宜、小吃眾多：「那時南京的生活程度也還低，我記得還有四塊錢包一個月飯的館子。中正街的正興館是我們老到的地方，十個子兒一碗豆腐湯，道地，還有內橋的鍋貼，醉。」[25] 總之，南京時代的儲安平，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

南京讀書期間，對儲安平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是祖母去世。他回憶道：「為了小孫孫的學業，她很高興的幫他料理鋪蓋行李。但是，在祖母死後，家人們在追念時候談一些什麼，說我到南京去了之後，我祖母的生活便起了一種很黝暗的變化，她的生活裏彷彿失掉了一個活跳的太陽似的，常常變為很陰沉、很憂鬱的了。」祖母日夜思念安平，身體越發衰弱，精神日益萎靡。1923年5月，儲安平在學校得到祖母病危的消息，立即趕回家中。但此時祖母已經處於彌留之際。他形容：「她不再有力氣說一句話，我也懂不得應該找出怎樣一句頂適當的話來安慰她。我只像一隻小山羊地伏在床邊上將光光的小臉給她摸摸，她閉着眼睛，定着神，像撫摸着一件稀世寶貝一樣，也偶爾掀起眼皮來看一看我，看看我是瘦，還是胖。」祖母終於撒手西去，安平失去了世上最親的人。他悲痛萬分地認為，從此「便不曾再有一個人來愛我」。[26]

祖母臨終前，曾留下一塊土地，租金用來支持安平讀書，又將其託付給寡居的二兒媳崔氏(儲炳元之妻)照看。但相對於伯

25　安平：《南京》，《申報》1931年3月21日。
26　安平：《我的祖母》，《申報》1931年4月16日。

母，真正能負起照顧安平之責的，還是伯父儲南強先生。伯父對安平可算疼愛。他每到南京，便叫黃包車將安平接出。某次，伯父說打算在秀山公園對面買一塊地建房，給安平住，以後有儲家子弟來南京讀書時，也可以住着方便。這一句可能是隨意的許諾，使安平多日坐立不安，無時無刻都在想着一座小洋房的形象，甚至想着「叫哪一個媽子來燒飯，哪一個媽子來服侍。」當後來他看到江南第一工業區附近正在建造小洋房時，甚至天真地寫信回家問，小洋房是不是伯父所建。[27] 雖然父母雙亡，但伯父在某種程度上代行了父親的職責，安平在經濟來源上仍不成問題。

祖母去世後，安平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每逢假日甚至年節，他都盡可能地待在學校的宿舍裏。他自述：「我不回家不是為了自己，沒有家。我自己縱然沒有父母兄弟，又是我宅子裏還有一許多人待我更好更親昵，他們對我全關切全尊重，但我的倔強不允許我無條件的去受人家的施捨，或者看到一次虹裏的七色光彩。」[28] 將別人的關愛看作施捨，自我邊緣化，盡可能不給親人增加麻煩，其自述便是對自己敏感性格的最好詮釋。不過，似乎也並非家人對他「全關切全尊重」，他的繼母惲氏便是例外。據儲安平後來回憶：「祖母過世以後，不知她們母女吃什麼。我單獨吃飯，一塊腐乳吃三四天。過年過節給一點肉醬，也是一吃幾天。」[29] 若果真如此，他視回家為畏途，似乎也可以理解。

但是，南京時代的儲安平年紀尚小，不可能做到完全獨立。他生來身體稟賦較弱，且自幼為孤兒，內心常年孤獨壓抑，獨自在外生活，不能很好的照顧自己，身體常常會發病。儲安平曾形容自己幼時「白白的臉」。[30] 章詒和對中年儲安平樣貌的概括是

27　安平：《南京》，《申報》1931年3月21日。
28　儲安平：《感情的顏色與光彩》，《文藝月刊》1933年第3卷11期。
29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132頁。
30　安平：《我的祖母》，《申報》1931年4月16日。

「面白、身修、美豐儀」。[31] 所謂的面白，在他這裏實際正是一種氣血缺失之相。儲安平久患乾咳，需要回家養病。在家休養時，便常常會穿過青龍橋到達縣政府附近的中央台集市，購買梨膏糖以潤喉嚨。為體質問題，他四處求醫問藥，甚至不惜嘗試民間偏方。據其侄儲傳能稱，安平在家養病時不知從何處聽說，食用童子尿浸過的雞蛋可以養生，遂拿木桶到武廟小學去接裝小學生的尿液，炮製養生雞蛋食用。[32] 青龍巷中有一家醫院，名叫仁杏醫院，是宜興西醫陸祖仁所建，安平曾多次在這裏就診。青龍巷與宜興北門相接處，有當地中醫周維新開設的診所，安平也經常來這家診所療養諮詢。家庭不幸，身體欠佳，使不過十二三歲的他，對溫暖有一種很自然的渴求，對女性也有一種本能的親近。就在他去周維新中醫診所調養時，隔牆透過窗洞，看見鄰家少女在花園裏澆花歌舞。二人年齡相仿，他聽到歌聲，低聲應合，遂漸通話語，情不自禁地墜入愛河。這位不知名的少女應當算是儲安平的初戀情人，據說長大後她還擔任過武廟小學的教師。儲安平去上海讀書後，由於時空阻隔，兩人關係就此作罷，正所謂是「雁燕分飛，互道尊重」。[33]

光華附中

1924年夏，儲安平從正誼中學轉入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就讀。證據是他曾在1936年的赴歐路上回憶道：「吳先生是中國田徑界的前輩，他代表中國出席遠東運動會時，我正在東南大學附中讀

31 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8頁。

32 黃波：《百年安平》，謝泳編：《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2009年，第32頁。

33 儲傳能：《儲安平一百零一年誕辰懷念》，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jqxn.html。

書」。[34] 吳先生指近代中國著名田徑運動員吳德懋，其事指1925年5月16–23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七屆遠東運動會，吳德懋榮獲男子田徑五項全能冠軍，為中國奪得唯一一塊金牌。此事當年在全國影響極大，因此儲安平記憶深刻。

東大附中是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中學。掌校者廖世承(1892–1970)，江蘇嘉定人，出身於清華學校，留美獲布朗大學教育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布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東南大學教育科教授兼附中主任，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中學教育專家。廖世承在東大附中期間，銳意革新，率先採用「三三新學制」，結束了近代中國中學學制混亂的局面，在教學中進行美國道爾頓制實驗，並出版了著名的《東大附中道爾頓實驗報告》，在全國享有盛譽。

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發生英國巡警殘殺中國商民的「五卅慘案」，一時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舉國罷工、罷市、罷課，譴責列強殺人暴行。6月3日，上海最著名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562名大中學生為抗議校長卜舫濟阻止學生上街遊行並侮辱國旗，憤而離校。聖約翰中文部教師錢基博、孟憲承、伍叔儻等十七名教師亦隨之離校，史稱「六三離校運動」。聖約翰離校生在滬海道尹張壽鏞、江蘇交涉使許秋帆、上海總商會會董趙晉卿、原浙江交涉使王省三以及劉湛恩、朱經農、張君勱、榮宗敬、張嘉璈等商學兩界名流的支持下，另立新校，定名「光華大學」，並公開向全國招生。光華的成立，是震驚全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其脫離教會學校聖約翰，呼籲國人自辦大學，也是當時如火如荼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中最重要的成就。聖約翰離校大中學生562人中，有400餘人進入光華大學及附中。滬江大學附中、揚州美漢中學、蕪湖聖雅各中學、安慶聖保羅中學等教會學校的學生亦紛紛申請轉

34　儲安平：《哥倫布》，《中央日報》1936年9月27日。

入。[35] 從東大附中畢業的儲安平來到上海，參加了光華大學暨附屬中學第二次招考，被錄取為高中一年級的新生。[36]

儲安平選擇光華附中，似乎可以視為其強烈民族主義觀念的初步體現，即他認同光華大學及附中「打倒洋奴教育」、「收回教育權」等飽含民族主義色彩的教育理念。儘管民族主義是時人普遍分享的一種觀念，卻不能因此便對儲安平的民族主義思想予以忽視。與當時流行的「醒獅派」國家主義者不同，儲安平並不以國家為最高目的，對中國固有道德文明也無自負意識，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只是一種簡單的愛國觀念，一種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背景之下，對獨立、自主、富強、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深切期待。這種愛國主義是理解儲安平一生的重要線索，其後他拒絕離開大陸，執意留下來建設新生的中國，便是出於這種愛國主義。

光華附中初建時，租賃臨時校舍於上海新西區的豐林橋(今徐匯區楓林路)一帶，主任由原滬江大學教授陸士寅擔任。豐林橋外圍是北洋時期上海的「政治心臟」，有滬海道尹署和江蘇交涉使署，正是張壽鏞和許秋帆辦公之處。光華附中選址於此，應是出於就近照顧的考慮。但聖約翰離校事件倉促，並無教室設備可資利用，豐林橋一帶開闢較晚，房屋稀疏簡易，實在不堪其用。1927年，國民軍北伐，豐林橋一帶因靠近租界，成為雙方對峙的前線。附中受戰火蹂躪，學生被驚嚇而四處逃避，校方遂將學校遷入大西路的光華大學新址(今長寧區延安西路東華大學校址)。[37] 同年，陸士寅辭職，主任一職先由大學部國文教授錢基博暫代，後由廖世承擔任。

1927年夏，國民黨佔領南京，解散江蘇省教育會，停辦國立

35 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淚錄》，光華大學，1928年，第47–72頁。

36 《光華大學暨附屬中學第二次錄取新生揭曉》，《申報》1925年9月2日。

37 張振鏞：《校史》，《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光華大學，1935年，第1–2頁。

東南大學。東大附中主任廖世承來到上海，擔任光華大學教育學教授兼附中主任。1928年9月，擔任光華大學副校長。據周有光回憶，當時有人請廖世承做大學校長，但他非常謙虛，推辭不就，只肯擔任副校長並掌管中學。他認為中學教育至關重要，辦好中學是辦好大學的關鍵。[38] 他將治理東大附中的經驗應用到主辦光華附中之上，在校積極修改課程，注重教學訓練，設立獎懲制度，嚴格訓育學生，又制定了「三年教育計劃」，包括編輯教材、擴充學額、建築教師宿舍、修建室內運動場、編輯生活指導、提高學生作業興趣、充實學生自治會、建設理科小工廠等。[39] 光華附中的教師，既有洪北平、何仲英、顧盡丞等舊聖約翰中文部的資深學者，也有潘序祖(予且、予端)、張沅長、周耀(周有光)、姚璋(姚舜欽)等青年才俊。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國文、英文、公民、社會科學等科目的教育，都各有特色。光華附中後來居上，很快就成為一所聞名全國的中學。

豐林橋時代的附中設施簡陋，教室和宿舍相隔百步之遠，「或烈焰熏天，則往來苦暖，時或雨雪霏飛，跋涉為艱」，上下學非常辛苦。但學生們自認為負有教育獨立的光榮使命，求學熱情高漲，夙志堅忍，很少有人發表怨言。[40] 學生的業餘生活也十分豐富。1926年1月，高一學生趙家璧聯合高二的楊蔭溥、高三的阮篤成等在校內出版了《晨曦》月刊。[41] 從創刊號的目錄看，該刊設有論著、談藪、科學、讀書錄、小說、文苑、戲劇，談屑等八個欄目，多登載名人在光華的演講和學生習作，內容豐富多彩。[42] 校刊以外，還有各種學生會、音樂會、美術會、自然科學研究會、中英文演說辯論會、話劇社以及各種運動比賽、童子軍

38　周有光先生訪問記錄，北京，2012年1月4日。
39　張振鏞：《校史》，《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第3頁。
40　《壬申級級史》，《光華年刊》1926年，第149頁。
41　趙家璧：《本校刊物的誕生》，《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第198頁。
42　《目錄》，《晨曦》1926年第1卷第1期。

技術表演、徒步旅行、自由車長途旅行等等，校園文化可謂活潑生動。[43]

遺憾的是，儲安平並未在校刊《晨曦》上發表文章，亦未參加多數校園活動。目前可考的是他參加了「宜興同學會」。該會在建校之初即已成立，其後由於大學部和中學部長期分離，同鄉聯絡不便，致使其會形同虛設。1927年秋，附中從豐林橋遷到大西路的大學部校址後，經儲安平提議，宜興同鄉會得以重新組織。[44] 據1928年《光華年刊》顯示，他在高三時還擔任過年級文牘部副部長的職務。不過，這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緣職務，職責不過是起草文檔公告而已。[45] 光華附中教師潘序祖在1932年的回憶文章中說道：「儲安平君，他不單長於創作，而且長於批評。他的作品，有一種特殊的作風。他曾在《新月》上努力過，又為新月書店編過書，作品也散見於報章雜誌。他在附中的時候，沒有參加過什麼團體，所以也是一位無名的英雄。」[46] 的確，從現存的儲安平文章來看，他在附中後期已開始對文學感興趣，並開始了文學創作。

左翼文學

1925年後，上海文壇的風氣和五四時期已有很大不同。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表現俄國革命的文學作品如洪水般湧入中國，文學藝術方面的重建，逐步由「全盤西化」轉為「俄國文化熱」。經過五卅運動和國共大革命的激蕩，「革命文學」在中國更是一時臻於鼎盛。成立於1922年的創造社和1928年的太陽社是宣傳「革命文學」的骨幹。他們出版了《創造》《幻洲》

43 潘序祖：《課外作業》，《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第121–126頁。
44 《宜興同學會》，《光華年刊》1928年，無頁碼。
45 《中學各級》，《光華年刊》1928年，無頁碼。
46 潘子端：《光華附中的課外作業》，《光華大學附中週刊》1932年第1卷第1期。

《洪水》《流沙》《太陽》等左翼雜誌，不遺餘力地鼓吹「革命文學」。總體而言，他們所理解的「革命文學」比較狹義，那就是「在精神上徹底同情於無產階級，在形式上徹底反對浪漫主義」；「以工農大眾為描寫對象，使用接近普羅大眾的用語，反抗一切資本家、帝國主義和舊勢力，用文學鼓吹、宣傳、指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路徑。」由於「革命文學」的講法相對含糊，後來逐漸被主體指向更加明確的「無產階級文學」代替。左翼作家們將文學視為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認為文學最主要的功用是宣傳，否定文學的審美性、個人性和藝術性。[47]

1927年10月，魯迅定居上海。很快就有一大群學生和青年作家聚集在他周圍，或向其主持的雜誌投稿，或邀請他來學校演講。11月16日，魯迅接受光華學生郭子雄、洪紹統的邀請，在學校飯堂做了一場題為《文學與社會》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批評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認為那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象牙塔文學，也批評了「革命文學家」，認為他們並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其文學創作不過是一種對社會的詛咒式發洩，並不能創造出真正的文學。[48] 但是，魯迅批評的只是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家」，而非「革命文學」。他從廣義上理解「革命文學」。在他看來，一切弱者反抗壓迫，呼籲破壞舊社會，謳歌建設新社會的文學，都可以稱作「革命文學」。「革命文學」不能完全無視文學的審美性、個人性和藝術性。「革命文學」也應該由真正的革命階級來創造，而不是由創造社、太陽社一班行為可疑的才子文人來書寫。[49]

儘管魯迅和「革命文學家」們其後展開了長達一年多的「革命文學論戰」，但從文學譜系上講，兩者都屬於文學中的左翼一

47　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6–127頁。

48　魯迅講，洪紹統、郭子雄合記：《文學與社會》，《光華週刊》1927年第2卷第7期。

49　王宏志：《魯迅與「左聯」》，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6–35頁。

脈，只是對「革命文學」暫時存在着不同理解，而決非在文學觀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且，由於中共的干預阻止，以及魯迅閱讀馬列著作後產生思想轉變，雙方在1929年握手言和，並於1930年初共同組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完全站到了同一陣營。

儲安平的文學閱讀和寫作，就是在「革命文學」風靡中國的背景下開始的。作為高中生的他，並沒有仔細分疏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異同，而是籠統受左翼一脈作家的影響。他閱讀了大量俄國文學和創造社、太陽社出版的左翼雜誌。尤其是1927年11月旁聽了魯迅在光華大學的演講後，受魯迅個人魅力的影響，開始給魯迅投稿、寫信，從思想和行動上逐步接近魯迅。此時他所有的文字都帶有左翼色彩或和左翼作家有關，這有正式發表的文章為證。

目前可見的儲安平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名叫《關於睡廟求醫的故事》，是為回應周作人的文章《花東廟》和潘達仁的《關於「睡廟求醫」》而作，講的是自己所知道的宜興當地關於「五聖」和周處的傳聞，發表在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語絲》雜誌上。[50] 儘管《語絲》並非左翼雜誌，但在上海時代由魯迅擔任編輯，發表了不少投槍式的文章。儲安平這篇文章正是經魯迅之手刊發的，儘管講的是掌故軼事，但可知儲安平是該雜誌的讀者，而且在行動上親近魯迅。

第二篇文章是對俄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名《布洛克及其名作——〈第十二個〉》，寫於1928年春，發表於同年5月的《北新》雜誌。《第十二個》是一首長詩，產生於俄國十月革命時期，歌頌的是十二個俄國無產階級兵士為改變世界、實現正義而進行革命鬥爭的浪漫故事。查當時的通行譯本，《第十二個》應為《十二個》，作者亞歷山大·勃洛克，中譯者胡學，北新書局1926年出版。該書列入魯迅主編的「未名叢刊」，魯迅還在書後

50　儲安平：《關於睡廟求醫的故事》，《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40–142頁。

寫了後記，盛讚這部作品的藝術價值。[51] 儲安平介紹了這部長詩的內容和思想，還介紹了俄國文壇對它的反應，從中可知他對當時的俄國文壇有頗深的瞭解。他和魯迅一樣，對這部革命頌歌非常推崇，認為其「將隨革命以永存」。他還不吝讚許之語，認為「各國的文壇……都將以無產階級文學為依歸，而有唯新俄羅斯文學是瞻的趨況，真合上了 last shall be first 一句。」[52] 他認為未來中國的文壇發展的主流方向，必定是無產階級文學。

第三篇文章是一部獨幕劇，名《血之沸騰》，發表在1928年5月的《流沙》半月刊上。《流沙》創刊於1928年3月，是後期創造社的主要刊物。該刊希望「刊登描寫現實的小說、詩歌及雜文等形式，喚起階級意識」，是當時比較著名的左翼雜誌。儲安平這篇文章以醫院為場景，通過工人、工人妻子和看護婦的對話，講述了工人代表因要求加薪，被資本家毆打，以及試圖尋求進一步抗爭的故事。他借劇中人的口說：「(資本家)的人格，比狗的狗格，都不如」，「他們只曉得奉承外國人……不顧到什麼是公眾的幸福，什麼是工友的利益！」「我們的意志是這樣的堅決！從此以後，我們不能再像以前般沉默了！是的，我們要鼓起我們的熱血來鬥爭！」[53] 整部戲劇情節簡單緊湊，非常符合革命文學「宣傳性」和「煽動性」的要求。其中譴責工頭的剝削，歌頌無產階級，讚揚工人階層意識覺醒的思想歷歷可見，實在是一部標準而典型的左翼話劇。

儲安平在附中時代公開發表的三篇文章，一是經魯迅之手刊發，一是介紹俄國「革命文學」，一是標準的左翼話劇，說明他早期受左翼文學思潮影響頗多，並試圖進行這方面的文學寫作。

51　魯迅：《後記》，亞歷山大·勃洛克：《十二個》，北新書局，1926年，第67–74頁。

52　儲安平：《布洛克及其名作——〈第十二個〉》，《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42–148頁。

53　儲安平：《血之沸騰》，《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17–227頁。

左翼文學對儲安平成長的作用不可忽視，其包含着一種對未來新世界強烈的主觀想像，革命、犧牲、獻身等主題都深具浪漫主義色彩，後來的儲安平雖然沒有成為一個革命者，卻在許多行為中都表現出挺身而出、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左翼文學本身也是質疑現行社會制度的產物，包含着改變現狀、顛覆現實的訴求，帶有強烈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很可能初步影響了儲安平的思維結構，使他開始產生一種批判思維，為他日後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奠定了基礎。

第二章　光華大學

> 他要讓自己去承當那幾千里一片廣土上的月色，在白白的月色下吹一段淒壯的胡笳。他要奔上那不長一根青草的山頭，在山頭上引吊一回那破碎的山河。
>
> ——一段軍行散記，1931

光華週刊

1928年9月，儲安平由附中升入光華大學文科政法系。按照當時的規定，附中的優秀學生可以免試直接進入大學部。不過，很多附中學生未必看好私立的光華大學，即使有免試的機會，也紛紛嘗試投考北大、清華、燕京等實力更雄厚的老牌名校。就如日後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夏鼐，便是在附中「不滿意於光華大學」，故放棄免試的機會，於1930年秋考入燕京大學。[1] 儲安平在附中並不是最頂尖的學生，投考了國立中央大學僅得「預科備取」，遂決定直接升入光華大學。[2] 進入大學後，他成為資深的「光華土著」。他一改附中時代很少參與公共活動的習慣，開始積極入世，幾乎參與過光華校內的大部分學生活動。

光華大學最主要的學生刊物是《光華週報》，創刊於1927年4月8日，由「上海光華大中學生會編輯部」出版，宗旨是「砥礪學行、培養愛國精神」，注重刊登愛國和學術方面的文字。[3] 同

1　夏鼐：《夏鼐日記》第1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2　《國立中央大學錄取新生》，《申報》1928年8月31日。
3　統：《卷頭語》，《光華週報》1927年第1卷第1期。

年秋，《光華週報》更名為《光華週刊》。1928年9月，《光華週刊》第4卷第1期出版，出版方變為「上海光華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成員有謝元範、馬厚文、儲安平、郭子雄、陳聲和、潘炳麟、王家棫、詹文滸、趙家璧、于在春、姚兆勝、陳乃猷、俞大綱、王志聖、夏賡英、曾克家、胡越、郭斌佳、錢振海等十九名學生。這些學生多半為附中舊人，負責《光華週刊》的主任是郭子雄，副主任是俞大綱和于在春，儲安平擔任印刷主任，負責聯絡刊物的印刷事宜。[4] 1928年12月10日，第4卷第4期《週刊》出版，郭子雄、俞大綱、于在春三人因事辭職，同人挽留無效，主任改為陳聲和，副主任改為夏賡英和儲安平。[5] 儲安平雖然只是副主任，但實際形同主任，因為陳聲和只是資格稍老(1925級)，文學水平一般，夏賡英讀商科，又是國民黨員，熱衷於學生運動，未必真正對文字工作感興趣。1929年初，《光華週刊》出版第5卷，儲安平由副主任升為主任。可以說《光華週刊》從第4卷第4期開始，實際編務幾乎全部由儲安平執行。這是儲安平開始編輯生涯的第一步。從此，他在光華也由附中時代的「無名」變為「有名」。

《光華週刊》時代的儲安平已經頗具責任感，他盡可能利用這塊公共園地進行批評，督促學校進步。第4卷第1期上，他率先發表了《多方面的發展》一文，指出光華在校園建設、課程設置、日常管理等方面的不足。這些不足是因為經濟問題，光華是私立大學，經費需要自行籌募，致使學校在經濟方面捉襟見肘，影響發展。由於儲安平當時親近左翼文學，很自然地採用了馬克思主義式的話語分析：「任何一個社會我們都可以分出兩個階級：一是下層基礎，一是上層建築」，「下層基礎就是一些經濟的狀態，而這種經濟的狀態，支配了上層建築中的一切意識形

4　《編輯委員會委員》，《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1期。
5　《編輯委員會啟事》，《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4期。

態。下層基礎不穩固，上層建築必搖盪。」[6] 因此，他呼籲光華在募集資金方面進一步努力，謀求出路。類似的建議又體現在他的《灰霧之消散》一文中。他承認光華教授著名，學生優秀，文科教育在國內值得稱道，但如果要成為真正的學術中心，至少應有一個科系成為國內大學的王牌。而目前光華並無這樣的科系，這和校方作為甚少或辦學經驗不足有關。儲安平再次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校方管理疏鬆、開課隨意、忽視學生、條件簡陋等問題。他呼籲學校傾聽學生的意見，體恤學生建言的誠意和熱忱。[7]這兩篇文章，思想比較鬆散，文風稍嫌拖沓，批評力度也有限，但作為學校一分子的責任意識卻歷歷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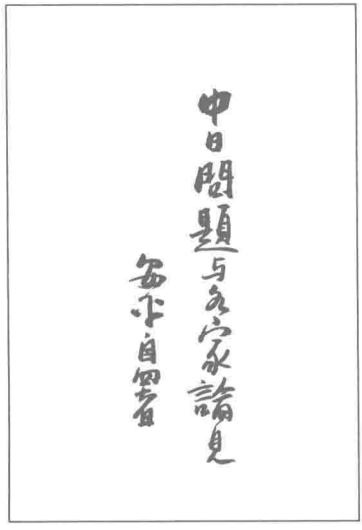
責任之外，是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在《灰霧之消散》的同期，儲安平刊發了一篇署名「大一同學四十五人，安平擬稿」的文章，題為《我們的級長——潘炳麟君！》。光華及附中實行級長制，大一的級長仍為附中高三時期的級長潘炳麟，儲安平曾在其下擔任文牘部副部長。儲安平提到，某次年級會向學校和平提案反對周姓教員，潘氏激烈煽動緊張空氣，導致學校惱怒不准所請；年級會討論開遊藝會，投票中多數同學都不同意，潘氏違反規則，強令重新投票四次，才最終使表決得以通過；作為年級長，潘氏常年在外招搖，將本級事務置之腦後。同學普遍對其憤怒已久，但無人敢首先站出來講話，儲安平遂聯合一年級四十五位同學，公開揭露潘之劣行。

儲安平認為潘炳麟才德均差，不能勝任級長職務：「英文演說，不是客氣，你也沒有資格；而中文演說，你也沒有一二名的希望」；「你的劣根性是什麼呢？就是雖與己無利也無損而與人卻有益的事，你也必得設法阻止。」「辦事則處處用手段、敷

6　儲安平：《多方面的發展》，《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1期。
7　安平：《灰霧之消散》，《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4期。


光華週刊
第四卷 第一期
獻辭……郭子雄
紀念孫總理誕辰……一個黨員
藝術生活……謝元範
多方面的發展……儲安平
苦悶的生活之反抗……穴 奸
大學外史……戊 辰
兩個義校參觀記……紋 鑲
三言兩語(八則)……玄玄等

儲安平編輯的第一本雜誌《光華週刊》封面


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
每年自習

儲安平自題《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扉頁



儲安平光華大學學籍卡照



端木露西光華大學學籍卡照

衍、滑頭……嗚呼！像這種人，哪配做領袖？」[8]從這篇批評文字中可見，儲安平還缺乏批評經驗，用詞較重，且頗帶情緒化。對潘炳麟個人能力的質疑，亦可見此時他已經初步流露出恃才傲物的態度。不過，身為大一新生，敢於公開批評資歷頗深的年級長，體現出儲安平嫉惡如仇的性格，領銜執筆，也可見儲安平初步的學生領袖氣質。

潘炳麟迅速對儲安平的批評作出回應，文章被儲安平刊登在下一期的《光華週刊》上。潘氏不談儲安平所列舉的擅權瀆職等事，只講類似事情可私下提出，公開揭發並不合適。儲安平認為他德才不濟，實在是對他的侮辱嘲諷。他認為四十五位同學受儲安平利用，將「人格和道德付之於執筆者，任他去玩弄」，並說，公開寫信以「劣根性」形容別人，是光華的恥辱，也是儲安平和這四十五人「劣根性」的暴露。[9]最後，潘炳麟公開聲明，主動辭去級長的職務，儲安平的批評初步以勝利告終。因為這次批評，他在光華樹立起權威，可謂一戰成名。

受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影響，《光華週刊》在1927年和1928年初先後呈現出「革命化」、「文藝化」、「學術化」等多種風格。到第4卷，受儲安平影響，開始呈現出一種批評的色彩。尤其是在批評學校事務和年級長之後，儲安平開始重新總結《週刊》的辦刊理念。他認為，《光華週刊》應該力求公平公正，不是「三五人所把持或包辦」的刊物：「他所說的，乃是全體同學之所要說的；他所批評的，也是全體同學之所要批評的」。刊物應該保持獨立精神：「有許多人會利用刊物，形成他們自己做走狗的一種工具。他們的方略是絕對妥協，他們的手腕乃是對當局予以一種歌頌般拍馬，而他們的思想，則是落伍、落伍、落

8　大一同學四十五人、安平擬稿：《我們的級長–潘炳麟君！》，《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4期。

9　潘炳麟：《對大一四十五人的覆函》，《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5期。

伍而已。他們會將刊物形成為一種學校裏的點綴品、裝飾品、消耗品，而毫無其所以需要它存在之意義。」他理想中的編者應當是一個進步分子：「有着革命的精神，遠大的志望，而決不是一個陳敗的敷衍者或趨炎的附勢者。」儲安平的責任感在此再次體現：「我們雖然曉得我們自己決不是一種走狗，或是一種不肯負責的一流人，但，我們自己又明白我們自己學識才瞻之渺陋。我們這次，只是為大局而出來勉力維持一下，而決不是自以為有了什麼把握而敢毅然受任的。」促使他自己站出來維持《週刊》，則是出於一種至誠和「盡忠報職」的態度。[10]

這篇發表於1928年12月的宣言書非常值得注意。1946年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為其確立了公平、獨立、客觀、建設四種態度。這些態度在他編輯的第一本雜誌《光華週刊》中亦隱約可見。由於資料限制，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認為，他的編輯思想間接來源於《新月》《獨立評論》。[11] 然而，《新月》發刊詞《新月的態度》(1928年3月)雖然發表在這篇文獻之前，所講的基本是文藝，《新月》同人要到1929年後才開始談論政治，展現出批評和抗爭的色彩。因此，與其說儲安平的編輯思想受某本雜誌影響，不如說由他自己獨立總結得出。實際上，公平公正客觀獨立等辦刊準則，對報人而言是淺見、底線，也是常識性要求，差別在於辦刊者本人是否有良知和勇氣堅守這些宣言。儲安平的可貴在於始終言行合一，這在編輯《光華週刊》的時代就已經端倪初見。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文字所透露出的思想並不完全是「自由主義」的。儲安平提倡辦刊公正、獨立，精神上雖然帶有自由主義色彩，但「革命」、「走狗」、「階級」之類的詞語，明顯是左翼文學的常用詞。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分析，顯然來自各種左翼教科書。這篇宣言還誇大地將自己與學校當局置於對

10　安平：《批評及罵與週刊及週刊之今後》，《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6期。
11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第109–114頁。

立的立場，言論中似乎帶有一種真理在握、唯我獨革、非此即彼的「革命特徵」。他對年級長潘炳麟的評價也明顯不夠寬容。因此，此時儲安平的批評思想，更多的是拜時下流行的左翼文學所賜。

良師益友

儘管儲安平對光華大學多有批評，1927–1930年卻是光華的全盛時期。1926年國民黨北伐，北京的政治形勢收緊，大批知識分子南下上海避難，落腳於光華大學。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停辦國立東南大學，又導致大批東大教授出走上海，加盟光華。一時間校內名流雲集，胡適、張東蓀、徐志摩、羅隆基、潘光旦、吳澤霖、陳茹玄、錢基博、呂思勉、張爾田、吳梅、沈有乾、何永佶、諸青來、王造時等名教授皆列講席，使光華文科的師資力量一時間居全滬各大學之冠。

光華教授中，名氣最大的要數胡適。胡適當時暫居上海，兼任光華講師，教授中國哲學史課程，每週三小時，每小時薪水為大洋三元。[12] 胡適的任期為1927年9月–1928年6月，當時儲安平還在附中讀書。許多附中學生都仰慕胡適的大名，站在教室外旁聽他的課程，按理說儲安平亦可能旁聽。其後儲安平主辦《觀察》，敦請胡適為撰稿人並多次與之會晤，向其請教，這段間接的師生之誼，很可能是儲安平向胡適引介自己的一個由頭。當然，胡適並不認同《觀察》的立場和態度，始終未為其撰稿，我們在後面將會予以說明。

名氣略遜於胡適的是張東蓀。1928年秋，張東蓀來到光華教授哲學課程。一年之後，就任改科為院後的首任文學院院長。張東蓀在光華的兩年，正是儲安平在光華最活躍的時期。我們從儲安平的成績單上看到他在1930年春選讀了「名學」，這正是張東

12　夏鼐：《夏鼐日記》第1卷，第13頁。

蓀開設的課程。[13] 1930年夏，張東蓀北上，轉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半年後，儲安平亦北上投奔燕京。1932年，張東蓀等國社黨人主辦《再生》雜誌，儲安平曾經為其供稿兩篇。後來他主辦《觀察》，亦首先獲得了張東蓀的文章支持。張東蓀不但是《觀察》的重要撰稿人，其著作《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也由儲安平的觀察社出版。

儲安平與羅隆基、王造時、潘光旦等人的關係亦是在光華時期確立。章詒和曾說，章伯鈞對她講，儲安平自述在光華讀書時，羅隆基已經離職。[14] 若章伯鈞回憶無誤，很可能是儲安平在刻意避諱。羅隆基在光華擔任政治學教授，任職近三年(1928年9月–1931年1月)，儲安平的專業便是政治學，光華政治學方面的師資非常有限，常年只有三四位教授，他不可能與羅隆基沒有師生之誼。王造時曾在1930年春支持過儲安平在校外編輯雜誌。1931年他擔任文學院院長，直接指導儲安平組建「光華抗日救國會」。1933年他在自辦的《自由言論》上刊發了儲安平的稿件，可見他與儲有比較深的關係。但是，後來儲安平與羅、王兩人漸行漸遠，《觀察》撰稿人中並沒有兩人之名。這很可能是因為羅隆基的道德人品較差，為儲安平所鄙視，王造時則領袖慾極強，一直試圖辦刊辦報自成一派，不願與儲安平合作。儲安平曾經跨系選修過潘光旦的「普通生物學」課程。潘光旦在當時口碑極佳，人品學問皆屬一流，為儲安平所尊敬。後來，潘光旦成為《觀察》的主要撰稿人，一直和他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

儲安平就讀於光華的時代，吳澤霖、沈有乾、何永佶三人在此任教，分別教授社會學、邏輯學、政治學。三位都是各自領域的權威學者，儲安平在光華與他們確立師生之誼，日後邀請他

13 《光華大學學生成績單·儲安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藏，光華大學檔案，檔號B20892。

14 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最後的貴族》，第39頁。

們成為《觀察》的撰稿人。余上沅在光華教授戲劇的時間段為1927–1928年夏，當時儲安平還在附中，但已經與之相識。邵洵美並不是光華教授，但他是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名流，也是新月派的骨幹，儲安平因徐志摩和《新月》的關係與之相識。1931年儲安平在校外編輯雜誌，首先獲得邵洵美的支持。其後編輯《中央日報》副刊，邵洵美也是常見作者。1936年，邵洵美的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文學時代》雜誌，敦請儲安平擔任主編。張沅長是聖約翰離校運動中唯一拒絕碩士文憑的學生，其後進入光華附中擔任英語教員，與儲安平有師生之誼。後來，張沅長留學海外歸來，擔任中央大學教授，成為儲安平的《中央日報》副刊、《文學時代》和《觀察》的資深撰稿人。

學生輩中，儲安平的第一個摯友是趙家璧。他是聖約翰大中學離校生之一，由附中到大學凡七年，始終與儲安平同級。趙家璧在校期間就表現出卓越的文學創作和編輯才能，在附中時主編《晨曦》，大學一年級時被良友公司聘為《中國學生》的編輯。趙家璧主編《中國學生》時，儲安平在雜誌上發表了多篇文章。1931年，趙家璧主持「一角叢書」，發行的第一本書是《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翻譯的是 *Forum* 雜誌上發表的胡適、威爾斯、愛因斯坦、杜威四人的英文自述，其中《威爾斯的信仰》一文，譯者即為儲安平。[15]1933年，趙家璧編輯了一本散文集《四年》，其中收錄了趙家璧、儲安平、郭子雄、陸壽長等光華學子在四年大學期間所寫的代表性散文。[16]儲安平畢業後，擔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經常得到趙家璧的文章支持。1935年趙家璧北上組稿，經過南京，亦主要由儲安平接待。[17]1936年，

15　儲安平譯：《威爾斯的信仰》，胡適等：《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良友圖書公司，1931年。

16　郭子雄、儲安平、趙家璧、陸壽長、唐錫如等：《四年》，良友圖書公司，1933年。

17　趙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文壇故舊錄》，中華書局，2008年，第136頁。

儲安平在良友公司出版小說集《說謊者》，是趙家璧督促之功。1946年，儲安平主辦《觀察》，特邀趙家璧為撰稿人。

著名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亦和儲安平頗有交情。穆時英1925年入光華附中讀初中一年級，1928年升入高中，期間作為文學院特別生，跳級成為光華大學1930級英文系學生，1934年畢業。穆時英是光華名氣最大的學生作家，在《小說月報》《現代》上發表了大量小說，又有多種小說結集出版，轟動上海文壇。穆時英在1931年曾經形容儲安平：「這位朋友，有點像神龍，到現在，我還摸不清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人是聰明的人呢，也是個很漂亮的人。從小是個孤兒，所以人情世故很深；因為他太孤寂了，所以時常生幾場小病，時常要尋個愛人伴他。他很勤奮，時常寫東西。」[18] 儲安平自己形容：「時英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在上海時，常在一起玩，並且同住在一個房間裏過。」[19]

當時京滬存在着大批從事新文學寫作的學生作家，他們多半是《新月》雜誌的撰稿人。[20] 由於當時的文學圈子並不算大，儲安平很自然地和他們熟識。其中有：郭子雄，光華1925級英文系；沈祖牟，光華1927級銀行系；于在春，光華1928級國文系；徐轉蓬，光華1929級國文系；陳夢家，中大1927級法律系；方瑋德，中大1928級外文系；何家槐，中公1930級中文系。除此之外，還有孫斯鳴，先就讀於光華，後轉學中國公學。1931年曾撰文支持儲安平編輯的雜誌《今日》，後任《論語》《人言週刊》編輯，連載儲安平的《給小讀者的信》；沙學浚，由光華附中轉考金陵大學、中央大學，後為《觀察》撰稿人；郭有守，郭子雄之兄，徐志摩的摯友，畢業於北京大學、巴黎大學，任職於教育部，愛好文藝，後來亦成為《觀察》的撰稿人。光華時期的師友之誼，是他人生路上第一批人脈資源。

18　穆時英：《光華文人志》，《光華年刊》1931年，無頁碼。
19　編者(儲安平)：《本期編後》，《中央日報》1933年8月10日。
20　秦賢次：《儲安平及其同時代的光華文人》，《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文學轉向

儲安平自認為，所有師長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徐志摩。據儲安平發表於1932年的《悼志摩先生》一文描述，他初見徐志摩是在1928年春的新月書店，若干人打算排演腳本在書店與志摩談話，他在場旁聽。他形容「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爐，大家圍着他感到有勁……過後一兩年，他收下了光華的聘書。一次更接近的通氣是不消說得的。」[21]徐志摩在光華的任期分為兩段，第一段是1927–1928年夏，屬兼任；第二段是1929–1931年春，屬專任。儲安平和徐志摩「更近的通氣」，應該是在第二段。

徐志摩任教光華的時代，新月派文學在上海復興，開始呈現出一種與左翼文學分庭抗禮的形態。眾所周知，新月派在文學觀上與左翼文學針鋒相對。徐志摩在《新月》發刊詞《新月的態度》中，將批判對象指向包括左翼文學和頹廢派的在內的各色流行文學，他將「尊嚴」和「健康」視為文學的兩大標準，反對文學上的偏激主義和功利主義，希望新月派文學「從惡濁的底裏解放聖潔的泉源，從時代的破爛裏規復人生的尊嚴」，維護文學本身應有的嚴正與格律。[22]新月派文學是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他們普遍奉行一種文學觀和寫作實踐，即文學作品是否偉大，要看它表現的藝術性是否深刻。文學的任務在於反映普遍人性，文學的精髓部分是涉及普遍人性的部分，所謂的階級性、政治性，實為無關緊要的附屬。[23]

新月派的文學態度，貌似無關於時代和政治，實際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以載道」觀的否定，對五四新文學觀的繼承。他們不認為文學或詩歌可以擔負起救世的宏大使命。他們認為，那些無產

21　儲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1932年第4卷第1期。
22　徐志摩：《新月的態度》，《新月》1928年第1卷第1期。
23　黃昌勇：《新月派文學思想論》，《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

階級文學，貌似在替普羅大眾代言，但很多不過是革命文學家為了嘩眾取寵的產物。革命文學家之間的混亂攻伐，粗糙的文學實踐，非但對文學的格律是一種致命毀滅，亦未見會真正發揮什麼社會功用。新月派在文學格律與技巧上下工夫，似乎是躲進小樓構建文學象牙塔，至少能捍衛文學的藝術性，可以經得起歷史檢驗。

1929年，原本互相攻伐的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意識到新月派的復興，遂握手言和，將矛頭對準了他們共同的敵人，與新月派骨幹梁實秋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文學罵戰。就在雙方罵戰的前後，儲安平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文學轉向。

當年3月，他在《偶記隨感四則》裏還認為，無產階級文學在「謀促進和激鞭無產階級的醒悟和奮鬥」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不能因為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低，就說無產階級不需要無產階級文學。[24] 到1930年4月，他發表的《第四十一概略》，雖然仍是介紹蘇俄的浪漫主義革命文學，卻在文末指出：「本文中引及了魯迅先生的演講，那演講，已是兩三年前的事了。因為現在魯迅先生的方向已轉到新興階級的一方面來了，所以在此有聲明的必要。」這個聲明話中有話，暗示他對已成為「左聯」盟主魯迅的立場和文風已有微詞。據光華同學、日後成為中共江西蘇區「中華人民委員會」秘書長的謝然之回憶，1930年秋季以後，儲安平已經作為支持新月派文學的一分子，與校內支持左翼文學的同學互寫壁報論戰。[25]

文風的改變是說明這種轉向更直接的證據。儲安平寫於1930年秋的《小病》《殘花》《母親》《牆》等，皆文風繾綣，抒發的是個人內心的喜怒哀樂，情感動人真摯，毫無革命、階級之類的思想和內容。這些散文輕盈、優雅、風度從容、哀而不傷、瑰麗

24　儲安平：《偶感即記四則》，《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49頁。

25　謝然之：《自述年譜簡編長編初稿》，《新聞與教育生涯：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台北：東大圖書，2000年，第155頁。

精湛，帶有明顯的「感美感戀」的心態，實在是典型的新月派文學。[26]他發表文章的雜誌，也由《流沙》《語絲》轉到新月派文人的集聚地《新月》和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真美善》。

這種轉變，一方面由於魯迅和儲安平等光華同學漸行漸遠，一方面和1929年後徐志摩專任光華教授有關。當時，儲安平和穆時英等組織了「光華文學會」。1929年4月9日，該會派錢公俠、沈祖牟前往魯宅，邀請魯迅來光華演講，魯迅拒而不見；13日，該會再度致信魯迅，他連夜回覆拒絕。[27]據謝泳考證，6月，儲安平可能給魯迅投了一篇稿件，魯迅回信並退還了稿件。[28]魯迅一般不拒絕上海各大學學生的演講邀請，此次直接拒絕光華同學並退儲安平之稿，很可能是認為以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勢力在光華已經日漸壯大，這些學生最終不會成為他的同路人。這種做法，實在讓這些未諳世故的文學青年們的心靈大受傷害。

相比之下，任教於光華的徐志摩卻極願與學生玩成一片。學生們回憶，他們常常守在學校門口等待徐志摩的到來，遠遠望見志摩下車，就簇擁着他走進教室，開始一天愉快的功課。[29]徐志摩的上課方式極為特殊。「他在課堂的態度同別的教授不同，並不板起臉孔講演，但他卻能在課堂造成一種空氣。志摩的教書方法，受了牛津和劍橋教育的影響，目的在求師生間相互的接觸與瞭解，不僅在求灌輸學生們一點書本內的東西，還希望學生有力量去領悟書本外的事」。[30]徐志摩的教法也相當靈活隨意。有一次，徐志摩在光華的茅屋中講雪萊的《西風歌》，恰巧西風從茅屋的縫隙吹進屋時，正講到《西風歌》的末兩句，便引用原文

26　朱壽桐：《以感美感戀心態走出名士傳統》，《文學評論》1994年第1期。

27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頁。

28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第9頁。

29　趙家璧：《寫給飛去了的志摩》，《書比人長壽》，中華書局，2008年，第3–5頁。

30　郭子雄：《憶志摩》，韓石山編：《難忘徐志摩》，昆侖出版社，2001年，第119頁。

對着西風吟唱。[31] 他還經常帶領同學們搬離局促漆黑的教室，到校園中去上課。一群學生跟隨着徐志摩，看他第一個跨過籬笆，倚在梧桐樹幹上，開始念 W.H. Huson 的 *Green Mansions* [綠廈]和 *Birds and Man* [鳥與人]。其場景之浪漫，可以想像。

有了和文壇巨匠真正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作為仍在文學道路探索方向的儲安平，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徐志摩影響是在所難免的。他說：「(徐志摩)這人初看上去，和他應酬似乎很費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誠摯，他詩人的節氣。他對於後進，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熱。」「要他寫東西有一絲苟且是不來的……這認真是我們絕大的師法，我說不僅是在文學的努力上，便是在為一切學問或為人上也一樣。」「我寫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響的。『在相識的一淘裏，很少人寫散文。不過，』他說：『在寫作時，我們第一不准偷懶……對於他這份督促我永遠不該忘記』。」[32] 他顯然將徐志摩視為自己文學上的領路人。

不過，徐志摩雖然影響了儲安平，兩人的實際關係或許並不像表面材料《悼志摩先生》裏描述得那樣親密融洽。「徐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但他對儲安平，很可能也只是一種普通師生關係下禮節性的幫助。光華同學何雨文曾經回憶：「他(儲安平)自承是徐志摩的得意門生，他的散文就是志摩式的濃得化不開的散文。然而志摩不喜歡他，志摩竭力捧場的是趙家璧和錢公俠。志摩不喜歡他的原因，可能為了他太倔強，太不隨和，與什麼人都合不來。他自己感覺到志摩不喜歡他，他就少到上海西摩路志摩的寓所——那是新月派文人聚會之所。」[33]這說明兩人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微妙。

31　邢鵬舉：《光華校史上最可紀念的幾頁》，《光華年刊》1933年，無頁碼。

32　儲安平：《悼志摩先生》，《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99–200頁。

33　《附匪分子儲逆安平弄巧反拙大禍臨頭，其人其事內幕》，《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登記卷·儲安平》，台北：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129000046134A。

情感遭遇

儲安平興趣廣泛，文學之外，一度曾熱衷於戲劇，這和田漢的影響不無關係。1928年夏，在光華教戲劇的余上沅離職，課程由田漢繼任。當時上海很多高校的學生都已在田漢的指導下組建劇團，作為光華教授，田漢也很希望光華能夠建立起劇團組織。1929年春夏之際，儲安平、錢公俠等和田漢商議，決定要在光華組織劇社。成立大會上，儲安平被選為臨時主席，錢公俠、俞大綱、王家棫為劇社章程起草人，約有四十人左右參與。田漢對劇社同人寄以希望，期待他們能夠在戲劇理論和技巧等方面有所突破，對劇團成員多有鼓勵。[34] 儲安平和劇團同人的熱情極高，決定排練田漢新創作的《戰鼓》等劇，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公演。但是，當時已經是學期末，大考臨近，便決定將公演推遲到下學期。隨即，田漢和儲安平率領劇團成員去吳淞海邊遊玩並野餐，盡興而歸。[35] 可惜的是，學期結束後田漢辭職。1929年末，儲安平亦辭去劇團主席之職，和劇團徹底脫離關係。

實際上，儲安平卸去的不只是劇團主席，還有《光華週刊》主任等校內職務。[36] 1929年12月，他在一封給留學海外的郭子雄等四位好友的信中說：「我很想漸漸地擺脫去一切俗事的糾紛……所以，光華劇團，這半年非但不幹，並且也脫離了。文學會現在由家棫兄負責。我想從明春起，更恢復我以前的何家角生活。」[37] 儲安平本來是光華最積極的學生，突然有此轉向，而且情緒低落頹廢，無心世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在情感萌動的年紀，愛上了一位姑娘。

這位姑娘，在他的文章裏化名為「桃妹」。他在寫於1928

34　《田漢在光華組織劇團》，《申報》1929年6月5日。
35　《光華劇團到吳淞去：首次公演改在下學期》，《申報》1929年6月15日。
36　《編輯委員會啟事》，《光華週刊》1929年第6卷第3期。
37　安平：《給海外的朋友們》，《光華週刊》1929年第6卷第3期。

年冬的散文《兩個少女與我》，1929年1月公開發表的情書《口供》中兩次提到了這位「桃姝」。[38] 按其說法，儲安平似乎很早就見過幼年的桃姝。數年後，她在上海讀書，儲安平去其校遊玩，看到了桃姝已經亭亭玉立並一見鍾情。這位桃姝是某個學生或青年劇團的名角。他曾經觀看過以桃姝為主角的「第一次公演」。他說：「(公演)上你那玲瓏的對話，入情的動作，深刻的表情，以及風一般的舞，鳥一般的唱……但在那晚，最足使我戀念不忘，至今還追念不忘的，還得推你那美目的兩盼。那兩盼……充滿了生命的跳躍，潛存了你全部的幽妙的情意……可愛的姑娘啊，你不是已經將我的心全帶去了嗎？」[39] 儲安平單戀桃姝至深，卻不敢真正接近。「公演」結束後，桃姝主動邀他同行，他因缺乏勇氣而猶豫恐懼，錯失表白機會。

由於缺乏資料，我們只能按照文章中的暗語，猜測桃姝的真實身份。早年儲安平對自己的情感敍述非常隱晦，經常會在真實敍述中摻雜一些虛構的情節。不過，其大多數片段都源於他自身經歷，大體可信。因為他曾經自述，他同意郁達夫所說的「文學創作的內涵總不免多少具些作者自身的寫照」，而他的文學創作「更是完全是歷史的記載」。[40] 郁達夫習慣在文學作品中自我暴露是人所共知之事，儲安平自認為在這方面不次於郁達夫，實際等於他親自確認了其一般文學作品內容的真實性。

如果按照桃姝是學生或青年劇團演員這個思路繼續，她的真實身份似乎可以判斷。我們看到，儲安平寫作《口供》的1929年1月，光華劇團還未成立，他在其中提到的「公演」、「劇社」的原型，在當時的上海，只能是田漢組織的南國社。當時的南國

38　這篇《口供》，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將其歸為小說，誤。儲安平在《說謊者》的序言中講過，從1931年春才嘗試寫第一篇小說，《口供》寫於1929年，只能是一篇根據實際情況演繹而出的散文。

39　儲安平：《口供》，《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32–133頁。

40　安平：《兩個少女與我》，《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5期。

社是上海最著名的戲劇社團，光華劇團成立前，儲安平便和田漢有所接觸，並承認自己是「南國社一個最沒有實用的分子。」1928年12月15日，南國社第一次在上海梨園公所公演，儲安平形容自己觀後的感觸：「在那種萬籟無聲大地如死的夜色中，我傷感地在操場上徘徊了好久，不是單純的敬佩，不是單純的感動，心靈中洶湧着的只是一種沒有理由的衝動。」[41] 如果是單純佩服藝術精湛，敬佩和感動就已經足夠，所謂傷感和衝動，按理說應該有感情的因素。聯繫儲安平對桃姝在「第一次公演」上精彩表演的稱讚，以及自己觀後面對桃姝複雜、糾結的心態，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儲安平所愛戀的，是一位南國社中的年輕女演員。

查當時資料可知，南國社第一次公演的戲劇有《蘇州夜話》《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等劇。[42]其中，《蘇州夜話》的女演員為姚素貞(飾女學生)、唐叔明(飾賣花女)；《生之意志》為吳似鴻(飾女兒)；《湖上的悲劇》為唐叔明(飾其弟)、王素(飾乎白薇)；《名優之死》為楊聞鶯(飾劉鳳仙)、唐叔明(飾蕭玉蘭)。[43] 其中的唐叔明和吳似鴻都是田漢的學生，和儲安平幾乎同齡，是劇社中最耀眼的兩顆明星。尤其是唐叔明一人分飾演三角，表演異常精彩，引起極大轟動。[44] 所有演員中，儲安平僅稱讚了唐叔明：「特別是唐叔明女士所飾的賣花女……使我受了極深的感動。」[45] 他的同學陳聲和稱讚她：「三個戲裏卻有三個不同的態度……雖然處於配角的地位，可是演來態度逼真，處處動人，真可謂演得恰到好處」。[46] 儲安平的這位「桃姝」，在

41　儲安平：《記田漢先生》，《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11頁。

42　《南國社第一日公演之盛況》，《申報》1928年12月17日。

43　田漢：《南國社時代》，《南國月刊》1930年第2卷第1期。

44　趙銘彝：《記唐叔明與吳似鴻》，《趙銘彝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第78–80頁。

45　儲安平：《記田漢先生》，《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11頁。

46　陳聲和：《南國公演第一次》，《光華週刊》1928年第4卷第6期。儲安平在文後加有按語：「不幸的是像南國這樣一次毅忍的努力，而中國的文壇，至

讀音上和唐叔明極為相近。由此大膽猜測，桃姝極可能就是唐叔明。如《口供》中所提到，桃姝已經名花有主，儲安平又缺乏表白的勇氣。即便鼓足勇氣，桃姝的態度也讓人捉摸不定。儲安平本是孤兒，性情有多愁善感、敏感脆弱的一面，對溫暖有着強烈渴求。求之不得，使他由積極趨向消極，陷入超出一般人的傷感苦痛之中。

儲安平的身體稟賦原本虛弱，情緒上的沮喪更加重了他的病情。此時他經常服藥，情緒也不免流於頹廢。[47] 比如他在《殘花》中說：「昨夜，在床上，我哭了。我哭了，那是說，我流了淚。我流淚，一滴，兩滴，三滴，滴滴滴在枕頭上。悲哀的青煙在我心頭絞，我想放聲嚎哭，但，即使淒咽也不敢。心，心在那無極的感傷之海裏就像一條小小的船，失去了舵，也失去了櫓。熱的血，熱的淚，像澎湃的波浪只管向着四周沖。我只能，只能在一片夜的荒涼裏，感到孤獨，孤獨，無底的孤獨。」[48]他日漸對生活喪失興趣，身體幾乎處於崩潰狀態。他的心態日漸封閉，視野日漸狹窄，過度關注個人幸福與情感，少有關心公共事務的激情和衝動。

1930年春，儲安平和光華同學遊歷蘇州歸來後，寫有一篇名為《蘇州》的遊記，刊登在《中國學生》雜誌上。在《蘇州》的開篇，他就說：「蘇州！想起了蘇州，便會想起了蘇州的女人。蘇州的女人，有着另一番的風趣，然而天不給機會我，好去明白

今還沒有給他們以相當的熱誠的反應。我們因既然做了觀眾，所以想盡一些觀眾應盡的責任。同時，田先生是本校的教師，南國同志也曾來校表演過(關於這事則覺得田先生及同志竟慨允到本校同樂大會來表演，如代本校說話自當感謝他們的好意，但設若又代他們說話，則我頗以田先生這次的允諾為可惜而不當。)本刊想表示出一些誠懇的謝意，故此刊載了以上幾千字關於南國的文字。自然，這我們不敢就承認是批評，但至少是一種真實的同學心的流露罷。某日後記安平。」

47 安平：《給海外的朋友們》，《光華週刊》1929年第6卷第3期。

48 儲安平：《殘花》，《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66頁。

到她們的好」；「蘇州的女人，像是太溫柔了，然而天不給機會我，好去嘗到她們的纏綿。」[49]唐叔明正是蘇州人，儲安平對蘇州女子別有一番愛恨糾結，在此便別有一番深意。[50]同年8月，他在《中國學生》上發表了《女寶貝》一文。他說：「女人就有那樣一股力，她叫你死，你死，死還心願。由你是，在平時，是英雄，是壯士，只要當了美人的面，就如金銀見了火，你將軟，你將氣短」；「世上一切都好想法，惟有女人的心，搶不來，買不來，權勢也壓迫不來……女人的心，有如雲霧裏的月亮，不出來。」[51]儲安平無法走出情感迷霧，深陷憂鬱和悲傷的複雜情感之中，這和前一時期有很大不同。

端木露西

忘記一段無望感情的最佳辦法，是重新尋找其他寄託。很快，儲安平認識了從南開大學轉來光華的端木新民，並開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端木新民(1912年3月10日–1995年7月)，曾用筆名露西、路西、路茜等，後主要以端木露西之名行世。露西家住蘇州甜橋巷十三號，其父端木適安，生於1879年，母親孫韻，生於1894年，育有六女四子，端木露西年齡最大。[52]端木露西早年曾就讀於蘇州振華女中、惠靈女中。端木適安從蘇州電話局局長調任天津電話局局長，露西遂隨之北上進入南開大學附中及預科。1930年7月前後，端木適安調任上海電話局局長，露西又隨之南下。[53]端

49　安平：《蘇州》，《中國學生》1930年第2卷第4期。

50　陳白塵：《哭田漢同志》，《陳白塵文集》第7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34頁。

51　儲安平：《女寶貝》，《中國學生》1930年第2卷第8期。

52　《光華大學學生學籍卡·端木新民》，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藏，光華大學檔案，檔號B21771。

53　玲玲：《端木新民女士南下》，《大光明》1930年7月24日。

木露西是蘇州小報關注的焦點，在報紙上留下了許多緋聞和有趣的記錄。據稱，某次她從光華大學放假回鄉省親，小報描述她：「嬌憨依舊，而風格已卓絕海化」，「恒自居男子，不知者有尊稱為小姐姑娘或女士者，必遭呵斥」。[54] 當時的小報戲說成份居多，但似乎也可見她特立獨行，個性鮮明，頗有巾幗豪傑之氣質。

1930年9月，端木露西進入光華大學，就讀於文學院一年級。她是那種聰明但成績比較差的學生。她曾自述：「我不怕招笑，我一向不是一個好學生，我慣會忘記許多老師指定要我念的書，我老愛取巧看一些，反正我對於考A考B都不大有趣味，我的只記着一個C。」[55] 查露西在光華的成績單，基本英文成績是C，基本國文是C，體操和社會學概論都是C⁻，衛生演講是D，可知她此語並非是自謙之辭。[56]露西在光華是風流人物，被稱為「花后」，「精於舞蹈，長於交際」，非常大方。她自述：「我在學校裏並不怕和男同學說話，也不怕別人造謠……(光華)的男女同學全是最聰敏的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怎樣去把握現實。一個愚蠢的人在這些瘋狂的男女中間，也勇敢的去嘗試戀愛。」[57] 儲安平是學校的著名人物，才子和「花后」相識，很自然地開始暗生情愫，隨即迅速地建立起戀愛關係。當然，其中多半有端木露西的主動。

儲安平曾在寫於1930年11月的一篇小說《美麗的圖畫》中隱晦提到他和端木露西確立戀愛的過程。這篇小說講的是「我」和「××」跟隨集體去某地旅遊，當時彼此只是關係曖昧，沒有正式挑明。在某地有一個私家名勝「汪園」，同學們打算參觀園

54 黃惲：《端木新民與葛建時》，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246090100j9o5.html。

55 海棠：《端木新民北上》，《大光明》1931年4月23日。

56 《光華大學學生成績單·端木新民》，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藏，光華大學檔案，檔號B21771。

57 露西：《我的大學生活》，《中央日報》1936年7月23日。

子，卻因主人不在而被婉拒。「我」和「××」和不約而同地從籬笆牆偷偷跳進園子，開始心照不宣地單獨靠近。兩個人在汪園的水上划着小艇，甜蜜地說笑。在歸去的晚風中，她說冷，他第一次膽怯地將手放到她的肩上，他害怕冒失，害怕被鄙視，但她沒有拒絕。最後兩人站在橋的欄杆上擁抱，略有倦意的她依偎在他懷裏，她的臉緊緊貼着他的胸，他也將自己的臉藏在她蓬鬆的頭髮裏。他認為那是終生難忘的一天，就像一幅美麗的圖畫，永遠刻在兩人的心板之上。[58]

端木露西也曾在1935年的《中央日報》上隱晦地提到他與儲安平這一時期的幸福時光。「『這樣好的天氣，能一起出去走走，多美。課後，你來看我吧。』我寫了那樣一張條子給他。他永遠好似一隻最柔順的小鳥，聽着我的話。他的兩隻眼睛熱望着我，要我告訴他去什麼地方。呵，這兩隻一直使我不能忘懷的眼睛對我注視的時候，正好似要在我身上奪取什麼似的，使我不敢正面看他一眼。」大西路光華大學正南方不遠，是著名的萬國公墓，二人便一路交談走到公墓。「他像一個最乖的孩子跟着一個母親似的，那樣溫順的緊緊偎在我的身旁」。兩人在規模最大的墳墓邊坐了下來，靜默許久，他問道：「茜，你快活嗎？」她答道：「我想我是快活的。但是，一個人死後是不是還需要一種光榮，像這種富麗堂皇的墳墓？」。兩人步行歸校時，他突然拿出一朵鮮紅的花朵送給她，給她一個驚喜。她在心裏讚歎道：「這個年輕人是多麼聰敏、多麼可愛！」[59]

儲安平的第一位傳記作者戴晴的戲劇性描寫是：「初交時，他給她寫情書……對這些元由問世的妙文，她的妹妹們的評語是，跟這樣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再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時，她們則驚呼：『阿姊，梅蘭芳送你照片呀！』」[60] 戴晴

58　儲安平：《美麗的圖畫》，《創作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
59　路茜：《一個初秋的向晚》，《中央日報》1935年2月26日。
60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35頁。

寫儲安平屬於報告文學，亦有自己猜測的成份，但在寫此書時採訪過當事人，此段文字大體可信。這說明此時安平與露西心心相印，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端木露西在光華停留的時間卻極為短暫。從她在光華的成績單來看，她只待了一個學期，而且，當時正逢教務長董任堅在光華推行前期大學制，大一不分專業，她只修讀了一些通識性課程，並未選讀專業課。[61] 大約1931年春，她便離開光華回到蘇州。這一事實有儲安平的文章為證。

儲安平在1931年春記述道：「茜幾次寫信來勸我。這自然因為彼此有一些小小的友誼，我不該完全隱晦說我不需要她給我的安慰。她上上海來看我了。前幾天，像一陣清風地來的她，也終於又像一陣清風地去了。沒有收到她的好處，卻受到了更苦惱的折磨。那自然也因為天下雨，她又是那樣的忙，我不該有一絲怨恨……她走了，走了，她在我夢裏走了。」「她來信給我許多勸慰，自然我得謝謝她的好意。她說現在這中國需要着我這種人，我的故鄉需要我，我的家庭更在熱望着我的出頭……對於這恩惠，我實在不能吝嗇我自己對她的銘感和愛了。」[62] 端木露西為何很快便離開光華？其詳情已不可考。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可能與光華在1930年末發生的一場嚴重學潮有關。在講述學潮之前，先說儲安平在光華師長那裏受到的自由主義啟蒙。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校聚集，是光華爆發學潮最主要的原因。

自由主義啟蒙

儲安平在光華讀書期間，校內的兩種主要思潮，都對儲安平的思想產生形塑作用。

61 《光華大學學生成績單·端木新民》，光華大學檔案，檔號B21771。
62 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84–189頁。

首先是民族主義。如前文所言，光華誕生於五卅慘案，脫離聖約翰而獨立，肩負着「收回教育權」的使命。所謂打倒帝國主義或洋奴教育之類的話語，在光華的校報校刊上常見，學生亦經常參與一些社會上的愛國運動。儲安平便在1929年的10月發表了一篇名為《雙十節在我們的心頭》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儲安平說：「五卅五三所給予我們的意義，乃是帝國主義的壓迫、橫暴，他們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欺侮，我們必須團結我們的力量，固實我們的戰陣，和他們對抗，和他們誓死抗爭！」他告訴廣大學生，辛亥革命的意義是追求民族的平等，打倒帝國的專制，因此，雙十節的意義不只是放假一天，還需要記住，辛亥革命爭取平等的偉大精神。[63] 這可能是目前可見儲安平發表的第一篇直接談國家民族的文獻，說明當時他雖然只是學生，亦受感情困擾，卻未忘記社會責任，對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懷有憂思之情。

然後是自由主義。當時，新月派知識分子開始以《新月》為陣地，發起了轟轟烈烈的「人權運動」。胡適在《新月》上先後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我們走哪條路》等文章，批評國民黨的訓政，羅隆基發表了《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告壓迫言論自由者》《論人權》等文章，呼籲保護人權和思想自由。光華教授諸青來在校外出版《三民主義商榷》，對孫中山學說進行了條分縷析的抨擊。[64] 光華教務長董任堅在各種刊物發表文章呼籲大學的學術自由，譴責國民黨以一種主義貫徹到學校中，壓制學術之進步。[65]

此時儲安平在光華，修讀了「政治學大綱」、「盧梭民約論」、「國際法」、「法學通論」、「政治思想史」、「國際關

63　儲安平：《雙十節在我們的心頭》，《中國學生》1929年第1卷第10期。
64　諸青來：《三民主義商榷》，箴文書局，1930年。
65　董任堅：《大學教育論叢》，新月書店，1932年。

係」、「政黨論」、「比較政府」、「市政學」、「中國憲法史」、「社會主義及運動」、「名學」、「普通生物學」等專業課程。[66] 這些課程的老師正是羅隆基、王造時、張東蓀、潘光旦、諸青來等自由派教授。教授們講授專業知識，卻也不忘將他們對國民黨的批評帶入課堂。羅隆基在課上講的是自由、訓政、黨治。[67] 潘光旦「每課必須對黨義痛斥」。[68] 文學院長張東蓀在教職員大會上聽到有人會前恭讀孫中山遺囑，便奪門而出，憤然說道：「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69] 即使已經離校的胡適，還會回來講《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批評國民黨逆文化潮流而動。[70] 王造時則在光華的雙十國慶紀念會上說國慶是特權階級的國慶，影射國民黨是軍閥，號召廣大民眾用甘地不合作主義的態度對待國民黨，爭取真正的民主政治。[71]

按照教育部的訓令，各大學必須設置黨義課，學生也必須參加全國性的黨義考核。但是，由於這些教授的存在，光華的黨義課長期廢弛。即使曾一度聘請本校畢業的潘樹藩擔任黨義教師，這位先生也經常不到校，偶爾上課，亦僅講述各社會主義派別思想，「而絕不折衷解釋於三民主義一種原則之下」，以致授課半年，未提黨義一句。潘樹藩離職以後，並無其他教師接續，黨義課遂長期停頓。[72]光華不但不設黨義課，還不搞總理紀念週，嚴重時甚至學生反對國民黨的壁報傳單滿天飛，成為上海各大學的異數。

66 《光華大學學生成績單·儲安平》，光華大學檔案，檔號B20892。

67 《市執委會再呈中央迅處光華學潮：被迫學生宣白冤抑》，《民國日報》，1930年1月11日。

68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關於上海光華大學學潮起因經過及處理辦法與教育部往來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政治4，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頁。

69 沈雲龍：《光華大學雜憶》，《傳記文學》1981年第39卷第3期。

70 《光華大學十週年紀念冊》，光華大學，1935年，第30頁。

71 蜀女：《革命的光華大學的國慶》，《硬的評論》1930年第1卷第7期。

72 《文學院教員一覽》，《私立上海光華大學章程》，光華大學，1930年，無頁碼。

儲安平此時並未公開發表過批評國民黨的文字。但是，他是《新月》雜誌的讀者，後來更被徐志摩提攜為撰稿人，對新月派師長們呼籲自由的檄文並不陌生。在校內，他與羅隆基、王造時、潘光旦、張東蓀等教授都有密切交往，他們的言論和思想也不可能對他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光華校園中不設黨義課，不搞總理紀念週，學術獨立，拒絕政治干涉的自由風氣，對儲安平自由思想的初步形成起到了客觀的薰陶作用。

然而，自由的好景不長。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因發表激烈反對黨國的言論被捕。次日，光華大學政治學社的學生召開大會，請羅隆基報告被捕經過及原因，席間學生們對無故抓捕教授是否合於法理等事進行探討，並對羅隆基表示慰問。[73]這次大會由潘光旦主持，有四百多學生出席，圍繞人權問題討論甚久，並有「嚴正之表示」。[74]從理論上講，當時儲安平必定在場。這些學生又於次日晚，集體登胡適之門，打算在光華發動一場聲援羅隆基的大運動，要求約法保障。未等他們發動運動，光華的國民黨學生先發制人，借副校長廖世承處理光華、復旦賽球風波不公，在當年的12月9日發動學潮，名義上驅逐廖世承，實際上是驅逐他支持的新月派諸教授。

光華學潮中，學生張貼反廖標語，四處散佈謠言，宣佈罷課，歷數所謂廖世承縱容羅隆基等新月派教授的十二大罪狀，一時簽名達二百餘人，要求校方馬上答覆。國民黨學生又在校內蒐捕共產黨學生，甚至有人要放火焚燒校園，學潮造成空前混亂，光華成為恐怖世界。其後，區黨部、上海市黨部均發文譴責光華，中央訓練部強令教育部解除光華對羅隆基的聘約，且令王造時、徐志摩、諸青來、潘光旦等教授辭職。校方在徐志摩、羅隆基、王造時等人的堅持下開除十餘位帶頭鬧事的學生，卻無力使

73　《中公光華教授羅隆基被捕即釋》，《申報》1930年11月6日。
74　《光華大學討論人權問題》，《申報》1930年11月7日。

教育部收回成命。次年春，羅隆基去職。[75] 徐志摩、董任堅、潘光旦等對校長張壽鏞在與蔣介石、教育部交涉中所表現出的懦弱甚不滿意，一併辭職而去。儲安平也對張壽鏞的立場嚴重不滿，評價道：「辦學是他的副行，做官才是他的正業。只要一切大小勢力不與他的官途搗擾，至於小小地方對於學校的要求，他是無不可答應的。」[76] 剛來光華半年的端木露西，很可能就是在這場學潮中受到驚嚇，遵父母之命退學回到家鄉蘇州。端木露西已經退學，儲安平也不願繼續留在光華，同樣萌生去意。

當時北平的政治環境日趨平穩，北伐時期在滬避難的胡適等紛紛返回，北平有取代上海成為文化中心之勢。[77] 張東蓀在1930年夏北上燕京大學任教，徐志摩亦開始奔波於京滬兩地。北平的國立、教會大學實力雄厚，光華附中的許多同學都投考燕京，人數眾多，甚至有「燕京光華同學會」的組織，頻繁聯絡。[78]儲安平離滬去平，前往燕京大學，似乎順應了當時的一種流行趨勢。

北行散記

關於儲安平去北平，在他的《悼志摩先生》裏有隻言片語的提及。他說：「那時我預備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個鐘頭前，他正從北平回來。聽見我也上北平去，說：好極了，咱們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住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遠像一支蝸牛般的躲在屋子裏」。[79] 但是由於資料限制，具體情況已不可考，亦未被研究者注意。筆者在1931年的《申報》上發

75 《光華大學舉行紀念週》，《申報》1931年1月13日。

76 儲安平：《行》，《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13期。

77 許紀霖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頁。

78 姚克廣(依林)：《北平光華同學概況》，《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第201頁。

79 儲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1931年第4卷第1期。

現了儲安平的長文《北平散記》，共20篇，兩萬六千餘字，講述他由上海到北平，再從北平返回的全部經過。《北平散記》系列文章在《申報》上連載了四個月，是迄今為止瞭解儲安平早年最集中、最系統的文字資料。

儲安平的離開的時間是1931年2月1日。當時的光華已經重開黨義課，按時舉行總理紀念週，宣佈「教員思想應立於黨治之下，以不違背黨義為原則」，校內氣氛保守、沉重。儲安平參加了被學潮打斷而補行的期末考試後，決定逃離上海，前往北平。[80] 儲安平先到南京，受到就讀於中央大學的遠房侄子儲元熹的接待。他在南京停留，既是出於懷舊，也是為了拜謁中山陵。他由儲元熹陪伴，「懷着一顆極嚴穆的心和舒緩的步子」走上中山陵，在禮門以「最驕傲最鄭重的態度」，於簽名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他形容自己，「在陵上徘徊了長久，心像死去了般的沉靜，嚴穆佔據了我的全部意識，我真想坐在石級上，像摸不着一絲邊際地悠思一回。」[81] 儲安平的行為表明，雖然他受自由派師長的影響，對國民黨未必有好感，但心底還是對孫中山懷有非常深刻的敬意。這應該和他的民族國家觀念有關，即敬仰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鞠躬盡瘁，奉獻了畢生精力。從儲安平對孫中山的態度可知，國家獨立、民族富強在他心中佔有何種重要的份量。

他從南京浦口上車，乘坐帶隔間的臥鋪，遂對三等車的民眾產生同情。「三等車裏是那樣的凌亂和苦楚，真不安心。要顧全身體的健康非得坐二等，然而二等從上海到北平，連路上小用，單一趟，得花上八十塊錢，中國不究竟還是窮人多嗎？」津浦路徐州以北沿線，城鎮的骯髒、民眾的貧窮更讓儲安平震驚。「北地的車站上，不像南邊一樣乾淨有秩序」，「沿途我便不曾看見

80　安平：《像一隻老鼠，我跑開了上海》，《申報》1931年3月12日。
81　安平：《我的潔瑪》，《申報》1931年3月30日。

有一個人腳上穿着一雙洋襪過，是一列的老藍布衣裳褲子和白大布襪、黑布鞋」，「我眼看有一個視窗擲下了一塊不要吃的大餅屑，像一群野狗，許多小孩子便哄了來。」[82]這是在光華的象牙塔中難以獲得的真切民生經驗。

比較有趣的是儲安平對北平的評價。儲安平形容：「北平像一個破碎的蜂巢。大部分的北平的房子是破舊衰落得不堪的。」「北平的市面現在真蕭條，據說自遷都以來，天津還可以維持到五成，北平便可憐得只能維持到兩三成了。」「北平的電車真乘不得，是那樣不乾淨，那樣的沒秩序。坐電車的人，還沒有上海三等乘客一樣的整齊，大部分是軍人以及一些非知識階級者。」聯想到1930年代初，「荒涼」、「冷落」成為時人對故都的共同印象，儲安平觀感如此並不意外。[83]但北平也有優點：「北地商家的店員之和氣，真少見……大部分他們的招待是一列的、一列的和氣，沒有一些些勢利的臉色。」「北地的人，絕不是像江南的人一樣的刁滑輕浮的，他們率直、乾脆、誠懇，着實講義氣，肯負責任……北地的人，那一副老實相，便得感動你，感動你到心。」[84]儲安平時刻將上海或江南當作一個對象，在各方面與北平進行反復對比，似乎在論證自己北行的正當性。

如沈從文這樣一度流浪在北平的文人都住過公寓，儘管儲安平不住公寓，但他造訪過朋友住的公寓並印象深刻：「四壁是沒有磚頭的，當中隔着一層蘆條，就在蘆條上糊上一層報紙……兩條長凳，三四塊木板，一架殘壞的洗壞的洗臉架，一張破桌子。」這樣的公寓雖然簡陋但有好處：「住在公寓裏的人，如其自己有一個經緯，那就是說，對於你自己的學業有一個計劃，有一個成竹……那種自由的讀書，自由的思索，自由的探望，該比

82　安平：《津浦道上》，《申報》1931年4月11日。

83　季劍青：《故都故都奈若何：1930年代北平的現代主義詩歌》，《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4期。

84　安平：《北平》，《申報》1931年4月20日。

在這些好像肺病養成所的大學校裏讀死書、吃飯、起身、睡覺要有功效得多多。」儲安平由此對學校機械的讀書生活開始批判，作出了「現在的教育是完全失敗了的，是完全騙人」的論斷。[85]從中可見，儲安平固然渴慕求知，卻不贊同機械讀書，認為經驗來源於實踐，行動與讀書同樣重要。光華當時的校訓便是「知行合一」，讀書和行動結合亦為校方大力提倡，儲安平作如是想，似有光華教育之功。

儲安平在上海，在社會上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報館，因此他對北平的報紙雜誌格外留意。北平的報業有着和上海不同的特色。「北平的報館，雖然在規模上，遠不及上海的幾家報館來的宏大，但北方的新聞事業，要比南方的有生氣些，其最大的原因，南方的報紙只是一種 Building Affair，至北方則多少有一些 Literary 的意味。」但北平的劣勢更為明顯：「北國的報紙上的副刊，其量的方面，比上海的報紙的副刊相差很遠。……所刊的稿子，非但談不上精彩，並且簡直可以說一聲糟，搞得不堪。」「要說到北國的文壇，實在一無可說，因為根本上，其本身衰敗非常」，「以前北平的小刊物、小雜誌很多，但是現在簡直消沉得很。」[86]總之，北地的報紙雖多，但可讀的很少；文壇未必無生氣，但大環境卻比較惡劣。北平在這方面還不能和上海同日而語。

由於張東蓀和光華附中舊同學的關係，儲安平以旁聽生的身份，落腳在燕京大學，他對燕大描繪也就最多。「說起 Building，恐怕就要推燕京為第一了。你一走進這校園，便覺得裏面考究得像皇宮似的。」「他們不像別的學校，事先一無計劃，一無規模，有錢想砌房子的時候，便隨便在什麼空地上砌一座，他們對於一切建築佈置，事先都有一種完美的設計」。燕大有哥倫比亞和哈佛的中國文化研究會圖書部，名貴的書非常多，

85　安平：《公寓》，《申報》1931年4月22日。
86　安平：《北國的報紙及副刊》，《申報》1931年5月8日。

學生講義多由校方免費供給。[87] 儲安平並未將燕大與光華兩相對比，卻可見燕大的優勢正是光華的劣勢。光華校園建築正是倉促建造、無章可循的典型，光華的教職員宿舍也非常簡陋，圖書館亦僅有一室，在滬上各大學中最為狹小。

但儲安平對燕大的精神方面卻評價有限。他認為，燕大「比較江南普通的一些大學，自然高一籌，不過要說一定好到哪兒去，倒又說不出」。「一般學生的程度…也不見得十分好到哪兒。大概在『工具』上，燕京學生的程度是好的，在『知識』上，燕京學生的程度也不能說壞，但在『思想』上，燕京學生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給我們佩服。這一點，是最給我們失望的一點。燕京學生，說起讀書，差不多都是非常用功，實遠非江南的一些大學所能相與倫比，沒有一個不讀書，沒有一個人不用功……不讀書便立刻為同學所輕視。」[88] 這實際正是儲安平所反對的「死讀書」，非但學而不思，更缺乏實踐意識、社會參與意識。他對燕大的總結是：「從普通的學校轉到燕京去，是很值得的，不過你一定要懷着怎樣一顆夢想美麗的心到燕京去，也許會使你失望的。」儲安平感到有些失望，並不覺得燕大與局促於上海大西路的光華有很大差別。

在燕大時，張東蓀曾將徐志摩到北平的消息告訴給儲安平，儲也打算前去看望，但第二天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突然離開北平。[89] 他離開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他看到北平文壇冷落，報業低沉，校園風氣死板，並未取代上海成為文化中心，這和他預想中的北平有很大的差距。何況，北上原本就是倉促而行，未有任何準備，光華那邊亦未真正退學，計劃停留一年半載也不現實。另外，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他收到了一封來自江南的信，信的作者

87　安平：《燕京拾碎(上、中)》，《申報》1931年5月12、21日。
88　安平：《燕京拾碎(下)》，《申報》1931年5月26日。
89　儲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1931年第4卷第1期。

無疑是端木露西。儘管他認為江南已經沒有值得他留戀的人和事，但是「為了那樣一封信，使我那天一晚沒睡着覺」，「心一直蕩在半空裏」。[90] 短暫猶豫一番之後，重回光華的念頭已經決定。

從散文到小說

1931年3月，儲安平北行歸滬。雖然他並未恢復之前的心境，需要身在蘇州的端木露西經常寫信勸慰，但還是開始由消極轉向積極，逐步謀求振作，甚至比以前更加刻意鍛煉自己。就如何雨文對這一時期的回憶：「刮着大風的早晨，他可以獨自在校園內啃着英文。等到我們醒來，還躺在熱被窩裏，他已回來。問他為什麼如此自尋苦吃？他一本正經地說，一個人應該如此鍛煉自己。」[91] 這說明，他越發認識到，要在以後的人生中有所作為，要出人頭地，必須壓抑與生俱來的感傷氣質，克服性格中憂鬱、軟弱的面向。一個人必須變得堅強甚至殘忍，才能真正的在大時代中承擔重要使命。他開始學習寫作小說，進行新文體的嘗試。

實際上，儲安平的光華同學，寫散文的很少，如徐轉蓬、錢公俠、穆時英、王家棫、于在春等，多是小說作家，在校期間就出版了比較有影響的小說作品，崛起得很快。儲安平的文字功底並不遜於他人，一番冷靜思索後，意識到小說對自己或許更為合適。他說：「我最初是學習寫散文的。但是我的年紀太輕，我的感情太浮，這使我覺得自己還沒有寫散文的才氣。我這一點不能數的年齡，我這一點不夠掂量的人生體驗，能夠容許我寫得出什麼深含哲理的東西？我這一點蕪雜的思緒，我這一點浮泛的感情，又能夠容許我寫得出什麼蔥郁曠遠的文品？我實在沒有理由

90　安平：《故宮與北海》，《申報》1931年6月4日。

91　《附匪分子儲逆安平弄巧反拙大禍臨頭，其人其事內幕》，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129000046134A。

不允許我自行慚穢，收拾我從前對於散文的熱望。」[92]

隨即，儲安平寫作了《春瘟》一文，講述的是一個百無聊賴、獨困春閨的艾小姐與男友成先生的戀愛故事。小說中成先生木訥、拘謹、膽小和不解風情，導致艾小姐產生了一種既渴望又無奈、既期盼又失落的微妙心態。[93] 儘管是男性作家描寫女子的心態，儲安平對艾小姐的內心幽微之處卻把握得非常到位。描寫成先生的性格特徵，似乎也有一種自況、自諷的味道。不過，儲安平的小說也存在着問題，那就是在情節上過於簡單，所講的都是日常瑣事。純文學的生存空間，在當時的上海本來就極小，儲安平的小說和那些以情節取勝，甚至以兇殺、暴力、色情襲人眼球的作品，明顯處於劣勢。因此，儲安平這篇小說，在當時並未找到地方發表，直到1933年秋天，才改名為《春》，發表在以刊登時事新聞為主的天津《國聞週報》上。[94]

但是，儲安平的認真態度一如既往。他形容：「在每一次習作的時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認真嚴穆的。但是我對於文藝上的修養實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說寫成了之後，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還是失敗的地方居多。」他總結自己產量低的原因是，健康不允許他有過量的寫作：「寫一篇小說，常常須先經好幾個月的內心的醞釀，寫成了以後，又需要一陣子很長的休息。」另外便是從不將創作當成買賣，他自述：「從來沒有一次有過一點為稿費而寫作的動機過。」[95]身體不夠健康，不擅長虛構故事情節，產量極低，這就使儲安平雖然從散文轉向小說，卻沒有取得散文的成就。今天我們談儲安平的文學，也多半是談他的散文而不提小說。這是青年時期的儲安平，再次對文學並不成功的摸索。

92　儲安平：《自序》，《說謊者》，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1頁。
93　儲安平：《春瘟》，《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03–112頁。
94　儲安平：《春》，《國聞週報》1933年第10卷第15期。
95　儲安平：《自序》，《說謊者》，第2–3頁。

同時他開始在校外編輯雜誌。

1931年下半年出版的《新月》上有一則無人注意到的《今日》雜誌創刊號廣告，宣稱這是一本「適合於一般青年學生界的一份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文藝的半月刊」。創刊號文章包括王造時的《論愛國心》，魯參(羅隆基的筆名)的《國民會議開幕前的忠告》，孫斯鳴的《約法與約法三章》《整飭學風與重修孔廟》，邵洵美的《高蹈派的詩與批評》，方瑋德的《十四行一首》，陳夢家的《南風》，儲安平的《沒有太陽的天氣》。這期雜誌的作者除了王造時、羅隆基、邵洵美，基本屬於新月派的小字輩。儘管從題目上看，儲安平這篇文章屬於文學類，但這本雜誌總體明顯偏政治化。[96] 這份雜誌的出版方和資金來源已不可考，但可知儲安平擔任編輯。因他在《悼志摩先生》中提到：「去年春天(1931)編《今日》，問他要稿子，他來信時還記念到這江南的好嫵媚。」[97] 1931年國民會議的開幕時間是5月5日，由此可從羅隆基的文章判斷，創刊號出版於5月之前，即儲安平在《申報》上連載《北行散記》之時。這表明，儲安平已經不滿足於做校園刊物的主編，將編輯活動的範圍擴展向社會。遺憾的是，這本雜誌第一期已經印刷完畢，卻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未能發行。[98]

南京請願

雖然《今日》雜誌胎死腹中，但儲安平並未再度抑鬱消沉。他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民族國家觀念，國難危急關頭，更激發了他

96　《〈今日〉廣告》，《新月》1931年第3卷第12期。

97　儲安平：《悼志摩先生》，《新月》1932年第4卷第1期。

98　沒有證據表明該雜誌被國民黨查封。參見李默等整理：《國民黨反動派查禁報刊目錄(1929–1931)》《國民黨反動派查禁書刊補遺》，《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現代丁編》上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35–176頁。

的愛國意識。幾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亡，對日一戰的呼聲十分普遍。光華新任文學院院長王造時已經成為上海最活躍的主戰派。在他的主導下，光華學生馬上成立了救國組織「光華抗日救國會」，由儲安平擔任第一常務。[99] 9月23日，上海學生在天后宮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召開了「上海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第一次會議，儲安平代表光華參會。會議決定，參加的十一校每校推舉一人組成執行委員幹事會，是主持救國運動的核心機構，儲安平被選為幹事會委員。學生又議決由各校推舉代表兩人於27日進京，向國府請願，要求集中全國軍力對日一戰。[100] 次日，儲安平擔任各大學抗日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的會議記錄。學生們議決，鑒於事情緊急，決定請願團於25日在上海北站集結，提前進京。請願團需要代表先期到南京接洽，議決光華、上海法政兩校各出一人作為代表，儲安平曾在南京生活多年，遂成為上海先期進京的兩名代表之一。[101]

開會當晚，儲安平即登車進京。他到達南京後，住在中央大學，並出席了南京學生組織的救國聯合會，「雙方意見，極為融洽，決定在同一步伐之下，努力救國工作。」[102] 26日晨，各校後續代表四十六人，攜帶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開具的致胡漢民、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等要員的介紹信到達南京。兩隊人馬集合，當日到達國民政府。包括儲安平在內的學生代表在大禮堂面見了蔣介石，交談兩個多小時，遞交了五點意見，分別為：請國府集中兵力，驅逐日兵出境；懲治辦事不力的外交官；令張學良迅速出兵；發給大學生槍械，武裝全國學生，以為政府後盾；實行革命外交，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蔣介石逐條予以答覆。[103] 蔣介

99　陳建軍：《光華文人志附識》，《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5期。
100　《各大學學生救國聯會昨舉行首次執委會》，《民國日報》1931年9月24日。
101　《大學抗日救國會幹事會》，《申報》1931年9月25日。
102　《大學生代表在京行動》，《申報》1931年9月27日。
103　《滬大學代表請願國府五點》，《中央日報》1931年9月27日。

石對學生表示，目前政府正在積極籌備應付日本之事，若無和平挽回的餘地，一定對日死戰。他承諾責令張學良收復失地，戴罪立功。蔣介石說，學生作為知識階層，以後必將是國家的棟樑，若就此為國犧牲，損失重大，若非萬不得已，不會讓學生出而衛國。[104] 部分學生覺得政府已經表態，沒有再周旋的餘地，遂在中央黨部參加了總理紀念週後於28日晚回滬。

但是，在大多數上海學生看來，第一次代表團進京請願目的未達，還需要第二次派代表進京。在上海各大學抗日救國聯合會的組織下，學生發起了第二次進京請願。此次進京由各校學生自由參加。28日晚，上海站人山人海，三千多學子聚集在上海北站待發，其中包括了二十五名女生。[105] 儲安平是否跟隨第一批請願團回滬已不可考，但可知他同樣參加了第二次學生請願。29日，少數第一批請願未歸的學生，獨自行動的復旦大學七百餘人，第二批來京的上海請願學生三千多人，和金陵、中大學生代表，總共五千餘人一起到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蔣介石再度出來接見。學生人數眾多，為保護蔣的人身安全，場地保衛工作森嚴，政府如臨大敵。蔣介石此番同樣大聲斥責學生，說已經給予第一次請願代表答覆，再來請願，實無必要。他責令學生回校，稱若堅決不回，政府可在南京明孝陵劃出一片可以容納五千人的土地，供學生們進行軍事訓練，但是否上前線還要由政府調度。[106] 蔣介石懷疑，學生持續請願，可能受共產黨的蠱惑，名為救國請願，實有蓄意破壞政府工作的嫌疑。

蔣介石責備學生之語較多，對於如何抗擊日本，是否出兵、如何出兵回答得仍比較含糊。這種含糊，實際並非政府懦弱退縮，而是知道自身的軍事實力與日本相比有極大差距。貿然對日開戰，必將是一場「國賭」，追求快意的孤注一擲，極有可能將

104　《滬學生代表談赴京謁蔣請願詳情》，《申報》1931年9月30日。
105　《滬各大學學生來京請願之經過》，《中央日報》1931年9月30日。
106　張雲萍：《請願經過》，《復旦社會學系半月刊》1931年第8期。

中華民族陷於亡國滅種的悲慘境地，因此要忍辱負重，盡可能謀求和平解決。但蔣介石顯然沒有耐心勸說學生，而是不由分說嚴厲斥責。一路上慷慨激昂的學生代表都有所退縮，不敢言語。尤其是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請願總指揮劉某，或事先私下受到當局的警告，或懾於蔣的威嚴，當場帶頭高呼鼓掌，表示請願的目的已經達到，對蔣的回覆表示十分滿意。然而，他在第一次請願之前，曾在會上表示，不允許蔣介石含糊地答覆，不達目的絕不妥協，即使餓死在牢獄裏，也非要政府出兵不可。劉某的這種軟弱和突然轉向，幾乎將上海學生的鬥志完全擊潰，無形中分化、瓦解了學生的精神。在蔣介石的威懾之下，會場寂靜無聲，五千多人無一敢講話。

就在這個時候，儲安平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據一本被遺忘的雜誌《時代評論》上一篇文章講：「只有光華大學的儲安平挺身而出，當場發表了一次表示不滿意的反駁言論」。[107] 另一份資料記錄道：「蔣主席訓話已畢，將要走出禮堂時，突然有一個學生在人堆中，提高了喉嚨，責問政府為什麼不立即出兵東北？這個學生就是儲安平。」[108] 又有文章講：「臨散會時，突然有一個人站起來講話，態度很從容，聲調很高亢，博得全場學生的注意，連到軍校職員跟隨蔣委員長的隨從都很欣賞這個人，這個人就是儲安平。」[109] 儲安平此舉極具勇氣，且充滿反抗精神，以至旁觀者評論道：「那種反抗精神才能表現出我們上海學生的光彩，給上海學生爭一個臉子。」可惜，儲安平的抗議呼聲和演說在五千餘人中間顯得十分微弱，像是「死前的一次回光，在混沌中終於給劉君壓下去了。」[110]

107 黃力：《首都請願行》，《時代評論》1931第1期。

108 春芳：《儲安平失嬌妻，辦觀察補損失》，《文飯》1946年第31期。

109 《附匪分子儲逆安平弄巧反拙大禍臨頭，其人其事內幕》，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129000046134A。

110 黃力：《首都請願行》，《時代評論》1931第1期。

北上抗日

政府派出專車，將上海請願學生遣送回校。一份收藏於台北國史館的資料記錄了儲安平歸程的趣事：「上了車之後，光華同學發現不見了儲安平，一時議論紛紛，以為儲安平一定為政府所拘捕，許多人義憤填膺，要求全體請願學生，聯合營救儲安平，一時車上秩序大亂，抗議政府非法逮捕愛國學生，有人高呼儲安平萬歲，但因為火車沿途不停，無法採取行動。車到蘇州時，各校代表集合開會，商議轉回南京，除非政府釋放儲安平，決不回上海，有人主張在蘇州拍發電報，通告全國，譴責政府之非法行為。光華學生更痛哭流涕，願回南京陪儲安平坐監。會議開得正熱鬧時，突然儲安平自行從臥鋪座位下鑽出來，精神頹喪，神色倉皇，看到大家就問現在車到什麼地方，別人告訴他到了蘇州，儲安平才長籲一口氣，放下心，慶幸逃出虎口。」[111]

這則資料近似戲說，有些醜化的意味，仔細思量卻也比較合理。一位二十出頭的學生，出於激憤當場頂撞斥責了國家領導人，事後內心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他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種無禮之舉而被逮捕。不過，最高領袖遠比他想像的要寬容，回去之後仍然平安無事。於是他馬上着手編輯了一本書，題為《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收錄了王造時、汪精衛、陳啟天、陳獨秀等二十家對待日本問題的言論，11月由新月書店出版。儲安平在序言中說：「在中國，有若干現象，使你知道了傷心……言論不自由如故，集會不自由如故，民眾運動之被壓迫也如故。」他編這本書的用意在於，讓一般民眾知道知識界在對日問題上的要求和看法，給政府一個俯察民意的參考，監督檢驗政府能否在這方面滿足民眾和知識界的願望。[112] 該書出版前後，正逢上海的大中學

111　《我所知道的儲安平》，《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登記卷·儲安平》，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檔號129000046134A。

112　儲安平：《序》，《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新月書店，1931年。

生發起第三次進京請願活動，總人數逾萬，聲勢浩大，全國學生亦如潮水般湧入南京。光華的學生領袖已不再是儲安平，換成了1930級政治系學生沈雲龍。[113]

儲安平之所以未參加第三次請願，除了可能對頂撞最高領袖一事仍有顧慮，還有其他兩個原因。首先，儲安平在光華抗日救國會中遭到了彈劾。儲安平第一次到南京後，借了一身從未穿過的軍裝馬靴在車站接待後續學生，這種鋒芒畢露給同學留下不良印象，回校後便被同學在會上提案彈劾其職務。[114]儘管最後彈劾案未能通過，但團體內部已然產生矛盾。其次，儲安平親身經歷兩次請願運動，目睹政府要人的敷衍塞責，學生領袖的前線倒戈，遂對請願的效果開始懷疑，他不認為學生運動可以真正促使政府出兵。國難日益深重，他不能無動於衷，正在激進、憤怒之時，他獲知上海已經出現多個民間義勇軍組織，不日即將前往東北前線援助馬占山抗日。他也萌生了直接奔赴前線的決定。

1931年11月23日，儲安平與一起先期進京的法政學院李椿森等組成了學生團體「抗日救國隨軍記者團」，李椿森任團長，鄭文蔚任總務股主任，徐則驤任調查股主任，儲安平任文學股主任。[115]「記者團」的職責是隨這些義勇軍出征，「報告戰地狀況與後方消息相通，蒐集戰爭材料俾作文字上之貢獻，實地調查滿蒙現勢，對暴日侵我東北作進一步之研究」。[116]然而，從後來《申報》一兩個月內的新聞報導來看，未見該團體有任何活動新聞，李椿森、鄭文蔚、徐則驤等人之名雖經常出現在報紙上，但參加的都是其他活動，與記者團毫無關係，似此團體已經無形宣告解散。

當時上海所有的民間義勇軍組織中，真正北上而且影響力

113 《滬大眾學生昨晨抵京》，《申報》1931年11月26日。
114 儲安平：《論涵養》，《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11期。
115 《抗日救國隨軍記者團成立》，《申報》1931年11月25日。
116 《隨軍記者團今開會議》，《申報》1931年11月26日。

最大的當屬「青年援馬(占山)團」。儲安平等人組織的隨軍記者團，最初目標應該也是跟隨援馬團北上。該團正式成立的時間是11月中旬，團長名張少傑，湖南祁陽人，曾服務於東北軍並官費留法，九一八後流亡關內。援馬團團員有大中學生、警員、公務員、醫生等。該團曾在上海召開多次演說大會，宣傳鼓動抗日。儲安平的記者團解散，遂隱姓埋名加入其中，「與全體團員一起戎裝草鞋在上海抬棺遊行，以示抗日決心」。[117]

出發前夜，儲安平「草草的卷起一條被頭和一條氈單」，懷着一種「死刑犯去刑場路上」的視死如歸，在夜色中悄悄離開學校，前往援馬團的團部。12月6日，該團在上海北站召開全滬各界民眾大會，萬眾歡呼，夾道送行。當然，其中亦有白髮父母勸阻子女，紅顏少女勸阻情人出征，垂淚哭泣。儲安平沒有父母和兄弟姐妹，感受到了一種微微的落寞，卻又感覺到一種沒有牽掛的驕傲。[118] 二百七十餘名身着軍服的團員晚間準備登車時，鐵路局奉政府令拒絕該團上車，團員遂臥前車軌道之下阻止車輛正常行駛。[119] 次日，團員被迫改為步行。

這時，同樣極具愛國意識的端木露西，正在家鄉蘇州宣傳抗日。蘇州的《鬥報》在青年會舉行了抗日救國演說比賽，露西報名參加，並作了「對日作戰之理由」的演講。她說，中國當下軍閥割據，各自為政，軍隊不統一，若集中兵力對外一戰，可將私人軍隊轉化為國家統一之武力；當下中國思想混亂，過激、共產、麻木不仁思想皆有，若對外一戰，當可統一思想，增加國家觀念，一致對外等等。露西的演講獲得了第一名，演講的舉止和儀態，深得蘇州人士稱讚。[120] 儲安平這次北上，由於事出倉促，沒有及時徵得露西的同意，只寄了一個條子給她。原本以為再無

117　《儲安平傳》，《宜城鎮誌》，第578頁。
118　儲安平：《一段軍行散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93–194頁。
119　《青年援馬團被阻後，昨晨步行出發》，《申報》1931年12月8日。
120　般若：《端木新民之主戰理由》，《大光明》1931年12月8日。

法相見，恰好援馬團改為步行，且路過蘇州。在蘇州歡迎的人流中，他看到了露西在此等候。她「一粒一粒發亮的水球在她那美麗的帶着悲愁的眼角上連珠似的落下來。」露西有些悲哀，「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決心」，他默默地轉過身，「在她潤濕的眸子裏消失了他自己的陰影」。離開蘇州時，他趁着閒暇給她寫了一封信說：「我愛我的國家，正如我愛我的Lover一樣。」他認為，一個男子，畢竟有比戀愛更重要的責任。他不能為了愛一個女子，便拋下國家，假如他真正的愛那個女子，他一定格外愛他的國家。[121] 字裏行間充滿着一種個人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

青年援馬團離蘇州，過無錫、常州、鎮江並沿途宣傳，一路風餐露宿，如軍人般整齊劃一行動，非常艱苦。到南京後，該團登車，於1932年1月3日抵達北平。在平津綏靖公署的安排下，他們暫駐北平工業大學進行軍事訓練，以便盡快奔赴東北前線。[122] 儲安平此時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對自己將在前線殺敵報國、馳騁疆場產生浪漫的暢想：「他夢着摩天的關門，關門上的一額橫匾；長城萬里，萬里城上的朔風。絕塞的嚴寒，凝不凍他的熱血；夜半的哭泣，嚇不碎他的雄膽。他要讓自己去承當那幾千里一片廣土上的月色，在白白的月色下吹一段淒壯的胡笳。他要奔上那不長一根青草的山頭，在山頭上引吊一回那破碎的山河。他要帶着張飛般的喉嚨，從這個山頭一口氣奔上那個山頭，要在錯縱的山頭，蜿蜒的河流和無邊的平原上，灑遍他的鮮血，用他的鮮血來澆退敵人的氣焰。」[123] 儲安平似乎真的是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但是，青年援馬團是臨時集結的團體，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團員雖多出於真誠，但其領袖在上海時奔走於權貴門下，到昆山之際在當局允許乘車的情況下仍堅持步行，似乎有政治投機

121 儲安平：《一段軍行散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95頁。
122 《青年援馬團近訊》，《申報》1932年1月17日。
123 儲安平：《一段軍行散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98頁。

和故意拖延之意。[124] 平津綏靖公署和馬占山更不會同意學生真正到前線犧牲。[125] 不久，淞滬抗戰爆發，部分團員認為，上海已經成為戰區，在家門口即可抗日，何必遠走東北？遂有部分團員南歸，援馬團迅速以解散告終。儲安平亦隨即回滬。

回到上海後，光華校園經淞滬抗戰，部分校舍被毀，已經宣告停課，直到4月10日才重新在愚園路租借房屋開學。[126] 5月5日，中日《淞滬協定》簽訂，十九路軍調防，日軍獲得了在上海部分地區駐軍的合法許可權，這在當時被視為喪權辱國之舉。此時，政府在國難會議上再度拒絕民間呼籲實現民主憲政的要求，引起知識界的強烈不滿。由此，儲安平的政治意識極大萌發，對國民黨的不滿亦由編輯《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時期的隱晦質疑變為嚴厲的直接批評。

6月，在張東蓀等主辦的《再生》雜誌上，儲安平以和記者通信討論的形式發表文章。他說：「我們回顧執政後的國民黨，他們的政績在什麼地方呢？有人說等於零，但我們覺得，實在比零還要壞。我們姑且撇開物質的建設不說，就精神上的遺留而言，國民黨之影響到後十年內的國民道德，其罪過真無可計算。」「國民黨既以武力握得政權，人民在被壓迫下，便不得不退一步，希望國民黨能有幾個領袖出來做一些事業。但一直到現在，凡有國民黨裏所謂領袖者，沒有一個不是都登台過的，但又沒有一個不是使人民失望的。在這種地方，我們認真的看到國民黨在一般人民的血裏所栽培下的，只是一種反國民黨的力量。」[127] 這篇文章的激進程度，在儲安平早年的文章裏非常罕

124　廣仁：《援馬團幹些什麼？》，《時時週報》1931年第3卷第1期。

125　《馬占山勸阻各地青年援馬團赴黑之通電》，《時兆月報》1931年第27卷第1期。

126　《光華大學十週年紀念冊》，第38頁。

127　安平：《現在的問題》，《再生》1932年第1卷第3期。國民黨訓政影響國民道德的觀點，似乎來自其師羅隆基。羅隆基曾認為，獨裁要求的思想統一，必將養成國民的懦弱性、消極性和奴隸性。羅隆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新月》1930年第2卷第12期。

見。這說明，此時他對國民黨一味退讓，喪權失地的不滿達到極點，可謂他思想中的第一次激進化。但是，要認識的是，這只是暫時的激進化。總的來講，儲安平仍然認可國民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對其轉變仍寄予希望。一旦內憂外患的危機稍減，這種激進化便會很快恢復到常態。

1932年7月16日，儲安平參加了光華大學第七屆畢業慶典，正式從光華畢業。

第三章　庚桑洞

縱然天地立刻將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這樣一次美麗的夕光，則雖將陷入於黑暗，似亦心甘。

——豁蒙樓暮色，1933

山中對話

從光華畢業後，儲安平沒有直接求職，而是回到故鄉宜興，在庚桑洞中養病。拿出一段時間用來集中養病，是儲安平的夙願。他在1931年初說：「我寫信給伯父，說近來身體和心境都壞到極點，似乎壞到無法收拾了，我不再覺得有充分的理由還要讓自己再生存下去。家裏來信勸我還是回家休養休養吧，但我覺得回去了未必心境就能好，而且也許會變得更壞了。這身體，不是一年半載會變得健康的，挨一天算一天吧。我說，要是暑假裏能上山裏去住兩個月，也許可以好一些。」[1] 1931年末，本來身體羸弱的儲安平，參加了兩次進京請願並跟隨青年援馬團步行北上抗日，奔波勞碌中，體質進一步惡化，若不休養調整，恐怕難以為繼。恰好，伯父儲南強正在宜興整修善卷、庚桑二洞。畢業後，儲安平便馬上回到家鄉，在庚桑洞開始了山居生活。

庚桑洞，又名張公洞，位於宜興縣城東南方約22公里處的孟峰山麓。庚桑洞是一座巨型天然溶洞，因春秋時道家祖師庚桑楚曾在此處隱居而得名。後又傳說，張道陵或張果老曾修道於此，又稱張公洞。庚桑洞在唐宋時期曾是江南的修道福地，建有

1　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84頁。

道院，後因日久年深而淤塞荒廢。1921年，儲南強傾其所有，開鑿庚桑洞及宜興西南的善卷洞，經十餘年整修、設計，才告以完工。修繕後的庚桑洞總面積達3200平方米，洞中有洞，洞內石乳、石柱千姿百態，各顯崢嶸。庚桑洞的下洞為「海屋大場」，上行到達精華部分「海王廳」，經雲梯、天橋拾階而上，從天洞出，即到達孟峰山頂。山頂有摩崖石刻和涼亭，駐足可觀太湖風景。在庚桑洞的天洞口，有一座小樓，儲安平便居於其中。

在摩登城市中生活甚久的他，回歸大自然的懷抱，自然覺得悠遊愜意，心情愉悅。用他自己的話形容便是：「在那裏，有迷蒙的遠山之影，有聽了會洗去你心頭一切雜念而飄然欲睡的泉之聲，有幻變萬千的朝露，有婉轉輕妙的鳥之曲，有一切你所心愛的而在都會裏所沒有的自然之色調。要是你愛吟詩，那盡可以隨性所之地吟味幾句；要是愛沉思，則長靜的四周，即使極輕微的塵聲，都不會有來擾亂你的思緒。愛癡癡地立在什麼地方看一看天邊之雲霞的，假使你自己不想回去的話，半天一天，誰也不會來敗你的興；要是你在外面散步得疲倦了，於是閉上眼睛在床上休息一回，養一養神，或者偶爾和一些老和尚、老農夫，以及那些和自然更親近的人們談一些如油鹽柴米等極其本色的話。」[2]

儲安平的小說《無名》，講述的正是這段山居時期的故事。某日他和伯父進山遊覽，借宿宜興父子嶺八達廟，在廟中遇到一位和尚。這位和尚法號無名，約四十歲，每天除了在濟公神像前燒一炷香外，不念經，不做功課，不修邊幅，喝酒吃肉。伯父有事先回，安平貪戀山色，留在廟中小住數日。他常常與和尚一起細品螃蟹和太湖魚，興致來時，雖不會喝酒，卻勉強小酌，一醉方休。儲安平對和尚的身世和行為產生興趣，遂與他產生了一段對話。考慮到儲安平的小說，多半帶有紀實色彩，可以大體相信這段對話的真實性。即使對話為儲安平虛構，其中體現出的對人

2　儲安平：《動與靜》，《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12期。

生的看法，也明顯是儲安平當時思想的真實反映。在此不厭其煩地將原文略作刪減後照錄：

「和尚原籍哪兒啊？」

「四海為家，沒有原籍了。」

「你家裏沒有什麼親人了嗎？」

「我想我們還是不必作這種迂俗的寒暄吧。」

「就是在這兒出家嗎？」

「也無所謂『出家』啊，只是隨遇而安吧了。」

「但是至少是一種逃世的生活哪。」

「那麼照你的意思如何呢？」

「應該出來做一些事業啊。」

「你所謂的事業是指什麼呢？」

「自然是為國為人類作一點服務啊。」

「我們來到世上，便非為人類作一點服務不可嗎？」

「是哪。」

「這也只是一般通俗的論調了吧。」

「你現在對於生活厭倦了，是不是？」

「我對於生活倒無所謂厭倦，但是我對事業，對於曾經有過的理想，卻是幻滅了！」

「那是為了什麼呢？」

「你現在正是一個進化論者，或者就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其實，什麼事業，我說不過是一種炫眼的名目吧了，我覺得一切的根源，還是出於慾的一字的。」

「你說一切為國家為人類的奮鬥，最初還是出之於一己之慾的嗎？」

「是那。但是你別誤會，這個說法並不是和進化者的思想衝突的，這只是另一種的看法了吧。」

「是否人生而都有慾的呢？」

「我以為人是生而有慾的。有慾乃是天下第一苦事。越是爬得高的，他的身心不是越不感到安寧嗎？枝葉越是拉得開的，那下面的根幹兒不是越不容易承受嗎？既然最終的目的在乎獲得生存，那我便取其最簡單的一種好了。」

「你這話我是理會的，不過目下人世間一般人，明知越高越苦，可還是一心向高處爬，自己擺脫不了那。」

「你說擺脫，談何容易呢？不過有時，生活卻會將你折磨到使你自然而然的會覺得四大皆空的。」[3]

從這則對話中可以看到，二人基本是各說各話。在儲安平眼中，和尚在山中隱居，不問世事，實際上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態度。他無非是以前生活受到重大挫折，不得已才選此作為歸宿。但和尚卻不這樣認為，他從佛教的觀點，認為人有生老病死、愛離別、怨憎會、求不得等無法擺脫的痛苦。一切的痛苦都因人有慾望，私者追逐個人的名譽或地位，公者入世為國家民族社會服務，實際上都是被某種幻相所迷，也都是被個人慾望驅動。慾望永遠無法滿足，追求名譽、地位或物質的活動便永無止盡，結果只能是永遠不斷地增加自己的痛苦。因此，還不如像無名，回歸到一種最原始最簡單的生活方式，認識到大千世界一切無常，遠離顛倒夢想，才是唯一脫離痛苦獲得快樂的光明大路。

其實，對和尚表述的觀點，儲安平也能理解。因為當時他對「慾望」和「幸福」的理解，已經頗帶禪意。他曾說：「知識和慾望雖然是正比例，而知識與幸福卻成反比例。如知識為零，幸福就無限大。大部分人希望以增加知識而得到增加他們的幸福，結果是一個不幸的相反。」[4] 但是，他不會按照和尚的佛家觀點

3　儲安平：《無名》，《儲安平文集》上冊，第88–94頁。

4　儲安平：《幸福》，《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12期。

去實行。他還只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大學畢業，一切才剛剛開始，前方還有無限光明的風景。經過之前的南京請願和跟隨援馬團北上抗日，他性格上的憂鬱、悲觀已經去掉了不少。他很自負，他要努力，繼續鍛煉自己。他有強烈的事功心態，從私人的角度，他要立言立德立功，成就自己，實現人生價值；從社會的角度，他有一種士大夫式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要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對社會做出貢獻。這兩種立論迥異的話語體系碰撞，結果只能是雞同鴨講。這則對話從側面顯示了儲安平當時的心態。他雖然蟄居山中，卻並不能做一個真正的隱士，看似與世無爭，卻是在以一種出世的姿態，為入世做準備。他的心仍在大千世界之中。

給小讀者的信

儲安平入世心態的一個表現就是，開始在洞中寫作《給小讀者的信》。他採取書信體形式，我們推測，其中有冰心的影響。冰心在1923–1926年留美期間，在報紙上給國內的小朋友寫了一系列書信，記錄海外的風土人情和閒情軼事，談讀書、談生活、談做人，最後結集為《寄小讀者》。目前還無人注意到，儲安平非常崇拜冰心。1931年春他的北平之行，自認為比較大的一個遺憾便是，沒有來得及在北平拜訪作家冰心。[5] 因此，儲安平選擇書信體，以小朋友為對話對象，實有模仿冰心之意。謝泳曾說：「所謂給小讀者的信，是儲安平虛擬的一個說法，其實是以寫信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青年人道德修養的一些想法。」[6] 這個判斷很有道理。不過，從儲安平將這些稿子藏之名山很少示人的行

5　安平：《南歸》，《申報》1931年6月5日。

6　謝泳：《儲安平〈給弟弟們的信〉》，《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為上可見，對他而言，這也是比較保險的寫法。他第一次系統地談政治、人生、修養這類比較大的話題，以小讀者為預設對象，即使內容平實，無甚高論，也不會受到更多的質疑。儲安平山居無事，落筆又迅速，每隔幾天便寫一篇，很短時間就寫了十二篇文字。

這十二篇文字，分別為《論做人》《團體生活》《國家大事》《好問》《春天》《生活的和諧》《論政治人格》《吃虧》《論涵養》《幸福》《行》《顧之何益》，到1935年，又補充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動與靜》和《帽子哲學》三篇，發表於孫斯鳴編輯的《人言週刊》。其後為籌措留學旅費，抽去《論涵養》一文，更名為《給弟弟們的信》，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7]這十五篇文字文風流暢，內容通俗易懂，雖然在學術或哲理方面的價值有限，卻是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從中可以一窺此時的儲安平，對政治、人生和生活的理解程度。

最明顯的表現是，儲安平已經具備一種比較明顯的政治意識，基本認同於英美的民主制度。他對中國政治走向總體的判斷是：「今日的中國，正在想開快車，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他認為，「實行民主政治的方式是代議制度。代議制度的能否成功，又全視人民在選舉上能否認真。所謂必須人民政治意識要發達的作用，一方面在人民在選舉時候的踴躍參加與認真投票，一方面便是在平時以健全的輿論造成最大的力量來監督政府。」[8]之所以要監督政府，是因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儲安平說：「政府的權力是我們人民賦予他們的，但這賦予可不是絕對的賦予，不是永遠的賦予。假如他們不能遵從國民的公意，我們可以隨時收回我們以前給他的權力。」[9]儲安平的民主政治觀，雖然都是常識，但可見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已經具備最基本

7　儲安平：《自序》，《給弟弟們的信》，第3頁。
8　儲安平：《團體生活》，《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9　儲安平：《國家大事》，《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5期。

的瞭解。儲安平在光華時期修讀過「盧梭民約論」課程，因此他談論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基本是盧梭《社會契約論》式的口吻。

近代西方有兩種民主觀念，一種是詹姆士·穆勒式的低調民主觀，其對人性有一個較低的評價，認為民主只是一種制度，一個程序，一則可以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外來的侵害，二則讓自私自利的庸庸大眾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互相妥協，和平共營；另一種是盧梭式的高調民主觀，認為在民主共和政治之下應該人人自由，但個人自由並非最終目的，更高的理想是通過每個人的政治參與，實現一個和諧無私、親密圓融的全新社會。[10] 前者比較傾向於民主思想中的「自由主義」一脈，後者則傾向於「共和主義」一脈。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繼承的，是盧梭式帶有強烈集體主義精神、烏托邦意識和道德意識的「共和主義」高調民主觀。儲安平亦不例外，他談民主政治，雖然提到民眾要監督政府，但只是一筆帶過，對保護個人權利和私有財產幾乎沒有提及，重點完全落在國家觀念和集體主義之上。

儲安平說：「中國有三千四百九十餘萬方里的地域，四萬萬八千萬的人口，頂好的氣候，和無盡量的地底下的富藏。但是中國卻不能形成一個強國。其理由雖然很多，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中國的人民，沒有民族精神，沒有國家觀念。」他將國家觀念的缺失歸咎於儒家和君主專制：「中國的世界是孔教的世界，孔教的中心思想是宗族觀念，而非國族觀念。大家只知有家，不知有國；中國的政治，素來是君主專制，寡頭政體。所謂國家，不過是少數人的私產，所謂政府，不過是少數人的私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中國以往的政治，也不使你們有參加政治、過問國事的可能。」[11]

10　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29–231頁。

11　儲安平：《國家大事》，《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5期。

中國人非但沒有國家觀念，還缺乏團體觀念。他說：「中國人素來不善於團體生活，缺乏公共道德。一盆污水潑在街上便彷彿與自家不相關了，一切救濟賑災，無人自動參加。祠堂裏有公產可佔，於是大家出來干涉了，地方上說要徵收房捐，於是有房子的人們便出來反對了。」[12] 正因為人人為己，才不能結合為良好的團體，使中國的政治遲遲不上軌道；不肯為公，才不能保家衛國，使中國積貧積弱，屢遭東西方列強欺負。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每個人都講義務、盡責任、增強道德精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存在着一種「反求諸己」的傾向，那就是將改造政治和社會的要求，轉為改造個人思想和道德的自我要求，期待個人通過思想砥礪和培養必要的智識德行，以大無畏的精神投向政治、社會和文化活動，進而促成國家的復興和人類歷史命運的轉變。[13] 儲安平在這方面極具代表性。他認為：「欲救今日的中國，欲使今日中國的政治清明，只有大家來建設自己的政治人格的一條路。」所以，儲安平的《給小讀者的信》系列，實際核心並不是在宣揚什麼民主政治，而是在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在公共方面，他認為理想的現代公民應該具備如下素質：「我們平時必須公正地參加任何公共事業，我們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不浪費公帑。即使我們要從事我們的政治理想，行為也必須是坦白的、光明的、負責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搗亂式的、暴動式的。我們必須孕育一種剛正之氣，不諛陷，不陽奉陰違，不口是心非，不要以為政途可爭權奪利，不要以事業為富貴的附庸，我們對於國事有所發言，必須是善意的批評式的，建議式的，而不是惡意的謾罵式的。」[14] 在私人方面，應該有強健的體魄，高尚的情趣，

12　儲安平：《團體生活》，《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3　楊貞德：《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個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第7–12頁。

14　儲安平：《論政治人格》，《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9期。

良好的涵養，豁達的心胸，以及知行合一的精神。「惟有大節操者，才能得成正果」。只有從小培育這些人格，逐漸養成一種浩然之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未來中國的合格公民，承擔起實現國家富強的重任。

儲安平時刻以西方的政治文化為標準，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進行否定。他認為以上的種種問題，都與孔子學說的負面影響密不可分。但是，儲安平過度強調個人修養的重要性，恰恰和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分享着同樣的思路。儒家本身就是一種修身學說。從孔孟到朱熹，幾乎都認為，人皆有無限向上之潛能，通過內在的德行修養，可以臻於至善。而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也是唯一途徑，君子必須由個人的修身，進而領導政治，推動社會，使社會達到完美之境。換而言之，只有具備良好的道德人格，才能在經世濟民的事業中應付一切困難，無往不勝。儲安平當然對儒家的修身觀不感興趣，但卻從現代政治學的公民知識出發，同樣給了修身以最重要的位置。他對通過提升道德來改變中國社會，亦抱有一種極度樂觀主義的態度。這種樂觀主義相信人有體現至善、成聖成賢的可能，認為政治權力更多應由內在德性的培養去轉化。用張灝的話講，這是對人的墮落性和無限為惡的潛能缺乏一種「幽暗意識」。[15] 一旦道德說教無效，塑造「新民」的願望落空，便可能滑向精英權威主義，認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通過開明專制，引導民眾的道德提升。後來儲安平曾一度稱頌新生活運動，留學期間讚賞納粹德國民眾的國家意識，稱讚希特勒的國家動員能力，正是這種心態的典型表現。

15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張灝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頁。

初識吳稚暉

1932年8月，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前代理教育部部長李書華來到宜興，遊覽善卷、庚桑二洞。[16]儲南強和吳稚暉是江陰南菁書院的同學，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這次吳稚暉來遊，儲南強提前安排了張渚鎮桃溪旅社的住宿，並囑咐老闆江壽林全程陪同保護。[17]在庚桑洞中，吳稚暉看到年輕、英俊、好學的儲安平，瞭解到他在上海讀書寫作，去南京請願，隨抗日援馬團北上的經歷，遂對這位少年後生產生喜愛。尤其當伯父儲南強將《給小讀者的信》系列文章交給吳稚暉，請求「指正」時，吳稚暉大為讚歎，閱讀一番後，在《團體生活》《論政治人格》和《行》三篇文章之後寫下了自己的按語。

吳稚暉的按語，實際是對儲安平文章的象徵性增補。儲安平說中國人只知道有家族觀念，而沒有國家觀念。吳稚暉看到，那些貪污浪費的政客，實際上也有國家觀念，每天都在口口聲聲地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他們接受並信奉的實際是家族教育和利己教育。[18]至於《行》的按語，吳稚暉開始還接着儲安平到底是「知行合一」還是「知難行易」更有道理的話題講，後來卻扯到「男女戀愛與衛生問題」上。他信馬由韁，以「食色性也」的話題任意發揮，諷刺部分新派青年口口聲聲稱「戀愛神聖」，卻不過如低級生物一樣受食色慾望之驅使。這則按語用詞戲謔甚至色情，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19]吳稚暉的按語，雖然是真性情的表現，但對「小讀者」而言，實不合適。

16 楊愷齡編：《民國吳稚暉先生敬恒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2頁。

17 《儲南強致江壽林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吳稚暉檔案，檔號稚11021。

18 《吳稚暉按語》，《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19 《吳稚暉按語》，《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13期。

吳稚暉對儲安平的欣賞，與其說在才氣方面，不如說是在道德方面。作為一個二十出頭的新派青年，竟然在文章中體現出鮮明的修身觀念、向上意識和道德精神，實在讓「老朽」的吳稚暉刮目相看。吳稚暉這種個性鮮明、放蕩不羈、極端孤傲的名士，不輕易對人賞識，但是一經看中，便百折不回，且「一發不可收拾」。正如當年他在日本留學時代，作為留學生中赫赫有名的前清舉人，原本瞧不起「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目」孫中山，接觸其人格、學識、學說後，卻佩服得五體投地，馬上納頭便拜，成為「總理信徒」，五十年而不渝。[20] 他對儲安平的欣賞亦與此類似。後來，儲安平將文章結為《給弟弟們的信》出版，吳稚暉親自寫序，不吝褒揚之詞彙說：「他是一個江東少年裏最偉大的文豪；但他偉大之處，不單單文章做得好，亦不單單他的學問淵博，我們老頭子都崇拜他的，還有他的人格偉大！他如何偉大起來的呢？就是修養的得法。您採用儲先生的指示來修養，是一條光明的大路呀！」[21] 1936年，儲安平赴英留學，吳稚暉對其多有指點，並給儲安平寫了一封長信，不厭其煩地囑咐他在海外的各種事項。儲安平主辦《觀察》的時代，吳稚暉還為儲安平的商務版《英國採風錄》題寫書名。吳稚暉在儲安平的人生中，並不是人生導師之類的角色，但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卻起到了一個「保護人」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會提到。

閒居金陵

宜興是內地小縣，當地報界人士知道吳稚暉、李書華遊洞，並賞識儲安平之事，遂紛至沓來，到洞中採訪儲安平。據說，其後儲安平在洞中的生活起居，也經常被他們登載於報上。原本安

20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5卷，台北：遠流出版，2004年，第193–195頁。
21　吳稚暉：《介紹儲安平先生著〈給弟弟們的信〉》，《申報》1936年5月1日。



《給弟弟們的信》封面



1930年代早期的儲安平

靜的生活被這些記者破壞，他感到十分不適。何況，洞中也終非久留之地。1933年春節過後，他身體開始轉好，遂打算出洞，先到南京閒居一段時間。當時的庚桑洞就處於京杭公路上，乘汽車可直達首都南京。臨上車前，突然接到常州發來的電報，告知外祖母逝世。[22] 這位外祖母實際是繼母惲氏的母親，儲安平與其沒有任何感情，例行公事地先到常州靈前磕頭，次日便乘火車到達南京。

儲安平形容自己在南京的閒居生活：「我到南京已有一個多月，僅僅看見三天有太陽。……飯後在床上假寐，聽窗外淅瀝之歌。睡了三個鐘頭，猶未成眠。沉入於一切雜感之我，於是披衣服起來，撐着雨傘走出寓所。常常在許多地方，會因為看見自己的形單影隻而引起若干孤獨之感的吧，但索性抱着一種悠閒的心情，一個子在外面踱踱，倒又覺得無上高雅。懷着這樣一種超然的心情，隨便上崇山峻嶺、江河大流、荒落墳郊，或士女錯縱的都市公園裏，都能得到一種沖淡之趣。」[23]

22　儲安平：《來京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01–205頁。
23　儲安平：《豁蒙樓暮色》，《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05頁。

在一個風雨交集，疏落夾雜着雪珠的下午，他獨自登上南京的台城，再由台城跨入古雞鳴寺，登上豁蒙樓。豁蒙樓是張之洞為紀念他的門生、戊戌殉難的六君子之一楊銳所建，位於雞鳴寺最高處。儲安平在豁蒙樓的窗邊坐下，遠眺台城之下的玄武湖，看到一抹夕光將湖面照得平滑柔軟，天地馬上將要被夜色籠罩。他在後來的名文《豁蒙樓暮色》中寫道：「縱然天地立刻將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這樣一次美麗的夕光，則雖將陷入於黑暗，似亦心甘。」這句話似乎隱含着一種個人抱負，雖然世俗惡濁黑暗，但自己若能如那一抹夕光，在黑暗完全降臨之前發出最後的迴光返照，雖然悲壯，卻也不枉此生。天地之間一片寂靜。儲安平聯想到前路漫漫，壯志難酬，又產生了一種人生悲苦之感。

除此之外，便是去探訪朋友。《新月》時期結識的朋友方瑋德家就在南京，他時常過去閑坐，可是經常是二人良久對視，既不願動，又不願思考，不願講話。他會每天去圖書館，常常一坐就是八九個小時。他自認為大學時代讀書太少，此時難得有大段賦閑的時間，希望將從前荒廢的光陰補回來。南京春寒料峭，春雨蕭瑟，可是無論多冷的天氣，多大的雨，他都不讓自己偷懶。即使在房中困倦，希望能再安睡一會兒時，他形容自己：「我咬緊了牙齒正如我手的捏緊了的傘柄，街燈將我從這個水泡送進那個水泡」。他蹣跚走到圖書館讀書。這時的儲安平無疑是孤獨的。這是一種內心深處不可言說、無人理解的孤獨。這種孤獨讓他既喜悅又害怕。害怕的是，孤獨的時刻，情感常常過度氾濫，往往延宕數日，使人覺得痛苦異常，對一切都失去興趣。喜悅的是，「一滴清淚裏有一份人類的美麗」。[24] 這種孤獨的感覺，讓他有一種難得的苦澀而清澈的體驗，對生命有一種切實的清醒感和存在感。

儲安平的名下有一塊土地，每年都有租金收入，雖然微薄，

24　儲安平：《感情的顏色與光彩》，《文藝月刊》1933年第3卷第11期。

也可維持生活。因此，即使他在南京閑住，最初並沒有謀求職業的打算。這並不是因為他對外面的世界心存畏懼，希望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不事生產，而是對那些毫無意義的工作有一種先天恐懼。儲安平自視甚高，就如他在此時的文章中所講的：「我的理性叫我做什麼一種人，叫我留下一些什麼東西在歷史裏。他頂好的說明還是九千里的江流，巫峽的曲截也止不住他的雄滔。他的阻擋只加重他的認真，他飛濺的開闊。在平順或險奧裏，緩流或急湍裏，涸落或氾濫裏，他永遠保持一份一貫，你分割不了他，崩潰不了他。」[25] 這表明，他不甘心於從事只為謀生的工作，不願在庸碌的日常工作中，慢慢泯然眾人，喪失了意志，磨蝕了自己的韌性。因此，當他在南京見到自己的大學同學「汶子」，在一個軍事訓練班當小兵，每日生活於機械的訓練中，「沒有信仰，沒有自由，只有服從」的時候，心中多次想問他「為何走這條路」，卻出於尊重，遲遲沒有出口。[26]

但是，伯父儲南強卻對儲安平的職業非常着急。他在南京有故交，在某部的司長任上。在他的多次催促下，1933年3月，安平極不情願地前去司長家中拜訪。儲安平形容這位司長：「他是道地的一個五十年前的中國人的典型。他和來客談了一許多如任命之類的話，說誰三十至四十一歲可以簡任，四十二至四十五六歲也許要賦閑，四十七至五十六且還可以特任。我覺得一個現任司長如他這人談話的趣味，極有革命的中國政治史料的價值！他和來客彷彿是極相熟的，隨便談着，無非是交易所裏的賣出買進一類的事了吧。」司長多半時間在和另一位來客談話，偶爾才掉頭來招呼安平。他並不歡迎儲安平，害怕他開口託其謀職。但儲安平當場表明：「我家裏寫信叫我來拜訪，所以我冒昧地來拜訪了。我請你接受我的要求。我要求你不要誤會我來是為了想請你

25　儲安平：《感情的顏色與光彩》，《文藝月刊》1933年第3卷第11期。
26　儲安平：《夢與地獄》，《自由言論》1933年第1卷第5期。

找事做的，我目下還沒有職業的需要。」在司長詫異的目光中，儲安平當場告退。[27]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儲安平的高傲與倔強。他對這種受人豔羨的政府公務員職務不屑一顧，對他們庸常的工作，患得患失的可笑心態，處處謹慎的行為方式，更是充滿鄙視。

他不理解，如這位司長般只有在小商店做掌櫃的能力，竟然能佔據了政府的要津。一番思考，似乎也慢慢理解，這就是所謂的官僚體制。他也意識到，社會殘酷無情，人為了活着，必須要降下身段，被迫從事某些無意義的工作：「每個人都必須獲得他自己的生存。不論他背上壓下一重多厚的山，他也得盡他的本份有一回掙扎。一個螞蟻也得在一方寸的小圈圈裏建築他生活的營壘，一條曲蟺也得用她的小嘴鑿通一條深邃的泥腳。」因此，他雖然仍對生活比較悲觀，卻為了謀求自己的生存，很快就開始多次在南京和上海之間奔波求職，尋找機會。[28]儘管他在心態上可以睥睨一切，實際上卻仍是一個閑住在南京，職業未定的青年人。他在自信之餘，也許會自問：除了志氣之外，他身無長技，他能做什麼？眼下想到的，似乎還是寫作。

1933年春，他以自己從宜興來南京的經歷，或虛或實，寫了一篇《來京記》，寄給了上海的《論語》。《論語》由林語堂總負其事，由儲安平的朋友孫斯鳴擔任編輯。儲安平這篇《來京記》，將自己隱居山中比作黨國要人，或因政治下野，或因積蓄力量伺機再起而隱居。他虛構了來京後發表政治演講、朋友爭相宴請等內容，實際表達的是對政客平庸、無能和虛偽的諷刺。[29]不過，要注意到的是，儲安平這篇文章只是無心的戲作。他雖然在《論語》上發表了這一篇文章，卻完全因為和編輯孫斯鳴熟識，而非認同《論語》的辦刊理念和文章風格。不久，孫斯鳴離

27　同上。
28　儲安平：《朝行》，《文藝月刊》1933年第4卷第5期。
29　儲安平：《來京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201–205頁。

職，他利用《中央日報》的版塊，連篇累牘發表了諷刺林語堂和《論語》雜誌的文字，我們在後文中將會提到。

除此之外，便是繼續小說寫作。此時端木露西正在燕京大學做旁聽生，且在某小學兼任教師，收入微薄。[30] 兩人雖繼續保持關係且經常通信，但長期分隔兩地，頗受相思之苦。他便以露西為原型，虛構自己的小說人物。他在此時寫了兩篇小說，都是以女子為主人公，前者是《斷想》，發表在南京的《文藝月刊》，後者是《為奴隸的一生》，發表在杭州的《西湖文苑》。在《斷想》中，儲安平講述了「我」與愛戀的女孩「雲子」從宜興到上海的數年內，若即若離、藕斷絲連的交往，最後以雲子嫁人而告終的傷感愛情故事。[31] 故事夾雜「雲子」給北平的「我」寫信促使南歸，共遊萬國公墓等前文提到的情節，可見「雲子」是儲安平虛構的一個結合體，原型可能有那位中醫診所隔壁的不知名少女，或有光華前期暗戀的「桃妹」，但更多的是與露西交往的影子。《為奴隸的一生》講述的是一個家貧無法生存，流浪到「我」家中做下人的「桃桃」，單純、善良、可愛、心直口快、活潑，卻命運悲苦，在河邊洗米被淹死的故事。[32]「桃桃」的家境當然和露西大相徑庭，但如活潑、開朗、大方等性格，無疑也是露西的特徵。這些小說的情節過度乾淨、單純、清澈，像是兩篇童話。從中不難看出，此時的他對女性、人生和世界，持有一種深重的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態度。

30　漫漫：《端木新民在平近狀》，《大光明》1932年12月11日。
31　儲安平：《斷想》，《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3–33頁。
32　儲安平：《為奴隸的一生》，《西湖文苑》1933年第1卷第3–4期。

第四章　初做報人

> 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擺脫文學，說得再苛刻一點，叫我咒詛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學。這一個衝突，這一個矛盾，就摧毀了我的希望，是在別方面既無適就，在文學方面也一無建樹。
>
> ——說謊者·自序，1936

黨報編輯

1933年7月，儲安平進入《中央日報》，接手副刊《中央公園》的編輯工作。儲安平形容這是一個「偶然的機緣」，至於什麼機緣，未能言明。據1957年的一本反右文獻稱：「1933年夏，由偽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的同鄉、儲在光華大學的同學楊子英介紹，出任偽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歷時三年。」[1] 楊子英曾擔任光華附中學生自治會的正委員長，是校內外的風雲人物。考慮到楊子英這個名字比較陌生，若非儲安平口述，他人難以瞭解，所以此表述頗為可信。儲安平曾自述，他初進報社時，和社長完全不相識，與報館裏的編輯部主任、經理部主任和編輯同事亦毫無淵源。他以新文學作家的身份，與他們的文章趣味亦甚為不合。[2] 從常理來講，剛剛大學畢業，既和上司同事毫無淵源，又與他們的文學趣味不投，即使有人推薦，也不會受到無故接納。但是，

1　《儲安平的簡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光明日報社，1957年，第80頁。

2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程其恒編：《記者經驗談》，銘真出版社，1943年，第183頁。

儲安平接手之前的《中央公園》，是一個比較失敗的副刊，非但多次停刊復刊，編輯水平也比較低，文章內容雜亂，作者參差不齊，整體毫無生氣。[3] 國民黨的宣傳系統內極度缺乏宣傳人才，也需要將目光投向黨外，以輸送新鮮血液，所以儲安平這樣的青年作家，對《中央日報》而言是急需。程滄波對儲安平的接納，並無猶豫。

對儲安平而言，報紙編輯無疑是相對理想的職業。而且，《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中央黨報，公信力雖然無法和《申報》《大公報》相比，但發行範圍可達全國，廣泛為各級黨政機關人員閱讀，影響力頗大。如果認真加以利用，完全可以打造成為一塊優質、有效的言論園地，發揮積極的作用。不過，當時文學、政治上的門戶之見很深。《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黨報，負有宣傳黨義黨綱的責任，為其工作，很可能會被想當然地認為甘做國民黨宣傳系統的螺絲釘，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輕視。儲安平未嘗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但他有自己的獨特態度和應對方式。他認為：「中央日報有兩重人格。在政治上，他是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黨報，在新聞事業上，他是一個新聞報紙，我始終以一個技術員的身份，在偶然的機緣下，在中央日報社服務。我不知道我這種態度，對不對，應當不應當，但是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4] 允許編者價值中立，將工作與意識形態進行切割，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這是儲安平與《中央日報》之間可以達成的一個底線性共識。何況，此時的儲安平對國民黨系統的文藝刊物並不反感。比如他發表過文章的《文藝月刊》，是國民黨中宣部領導的「三民主義文藝」派機關刊物，《西湖文苑》是浙江省黨部主辦的「民族主義文藝」雜誌。[5] 即使是國民黨直接

3　張慧：《中央日報副刊與儲安平》，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5–8頁。

4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82頁。

5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

控制的文藝刊物，黨性也相當微弱，所謂主義不過是一個虛置的口號，雜誌作者左中右皆有，內容和正常雜誌無異，不明就裏者根本無法知道其有國民黨背景。

1933年7月1日，《中央公園》欄目發出預告：「本園自七月五日起，內容革新，除特約海內名家撰稿外，歡迎讀者投稿。惠寄稿件，內涵應真實，態度務求幽默，文章須有光彩。稿件題材請側重文化批判，社會諸相淡描，以及隨筆雜感等。幽默插畫，亦所歡迎。來稿每篇字數，最好自五百字至一千字為止。」[6] 這個稿約通知出自儲安平之手。從中可見儲安平的編輯態度，首先是強調名家的特約稿件，以增加副刊的知名度；其次要求稿件的品質，不但要真實，還應該態度生動幽默，有可讀性；第三，文章應該有立場，不太歡迎無關痛癢的學術文章或小品文，更側重於發表描繪社會現象和文化方面的批評文字。儲安平的「革新號」本擬於7月5日出版，因前任編者已經將該期的稿件編排，遂推遲到7月6日。

儲安平編輯的《中央公園》，撰稿人群體主要包括四部分。首先是光華讀書時期的師長、同學和朋友，如邵洵美、方瑋德、于在春、沈祖牟、趙家璧、陳夢家、何家槐、徐轉蓬、穆時英、孫斯鳴、張沅長等，以及已不可考證其真實姓名的如是、蘇九、鳳尼等人。當然，有些人也未必會如約發來稿子。比如方瑋德，此時已經去廈門集美學校教書，儲安平多次去函約稿卻未得回應，不得不開玩笑般冒方瑋德之名給自己寫信，發表在《中央公園》上。這是儲安平逼方瑋德出山的一種小妙計，不久方瑋德便發來信件和文章。[7] 其次是南京當地文學、戲劇兩界活躍的人物，如王平陵、繆崇群、韓侍桁、高植、常任俠、孫洵侯、滕

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3頁。

6　《中央公園預告》，《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7月1日。

7　方瑋德：《廈門通信》《在廈門》，《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10月13、27日。

剛、柴沅、老白等。他們都是南京文學雜誌《文藝月刊》的撰稿人，部分人有國民黨背景。儲閒居南京的時候，就已經和他們熟識，且多有來往。第三部分是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讀書的一批從事文藝寫作的學生，如張鳴春、錢國成、章伯雨等。最後一部分是無名作者的投稿。《中央公園》並非只刊發名家稿件，無名作者的文章在其中佔很大一部分。很多作者如「拜金」等人，文章的品質甚至超過知名作者，給《中央公園》增添了不少活力。

儲安平擔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比一般的編輯更注重副刊的公平性。他自述：「我自承我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編輯。我審閱稿件，完全以稿件的內容為標準，好的即用，不好的即不用。退稿在我是家常便飯，我退人家的稿件，既無所不安，也無所慚愧，因為稿子不好，退給人家，是天下最合理的事情。不僅普通朋友的稿子退，最好朋友的稿子，不合用時也退。不僅寫信退，甚至當面退。談天歸談天，公私分明，這是我最好的態度。二十二年夏，我初編輯副刊時，我的情人(端木露西)從北平寄來了三篇稿子，但我一篇都沒有用。我將她的稿子退給她，我說明我的理由，我覺得我這辦理，是最痛快安慰的事情。」[8] 儲安平非但退朋友、情人之稿，對上級安排的稿件，如不合用，他也照退不誤，不留情面。不過，對於好的稿件，他卻極為重視，即使並不認識作者，也會請其找機會到報社一敘。有時他還親自登門拜訪，以建立長期的友誼關係。如果發現有潛力的無名作者，即使文章稍差不堪使用，他也會去信予以鼓勵，期望他們發來新稿，直至順利刊登為止。不時還有讀者來信，不為投稿，只為請求編輯指導文學寫作，儲安平則會親切地給予回信，將自己的寫作經驗告訴給他們，不辜負他們的信任。

儲安平每月都會收到七八百封投稿函，近八十萬字，還要草擬六百餘封回覆郵件，可謂繁忙，但他卻將工作安排得井井有

8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84頁。

條。[9] 一般他當天收到稿子，即當天看畢。如不合用，不要求退稿的，閱後馬上撕毀；附有郵票的，隨手裝新信封退還，以免堆積。決定用的稿子，即手批「用」字，在文頭標明字數，以便下次容易編排。當天不能決定是否採用的稿子，批上「待復閱」，留待回家考慮。那些粗心未附退稿郵票的稿子，若文章很長，頗顯作者心血，便暫代保留，以防日後作者來函索要。他在辦公室準備了一個長櫥，上面有很多抽屜，注明「待用稿」、「待決稿」、「待領稿」、「廢稿」等字樣，閱後稿件分別放於不同的抽屜備用。對於稿費，儲安平最先開出千字一元到四元的標準，對於特約的名家專論，不以字數計，每篇可高達十元。舊時外埠作者領取稿費不方便，需要先將稿費單寄給作者，作者簽字蓋章後寄回，報社收到後才發放稿費。儲安平鑒於來往過於周折，遂進行制度改革，囑咐會計室可根據每月月底他提供的名單，直接向作者發放稿費。[10] 對待文稿和作者如此認真的態度，是因為他也曾是投稿人，知道文人寫稿的艱辛和不易，遂對作者有一種本能的體恤和尊重。每天處理如此繁忙的編輯事務，使儲安平漸漸形成一種極高的工作效率，逐漸鍛煉出一種幹練的工作作風和負責正直的辦事精神，這為他日後主辦《觀察》雜誌時，應對各種複雜環境打下了基礎。

批判論語社與左翼

在敘述儲安平編輯《中央公園》之前，我們需要確認一個總的前提，那就是儲安平對副刊是否有主導權的問題。對儲安平與《中央日報》副刊的兩種初步研究，都認為他編輯副刊並不自由，也經常身不由己，實為在夾縫中生存，最後以放棄編輯工作

9　儲安平：《編輯罪言》，《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4月2日。
10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90頁。

而告終。[11] 這些判斷，都沒有切實的證據作為支撐，有相當大先入為主的成份。實際上，這些講法基本是被國民黨中央黨報的名號所迷惑，想當然地認為其在意識形態或編輯方針方面具有不可通融性，編輯本人只能一切遵從，俯首聽命。但是，《中央日報》副刊的編輯，很多都是黨外人士。1928年在上海發刊時，甚至胡也頻這樣的左翼作家也做過副刊編輯，丁玲等亦是副刊的常見撰稿人。從原則上講，《中央日報》可能會要求副刊在意識形態方面和正刊保持一致，但從實際來看，並不真正要求副刊宣傳黨綱黨義。編輯若持一種超然的態度，不反對現行政治體制，不作政治批判，在文學文藝方面盡可以暢所欲言，甚少受到限制。

對於這一點，儲安平自己的說法最值得參考。1936年，他在離職後曾經寫道：「我對於我的工作極有興趣。我上報館的時間在晚上，但當晚飯沒有開的時候，我的心神可已飛到了我的編輯室裏。我每天都祈望夜晚的到臨，為的我可以在編輯室裏的桌子收到無數封書信和稿件。這已不是單純的一種『職業』，我的職業和我的興趣早就打成了一片。……報館簡直成了我第二個家庭，公事就是我頂融合的兄弟。」[12] 抗戰時他應雜誌之邀講述編輯經驗時寫道：「幸而那時我報館裏有一點可以稱頌的地方，就是我編的副刊和報館裏的人的趣味雖不調和，但他們對我卻並不為何干涉。所以我只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在編輯上，我仍保持着我的主權。」[13] 儲安平在兩次自述中，都表示了對這份工作的熱愛，他在這一問題說謊實無意義。因此，分析儲安平在《中央日報》三年的編輯工作，應該相信，儲安平在用稿權、整體格調確定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其中編輯刊發的個別文章，即使帶

11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言論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頁；張慧：《中央日報副刊與儲安平》，第30–32頁。

12 安平：《我要向莽原裏飛》，《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2日。

13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83頁。

有鮮明的立場，與國民黨圍剿左翼文學的文藝方向不謀而合，但更適合理解為，這也是當時儲安平個人文學、文藝觀的一種表現，是自願的而非強迫。當然，也不能過份強調這種自主性，畢竟《中央日報》作為黨報，文章有編輯部主任、社長層層把關，距離真正的個人園地遠甚。但是，儲安平受到的阻力，更多的是在文藝風格的新舊方面。

儲安平初到《中央公園》，半年多的時間裏，最集中發表的一系列觀點鮮明文章，便是聲討林語堂的「論語派」文學和批評左翼普羅文學的稿子。前者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蘇九的《從幽默到沒有》，王平陵的《談幽默》，幽槐的《討林語堂檄》，石嶽松的《擬幽默大師墓誌銘》，低吟的《擬幽默大師訴冤》，拜金的《寄林語堂》等等。後者在發表時間跨度以及規模上要遠遜於前者，有代表性的如張鳴春的《密斯脫趙的革命》、如是的《普羅文學做法》，鳳尼的《海上文壇雜玩》，韓侍桁的《觀念論的遊戲》，等等。儲安平還親自上陣，在很多文章中都表達了對兩派文學的意見，是為對上述批評文章觀點的再次肯認。

《論語》雜誌從1932年創刊後，以發表幽默詼諧、短小閒適的小品文開始聞名於世。很多作品針砭時弊，揭露官場，批評國民性，展現出這群頗帶自由色彩的知識分子的「叛徒」一面。[14]但作者群的隱士氣質大於叛徒氣質，他們以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揭露諷刺而無建設，且專以尖酸刻薄話語描寫變態、醜陋、肉麻為能事，在時人看來，這是一種無關於國計民生，毀滅文學格律的「文丐主義」和「亡國文化」。儲安平和《中央公園》的作者們普遍認為，在這些文章的影響下，文人競相談論幽默，從事嚴肅文學創作的人越來越少，文學開始普遍帶有一種油滑、諷刺的腔調。這些小品文雖然都出自名家之手，但很多都是插科打諢、

14　楊劍龍：《論語派的文化情致與小品文創作》，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0–32頁。

鄙俗肉麻，滿足的不過是閒人茶餘飯後的審醜趣味。另外，林語堂等人提倡的幽默，實際並不是真正的幽默，而是惡毒的諷刺和謾罵，在文壇開啟了陰毒、諷刺的風氣。就如宗白華在《中央公園》上發表的《悲劇的與幽默的人生態度》一文認為，真正的幽默是在平凡渺小裏發掘價值，既不是謾罵，也不是諷刺，冷峻背後透着的是心熱。幽默本身含有哲學意味，是一種對人生價值的重估，是在「平凡的人生裏肯定深一層的價值」。[15] 林語堂等人的「幽默」，不過是格調低俗的諷刺挖苦而已。

在儲安平看來，新月派或廣義上京派作品，雖然在氣魄上稍小，但從文學的角度講卻是真正的好作品，因為其中有徐志摩所強調的「嚴正格律」和「文學尊嚴」。[16] 論語派的幽默文字無疑與此大相徑庭。他還批評論語社諸人的做人原則。比如說林語堂「好做驚人之筆」，立論常失之偏頗，為追求擴大影響，一定要劍走偏鋒，故意招人反感。[17] 或批評郁達夫，一方面是《論語》雜誌的資深撰稿人，在該刊發表小品文，似乎是秉承「矯正文人空疏浮泛哀傷憂鬱的弊端」的創刊宗旨，但一方面卻在其他報刊雜誌上繼續寫「空疏浮泛憂傷」的文字，實在是自我分裂。他質疑論語社諸人的文學水平。《論語》雜誌提倡文章須有「瀟灑含蓄爽利幽默」之音，但他在諸人的文章中也從未發現，只看到李青崖等資深撰稿人的文章愚笨不堪，文風凝滯，和所謂爽利瀟灑的要求相比，簡直相去萬里。[18] 總之，儲安平在《中央公園》上，對林語堂以及論語派文學給予了徹底的否定和諷刺。

批評魯迅和他身後的普羅文學作家，標誌着儲安平與左翼文學的徹底決裂。儲安平與《中央公園》的作者們普遍認為，魯迅

15　宗白華：《悲劇的與幽默的人生態度》，《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7月11日。
16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言論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第178頁。
17　儲安平：《一年裏的出版界》，《讀書顧問》1935年第4期。
18　儲安平：《致幽默大師林及論語社諸賢》，《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8月17日。

原本從事小說創作，《阿Q正傳》之類的作品，本是反映大眾靈魂的偉大著作，但近些年來「不務正業」，轉向寫作可以一揮而就的千字雜文。這些雜文非但是創作上的投機取巧，且文風苛毒陰損，推動了文壇的刻薄風氣。他們責怪魯迅在文學上只會批判而從不建設：「一天到晚只是諷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點鮮明的回答。」[19] 他們還批評魯迅的為人，對他人極不寬容，樂於在文壇挑起筆戰。如張鳴春將文壇比作擂台，認為「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主。如果發現文壇上哪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20] 對於革命文學，如韓侍桁認為，這些「革命文學」，多半是作者在有熱水暖氣的高級旅館中寫成。作者們經常在各種左傾陣營裏晃來晃去，頻繁變動身份。他們喜歡玩弄時髦觀念，大談諸如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流氓階級等名詞。實際上他們從不認真對待文學，而是將文學當成一種文字遊戲，用文學上的左傾來博人眼球，將文學當作獲得名譽金錢的終南捷徑。這種文學不消滅，便沒有真的文學產生。[21]

實際上，《中央公園》對論語社和左翼文學的批評，在當時的批評話語中並不特殊，只能說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而且，這種批評的語調、角度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文藝」、「民族主義文藝」作家的批評非常一致，許多《中央公園》的作者也是國民黨宣傳系統內的作家。但是，目前所有的研究都未把如此色彩鮮明的《中央公園》視為三民主義文藝和民族主義文藝報刊。[22]

19　州：《雜感》，《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10月31日。
20　鳴春：《文壇與擂台》，《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11月16日。
21　韓侍桁：《觀念論的遊戲》，《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7月6日。
22　參見張大明：《主潮那一面：三民主義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這就說明，儲安平的《中央公園》和其他國民黨宣傳系統的刊物有一個很大不同，《中央公園》幾乎不從意識形態上着手，而是從文學本身批評。儲安平的態度，也並非是為批評而批評，為黨義而批評，而是為文學而批評。作為堅持文學格律的新月派作家，他對林語堂和魯迅兩派文學勢力給文壇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很深刻的認識。

初出茅廬的儲安平，將高調批評的矛頭指向林語堂、魯迅兩位文壇耆宿，批評色彩鮮明，言辭犀利，頗有睥睨一切的態度。這是一種少年俠氣的自負，其中頗含立志澄清文壇的氣度和精神。但是在一些地方，他並未很好地把握尺度。尤其是批評論語社的文章，連篇累牘，變換各種文體，既有「歌謠式」，又有「檄文式」、「墓誌銘式」，幾乎長達一年之久。有時，這些文章也超出了學理批評的範疇，轉為諷刺其人本身。實際上，這正好犯了和被批評者一樣的錯誤，那就是諷刺挖苦之處太多，缺乏一種理性和寬容的精神，距離儲安平所崇尚的嚴正的文學態度遠甚。而且，許多作者未必真心反對林語堂，但是發現儲安平的觀點和立場後，可能故意採取一種迎合的態度，撰寫大量諷刺林語堂的文章投寄。這種稿件，儲安平基本給予全文照發。考慮到《中央公園》的影響不小，未必沒有替林語堂和魯迅辯護的來稿，但是我們未看到儲安平發表。由此可以判斷，儲安平此時在編輯態度方面，並未能真正做到冷靜、理性和客觀。他還需要更多的歷練。

文壇之鏡

實際上，《中央公園》雖然身在南京，但由於儲安平的海派文學淵源，該園成為觀察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壇的一面鏡子。上海文壇的種種亂象，如作品抄襲、山頭林立、出版商業化等

等，在《中央公園》都有反映。上海文壇發生的大事，在《中央公園》上也都能馬上看到回應。從某種程度來講，《中央公園》甚至可以視為一部上海文壇的《文林外史》，儲安平和他的作者們以第三者的姿態，在南京記錄着這些亂象，或單純的反映揭露，或予以嚴厲批評。從這些批評的努力中，既可看到儲安平澄清文壇之志，也可見到其做人的一些特徵。

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是穆時英的抄襲問題。1933年9月，儲安平接到一封從偏遠的河南彰德寄來的信件，署名馬毅艇。事情起因是，在施蟄存主編的1933年第3卷第2期的《現代》雜誌上，作者「雪炎」告發了穆時英的《街景》開場，係抄襲日本作家池谷信三郎的《橋》的結尾。施蟄存為顧全穆時英的臉面，請穆時英寫了一個「表白」。在表白中，穆時英決不承認抄襲，而是說多年前看過《橋》，對其結尾的街景描寫印象異常深刻，恰好其後自己的創作中也涉及到街景，遂自然地「借鑒」了出來。他只承認自己是寫作「取巧」而非抄襲。馬毅艇作為普通讀者，對此事非常氣憤，遂寫了一封繼續揭露和質疑的文章，致函施蟄存，說明應該促使穆時英承認抄襲，明確態度以正視聽。但施蟄存和編輯杜衡回信說，無意再糾纏此事。穆時英此舉固然不可原諒，但作為一個有希望的作家，《現代》雜誌並不想過份抑制他，希望此事就此結束。因此，對於馬毅艇那打抱不平的信件，《現代》不能發表留用。這種互相包庇的態度使馬毅艇非常氣憤。他是偏遠地區的普通讀者，在文壇上沒有門路，亦無處投訴，遂附上和施蟄存的往復通信，抱着最後的希望投寄給儲安平。[23]

儲安平略有猶豫，仍將馬毅艇的文章原文發表，並加了編後語：「下面馬君這篇稿子是由河南彰德縣寄來的。在私誼上講，時英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在上海時，常在一起玩，並且同住

23　馬毅艇、施蟄存、杜衡：《穆時英的抄襲問題》，《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8月10日。

在一個房間裏過。這次我承編中央公園，也寫信去問過他要過稿子，他說要遲一些寄來，這大概是因為他新遭大喪的緣故。照普通情形來講，一方面，要是馬君知道我和時英的交情，他一定不致於將這篇稿子寄到中央公園來，因為今日中國的文壇，大部分都是互相偏袒包庇的，我既與時英有交情，則我一定也會不想再有所糾纏，而將他的稿子璧奉的。另一方面，為了顧到我和時英的私交，好像我也可不讓此稿發表。在我自己，確也曾考慮過這一點。不過我覺得今日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就是這種不偏不倚的精神，公私不要混在一起。我們相信只有是非，無所謂糾纏，所以仍將馬君此稿，發表於此。」[24] 儲安平此舉，鮮明地反映了他的做人特徵，那就是只問是非對錯而不徇私情。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一經犯錯，出於社會責任感和道義感，也照樣揭露不誤。這是一種與中國傳統的人情文化迥異的處理方式。從好的方面講，這是辦事公正，講原則，但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極有可能給人一種不近人情之感，未必真正能得到當事人的理解，註定是曲高和寡之舉。

對徐轉蓬和何家槐之間的文字爭端，儲安平同樣使用此種處理方式。何、徐二人是中學同學，也都是儲安平的好友。1929年，何家槐考入中國公學，兩年後轉到暨南大學，投入兼課暨南的徐志摩門下，從事新文學寫作。徐轉蓬原來就讀於光華大學國文系，因不喜錢基博等經史子集的國文教學，追隨何家槐轉到暨南大學。由於與徐志摩的提攜，何家槐當時在文壇已經小有名氣，小說基本能順利發表。徐轉蓬雖然一直勤奮創作，但因是新人，沒有門路，投稿多被拒絕。何家槐花銷較大，經濟拮据時，便拿徐轉蓬被拒的文章發表，基本每投必中，作者也署的是何家槐的名字。何家槐未必真心想將徐轉蓬的文章據為己有，徐轉蓬本人雖願意何家槐代轉稿件，也未授權何家槐署他自己的名字，

24　編者：《本期編後》，《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8月10日。

但雜誌編輯或以為徐轉蓬是何家槐的筆名，或認為徐轉蓬是無名作家，署其名無法提高雜誌的知名度，遂署何家槐之名。徐轉蓬出身農家，有很強的鄉土氣息，為人忠厚坦誠，雖受此啞巴虧，但自知投稿無路，基本未予阻攔，沒有強令何家槐更正。[25] 儲安平本來知道此事，但當事人並不介意，旁人也不便繼續深究。但是，儲安平對此多有不滿，認為這種行為助長了文壇不健康的風氣。1933年秋，他在南京和韓侍桁、高植等人聊天時提到此事，批評了何徐兩人的不正常關係。1934年，署名清道夫的內幕人士在《文化列車》上將此事揭露出來。何家槐馬上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關於我的創作》一文為自己辯護，他非但如穆時英一樣拒不認錯，還大讚自己文章水平如何高超。韓侍桁同是何徐兩人的朋友，打抱不平，遂在《申報》上發表了《何家槐的創作問題》，講述自己知道的何徐事件，並對何家槐厲聲批評，希望他能勇於承認錯誤，將「抄襲」的文章物歸原主。[26]

韓侍桁這篇文章攪動一池春水，何徐事件的討論日益白熱化，對何家槐的討伐質疑聲音此起彼伏，連何的老師胡適都被捲入這場爭端中，為何家槐辯護。[27] 當時何家槐已經加入左聯，1949年後甚至有些御用文人上綱上線，認為這是右派作家在所謂國民黨文藝政策的指引下，對進步文學進行的「反革命圍剿」，是一次「有組織的陰謀」。[28] 但是，這只是一個文學創作嚴謹與否的問題，並不涉及意識形態。如儲安平主持的《中央日報》副刊，便從未以意識形態看待此事，而是將其局限在文學層面。儲安平刊發了讀者投稿《何家槐徐轉蓬文章糾紛平議》，將徐何兩

25　溫梓川：《何徐事件的內幕》，《文人的另一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9–212頁。

26　侍桁：《何家槐的創作問題》，《申報》1934年3月7日。

27　《胡適致吳奔星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236–237頁。

28　吳心海：《胡適的失察》，《博覽群書》2009年第7期。

人各打五十大板，認為兩人有一種不為人知的秘密關係，實際在互相包庇。徐轉蓬作為被抄襲者，卻甘心讓何家槐代為署名，不予揭露，實際上也負有一半的責任。[29]

儲安平作為何徐兩人的朋友，因私事纏身，並未撰文，卻有意引導批評的方向，從糾結於兩人誰對誰錯轉向批判不健康的「出版權力學」。就如唐錫如認為，本是同樣的文章，署名何家槐就可以順利發表，署名徐轉蓬便投稿無門，只能說明當下文壇存在着畸形的現象，那就是他們只認作者的名頭，而不問文章的實際水平。選稿標準方面，也存在先選熟悉的作者，打壓文學後進的問題。讀者大眾對此也有責任，他們購買文學雜誌，只看其中是否有成名作者的作品，若無便不予支持。文壇異化為文章買賣市場，編輯和讀者普遍重名不重實，才有何家槐代替徐轉蓬發稿之事。[30]

《中央公園》在批評「出版權力學」之外，還廣泛揭露各種出版黑幕。如講書店的宣傳，出版新書莫不誇大宣傳，拉攏名人作為旗號，用種種虛構的推薦語欺騙讀者購買。[31]如批評書商，只將目光盯在吸引讀者眼球的低俗文學，忽視嚴肅的純文學作品和西方著名文學經典的翻譯出版工作。[32] 至於作者本身，亦缺乏職業倫理，將文字當做買賣行為，為金錢而粗製濫造文學作品。作家道德普遍較差，言行不一，大談修養本人卻毫無修養，詛咒或攻擊某種現象，自己卻照行不誤等等。[33] 儲安平則在《論魔術》一文中評論道：「文學家是諸色人等裏頂能用空心思的一種人，所以他們玩的花頭，比平常人更玩得多，今年是這個論調，明年又是那個論調了。」他諷刺文學家就像變魔術一樣，為了追

29 黃河：《何家槐徐轉蓬文章糾紛平議》，《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3月14日。
30 唐錫如：《何徐稿件糾葛與責任問題》，《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3月16日。
31 柴沅：《談新書業的廣告》，《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8月14日。
32 徐易：《我們需要傻瓜》，《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8月21日。
33 柴沅：《文人有行》，《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7月14日。

求新穎，時刻都在變換文體或形式的魔術吸引讀者，從不關心真正的文學。

目睹過多的亂象叢生，結果導致的是儲安平對文人的徹底否定性評價。這顯示在他組織刊發的對「朱湘自殺問題」的系列討論文章上。朱湘作為著名詩人，極端驕傲，性格孤僻，因生計無着，經濟窘迫，家庭不和睦而走投無路，於1933年末跳河自沉。此事在文壇影響不小，有作者率先就此事給儲安平發來評論文章。儲安平遂採取徵答的形式，希望感興趣的人寫文章回應，討論朱湘自殺的責任問題。短短十天內，陸續有二十二篇稿件發來，儲安平選擇其中的十篇發表，從不同角度議論了朱湘自殺。

這些討論主要集中於朱湘之死應歸因於個人還是社會。支持歸咎個人者認為，朱湘性格過份孤僻，恃才傲物，對一切都採取藐視的態度，其性格也有變態之處，這種性格註定不容於社會，只能以自殺作為最後歸宿。[34] 至於認為應該歸咎於社會的，認為社會不能幫助他生存，社會的殘酷無時無刻不在磨損他的意志，對這種性格不能寬容。他個人無力改變社會環境，遂只能以自殺告終。綜合言之，總的觀點偏向於否定朱湘的個人性格，對社會的譴責不過是點到為止。[35] 儲安平作為編者，在討論文章結尾的「編者按」中說：「編者本人，對此一無意見，故亦無文章可做」。然而，儲安平並非真的一無文章可做。在同版他刊發了《朱湘自殺的責任問題的題外文章：什麼詩人文人！》，文章破天荒地未署姓名，從口吻、用詞和思想上看，可以完全確認出自儲安平之手。

這篇文章對朱湘的自殺並不表示同情，對朱湘所代表的詩人文人持一種嚴厲的否定態度。文章說：「我是不願意發表意見

34　張鳴春：《朱湘之死怪誰？！》，《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1月8日；余之伴：《論朱湘之死》，《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1月13日。

35　程公若：《朱湘之死》，《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1月8日；華丁一：《我的意見》，《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1月10日。

的。再進一步說，我也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我既不瞭解朱湘的個性與氣質，又不明白所以造成朱湘這一副性格的背景。……我近來見到那些所謂詩人，廣大一些說來，應當說文學家，便覺頭痛，一成了所謂作家便自有一副令人討厭的樣子。走起路雖然未必兩樣，但談吐之間，真是令人生畏。彷彿自己是人類的至聖，對於一切都不滿意，對於一切都取攻擊態度，都發出歎息，對於什麼人都看不起。覺得這個現實的社會總是卑鄙的、齷齪的。好像一切都不屑為，一切話都不屑談，他們漸漸成為了一種超乎凡人的人。你想，社會根本是一群人組織的，功過大家都應當負責。那些所謂詩人，所謂作家，一天到晚在房子裏亂談，當了人而信口雌黃，當真要叫他們到大會上演講一下，他們又躲開了，當真要他們實行何事，他們又推諉了。尤有進者，文學家大都為人不負責任。對於什麼事都隨隨便便，疏懶成性，明明你約會他今晚會面，今晚他卻另與友人去聽戲了。說了話不當話，自己做的事，自己不負責任，結果什麼亂子都得朋友來擔當，來收拾。我以為文人也是人，文人也應該注意為人之道，假如自己不能好好作文人，作有打算的生活，作有經緯的事情，辦事不負責，說話不負責，則一旦感受社會的冷酷而自殺，社會實在不能負責任。要知詩人、文人的所謂社會冷酷，不一定是真的「社會冷酷」。[36] 這篇文章表現出儲安平內心裏對朱湘這種孤傲卻無能的文人非常不屑。他認為朱湘等文學家，做人本身便有極大問題。文人必須自我檢討，不應該將自己凌駕於社會之上，一味責怪社會沒有給他們出路。不久之後，儲安平在署名文章《論文學者》中，繼續對當代文人的品行進行徹底的否定。

儲安平在這篇文章中要說明的是，只有文學者本身健全，才能有健全的文學。他再次強調：「我們認為文學者不能在社會上

36 《朱湘自殺的責任問題的題外文章：什麼詩人文人！》，《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1月15日。

另有一種超人似的地位。文學者應如一切通常人一樣，應當對於自己的生活取認真的態度。一切做事說話都要嚴肅，都要負責任。文學者必須先在自己的修身為人上，有過健全的訓練與修養，方始能夠談到和他所產生的作品的健全或不健全。第二，我們以為一個作家，如其僅僅只會在紙上寫寫文章，那是不行的。最低限度，他同時必須有一個能明白事理的頭腦，能辨別是非。思考說話，要有系統，要有條理。換句話說，就是至少還要一點辦事和應付上的才幹。我們常常遇到許多文學者，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但在現實的生活裏以及做人的本份上，許多地方卻差得太遠。」[37] 從此文中可見，儲安平對文學作家的評價已經越來越低。他已經意識到，要改變中國，並不是靠會寫幾筆文章可以解決，更需要的是實際的任事才幹。可以發現，此時儲安平的思想觀念已經開始轉變，有將自己從文人中抽離出來之意味，與文學有一種漸行漸遠的趨勢。用一位研究者的話講，那就是「將文學與事功對立起來，刻意壓抑他在文學方面的發展面向」。[38]

不過，需要對此研究者的觀點進行修正。儲安平的文學態度轉變，固然可以視為他一生思想的轉捩點，但是這種告別文學有一個緩衝過程。此時的儲安平否定的只是烏煙瘴氣的文壇和品行低劣的作家，卻並未否定文學本身。尤其是，他並不否定從五四浪漫主義文學到新月派一脈相承的純文學傳統。他對文學的藝術性仍有較高追求，他甚至希望在烏煙瘴氣的文壇中獨樹一幟，重振純文學的聲氣。兩個表現是，他繼《中央公園》後在開闢了《文學週刊》，1936年又編輯出版了純文學期刊《文學時代》。這可以視為儲安平在轉向之前，最後進行的一次親近文學的努力。

37　儲安平：《論文學者》，《中央日報·文學週刊》1934年7月5日。
38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話語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第175–176頁。

最後的文學努力

1934年5月10日，由儲安平編輯的《中央日報·文學週刊》創刊。這時候的《文學週刊》，屬於《中央日報》改版後的副刊之一種，每週四出版。其他的副刊包括《社會調查週刊》，週一出版，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言心哲編；《戲劇週刊》，週二出版，齊魯大學戲劇學教授馬彥祥編；《農光週刊》，週三出版，金陵大學農光社編，《科學週刊》，週五出版，南京孟廣照編，《教育週刊》，週六出版，江蘇鎮江教育學會出版；《醫學週刊》，週日出版，南京丙寅醫學社編。在此之前，《中央日報》只有每日出版的《中央公園》和《明月》副刊。從改版後的陣容上可見，《中央日報》副刊改版後，逐漸擺脫了過去副刊以雜文、散文、掌故為主的小報風格，開始向知識化、專業化、技術化、學理化的大報副刊的方向發展。這既表明了當時報社銳意革新的一種姿態，實際上也正與儲安平本人意欲的努力相合，即通過編輯嚴肅、純正的文學副刊來進行挽救純文學的最後努力。

當時全國的大報中，最著名的《文學週刊》應該是《大公報·文學週刊》。該刊地處天津，以平津兩地高等學府的文史專業知識分子為依託，主要刊載古文、古史方面的學術論文或爭鳴文章，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和新文藝，不在其刊登之列。但儲安平的《中央日報·文學週刊》卻是一種純粹的新文學週刊。從其刊登的內容來看，更側重於刊登新文學作品及評論，新詩和西方文學翻譯，外國文藝理論介紹。這些文章都篇幅較長，出自對文學有專門研究或從事寫作的資深作者之手，如張沅長、陳夢家、方令孺、孫毓棠、趙家璧、李長之、臧克家、韓侍桁等。與《中央公園》一樣，《文學週刊》一般在版頭刊登一篇較長的文學評論作為主打，詩歌、書評或介紹西方文壇動向的文章安排在該版的下半部分。

《文學週刊》的總體目的，並不是確立中國自己的當代新文學，更多是介紹西方的文學思潮、理論為當代中國文學所借鑒。比如韓侍桁就在專論中認為，中國過去的所謂文學遺產，對今天的文學毫無用處。中國文學家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多多翻譯西歐的名著，使他們成為扶助中國新文學成長可資利用的資源。他甚至激進地認為，「人人都應該有的知識是，巴爾扎克、狄根思、杜斯退夫斯基等，對於我們是比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更急需得多。我們應當有權利把他們也作為自己的遺產」。[39] 儲安平則認為，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在這樣一個短促的過渡的時期裏，所收穫到的，應當是十分微薄的。這十幾年來中國的新文學活動，在詩的方面，只有抒情詩體比較寫得純熟，在小說方面，只有極少數的幾部比較寫得成熟，在戲劇方面，至今還只有田漢洪深熊佛西等幾個人在橫衝直撞。可是我們想到歐洲各國的文學，他們有那麼悠久的歷史，而我們自從脫了舊文學的樊籠，開始接受西方文學的洗禮，只有這麼短短的十幾年的歷史。」[40] 雖然他和韓侍桁所講的側重點並不一樣，但他們同樣承認中國的新文學需要大量向西方取經，本土新文學還有待建設，這一點確定無疑。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學週刊》成為儲安平向中國文壇介紹西方文學作品和理論的園地。諸如《論斯溫朋的詩》，《悲觀主義者福爾格奈及其作品》《彼普斯的日記》《德國浪漫詩人羅發利斯及其青花》《論莫泊桑》之類的文章基本佔據着《文學週刊》的全部版面。但是，問題在於，這些出自趙家璧、李長之、張沅長之手的文章特別專業，在西學東引方面或許有一定的功績，但如何為中國文學所用，或者中國的作家如何以此為

39　侍桁：《關於文學遺產的問題》，《中央日報·文學週刊》1934年6月7日。

40　儲安平：《勃克夫人論現代中國文人及其作品平議》，《中央日報·文學週刊》，1934年10月18日

借鑒來從事文學寫作，《文學週刊》在這方面並無貢獻，大體還處於一個原封不動輸入西方文學作品和理論的階段。另外，這些文章對於普通讀者而言也過於生僻，尤其不能得到報社同人的認可。比如儲安平曾說道：「最使我不安者，就是我的趣味和許多同事不甚調和，因為我是純粹的一個新文學家的身份，而以我編出來的副刊，不甚合當時報館裏大部分人的口胃。讀者不要看輕這一個事實，一個人最苦最痛同時也最感到不安的，就在當他感覺在他周遭的一群中，在思想上及意趣上他完全是孤立的時候。」[41]這段文字可以看到儲安平編輯《文學週刊》遇到的壓力。

實際上，儲安平遭遇的壓力，不只是在《文學週刊》，在《中央公園》時期就早已存在。他不得不發表一篇《編輯罪言》來表達自己的苦衷，並盡可能在報紙上調和新舊，在下方連載他並不感興趣的文言掌故、軼事。[42]如此壓力，由於民國時期的南京文壇本來就是一個保守主義的重鎮，從東南大學時期的學衡派以降，一直存續着一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的文學傳統。[43]就《中央日報》而言，多數編輯都是老一代文人，他們對新文學並不感興趣。尤其是他編輯《文學週刊》時，為維護版面的統一性，並沒有刊登舊文學的折中之舉。因此，《文學週刊》的命運一波三折。7月26日出版第12期後，便告以停刊。停刊原因，表面上是「編者精力有限」，實際和他所受到的阻力不無關係。[44]

1934年10月18日，《文學週刊》勉強重開，但報社只給他半版。儲安平覺得版面太少，不敢保證編得精彩，到12月6日再度

41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83頁。
42　儲安平：《編輯罪言》，《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4月2日。
43　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與到中央大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57–74頁。
44　《本刊啟事》，《中央日報·文學週刊》1934年7月26日。

將其停刊。[45] 不過，儲安平的阻力並不是永久存在。他獲得了南京新文學界，尤其是《中央公園》作者群的支持。[46] 在中央、金陵大學活躍着一批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教師和學生，《文藝月刊》雜誌活躍着一些從事新文學創作的作家，當地還存在着「土星筆會」等較有影響力的新文學團體，他們都對儲安平的《文學週刊》構成支持。尤其是，儲安平的編輯態度認真負責，使《文學週刊》達到了相當高的文藝水平。因此，儲安平的上司雖然隔膜於新文學界，並曾間接表示對新文學的不喜，最終還是對其予以認可，數月後甚至給他寫信，稱讚近期副刊頗佳，催促他將《文學週刊》復刊。1935年8月18日，停辦了8個月的《文學週刊》由此重開，儲安平還拉來了老舍等人的文章以壯門面，[47] 直到儲安平出國之前，才將該版停刊。

然而，《文學週刊》在文學方面的作為還是有限的，即使整版仍不能發表小說等篇幅較長的文章。因此，他希望在《文學週刊》之外，編一本真正屬於自己的純文學刊物。編輯刊物，也是南京文壇諸人的普遍願望。此時已經是1935年，由於市場壓力，以往有影響的純文學刊物如《現代》《水星》《文學季刊》《譯文》都已經停刊，只有國民黨宣傳部門資助的《文藝月刊》等極少數刊物和受大眾追捧的論語派刊物還在活動。[48]儲安平原本就有邀集趣味相投的朋友創辦雜誌的想法，且希望通過定期出版的雜誌來鞭策寫作，遂將創辦自己的雜誌提上日程。

1935年11月，儲安平主編的《文學時代》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此雜誌原名《筆匯》，擬由第一出版社出版，延宕半年，最後轉手給邵洵美的時代公司。時代公司擁有所謂七大雜誌，即《時代》《論語》《時代漫畫》《時代電影》《人言週

45　《本刊啟事》，《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12月6日。
46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記者經驗談》，第183頁。
47　《本刊啟事》，《中央日報·文學週刊》，1935年8月18日。
48　張：《書報評介》，《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11月29日。

刊》《聲色畫報》和《文學時代》，其中《文學時代》創刊最晚。《文學時代》為小開本，黃色封面，封面並無任何裝飾，只寫了刊名、期號和目錄。儲安平並未按照慣例撰寫發刊詞，只在刊物末尾的編輯後記中低調寫了短短的幾段話。他說：「一刊物的內容，就是一個刊物的一篇真切的宣言，我們並沒有這種企圖，想使讀者從這一個刊物裏看到有任何一種集體的流動——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們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們容許每一個在本刊上寫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藝上的立場與見解，除了對文藝的本身忠實這一點之外，我們沒有更大的苛求」。儲安平不敢高調，亦不敢發表任何宏大議論。他說：「我們自己明白，我們的能力實在太薄、太脆弱。我們不願意誇張，誇張的下場常常是難言的內恧。我們只願意就僅有的這一點綿力之下，小心謹慎地來作，我們這第一次大膽的嘗試。」[49] 他知道此時主辦純文學雜誌的艱難，雖然他會以「頂嚴謹的態度和熱烈的心情」去做雜誌，但也無法預料《文學時代》到底能堅持多久。

《文學時代》的作者既有南京文壇那批舊朋友，又有田漢、老舍、張天翼、王統照、余上沅、郁達夫、凌叔華等知名作家的文章，作者陣容強大，選取不論派別，完全以作品的水平為刊用標準。為了約稿，儲安平甚至多次給留學德國的季羨林寫信。

季羨林在日記中記錄道：「寫給安平一封信，把《錶的喜劇》寄給他。來信要稿要得非常懇切，只好寄點去了。」儲安平馬上將《錶的喜劇》刊發，還將季羨林寫給他的信刊登在編輯後記裏，使季羨林非常感動。其實季羨林當時只是一個剛剛擺脫了中學教師身份的留學生，儲安平卻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能，與之惺惺相惜。他將《文學時代》創刊號寄給季羨林，在空頁上寫道：「我們隔得這樣遙遠，而我們的心靈又像這樣的挨近。我讀了你的信札，我的感情很衝動。」季羨林隨即在日記中感慨道：

49　儲安平：《編輯後記》，《文學時代》1935年第1卷第1期。

「我讀了他這短短的幾行，我的感情也很衝動。我同安平還沒見過面，然而在我的心裏已經給他留了一個角落。」他顯然將儲安平當成了文學知己，甚至經常「無理由地想到安平」，幾乎到了想要流淚的程度。[50]

儲安平這時還在寫小說，在《文學時代》上發表了《一隻朱古律匣子的身世》，該文又被他以「聖土」為筆名發表在《文學週刊》上。此文與他同時期發表在《文藝月刊》上的《小約翰求偶記》和《說謊者》一樣，都以西方的人和事為背景，可以視為他一種新式的寫作實驗。不過，到第5期以後，《文學時代》的文章已經越來越少，似乎給人一種稿子缺乏和難以為繼之感。到第6期，終於以停刊而告終。雜誌停刊，固然有儲安平即將出國留學的因素，亦因雜誌本身遭遇的困境。他說：「這年頭，一個純粹的文學刊物真是沒辦法維持的。我們雖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經的苦樂，簡直出乎意料。最後一期的印行，更有許多困難，這困難我們不想訴說了。」[51] 儲安平所說的困難，還是銷路和稿源問題，最根本原因是敵不過那些「烏煙瘴氣」的文學，內容曲高和寡，市場上難以生存。儲安平是一個聰明的人，雖然在告別辭中說，困難給了他更大的決心去努力將來，可是他已深知在文學方面無法再有所作為，再加之對文學、文人的評價已經非常低，他決定完全放棄文學。

1936年，他在趙家璧的良友公司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說謊者》，收錄了從1931年春到1935年的八篇小說。自述中說：「我的理智叫我離開文學，擺脫文學，說得再苛刻一點，叫我咒詛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學。這一個衝突，這一個矛盾，就摧毀了我的希望，是在別方面既無適就，在文學方面也一無建

50　季羨林：《季羨林日記(1935.1.1–1936.12.31)》，香港：中和出版，2013年，第173、209、239頁。

51　編者：《告別辭》，《文學時代》1936年第1卷第6期。

樹。」[52] 他雖未正式宣佈離開文學，內心卻早已有徹底告別文學的打算。《說謊者》出版，實為他對自己告別文學的一個紀念。

中央日報副刊

儲安平辦《文學週刊》和《文學時代》，是堅持純文學的最後努力。但努力的過程，卻同時也是一種與文學漸行漸遠的過程。我們觀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報紙副刊，會發現有截然不同兩種辦報風格。一個是天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另一個是上海的《申報·自由談》。「星期論文」的主要作者是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翁文灝等平津高校的著名學者。他們談論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問題，多以論說文為形式，論辯嚴格按照學術論辯的標準進行，側重學理性。他們對現行政治體制基本持一種肯定的態度，希望在此基礎上進行斟酌損益。他們自信自己的精英身份，與政府高層亦保持着一種良好的關係，希望將「星期論文」打造成一個精英論說的場域，用言論對政治施加影響。《自由談》的作者則是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和海派小知識分子。他們沒有顯赫的留學背景，多半以自由撰稿為生，寫作多是嬉笑怒罵式的諷刺雜文，言說風格也比較即興。他們對政府，基本持一種冷嘲熱諷的態度，語言不可謂不辛辣。[53]

從某種程度上講，雖然《自由談》經常被儲安平的《中央公園》嘲諷，但除了對政府的態度不同之外，兩者在作者群、文章性質、言說方式和關注問題方面有着一種驚人的同質化。而儲安平此時對文壇的爭吵喧鬧，興趣已經越來越小，亦不覺得參與這種爭吵可以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他希望擺脫那種傳統副刊嬉笑

52 儲安平：《說謊者·自序》，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3–4頁。

53 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10頁。

怒罵逼仄的風格，將報紙的言說方向予以轉變。他逐漸脫離《申報·自由談》的風格，轉而模仿「星期論文」，因此就有了《中央日報副刊》。

我們先看《中央日報副刊》的徵稿啟事：「本報自七月十六日起增刊副刊一種，以提倡學術發揚文化為宗旨，出版伊始，尚希海內學者作家不吝賜稿。一經刊載，略備薄酬以報高誼，此啟。」「中央日報副刊徵稿內容：(一)關於文化的教育的社會的短評短論，每文請弗超過一千字。(二)世界名著以及國內外新書之評述，每文能在千字以內更佳，否則請弗超過二千字。(三)歐美各派學術思想評述。(四)世界名人傳記及言行錄。(五)各種學術演講之記。(上列三種每文至長請弗超過三千字)(六)散文小品隨筆或稗話童話等。(小說戲劇暫不收外稿)」[54] 這個啟事最大的變化就是徵文開始帶有學術色彩，不但希望海內名家學者撰寫評論文章，還希望有各種學術演講和名人傳記。《中央公園》時期主打的散文小品和隨筆，被其放在最末的地位，且並不要求內容幽默，這表現的是儲安平對報紙副刊嚴肅化的要求，以及更為明顯的對副刊內容「社會化」的強調。《中央日報》初始為每天出版，運行數月後改為逢一、三、五出版，儘管如此，儲安平的工作量，在所有《中央日報》的編輯中，當屬最大。

《中央日報副刊》的頭條文章為方正嚴整的評論。每逢週日，版頭文章更為正式，也被儲安平命名為「星期論文」，由言心哲、郭有守、胡煥庸等南京各大學的教授或政府系統的專家執筆，篇幅平均為兩三千字。儲安平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編輯，當時的人脈還是南京、上海兩地的文學界和學術界，與平津的學人比較隔膜。南京、上海兩地的大學，有見解的學者又比較有限，談社會問題未必到位。比如言心哲談農村與城市的關係，實為老

54　《中央日報副刊徵稿》，《中央日報》1934年7月4日。



中央日報副刊

第二四五期

瑋德紀念專號

自從瑋德去世的消息，在十三日本刊上發表以後，我們接到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來信，對于這一位年青詩人的去世，一致表示無限的惋惜。我們今天出這個專號，紀念瑋德的早亡，但是雖然出了這一個小小的紀念專號，可是並不能吐出我們對瑋德去世所感有的哀思；我們實在無法說明我們感情哀悼瑋德去世而滲起的一種悲苦，這一個篇幅太小，以致還有許多朋友們的佳文都無從刊出。九篇本來還有一篇文字，我自己也想寫一篇，都就能在將來的月刊上發表了。（安平）

曇華一現

哀悼青年詩人方瑋德

宗白華

《中央日報副刊》版面



中央公園

嘲語堂老友

用知堂原韻

斗牛

南歐如今成了家
登龍舒友或矣狗
興輪與腹由三島
太息大村今小用
兄女成行滿室家
若妻偏愛哈巴狗

不羨西裝不羨裝
拍馬屁似蜜蛇
恩愛最懷衛麻
且終胃熱喝涼茶

（在論語中大罵穿西裝）
（與登龍術作者反了臉）
（在英國讀書在德國衛麻失戀）

打字機成做窗紗
粵友頻邀吃三蛇

（自云現在研究打字機不久即動手做外國窗紗）

朋友呼容這一在苦人發事

儲安平編《中央公園》版面



純文藝月刊

文學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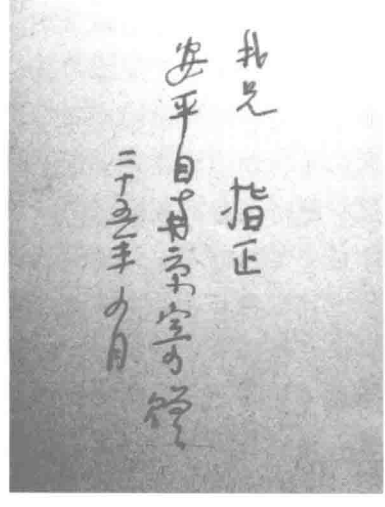
儲安平編

今後中國新文學的方向
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情的創造者
在一個遠遠的世界裏
中秋
政變
詩
論蘇俄新舊文學的精神及其演變
列車
今年的秋
快速生活症
夫婦之間
編輯後記

張沅長
老舍
方令孺譯
張天翼
陳銓
高昌南譯
老舍
林庚
由稚吾
鄧均吾譯
儲安平

創刊號

儲安平編《文學時代》封面



儲安平簽名樣

調重彈，大而不當，毫無意義。[55] 因此，《中央日報副刊》在稿源上便存在着很大問題。因為「星期論文」作者的份量有限，儲安平不得不在「星期論文」之外轉載潘光旦、吳澤霖等人在《華年》，葉公超在《獨立評論》上的文章以增加份量。由於文章缺乏，邀請學術名家撰稿的設想失敗，「星期論文」出刊7期後停止。

但是，頭版專論的文章卻一直存在，只是這些撰稿人多由儲安平《中央公園》時代的朋友擔任。有些作者如高植，本身是作家，未必真正熟悉社會問題，所寫的評論也就只具較低的可讀性。但是，《中央日報副刊》所論述的範圍相當廣泛，涉及國際政治、農村問題、道德精神、自然科學、文學翻譯、學校教育、語言文化、政府行政、慈善事業等，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問題的各個方面。這些討論中，尤其以討論農村問題的內容比較引人注目。因為儲安平過去編輯的副刊，其他問題都有多少涉及，惟獨未討論過農村問題。我們看到，《中央日報副刊》第一期的開篇文章便是言心哲的《論中國農村問題的性質》，第二期有《論我國的地租》，其後有《論鄉村建設之單位》《夏莊調查記》《農村社會化之地理的障礙》《土地單一稅之評價》《中國農村建設一斑》等等。粗略統計，副刊中至多有五分之一的內容和農村有關。

儲安平並不生於農村，對農民的生活實際相當隔膜，為何在此時如此頻繁地組織探討農村話題？首先，當時農村問題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國的不發達，根源就在於農村貧困。為了改變農村，梁漱溟、晏陽初等知識分子在山東、河北的農村進行着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其次，關心農村問題，很可能是《中央日報》主事者的希望。中共正在江西蘇區搞打土豪、分田地，似乎是在為中國農村尋找另一套暴力革命的出路。《中央日報》作為官方黨報，探討農村問題的出路，似也有

55　言心哲：《中國農村問題與中國都市問題》，《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9日。

與中共爭奪話語權之意。第三，儲安平本身是一個對國家民族的富強有着強烈關懷的知識分子，既然時人普遍認為解決農村問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那麼他願意通過言論和探討的方式，為中國農村尋找出路。

這些文章基本肯定，中國的農村問題是當前所有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有作者認為，中國的地租多高於標準地租，佃農收入極其微弱，呼籲政府按照各地情況，制定合理的地租，保障農民權益。[56] 還有作者建議農村設立類似於金融機構的倉儲制度，以便在災年時讓農民得到合理救濟。[57] 還有作者以實際觀感，介紹蘇聯實行集體農場制後給農民帶來的利益和弊端。[58] 或有作者親自去農村實地調查，揭露農民餓死，生活極端貧困的現狀，希望引起各方關注。[59]儲安平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有關注，還轉載了梁漱溟在徐州的演講稿，並刊發了一個西方人對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觀感。但要說明的是，儲安平及他的作者，對農村問題並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們對農村大多是一種本能的憐憫式觀感，對農村問題提出的基本是直覺式的解決方案。他們的意見，也早有人講過，而非真正的原創。尤其要考慮的是，梁漱溟根據他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理解，在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方面，已經有了極深的造詣，而且在農村因地制宜建立起了一套教育事業和合作建設事業。但《中央日報副刊》談論農村問題，表現的只是儲安平等人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卻看不到精妙和獨到分析。因此，大約到1935年以後，尤其是由金陵大學農光社編輯的《農光週刊》創刊後，農村話題在儲安平那裏漸漸減少以至於完全消滅。

但是，在有些方面，儲安平所刊發的反映社會和民生問題的文章，卻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有读者反映某些社會機構的服務

56　萇耕：《論我國的地租》，《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8月2日。
57　高邁：《論倉儲制度》，《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8月24日。
58　金文豪：《蘇聯的集體農場》，《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8月3日。
59　尚希賢：《夏莊調查記》，《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8月16日。

問題，由於《中央日報》的權威，這些文章很快就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並得到妥善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南京的公共汽車問題。有署名「竹」的讀者投書，反映南京的公共汽車人數太擠，衛生條件差，班次不均，速度不一。[60] 儲安平將其刊載在頭版，並在編輯後記中稱：「今天竹先生的一篇《本市的公共汽車》，立言極其中正。本刊是公共的喉舌，關於大家的福利的事情，只要作者態度公允，我們都願刊載。」[61] 四天之後，汽車公司總經理馬上發來一篇數千字的長文，一一回答「竹」提出的問題，並說明其苦衷，承諾一定會積極整頓改善。[62] 讀者見到《中央日報副刊》在類似事件上發揮重大作用，遂將其當成解決問題的園地，紛紛發來諸如反映本市汽車喇叭過大，要求提高南京小學教育的待遇，要求改進中山陵纜車等意見，希望有關部門關注。另一個是津浦路鐵路的問題。由於光華時代的北平之行，儲安平意識到三等車民眾艱辛，遂在副刊上呼籲津浦路三等車設置臥鋪。[63] 儘管此事並未馬上解決，但我們從1935年的報紙上，看到了南京路局對充實津浦路三等車設備，增加三等車數量的改革。[64] 這未必和儲安平的呼籲完全沒有關係。除了這些之外，《中央日報副刊》對就業、墮胎、乞丐救濟、托兒事業、平民生活等問題都有具體的討論，這些顯示了儲安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其中似乎還有一種變通意識：既然在政治言論上不能突破，那就下大氣力從改善民生上着手。

有學者在研究儲安平這段經歷時，認為儲安平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刊發了一些違心的文章，討論「領袖問題」和「士與救

60　竹：《本市的公共汽車》，《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7月5日。
61　《編輯後記》，《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7月5日。
62　吳琢之：《謹答「竹」先生的指教本京公共汽車》，《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7月9日。
63　儲安平：《津浦三等車應設臥鋪》，《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11月18日。
64　《津浦路充實三等車》，《申報》1935年9月4日。

國」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65] 前者如儲安平刊發了《能力分配與服從領袖》《論領袖制度》《談領袖》《擁護領袖與尊師重道》等幾篇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都強調服從領袖的重要性，認為大眾需要領袖來指導，甚至有神化領袖之嫌，將領袖制度與自由主義、議會制度相對照，呼籲領袖制度。由此，這位學者得出結論，認為這是國民黨內擁蔣派的大肆鼓吹，這些文章亦是作者逾越黨報編輯的期待視野，主動順應黨報的意識形態之舉。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未必真正與儲安平的思想衝突。

儲安平並不相信人與人之間的能力與智慧絕對平等，就如他在1932年寫成的《給小讀者的信》系列文章中說：「我想做人不外分兩種，一種是做吃人家飯的人，一種是做給飯人家吃的人。有種人，他天生就有那麼一副給飯人家吃的氣魄」，「領袖是一種天才……雖然有一部分人在說，二十世紀是集團主義勃興的時代，而在事實上，英雄主義乃是一切實際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任何組織裏，我們都需要有中心領袖。但領袖既是一種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66] 從這些言論可見，儲安平並不反感領袖制度，甚至擁護領袖制度。只是，他的前提是，領袖因時因事因地而產生，沒有絕對的永遠的領袖。而且領袖應該有胸懷，在朝是一個負責任的領袖，在野還可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

《中央日報副刊》中的這幾篇文章其實也是比較理性地談領袖，認為「領袖與群眾純然居於平等地位，他不過是言足以法，行足以則，守正不阿，公正廉恥，奮鬥犧牲，而被人擁戴罷了。領袖以坦白、公允、廉儉、純真、無我對待群下，群下以盡忠、服從、犧牲對待領袖，這樣並非上下的交相利，乃是上下的交相犧牲奮鬥的努力，以成遂民族的公利。」[67] 這說明他們論述領

65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報紙副刊：中央日報副刊研究》，第168–171頁。
66　儲安平：《論做人》，《人言週刊》1935年第2卷第3期。
67　楊昌溪：《擁護領袖與尊師重道》，《中央日報副刊》1936年3月31日。

袖和大眾的關係，也是從一個互惠的角度，而非完全盲從。尤其是，在國難的背景下，中國要實現社會的凝聚力，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指引。儲安平本來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有一個真正有能力的領袖將中國引上獨立富強之路，儲安平是樂於見到的。儲安平在《給小讀者的信》中，最反對的是為個人利益而忘記國家的存在，私慾膨脹，缺乏公德心，最強調的是為國盡忠的大公精神、集體感和團體意識。研究者說儲安平違心刊發這些文字，實際是先入為主地將儲安平定性為「自由主義者」，沒有看到儲安平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至於其中的《新士氣論》《士大夫的反省與努力》《脫士氣》等文字，批評了知識分子的門第觀念、自我優越感、目空一切和誇大狂，質疑知識分子的啟蒙作用。這位研究者認為，這些文字呼籲知識分子進行自我革新，與民眾打成一片，和儲安平的「知識階級台柱觀」相矛盾，也屬於投稿者越過編輯的期待視野，主動順應黨報意識形態的要求。[68] 這也是非常含糊的論述。實際上，這幾篇文章的作者，如張鳴春、高邁都是儲安平的朋友，並不存在着所謂越過編者期待的問題。他們否定的並不是整個知識分子階層，而是當下那些無能、平庸、不負責任、道德品行低劣的知識階層。這種知識分子，正是儲安平在《中央公園》時代連篇累牘反對和諷刺的。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批評，也不是徹底的自我否定，而是帶着一種反省的成份，雖然怒其不爭，卻也存在着一絲自我期許。在國難的背景之下，中國要救亡圖存，這種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勝任。為了挽救國家，知識分子自我革新、反省以實現浴火重生至關重要。這種「矛盾論」，同樣是以一種後設的眼光看待儲安平。

68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報紙副刊：中央日報副刊研究》，第171頁。

早期評論

儲安平在《中央日報副刊》時代，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徹底放棄散文而開始寫評論。前文說過，儲安平在光華時代，文學創作有一個從散文到小說的轉變。然而，由於對文壇和文人的評價越來越低，他文學家的色彩逐漸淡化，評論家的色彩浮出水面。《中央日報副刊》時期的儲安平，大約寫作了將近三十篇評論。這些文章既有報頭的長篇論述，也有四五百字短小的時評文章，評論那些不需要長篇大論的時事，作為活躍版面內容的調劑。

無論大小文章，儲安平此時的評論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很少有激憤與諷刺的意氣之語，而是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談論。他的評論文章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首先不厭其詳地提出原作者的觀點，繼而對這些觀點進行條分縷析的研究，最後給出自己的意見，或同意或反對，或有可資補充之處。儲安平也會針對某一問題，組織十餘篇不同觀點的文章進行討論。就如他對畢業論文一事的討論：「關於畢業論文這一問題，我們覺得可以分成如左的幾點：(一)畢業論文的存在問題。(二)現在一般大學生所交的畢業論文，是否是空虛的問題。(三)你贊成不贊成以翻譯名著來代替畢業論文。(四)假如你贊成，而同時又認為目下的哪種情形有改進的必要的話，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69] 儲安平會事前說明好所需要的文章和討論的規則，圈定討論範圍，才開始對外徵稿，然後將正反兩方面不同的意見全部登出來，由公眾評判。如果討論超出預定範圍，或有過度之趨勢，儲安平則會敏銳地予以叫停。儲安平的這種辯論理性，在當時中國的報紙上是不多見的。可以說，在《中央日報副刊》時代，再看不到《中央公園》上的諷刺和情緒之論，確實使副刊成為一個客觀、公正的園地，做到「公正」、「嚴肅」、「負責」，讓不同的聲音在此暢所欲

69　安平：《編者後記》，《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3月25日。

言，通過辯論達到共識。[70] 可以說，這一時期儲安平真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編輯風格，編輯思想已經真正趨於成熟。

編輯思想成熟之外，是編輯視野的開闊。儲安平的許多評論，都以北平的《獨立評論》和《大公報》「星期論文」的評論文字為基礎進行，這說明他將目光從上海文壇投向北平知識界，希望以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為對話對象。

胡適曾在「星期論文」上寫有《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一文，儲安平對胡適的觀點大體同意，但也有質疑，認為問題並非胡適所講的「教育的太少，太不夠」，而是因為中國教育在設施和政策上沒有走入正軌。胡適認為，實行義務教育有必要，但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實現的可能。儲安平則認為，如何將不可能之事變為可能，才是當下急需的事情。胡適看問題只是指出原因和現象，貌似抓到癢處，但並未真正抓到癢處。[71] 胡適談論失業問題，認為失業的主要原因是個人無能，不可輕易歸罪於社會沒有提供機會。儲安平則評論：「這個論調太偏。我覺得個人能力是一回事，社會需要又是一回事」。個人能力只是謀求職業的一個條件，課程設置的不合理，社會需要人才的多寡，都有原因。儲安平認為，類似事情十分複雜，不能用三言兩語空口解決。[72] 儲安平對胡適的質疑未必高明，但他顯然對這兩個問題的考慮比胡適更為理性。

傅斯年在「星期論文」上發表的激烈抨擊中醫的文章，儲安平亦有所回應。傅斯年認為，中國人之所以至今仍迷信中醫，主要是因為愛國心、頭腦不清楚以及教育不好的緣故。儲安平則認為這三個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中醫在中國民間的根基本來便比西醫深廣，正因為中國人頭腦清楚和愛惜生命，才求助於中醫。至

70　安平：《讀者·作者·編者》，《中央日報副刊》1935年2月20日。
71　儲安平：《教育破產的救濟辦法還是教育》，《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12日。
72　安平：《胡適談失業問題》《個人能力與社會需要》，《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11月11、21日。

於傅斯年認為中醫只是憑經驗診斷，這也不是壞事。對現實生活來說，經驗未必不重要，問題在於，不能鼓吹直接取消中醫，也不能未經研究便認為中醫都是胡說，應從學理上研究中醫，使中醫的學理變得科學化。[73]

儲安平此一時期的評論，包含着非常明顯的民族國家意識。比如他對新生活運動的推崇：「近年來我們的民族精神，日趨頹唐萎靡，社會風化，日見墮落幸薄。我們需要一個廣大的糾正運動，實不容緩。新生活運動的內容，雖然極平常，極簡淺，然而努力推行，實可挽救民族的危機。近來蔣委員長對於任何事情都主張實幹快幹，要心到口到目到手到腳到，這種精神，正是針對時症而發。新生活運動提倡的動機，本在鑒乎國難如此深刻，非有一個徹底的改革運動，不足以救危亡，所以能否切實實行，尤為新運本身成敗和民族得救與否的關鍵。我們讀到上面這個通信，感到南昌方面，新生活運動，已能夠嚴厲施行。尤望全國各地，都能漸收實效起來。」[74] 這說明儲安平由於強調民族精神和道德，對國民黨推行的新生活運動持完全肯定和期待的態度。他還會批評山西、廣東兩省地方實力派的經濟封鎖：「我們知道一個民族國家之存在，不僅有政治統一的要求，同時還有經濟統一的要求，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系，應以整個的一國為單位，內部不容再有分化割據的現象。中國現在正在這危亡的局面下，政府正在竭誠努力於全國政治軍事方面的統一，而不料在這經濟上，卻開始了一種割據的局面，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實在有消弭的必要。」[75] 由此可見，儲安平在發表言論時，無不首先以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一切可能危害這種整體利益的，都在他的反對之列。一切可能凝聚國家力量，促進民族精神提升的行

73　儲安平：《傅斯年的反中醫論》，《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10日。
74　儲安平：《南昌新運已見實效》，《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14日。
75　儲安平：《省自為政的統制經濟》，《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9月11日。

為，即使帶有規訓、限制的意味，他也都不反對。儲安平懷有一種深重的「救亡意識」。

因為這種救亡意識，使得儲安平不能忍受那些可能危害民族國家的言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他對光華師長呂思勉的態度。1923年，呂思勉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白話本國史》，他認為宋金議和在所難免，秦檜因主持議和而背負惡名，實在是冤枉至極。宋朝的兵力極弱，既未經訓練又非常散漫，岳飛不過是在平定內亂上有所小勝，抵擋金國則非潰即敗，實不堪用。呂思勉的言論原本是正常的學術觀點，在國難的背景下被別用心者擴大發酵，甚至被目之為漢奸言論。1935年，上海市國民黨黨部命令商務印書館刪改貶岳褒秦的部分，並有報人龔德柏將呂思勉告上法庭，說其違反出版法，甚至犯有外患罪。儲安平主持的《中央日報副刊》在呂思勉被起訴之前便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岳飛與秦檜，對於呂誠之先生白話本國史的一點抗議》，作者為高儲安平三級的光華校友(1925級)，曾與他一道親炙過呂思勉的謝元範。[76] 此事應該是儲安平向瞭解呂思勉學說的謝元範徵稿，以批評呂思勉的史學觀點，增加文章的權威性。

儲安平的這種行為，當在國難的背景下理解。九一八之後，東北淪亡，傀儡政權滿洲國建立，日軍不斷在華北製造事端，扶植漢奸成立偽組織，整個國家上空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中日之間可能一戰的危機意識，一直成為知識分子的心頭隱患。中國如何能應對這場戰爭並取得勝利？只有提升民族精神，做到政治經濟軍事的統一，才能應付國難。也要考慮到，1930年代的中國，正是國民政府統治的黃金十年，其執政合法性由於國力日上而趨於穩固。儲安平作為《中央日報》的編輯，無法完全與國民黨官方的立場隔離。在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天平上，儲安平毫

76　謝元範：《岳飛與秦檜，對於呂誠之先生白話本國史的一點抗議》，《中央日報副刊》1934年12月21日。

無疑問地傾向於後者。此種傾向到了抗戰時期甚至更為明顯。儲安平所秉承的，是一種「吾愛吾師，吾更愛國家」的態度。

家庭關係

《中央日報》時期的儲安平，最值得一談的是，他真正收穫了與端木露西的愛情。儲安平剛在《中央日報》工作之時，端木露西在北平燕京大學做旁聽生，並兼任小學教師，只能趁閒暇時到南京去探視。1933年秋，端木露西來南京看望儲安平，離開後順道去她一個朋友的鄉村家中小住數日。儲安平給她寫了一封信，從信中可以讀出當時兩人的微妙關係。儲安平說：「我說人世間沒有幸福這一個東西。幸福永遠是你跳在旁邊的時候所看到的一種字眼。你羨慕人家，可是到你做了那曾經為你所羨慕的那個人時，你又覺得索然無味，不過如此。假如我們能夠明白了這種道理，我們在生活裏一定可以減少無數苦痛，一定可以免去無數的煩躁……減少慾望就是增加幸福。慾望是沒有底的，永遠不會滿足的。假如讓自己的慾望無邊際的擴張蔓延，那也徒然增加自己的苦悶。我說我們如其都能夠明白了這一着，我們將來的生活該一定是很愉快的。」[77]

一個可靠的猜測便是，他與端木露西的感情此時出現了一些危機。根據《再論幻滅》中的描述，似乎端木露西認為，儲安平對她已經不再有以前的那種熱愛之情，她對這場戀愛有一種失落和幻滅之感。儲安平說：

> 記得我以前有一個朋友，和一個女子共同呼吸在一個熱戀的氣息中。他們以頂熱情的字句兩地通信着。但有一次，那個女子在信上忽而說，說他對她不再如以前那樣的懇摯了，從他的信

77　安平：《家書一段》，《生力》1933年第11期。

> 紙裏不再發現有如以前那樣美麗的字眼了。其實，我那個朋友對她比以前只有更好，更忠誠，更關切，熱情。但是那個女子何以會反而對他發生出這樣的印象呢？……這最大的關鍵，乃是由乎她的心情氣息未能和現實生活和諧所致。所謂以前，是指初戀時期，而現在則是熱戀時期了，在戀愛的過程裏，前後已是兩個階段，也就是說，已是兩種生活的姿態。但是在熱戀時期還要希望得到如初戀時期中的一般的微妙的神經刺激，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別是熱戀的後期，彷彿無論多情熱的信件，都不容易引起對方怎樣了不得的興奮，這決不是對方真的冷淡了你，真的疏遠了你，不過你自己的感受力，自己的反應力，已日漸麻痹，不若以前那樣的敏銳了吧。初戀時期的心情氣息異於熱戀時期，同樣，結婚後的心情氣息又異於結婚之前。……結婚後，他們必須保持一個 constant 的永久生活，保持一種有規律的常態生活了，而猶想追求那種微妙的神經刺激的快感，所以他便感到苦悶了，疑心他的對方對她冷淡了……自然不可避免的要感到一種幻滅。

可以想像，儲安平不會無故談論這些話題，無非是自己也遇到了類似事件。他假託所謂「朋友」之名，實際講的卻是他和端木露西。他對女方這種愛情的幻滅感的建議是：「我們一方面在結婚前不要對於結婚後的生活作過度的夢想，一方面在既結了婚以後，明白婚姻的生活本來就不過如此不再另有其他夢想，則必能安於此種良久的常態生活，而不致有幻滅之苦。其實，這種節慾少苦知足常樂的哲學，不僅戀愛裏如此，即於人生一切，亦莫不如此。」[78]

由此可見，儲安平未必能夠真正理解端木露西的情緒。他認為，她對愛情有着一種較高的要求，要求戀愛穩定或結婚後仍要

78　儲安平：《再論幻滅》，《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7月27日。



儲安平與端木露西結婚照


婦女周刊

第五十六期

托兒所

參加南京第一托兒所成立週年紀念後作

端本露西編《婦女周刊》版面



儲安平和他的孩子

保持初戀時的新鮮，要求安平對她時刻關注，這實際是不合常理的。在他看來，現實的戀愛應該是，雙方都應以一種平常的心態接受愛情會逐漸趨於平淡的事實。不僅是愛情，人生亦當如此。但是，儲安平對愛情的理解似乎有不足之處。愛情必定會趨於平淡倒是實際，但卻不能以「必然」為理由和藉口，認為已經再沒有必要去追求愛情的浪漫與刺激，忽視對方的感受。女子對浪漫有一種天然的喜好，本能嚮往某些生活情趣。尤其像端木露西這樣出身富家、生活洋化、興趣多樣的女性，一味令其安於現狀，告別美好愛情的理想，在現實面前低頭，顯然不能滿足她的要求。尤其是，儲安平不檢討此時自己過於理性的愛情觀，反要求露西安於現狀，必將產生分歧。

實際上，端木露西作為女性，已經較之同齡人更具獨立自主的意識。就如她對自己交友觀的描述：「我在大學裏面，沒有最好的朋友，也不和誰過不去，我的固執的個性，使我不會輕易的去對人愛，對人放不下手。我歡喜朋友，但只需要平淡的友誼，一朵雲花飄來了，又讓他自己飛過去，它雖停留片刻，可不會擾亂大家的心。」[79] 由此可見，她性格獨立清高，對人對事從不盲目依賴，有一種進退自如、去留隨意的態度，能夠遊刃有餘地處理人際關係。因此，她對儲安平的這種不滿，並非源於小女人患得患失的不滿情緒，更可能因為，較之一般人更具女性主義思想的她，不能認同儲安平過於理性的愛情和婚姻觀念，不能接受儲安平對婚姻中妻子地位的安排以及對女性的態度。

這種不滿情緒反映在她同時期發表的一篇名為《女人宣言》的文章上。在其中，她用直爽的語氣講出了做女人的難處：「我也恨透了女人——我恨做女人！做女人的難真不是女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能意想的。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儘管別人壓迫、欺侮和當她不如一匹牛馬，她也不敢公開抱怨什麼。她的一生可以

79　露西：《我的大學生活》，《中央日報·中央日報》1936年7月23日。

永遠呼吸不到一些快樂的甘露。誰對他憐惜呢？一些男子覺得女子是應該遭受這一切的」。[80] 端木露西譴責男人加之於女人身上的責任太多，需要女人卻以女人為生活負擔的虛偽。儲安平在露西的文章後面加了按語：「一個男子並不需要一個妻子有四隻手。只要一個妻子有兩隻手，能將所謂芝麻大的家務整理得清清楚楚，一個做丈夫的已是非常感激了。假如做妻子的連一隻手也沒有，則男子這份厭惡女子的心，也許真會永遠不會短少。」[81] 從這按語中再次看到儲安平對愛情和婚姻的務實態度，他甚至將女性的功能僅僅定位為丈夫的幫手，將其活動範圍局限在家庭之內。他對端木露西那種追求女人主體性的呼聲表示不敢苟同。

儘管兩人此時對愛情或婚姻的理解頗有分歧，但已經快交往了四個年頭，他已經工作穩定，兩人的婚事應該提上日程。關於兩人結婚的詳情已不可考，只知道出身豪富之家的端木露西，衝破了家庭的層層阻力才最終與儲安平完婚。他們結婚的地點是北平，目前有一張結婚照存世。[82] 從結婚照上可見，儲安平短髮整齊，西裝革履，身材修長，英姿颯爽。露西身着當時流行的披頭式婚紗，頭髮經過熨燙，手捧鮮花一束，雖然不能說特別漂亮，但也算光彩照人。兩人所舉行的是新式婚禮。但是，端木露西對婚姻本身未必沒有抵觸情緒。她在1934年6月，撰寫了一篇《婚前婚後》，以虛擬的第一人稱「我」，表明了自己的女性主義觀點。她說：「這些孩子多討厭，女人真不該結婚，但憑生育子女這件事，已使我覺得結婚實在無幸福可言的」；「許多人的變遷已使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打擊，才知道在大人的社會裏有許多事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和瞭解的！環境壓迫着你，要你改變走路的方向時，你能有多大的力量去抵抗呢？」由此，露西得出了「社會始

80　露：《女人宣言》，《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9月15日。
81　儲安平：《編者按》，《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3年9月15日。
82　《儲安平的交代·與羅隆基的來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65頁。

終是被男子操縱着」的結論，字裏行間無不表現出對女子必須以結婚為歸宿的無奈之情。[83] 雖然無奈，但世人皆是如此，她不能例外，也對改變現狀無力。尤其是，這並非她一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新女性普遍面臨的問題。即使對結婚、生育、相夫教子表示恐懼，她只能俯首屈服。她更不能阻止的是，婚後兩個兒子望英、望德的相繼出生。她需要擔負育兒的重任。

實際上，儲安平雖然對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持一種保守的看法，但是也不同意女性將時間和精力完全浪費在撫養孩子身上。他曾經質疑道：「為什麼做母親的，整日整夜都要撫育小孩，將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埋葬在孩子的啼哭裏面？孩子生得太多，生得太密，使做母親的健康上受到損傷，使年輕父母在婚後一點也不能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因此，他和露西都非常希望得到節育的知識。但是，當時避孕技術在落後的中國屬於秘傳，當露西去南京鼓樓醫院請教時，醫生卻告訴她必須有四個孩子之後才能傳授。[84] 端木露西沒有辦法，只能做起全職育兒的家庭主婦。不過，在儲安平的督促下，她會在《中央公園》上發表一些抒情的散文和遊記，偶爾在《文藝月刊》上也能見到她的小說或散文，她的文筆日漸有了極好的進步，甚至已經可以為《中央日報副刊》撰寫諸如《陳衡哲的兒童教育改良論》之類的評論。1935年4月，《中央日報》有籌設《婦女周刊》之議。端木露西是儲安平的妻子，且受過高等教育，對婦女問題頗有研究，文筆亦佳，遂被社長程滄波選為《婦女周刊》的編輯。儘管最初這只是一個兼職，而非報社的正式在編人員，但露西明顯對這份工作抱有極大興趣。[85]

露西編輯的《婦女周刊》，逢週三出版，每期報頭有「婦女

83　路茜：《婚前婚後》，《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4年6月21日。
84　平：《關於節制生育的一夕談》，《中央日報·婦女周刊》1936年10月7日。
85　安平：《離別南京》，《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4日。

問題專論」，其他版塊有「婦女衛生顧問」，談婦女的生理衛生問題；「世界女作家」，介紹世界著名的女作家；「各大學女生生活」，講述各大高校女生的生活面貌。除此之外，還有關於家務、育兒問題的各種文章。這是一個直接反映婦女生活，為廣大婦女發聲的園地。吊詭的是，端木露西雖然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對儲安平理性的婚姻觀以及對女性的保留性評價不能認同，但卻很好地將私人話語和公共話語分開，落實到具體的言論上相當謹慎、理性。她在這塊公共園地裏所要表達的，並不只是簡單的「爭取女子權利」的言論。

端木露西在《發刊獻辭》中說：

>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婦女一向是男子的附庸。她不能獨立。她沒有自由。……我們打破了數千年來的束縛，我們要求解放，要求與男子的地位平等。可是諾拉走後怎樣？我們獲得了解放與平等以後，我們又當怎樣？我們依舊是疑問。所以，今日的婦女運動，決不再是五四時代的婦女運動。今日的婦女運動，是諾拉走後怎樣的新婦女運動。我們不再彷徨，我們不再吶喊，我們要足踏實地的往前走，走上我們新婦女運動的康莊大道，完成我們五四以來未完成的使命。婦女周刊今天誕生了，我們的使命也就在實現我們這個理想。我們的態度是嚴肅的、誠懇的，我們的宗旨在養成健全的女國民，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一切關於婦女的問題，我們都願意提出來作公開的討論。我們希望這個婦女周刊能夠成為全國婦女界的一個喉舌，它不是少數人的婦女周刊，它是屬於全國婦女的，它的栽培和營養，也都是全國婦女的責任。[86]

由此可見，端木露西對女性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目前需要

86　編者：《發刊獻辭》，《中央日報·婦女周刊》1935年4月24日。

解決的不只是女性獨立的問題，而是獨立之後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後來她回顧這段經歷時，將辦刊宗旨概括為兩點，那就是：「一、鼓吹一般婦女要從自身的覺悟中謀取心靈上的、智慧上的解放。我們既不欲單單做女人，我們還需知怎樣做一般『人』，和怎樣享受去做一般『人』。二、鼓勵一般家庭婦女盡力作一個好母親，好主婦。」她敏銳的意識到，五四以來中國婦女解放的形式大於實際。女性擺脫了枷鎖進入社會，但在學校卻出現了交際花式的「皇后」，在社會上出現了供人觀賞的「花瓶」，女性並未獲得真正的獨立，女性本身不能亦不願擺脫對男性的依附。另外，當下的中國社會，還無法容納所有的女性就業，勢必有大量女性成為專職的家庭主婦。但是很多「新女性」成為家庭主婦之後，不懂治家和育兒之道，只知道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缺乏做人的態度和知識，沒有一點理想主義，以致當初的教育完全白費。[87]

因此，她辦《婦女周刊》，目的就在於呼籲中國女性成為真正獨立的個人，這和女性是否就業無關，而以是否具有獨立思想、社會意識、家庭意識和責任意識為判斷標準。用她自己的話說便是：「我們並不主張婦女都守在家庭裏面。我們反對舊時賢妻良母的制度和觀念。我們願意努力打倒一切封建勢力的工作。我們主張女子應該前進。不過我們和人家不同的，就是我們主張女子前進，着重於思想方面，而不在於形式方面。就以本刊而論，我們並不標新立奇，只喊口號。我們堅信，一個女子在社會上有了職業，不一定就是一個前進的女子。反過來說，一個女子沒有職業，並不一定就是一個不前進的女子。一個女子思想的前進與否，與她的職業之有無無關。不論在社會裏也罷，在家庭裏也罷，總之，她應該對國家對社會成為一個有用的人。」[88] 後來這些思想，被時人歸納為「新賢妻良母主義」。

87　端木露西：《蔚藍中的一點黯淡》，《大公報》(重慶)1940年7月6日。

88　端木露西：《新歲獻辭》，《中央日報·婦女周刊》1936年1月1日。

留學夢

儲安平和端木露西新婚燕爾，只是在一些思想和理念上面存在分歧，在生活中相處比較融洽。甚至在儲安平看來，兩個人內外互補，婚姻關係相當和諧。正如他自己的描述：

> 我租的房子十分理想，除了起居間、吃飯間、洗澡間、書房、下房等，我和露西還可以每人有自己的一間臥室。就可惜我不忍多化錢，所以沒有一點合適的傢俱。我頂愛那一間小書房，在窗口直對紫金山。我領略全部園子的結構。在夜晚，我撚亮了那隻壁燈，我愛在那一半有些傾斜的天花板下默坐一回。我們這園子在南京是少有的。我這樣說，乃是指能夠租到有這樣大園子的房子，在南京沒有第二家。這園子一共有十畝開闊，有整潔的水泥走道，有平坦的碧綠的草地，有密茂的名種花木。露西一有空，就帶了她的小英英小德德在草地上散步。我們吃得不頂浪費，但也不頂壞。我們從不將我們的金錢荒唐在無謂的消耗上，我們偶爾去看幾次電影。露西的趣味和我相近，她愛好文藝。她雖然還沒有深沉的造詣，但是有許多地方她都能瞭解，夫同妻是兩個人，世界上兩個人永遠都是兩個人。兩個人永遠不會變成一個人。假如你一定希望兩個人變成一個人，那你準得失望，準得幻滅，準得灰心苦痛。夫妻用不着有完全相同的學識、見解和嗜好。夫妻兩人只要彼此的趣味不太相反，不太遠就夠了。我們都接近文藝，都有相仿的人生憧憬，都相當瞭解人間的艱困，所以我們的感情上彼此均甚融洽。這兩年來，她從一個華富安逸的環境裏走到另一個樸素清苦的環境裏，她居然能夠適應這一個新環境。這兩年來，她的文筆又居然有良好的進步，進步到幾可自立。這些都使我安慰。[89]

89　安平：《我要向莽原裏飛》，《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2日。

這段描寫讓人羨慕，卻也並非完全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便是，他在生活方面過於節約，明顯不夠浪漫。比如他提到，看電影也是偶爾幾次，似乎認為類似活動屬於「無謂的消耗」。他過於精打細算，為了省錢，不肯購買傢俱。據戴晴講，「給太太的菜金，便是每個角子都要計較的」，非常吝嗇。[90] 其次便是他對露西的有限評價：「文筆幾可自立，還沒有深沉的造詣」。自立自強的露西未必真正喜歡這樣的言語。尤其是，他的編輯工作非常繁重，自己又一心撲在工作上，幾乎將報館當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這必然會使他將很少的精力用於生活情趣。

端木露西出生於蘇州富貴之家，本來生活方式洋化。比如，她在光華讀書期間，回蘇州時經常帶領弟妹在蘇州最摩登的餐飲小吃店「自由農場」消費。該店價格奇昂，十倍於普通小店，是蘇州縉紳名媛經常設宴之地。[91]《中央日報》時代，她曾寫作過《海上雜憶》系列散文，從中可見，她喜歡摩登上海的光影聲色，對上海的跑狗場、回力球場、跳舞場、美容院、城隍廟、麗娃栗妲，甚至賭場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92] 儲安平生長於宜興小縣，自幼失怙，生活也只能是衣食無憂，常常因過於強烈的事功心態而壓抑了本來就不高的生活質量和品味。正如其子儲望華所言：「幼年儲安平生活的宜興，在當時是相當的『鄉下人的』，這種骨子裏的『土氣』，和十里洋場『海派』相去甚遠，也和四面玲瓏處世方式格格不入。既便他留洋回來，談吐服飾都不洋氣。」[93] 據儲安平自述，他在上海生活七年，只進過舞場一次，根本不會跳舞。[94] 由此可見，兩人即使能在文學、藝術方面

90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36頁。

91　黃惲：《八十年前蘇州的自由農場》，http://blog.sina.com.cn/u/5e8246090100gtmm。

92　路茜：《憶跑狗》《美容院》《回力球》《城隍廟》，《中央日報》1935年4月9、12、14、16日。

93　儲望華先生信，墨爾本，2012年6月6日。

94　儲安平：《康悌輪上韻事多，月夜一曲相思歌》，《中央日報》1936年7月27日。

唱和，但生活方面的興趣未必真正一致。儲安平過份注重兩人文藝方面的共同之處，卻對生活上的相異有所忽略。若長期生活在一起，不能對另一半的愛好、品味、生活習慣予以回應，天長日久，必將產生情感裂痕。這種性格和愛好上的分歧，埋下了將來兩人分道揚鑣的種子。

另一個影響儲安平與端木露西關係的關鍵原因，是儲安平的留學夢。儲安平在一切事情上都捨不得花錢，拼命工作，都是在為他的留學海外做鋪墊。儲安平在光華時期即有留學之志。他寫於1929年的《給海外的朋友們》《中秋》兩篇文章，都流露出了對那些留學海外的朋友們的豔羨。[95] 無疑，留學對知識青年的吸引力至為明顯。就個人層面，留學可以充實人生體驗，增加人生閱歷；就社會層面，留學生的頭銜和資格，無疑也代表着文化權力，要進入學院當教授，一般應有留學資歷。只是，留學對普通子弟而言甚為困難。最主要的便是經濟問題，留學需要一大筆款項。當時固然有中美中英庚款之類的公費出國名額，但每年成功考取者寥寥無幾。就如1936年，僅有37人成功公費留英，公費留學各國的總數僅105人。[96] 儲安平固然聰明，但在學術與考試能力方面始終都不是頂尖人物。他沒有能力考取，只能靠個人攢錢。但他並不氣餒，一直對留學抱有一種樂觀態度：「這一個企念我已經有了五六個年頭。可是一個窮書生哪兒籌得到這一筆大款子，但我不失望。我對於任何事都不失望。我有一份不可搖撼的信心，事由人為。我對於任何事都覺得總有辦法。有多少次計劃失敗，我不悲觀，我們應當樂觀、沉靜，在樂觀沉靜裏有我們的世界。」[97]

據戴晴言，此時儲安平在《中央日報》的月薪為120元，遠

95 儲安平：《給海外朋友們的信》，《光華週刊》1929年第6卷第3期。

96 《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學生統計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教育1，第395頁。

97 安平：《我要向莽原裏飛》，《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2日。

遠超過同時期的一般工薪階層。[98] 除此之外，儲安平勤於寫稿，還有各種稿費收入。他的另一項收入來源是在國立戲劇學校任課。該院成立於1935年秋，直屬於國民黨中宣部和教育部，是中國培養戲劇人才的最高學府。國立劇校的校長是余上沅，儲安平作為他在光華時期的學生，被聘為國文教員，還擔任圖書委員會和出版委員會委員。[99] 他在校中教授國文，課程要求為：「除講演文藝理論，使學生對於一般文藝得到正確認識外，並選文講授，指定文學書籍及各種刊物由學生閱讀，又由教員指導學生實地習作，以期學生有閱讀及欣賞文學之能力，並有發表思想之能力。」此課授課時間為每週四小時，按照該校每小時二元到三元的標準，每月可收入四十餘元。[100] 這對儲安平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成為其留學經費的一部分。

儲安平工作穩定，收入豐厚，家庭幸福，但他有雄心壯志，更希望能夠真正出人頭地。他自己的話勝過一切旁觀者的描述：「在這樣一個生活裏，一個家庭裏，我還需要什麼？是的，朋友，我並沒有說不滿足，但是我還是要變換我的方向，還是要暫時離開我的家庭。我要這樣，說得小氣些，那因為我是一個男子，說得莊重些，那因為我是一個『人』。我有我更大的企望，我有更無邊際的貪求，我有我更野漠荒蠻的生力！我從小就在江湖上飄忽，在那不規則的旋律裏息落，二十多年的零丁的遭遇，使我孕育成一份奔放的性格。我愛在蒼茫裏索摸，我愛在無可掙扎的境遇裏掙扎，我愛向渺無邊湃的天空衝去。我要飛，我要盡情的放脫我的靈性，我要毫不顧忌的在莽原裏來去自如。我需要溫柔，但我不願永遠跌落在溫柔裏面！我接受愛情，但我不願永遠做愛情的俘虜。我滿足這生活，但我不願受生活的支配安排。

98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36頁。
99　《國立戲劇學校一覽》，國立戲劇學校，1936年，第62頁-65頁。
100　《國立戲劇學校一覽》，第36、51頁。

我不做生活的奴隸，我要做生活的主人。」[101] 這實在是儲安平對自己的事功心態最恰當的陳述。他在光華時代便默認：「中國的未來需要他這種人」，[102] 亦認為「一個男子有比戀愛更重要的責任」。[103]《中央日報》編輯崗位的空間實在有限，不足以使他真正施展才華，也無從可能使他在未來承擔起拯救中國的重任。他不怕吃苦，意志堅定，為了未來的大有作為，他可以暫時離開家庭，甚至迫不及待。他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留學歸國後做什麼，但是他要去。尤其是，端木露西被社長程滄波從編外人員提拔為正式的報社編輯，開始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免除了儲安平的後顧之憂，他更要出去。[104]

眾所周知，儲安平情有獨鍾的國家是英國。在留英之前，他對英國的認識是：「英國是世界議會政治的母親，泰晤士河畔的巴力門和惠斯敏斯大寺等的建築，幽古偉大是世界聞名的，英國沒有成文憲法，然而英國的政治卻仍有平和規律的演進，從沒有任何暴力的革命。這一點全世界研究政治或社會的人，都不致忽略，英國在政治如此，就全因為英國人頂愛好和平，守秩序。」[105] 但是，進入哪所學校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從戴晴到陳永忠、孫宏雲、任劍濤，所有流行的說法是，儲安平考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拉斯基，並深受拉斯基影響。[106] 這個說法並不正確。所有當年的新聞報導，都記載儲安平去的是位於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據其侄儲傳能言，是因為「原擬入劍橋大

101 安平：《我要向莽原裏飛》，《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2日。
102 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84頁。
103 儲安平：《一段軍行散記》，《儲安平文集》上冊，第195頁。
104 安平：《離別南京》，《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4日。
105 儲安平：《一隻照相機的厄運》，《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1月23–26日。
106 孫宏雲：《拉斯基與中國：關於拉斯基和他的中國學生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謝泳先生作為研究儲安平最資深的學者，在通信時即提醒筆者「儲安平可能不是倫敦政治學院正式註冊的學生」。謝泳先生信，廈門，2012年5月27日。

學，因額滿」，才「改入愛丁堡大學」。[107] 更值得玩味的是儲安平選擇了史學專業。[108] 儲安平政治學出身，對英國的政治文化也很感興趣，卻為什麼選擇以史學為專業，且聯繫的學校是具有古老歷史傳統的劍橋和愛丁堡大學？目前對儲安平的選擇，比較合理的解釋便是，他大概認為，英國現行的政治文化，都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其獨特、深厚、偉大的歷史根源。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都可以通過現實的政治觀察獲得，而政治制度背後的歷史因素，則需要到諸如劍橋、愛丁堡這樣的老牌名校進行專門的學習。而且，目前對儲安平在大學時期與歷史學科的關係可見這樣珍貴的記載：「他對歷史有很濃厚的興趣，他曾把歷史上大事的年份，記在牆壁上，每天早晨起來，背誦一篇，如此數年，他對於歷史上的大事年份，便歷久不忘了。」[109] 可見，儲安平非常喜歡歷史。

儲安平委託光華的師長蘇公雋，幫其複印大學時期的成績單，連同光華的畢業證書，一併交給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託其轉交給「倫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的西爾考克(Silcock)先生代為向愛丁堡大學申請接洽。[110] 戴晴稱，儲安平此時「開始結交權貴，請他們吃飯，陪他們打牌」。[111] 所謂權貴，即包括杭立武等掌握中英庚款資源的官員；所謂結交，也並非個人攀附，而是為其留學做準備。從現有資料看，儲安平還參加了促進中國與波蘭友好的「中波文化協會」，他與杭立武同任協會委員之職。[112] 由於這種交往，他雖然不是公費生，卻獲得了江蘇省

107　儲傳能：《儲安平百年祭》，《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5頁。

108　《本報記者儲安平赴歐》，《中央日報》1936年6月19日。

109　春芳：《儲安平失嬌妻，辦觀察補損失》，《文飯》1946年第31期。

110　安平：《離別南京》，《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4日。

111　戴晴：《梁漱溟儲安平王實味》，第136頁。

112　《中波文化協會臨時會，歡迎名譽會長，歡送波蘭會員》，《申報》1934年12月13日。

教育廳贈送的2000元官費。加之《中央日報》預支稿費500元，其嫂俞曼華資助1000元，終於湊夠盤纏得以成行。因為暫時資金無處，即使西爾考克並未將接洽結果回饋給他，他也不知是否被愛丁堡確切錄取，亦無所憂懼。他不慕虛名，甚至不打算一到英國就進學校，或者根本未希望獲得學位。吳稚暉在給儲安平的一封數千字的長信中，也不建議儲安平馬上入學。他說：「初去之一年，最好不必急急入校。住在一不見中國人之家中，或蹩腳私校(不是去學，去聽話)，先把言語弄得純熟，於是一帆風順，將來出門有路，頭頭是道，終身受用。」[113] 他所尋求的，是真正的學問。

正在此時，德國柏林即將舉行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將首次大規模派出代表團參會。《中央日報》需要記者赴德採訪，儲安平正好將要奔赴歐洲，可以先採訪奧運後再赴英倫，便成為最合適的人選。他跟隨代表團赴歐，既能觀察奧運，又可以公費乘船，護照等事都不必自己辦理，實為天賜良機。只是，出發的時間要由原本預計的8月提前到6月份。儲安平沒有猶豫，決定立即出發。在離京前他託杭立武寫了一封介紹信，打算到倫敦後再去找西爾考克接洽留學事宜。

113 安平：《吳稚暉先生的一封信》，《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3日。

第五章　觀察奧運

今日的德國再也不是忍氣吞聲接受凡爾賽和約時的德國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國不能不瞠目相視，而讓德國仍一繼而恢復了他世界頭等國家的地位了。

——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1936

首批奧運記者

1936年6月19日，儲安平收拾好一切行當，離開南京前往上海。數日之後，他將在上海與中國世運代表團會合，共同乘坐意大利輪船「康悌浮地號」前往歐洲大陸。離京之前，南京友人為他舉行了盛大的餞行活動，由徐悲鴻和夫人蔣碧薇做東，邀請張道藩、宗白華、郭有守、郭子雄等七十多位南京名流前來送別，場面十分熱烈。[1] 臨行前幾天，他尚在繈褓中的次子儲望德高燒達四十度，數日不退。儲安平自幼孤苦，缺乏家庭關愛，性格孤僻冷酷，「對於家庭人倫，一絲沒有感情」，對生老病死之事亦極為麻木。但此時身為人父，面對幼子的發病，卻憂心如焚。他常常極有耐心地守在望德床邊，哄他入睡，為他輕唱催眠的歌曲。[2] 他自陳，已經和小望德產生了一種不可分離的骨肉親情。但是，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能阻擋他出國的行程。

儲安平去滬，由端木露西陪同。在上海，他受到了舊日光華同學的招待。他們逐日宴請儲安平，為他餞行。他和露西住在上

1　西：《前日傍晚傅厚崗徐宅的園會》，《中央日報》1936年6月18日。
2　安平：《離別南京》，《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4日。

海北四川路的德鄰公寓。臨動身的前一天早上，他略有一絲感傷，五點半就醒了。儲安平形容：「我睜着眼睛看露西，我想到我要經過一段遙長的時間再能看見她。她睡得太好，太甜。她沒有聽到我低微的呼喚，她沒有聽到我出自心府的一片祈禱。她那時忘了她的安平在幾個小時後就要離開她，要經過一段遙長的時期再能飛回家。」他低聲呼喚說：「愛，你醒吧，你明天再多睡一忽兒吧。」[3] 他心裏忽然有了一絲傷感惆悵和戀戀不捨，隱約地感到了一種離別之苦。

6月26日上午10點半，他在露西的陪伴下雇車前往招商北站。光華同學朱有瓛、周光熙，朋友端木愷、周毓傑，露西的五妹及女伴江小姐、王小姐等都趕來送行。需要着重介紹的是端木愷。端木愷(1903–1987)，字鑄秋，安徽當涂人，少年時遷居上海，復旦大學文學學士，紐約大學法學博士。歸國後歷任國民革命軍軍官團政治教官、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行政院政務處參事、安徽民政廳長、國家動員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糧食部政務次長、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4] 端木愷和程滄波交厚，大概通過程滄波的關係與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夫婦相識。端木愷非常佩服儲安平的人品才華，與之成為摯友。端木本來是稀少的複姓，露西便認了本家，成為「端木家的嬌客」，端木愷的子女認其為姊。[5] 這種雙重關係使端木愷日後對儲安平多有襄助，非但資助他創辦《觀察》，還擔任觀察社理事長及雜誌的法律顧問。《觀察》即將被查封之際，正是在司法院秘書長任上的端木愷暗中為儲安平通報消息，使其提前逃往北平，這是後話。

碼頭上「歡送中華代表團參加世運」的條幅在空中飄揚，人

3　安平：《我要向莽原裏飛》，《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2日。

4　余惠芬：《端木愷(鑄秋)先生年譜簡編》，謝政諭編：《端木愷校長紀念集——紀念先生一百晉一歲冥誕》，台北：東大圖書，2004年，第365–445頁。

5　端木俊民、端木偉民：《緬懷我們的父親：端木愷(鑄秋)先生的一生》，《端木愷校長紀念集——紀念先生一百晉一歲冥誕》，第714頁。

頭攢動，車水馬龍，格外擁擠。他們將儲安平送到經濟二等艙的十號房間中，為他安放好行李。中午十一點半，船上響起鑼聲催促送客者下船。端木露西等遂站在碼頭上，與甲板上的安平互相對視。所謂送君千里終有一別，他「招呼露西她們先走，不必等待開船，如其要等着紙條兒斷等着人影，淡淡的灰色裏消逝，也徒然自苦而已。」[6]

離別的傷感是短暫的。畢竟儲安平對此次留學，已經寄託了太多的希望，做了許多的努力，能夠成功出國，對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喜悅。露西走後，他站在甲板上，剛才的黯淡情緒一掃而光，更多的是心情亢奮。他自述：「當我站到這高高的甲板上，我只覺得涼暢，只覺得豪放，我覺得我的靈府裏已滲入了一些新的力量。我獲得了一次再生的機緣，我已添了兩扇翅膀，兩條野腿，我新長了無數條臂胳，我的耳鼓特別敏捷，我的眼睛變得出奇的明爽。我要聽一聽這宇宙的聲籟，我要一眼看到這地球的邊緣。我要讓我的心神與自然交合，闖進了自然再去做自然的主宰。」許多人在抹淚，他卻裝得若無其事。他要變得剛強甚至殘忍，他要「讓自己在東南西北奔，在一個圈圈，一個圈圈裏磨練」。

此次中國世運代表團赴歐，為參加8月份在柏林舉行的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中國人第三次參加奧運會。第一次是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中國只有觀察員，沒有運動員；第二次是1932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只派出了劉長春一人參加，未取得任何名次；由於30年代中德邦交良好，希特勒盛情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賽。中國方面也十分重視，組建了一支龐大的代表隊，包括男女選手七十人、職員二十多人、國術表演員九人、體育考察員三十餘人，總數達一百四十餘人，可謂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代表團即將出國時，蔣介石親自宴請隊員並授予旗幟以資鼓勵。國民政府撥款十七萬元予以資助，並派出了考試院院

6　安平：《啟行》，《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5日。

長戴季陶作為政府代表，以表示鄭重。[7] 中國方面共派出隨團記者四人，分別是中央社馮有真、《中央日報》儲安平、國際攝影社羅谷孫、《時事新報》毛以信。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出國採訪奧運的記者，負有為各自的媒體發回奧運新聞的重任。儲安平和馮有真的文章，都將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因此，兩人做了分工。馮有真側重於描寫正面、全景式的報導性文字，儲安平專門寫軟性的記述性文字，其中帶有很多個人雜感，以免在內容上互相重複。

輪船離開吳淞口，兩日後到達香港。香港的南華體育會為奧運健兒召開歡送會，儲安平亦陪同前去。他本想感受香港的電車，遊覽一下街市，但只有三個小時的時間，未能如願，僅在市區匆匆一瞥就回到船中。他對香港的夜景極為讚賞，用詩化的句子形容道：「香港的夜景可實在迷人，我們在一片碧黑裏，看到無數閃亮着的星。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座人工的燈牌坊。山上的路，一條一條，看得十分清楚。下面蕩漾着碧藍的海水，這是詩，是畫，是幻想裏的宇宙，是夢中的夢。」[8]

7月2日，船到了新加坡，可以停留七個小時，儲安平才有了更多的時間遊覽。新加坡華僑和各團體夾道歡迎中國代表團，並用公共汽車載他們遊行全埠。儲安平非常喜歡這裏的風景，那種島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充滿熱帶風光的建築都使他倍感新鮮，甚至產生了在此久居的嚮往。讓他驚訝的是，在歡迎的人群中，有新加坡新聞界的人士打聽儲安平之名。問後才知道是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的記者，名叫吳逸生，曾就讀於滬江大學，在上海時，是儲安平主編的《文學時代》的讀者。吳逸生對儲安平極為尊重敬佩，一路殷勤陪護，逢人便介紹儲安平，稱其為文

7　《我駐德大使館歡迎世運代表團，程大使講代表團使命之重大，應效法德國人精神團結一致》，《中央日報》1936年8月12日。

8　安平：《香港》，《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18日。

學家，使儲安平覺得很不好意思。[9] 儲安平作為記者，負有新聞報導的任務，在行程中他並不輕鬆。在新加坡華僑團體的宴請會上，別人大快朵頤，他卻要在席上當場寫稿，記錄下身邊發生的一切新聞，以便趁離島之前用航空郵件發出，讓《中央日報》的讀者可以第一時間讀到。

過了新加坡之後，康悌浮地號駛入有風浪的地帶，全船乘客都開始眩暈嘔吐。儲安平亦很快被暈船擊倒，甚至到了連續十天都不能下床的地步，更不要說動筆寫報導。他形容：「我曾經幾次嘗試勉力支持走上甲板，但是在甲板睡椅上躺不到十分鐘，總覺得沒有睡在床上合適，還是悶着一口氣狼狽的跑到艙裏。我不敢下床，一下床就覺得腦子裏直漲，胸口有一股東西像要向上發作。可是只要我安安穩穩的伏在床上，我就有一份在慘澹中的平和好生活。我不吐，肚子不難受，好像什麼都沒有事。我疲倦了就睡，睡夠了就醒着到再疲倦。」[10]

9日，船到孟買之後，他的暈船才有所減輕，便馬上拼命支撐身體，握筆寫稿。他如此辛苦地寫稿，當然是責任在身，卻也知道只有多寫稿子才能拿到更多的稿費。他在船上也是連一分錢都要節省，船上換貨幣要算，中途下船遊覽時雇車也要算，吃飯時也要算。17日，船過蘇伊士運河，將停靠在開羅，船上允許除運動員外的乘客前往金字塔遊覽。儲安平未必對古老的金字塔不感興趣，但想到來往需要花銷五磅錢，為節省起見，遂決定不去。[11]

去國懷鄉，儲安平偶爾還是會產生思鄉之情。不過，船上並不寂寞。甲板上和吸煙室裏，整天都擠滿了人。世運團為調劑選手生活，設立了討論、訓練、遊藝、管理等四個委員會，經常組織各種演講、聚餐和表演活動，豐富多彩。體育運動員們本來就

9　安平：《四十萬華僑熱烈歡迎，代表團環遊新加坡》，《中央日報》1936年7月20日。

10　安平：《暈船的味兒》，《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9月25日

11　儲安平：《只要化五鎊錢，到開羅看金字塔去》，《中央日報》1936年8月2日。

活潑好動，甚至在船上搭建了小游泳池，用來休閒娛樂。儲安平與選手們都相處融洽。其中著名的美人魚楊秀瓊、田徑運動員符保盧，都與儲安平來往交談。只是，船上的伙食最開始尚可，到後來就越來越差，甚至差到無法下嚥，很多人不得不付錢到自己做飯的三等艙去搞伙食。7月20日，康悌浮地號抵達意大利威尼斯，為期25天的海行生活就此結束。

歌頌納粹奧運

在威尼斯時，中華民國駐意大利使館、駐意武官、留歐中國學生總會均派人到碼頭歡迎。等中國代表團到達慕尼黑，德國宣傳部和慕尼黑市政府亦派員迎接。一番熱烈歡迎後，儲安平跟隨世運代表團於1936年7月23日抵達柏林。儲安平形容車站熱烈的歡迎氣氛：「歡呼震天，國旗飄揚，這種熱烈的情緒和親愛的空氣，真是令人感動得要掉下淚來。」他認為，這種盛況不僅是在柏林，在全德國甚至全歐洲都是空前的：

> 全德報紙，對我表示好感，尤為空前未有。二十三日當天之 *Bz am Mittag* 午報，為柏林銷路最廣之報紙，撰文盛稱中國人民民族精神之強，謂中國人民不僅有組織，且能守良好之秩序，此事可於今晨中國選手隊抵 Anhalter 車站之情景中見之。中國此次遣派大批選手人員參加世運，德國政府及其人民，感覺無上光榮，自各國選手隊抵柏林以來，以中國選手隊抵柏林時之情況，最為熱烈。他國僑胞之歡迎其本國選手，未若中國僑胞歡迎其本國選手之如此之熱烈也。德國人民在車站目睹者，莫不感動下淚，一致舉手表示欽佩與歡迎，德國人民至以中國民族如此團結為佩為慰。當日之 *Nachtansgable* 晚報，每日均出兩次，二十三日第一次及第二

次中，均有中國選手隊抵柏林之記載及照片，所記俱詳細靡遺，而其描寫車站景況，尤為生動真實。該報謂，中國僑胞歡迎其中國選手，三呼中華萬歲時，其聲調一致，一若出自一個機器，數百面之青天白日旗飛揚時，幾使吾德人在德國車站中不復見到一件德國的東西，整個的車站俱為中國人民此種熱烈愛國空氣所籠罩矣。[12]

目睹此情此景，儲安平熱淚盈眶，激動不已，甚至隱約地感到了一種中國即將成為大國的幻象。

奧運選手在柏林入住的是奧運新村。儲安平作為記者，並無如此待遇，只能在外面租房。儲安平在出國前，就已經託在德國的朋友幫忙租房。事實證明，他的做法相當正確，因為待到大會開幕前夕，各國人民都湧入柏林來觀看奧運，已經不可能再租到房子了。到柏林後，儲安平沒有休息，馬上奔走於奧運新村和各個歡迎會上。他跑前跑後拍攝照片，採訪名流賢達，記錄新聞。柏林沒有黃包車，租汽車又花費太貴，很多時候只能靠步行往返。別人休息後，他還要寫通訊稿，經常從深夜一直寫到天亮，趕柏林到遠東的最近的一班飛機發出，以免延誤。[13]

奧運開幕的前一天，他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捕捉德國民眾對奧運的態度。他看到德國滿街都是卍字旗，商鋪中都懸掛着德國小國旗和奧運五環會旗。因為火炬和元首將要在下午經過街市，柏林幾條主幹道從早上開始就站滿了人。讓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老態龍鍾的半盲夫人，將小凳放在人群的後面，等待看希特勒經過。更多的人是遠道而來，只為一睹希特勒的尊容。儲安平對這些遠來的德國人讚歎道：「這些人，有的也許難得來柏

12　儲安平：《我代表團抵柏林時，輿論界備極讚揚》，《中央日報》1936年8月11日。

13　儲安平：《記者苦矣，此來吃苦並未享福》，《中央日報》1936年8月11日。

林，有的也許從來沒有到過柏林。他們都懷着最大的熱情，來到他們的京城。他們是來看世界運動會的，然而他們內心裏最大的衝動，還是要來拜謁他們元首所在的京都。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是何等關切，他們對於他們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們一旦從鄉間來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奮！」[14]

他先入為主地讚歎柏林奧運：

> 全世界人士期望着八月一日這一天的到來，期望着這一個舉世無二的大會。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的舉行，不僅僅是為的一種體育興趣，不僅僅是為的自己國家有選手參加，實在還有一種更偉大的動機，為的是對於一種光明公正的精神的崇拜。在這一個會裏，在這一個世界運動會裏，我們沒有國家的鴻溝，沒有種族的歧視。參加的國家世界五大洲都有，參加種族黃白黑都有，在這個會裏，他們都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都站在平等的地位。這一個大會最大的精神是「和平」與「友誼」，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誼裏包括道德。每個選手，每個球隊，他們都希望有良好的表現。然而他們是在「合理」之下競爭着的。他們是光明磊落的，他們是有運動道德的。在跑道上，在比賽時，他們一點不肯讓人，他們將盡他們的能力將他們所有的力量表現出來，但是一跑完，一比賽完，大家彼此握着手，勝的不覺驕傲，敗的不覺恥辱。他們前來，為的不是爭奪一個金銀質的錦標，他們前來，為的是要獲得一種榮譽，他們在全世界人士面前，顯示出他們的運動精神，他們要在他們的精神裏、道德裏，獲取全世界人士的嘉讚。[15]

14 儲安平：《半盲的太太，等着看元首》，《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

15 儲安平：《世運大會開幕紀詳，舉世矚目的八月一日》，《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

然而，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是百年奧運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屆。希特勒原本極端反對奧運，因為《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奧運會的目的是通過組織沒有任何歧視和符合奧林匹克精神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納粹持極端種族主義立場，仇視猶太人和黑人，認為他們沒有資格與日爾曼人同台競技。在他們看來，「奧運會是猶太人與和平主義者搞的花樣，是猶太人和共濟會信徒的一項發明，是產生於猶太教的一種遊戲，在民族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德國是不可能舉辦的。」[16] 後來，德國體育部長奧斯滕意識到，可以利用奧運來為政治服務。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敗，受《凡爾賽和約》嚴苛制裁，喪權辱國割地賠款裁軍，儼然被降為世界二等國之列。德國通過舉辦奧運，既可以擺脫外交孤立，改善國際形象，重回世界強國之林，又可以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增強國家凝聚力，提高民眾對納粹政權的認同度和支持，為日後進一步實行種族主義與對外擴張創造思想和輿論上的條件。而且，修建奧運場館需要大量建築工人和服務人員，可以間接增加數百萬人的就業崗位，振興德國蕭條的經濟。[17] 希特勒的態度遂從消極轉向積極，親自擔任大會總裁，籌辦此次奧運。[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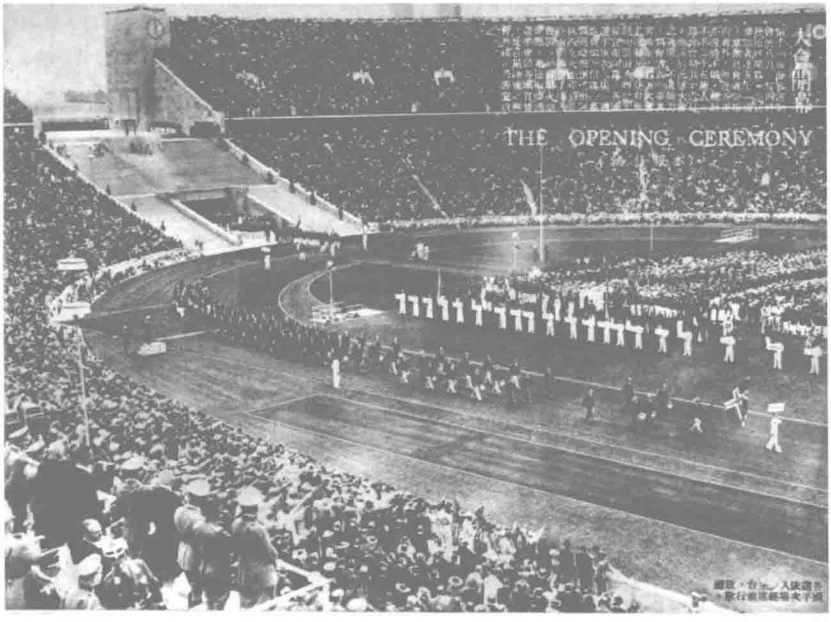
籌備奧運會之際，納粹黨進行了一系列擴軍和破壞世界和平的活動。1934年7月，納粹黨刺殺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致死，試圖奪取奧國政權未遂。10月，陸軍兵力增加兩倍，從《凡爾賽和約》規定的10萬增加到30萬，海軍亦暗中增加戰艦噸位。1935年3月，德國實行普遍兵役制，軍隊增加到50萬。1936年3月，出兵佔領萊因非軍事區；7月，派兵援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亂。[19]奧運

16　趙文亮:《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與1936年奧運會》，《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17　孟鐘捷：《德國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59頁。

18　《希特勒任世運會總裁》，《時事旬報》1934年第17期。

19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279–



1936年柏林奧運開幕式



奧運會場上的希特勒

會即將開幕之際，希特勒寫下一篇屬於最高機密的備忘錄，論述了德國重整軍備的正當性。有學者稱：「這個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與奧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及國際社會的善良意志相矛盾。」[20]

在希特勒看來，猶太人已經被剝奪德國公民權，不可以參加奧運會。黑人在納粹的官方體育手冊中被注明為體質低下的人，也無資格參加奧運會。國際主流社會對此種歧視表示一致反對，並發動了一系列強硬的抗議活動。海外猶太人群體亦呼籲取消德國的奧運主辦權。[21] 迫於國際壓力，希特勒最初允許猶太人和黑人參賽，但不准參加德國隊，以保證所謂日爾曼民族體育的純潔性。由於英美等國進一步施壓，希特勒最終被迫收斂反猶言行，允許個別猶太人參加德國隊的訓練比賽。[22] 比賽時，猶太人田徑選手格勒泰爾·貝格曼成績優異，卻在賽前被突然剝奪參賽資格，由男扮女裝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朵拉·拉特廷頂替上場，以欺騙國際主流社會輿論。[23] 奧運開幕的第二天，德國女子標槍、鉛球選手各獲得一塊金牌，希特勒親自向獲獎選手表示祝賀。當晚，兩位美國黑人跳高選手分獲金銀牌時，希特勒立即在頒獎前離開現場，以避免向「劣等種族」的黑人選手道賀。[24] 這些所作所為都和真正的奧運精神背道而馳，許多人認為這是奧運史上一次致命的錯誤，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

兩相對比，說儲安平的判斷屬於「致命的外行」並不未過。不過，儲安平對這些內幕，未必一無所知，但他基本是站在納粹德國的立場上看問題。他最看重的是，德國民眾崇拜領袖，熱愛

283頁。

20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03頁。

21　孫傳釗：《被遺忘的倫理責任》，《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第6期。

22　趙文亮：《猶太人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4期。

23　Ross Tucker, "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 Verification in Spor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09, Vol 21, No. 4.

24　Richard Overy, *The Third Reich A Chronicle*, London: Quercus Books, 2010, pp. 154–155.

國家，處處體現出一種所謂的「日爾曼精神」。[25] 就如其對開幕式上希特勒入場的記錄：「我們忽然聽到歡聲四起，萬燈閃爍，原來希特勒一行已經入場，當時軍樂聲、鼓掌聲、歡呼聲混成一片……希特勒從大門到司令台。我們只見希特勒舉手答禮，可是也同時只聽見四周的歡呼聲依舊。德國的人民，喊着那樣懇切、勇敢、崇仰的聲音來歡迎他們的元首。我們只看見幾十萬條粗壯的臂胳，像鐵一樣直的平伸着，沒有一點顫動，沒有一點下斜，他們德意志國民的精神那時就完全在這一條臂胳上，直到希特勒初坐了下來，這幾十萬條粗壯的臂胳才放下了。」[26]

在他看來，此種所謂「日爾曼精神」，是使德國從弱轉強的關鍵。他認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受《凡爾賽和約》制裁，德國民眾在艱難困苦中掙扎，「命運完全掌握在死神手裏」。然而，由於希特勒和納粹黨強大的動員能力，極大調動了每一位民眾的積極性，民族凝聚力一時達到頂點，國力亦隨之突飛猛進。德國由此衝破了《凡爾賽和約》束縛，並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裏，成為與英美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儲安平讚歎德國這種飛速的進步：「我們看，我們看今日的德國又是如何一個局面！今日的德國還是一九一八年時候的德國嗎？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僅僅二十年！二十年，在歷史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然而二十年間人事上的變遷是多麼驚人。今日的德國再也不是忍氣吞聲接受《凡爾賽和約》時的德國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國不能不瞠目相視，而讓德國仍一繼而恢復了他世界頭等國家的地位了。」[27]

所以，儲安平歌頌納粹德國，實際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德國在短短二十年內由弱轉強，儲安平自然聯想到中國的命

25　儲安平：《柏林的擁擠和日爾曼精神》，《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
26　儲安平：《希特勒到會，萬眾歡呼若狂》，《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
27　儲安平：《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中央日報》1936年8月19日。

運。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屢遭列強欺辱。中國雖然是一戰的戰勝國，卻同樣受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不公待遇，未能收回在山東的合法權益。九一八後，國家又受到東鄰小國日本的威脅和凌辱，甚至有一種亡國滅種之憂。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中德兩國同病相憐。中國欲擺脫此種命運，是不是應該效仿德國，需要出現一個希特勒式強有力的領袖？中國人是不是應該振作起來，團結起來，像德國人一樣熱愛領袖、熱愛國家，以喚醒民族意識，調動國民力量，推動國力前進，應付日益危機的列強侵略，從物質和精神上實現徹底更新，使這個沉睡的千年古國成為東方之雄？由此，當他看到德國的強盛與「解放」，很自然發出了「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的感歎，以及「我們的振臂一呼在什麼時候呢」的疑問。

儲安平認識的偏差，在當時具有典型性。當時國人普遍對德國存在好感。一戰後，戰敗的德國魏瑪政府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與北洋政府簽訂《中德協約》，宣佈放棄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等一切特權，尊重中國的完全主權。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新約，從此中德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篇章。孫中山也一直對德國抱有好感，認為中德兩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可以互相協助謀求共同利益。儘管其聯德方針未見實效，但其政策為後來的國民政府繼承。抗戰前的十年中，蔣介石聘請了大量德國人擔任各級政府的軍事顧問，指導中國的國防建設。德國財團、工業企業等均在華投資設廠，開啟中德工貿之合作。納粹黨上台後，出於積極擴軍備戰的需要，亟需中國出土的鎢、鉛、銻等製造武器的重金屬，以及花生、棉花、麻、豬鬃等農產品。希特勒着眼於利用價值，從表面上繼續保持魏瑪時代與中國的某種友誼關係。在1930年代所謂「中德關係的蜜月時代」，雙方高層更加往來密切，希特勒和蔣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贈物，以表達「欽慕」之情。[28]

28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九州出版



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

（本報特派記者第　信）

我國世運代表團
從上海到香港途中

帶着無限離愁別了親愛的祖國

兩天海上生活健兒們愉快活潑

（路透社）本報特派第　儲安平，赴菲律賓，現在特許我國代表團出發前往德國京城柏林參加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開會期中，海陸聯運生動的記錄。今晨在本版刊出此篇第一信，係國慶時發，經郵局航運，遲至今日始到。預先見面，可謂遲者，設若與讀者三方面的不幸。

記者前言

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定于八月一日在柏林開幕，中國代表團，于六月二十六日乘意輪熱那亞號啟程赴德，預計七月二日早晨抵香港，換乘日輪長崎丸，續駛赴滬，再轉北上，中國代表團，故二十六日上午，德駐滬總領事館公宴門前，東道主，備極殷勤。我們一行五人，預想此北赴時，又將見到來送行的朋友，那是自然也不免有些惆悵。不過聞悉的人，就是離開了比較柔弱的人，故這行大家

當時的中國朝野，亦普遍存在着某種敬仰德國的心態，認為德國人具有執着、有條理、忠誠和思想深奧、求真務實等特點，日爾曼民族是一個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29] 蔣介石更是「希特勒的遠東崇拜者」，為凝聚老大腐朽的國民黨，仿照納粹黨成立了「力行社」，並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結合起來，發起了旨在提升國家精神的「新生活運動」。一時間官方報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義，呼籲蔣介石成為中國的希特勒，成為國民導師和紀律的訓練者、國民精神的宣傳員，以帶領中國走向強盛。[30] 知識界亦認為，日爾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着的民族精神，實為醫治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等社會痼疾的良方。由此，蔣廷黻、錢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然轉向支持「新式獨裁」，擁護「集權政府」。儲安平作為知識界的一員，受此時代流行思想影響，並不意外，背後寄託着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擺脫貧窮落後，迅速實現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迫切心態。

儲安平的看法，有其歷史局限性，當作同情之理解。但是其中包含的激進民族主義觀念還是值得反思。如儲安平這樣深具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身處國家危亡的大時代，期盼國家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深切程度，遠非我們當代人可以想像。只要可以使中國浴火重生，即使政治上的自由暫時受到壓抑，亦非不可容忍。即使個別弱小種族受到排斥，似乎也無關民族解放的宏旨。從儲安平的奧運採訪錄上，絲毫看不到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影子，此時他思考的落腳點只是國家民族的命運。

社，2012年，第7、46、143、192–204頁。

29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頁。

30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第18–32頁。

離德去英

中國奧運代表團在此次世運會上全軍覆沒，僅有符保盧一人進入決賽，但很快因為缺乏良好的比賽設備而被淘汰出局。儲安平似乎很清楚中國代表團的實力，雖然有惋惜，但也知道中國人體力不佳，這和國力有關，不易短時間內提升，因此也並不苛求。何況，他對體育也不感興趣，對誰獲得金牌誰獲得銀牌等事他並不關心，他最關心的是將奧運的熱烈和歡騰以報導的形式傳到國內，以鼓舞國內的廣大民眾。因此，奧運結束，他參加過駐德大使程天放的宴會後，決定馬上離開德國前往英國。儲安平對柏林的印象是走馬觀花式的，除了參觀過柏林舊皇宮，去了一次葛羅那看奧運划船比賽，再未到過其他地方。他事功心態過於強烈，又不捨得花錢，不想作無意義的浮泛式旅遊。而且，他先前託朋友在英國租好了房子，承諾8月19日一定到倫敦，必須馬上離開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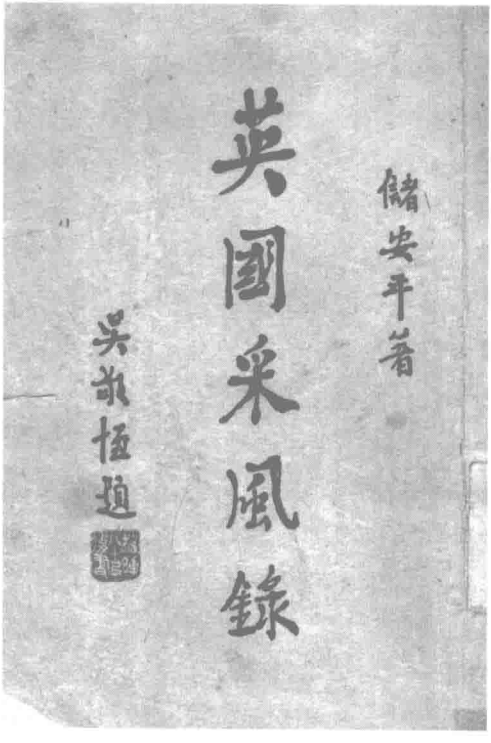
從柏林到倫敦，他購買的是五張聯票，第一張到阿克，第二張到布魯塞爾，第三張到比利時的奧斯登，第四章到英國杜佛，第五張到倫敦維多利亞車站。[31] 離開柏林之前他巧遇考取中英庚款的光華校友張承洪，到漢諾威後兩人分別，安平便獨自一人孤獨地向陌生的世界中闖去。他自負有着十幾年在江湖上飄的經驗，雖然一個人身處異邦，前面是未知的世界，卻也並不畏懼。在車上，他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德國人，希特勒的信徒。他告訴儲安平，德國從前有二三十個政黨，彼此鬥爭不休，而現在只有一個國社黨，在希特勒這個強有力的獨裁者領導之下。假如德國沒有強人希特勒，不知道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德國人問儲安平，是否中國目前分為南北兩派，互相攻擊？儲安平回答道：「現在的中國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全國都在此統一的政府之下。今

31　安平：《離德之前》，《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1月8、9日。

日中國的人民，都知道如何團結，為了要應付他們的環境。」當德國人說忘不了德國的土地割讓給法國，儲安平也說自己忘不了中國的東三省現在淪於敵手。講這句話時，衝動得幾乎要掉下淚來。[32]

儲安平去英國的一路，可謂吃苦不少。他身上僅帶了幾個馬克，需要支撐到離開德境，而這些馬克需要付腳夫的行李費或應對突發事件，因此他捨不得花錢去餐車吃飯，實在難以忍受時，便買兩塊硬面包果腹。由於語言不通，月台人員的不負責任，他幾乎乘錯了車。到奧斯登後需要過海峽乘船到杜佛，船上沒有臥鋪，且要半夜裏開，海風極涼，儲安平便睡在甲板的躺椅上，拿出毛巾將頭紮好，將雨衣蓋在身上，以防受涼。臨行前，吳稚暉曾開玩笑地告訴他，若無錢住宿可以到泰晤士河邊的椅子上假寐，而今還未到英倫，便已提前「享受」這種待遇。[33]上岸之後，到達英國杜佛，又被海關關員攔截，原因是他攜帶的 Rodenstoick 相機，雖然在中國購買，但屬德國生產，被懷疑有走私之嫌。關員似乎打算將相機扣下，儲安平千方百計證明相機在中國購買，是報社的物品，帶到德國來拍攝奧運會。他還當着英國人的面大講奉承之詞，說英國歷史悠久，政治清明，人們馴良守秩序，他都會將這一切用相機拍攝出來，告訴給自己祖國的人民等等。一番周折，才成功脫險。[34] 旅途上的艱辛，似乎預示着他一個人在異域的生活必將充滿波折。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

32　安平：《一個德國人》，《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1月15日。
33　安平：《海峽一夜》，《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1月21日。
34　安平：《一隻照相機的厄運》，《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1月23日–26日。



吳稚暉題《英國采風錄》封面

第六章　採風英倫

我了然明白我的志趣，我從來只允許我使自己的志趣變得更其剛強。可是，當我站在那迷糊的月色的初冬的黃昏裏，穿過了我那一層剛強的意志：悵惘悵惘——我不可制止地有一份輕微的悵惘！

——愛丁堡暮思，1936

愛丁堡暮思

1936年8月19日，儲安平踏上仰慕已久的英倫土地。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南京時代的朋友蘇芹蓀應約前來迎接。在蘇芹蓀的引領下，儲安平到達所租定的新居。

初到倫敦的幾天，儲安平每天無所事事。他會在蘇芹蓀的帶領下，遊覽牛津大街、大英博物館，或和同住的萬異去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圖書館看書，或去中華協會看報紙。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一帶是中國留學生的聚集地，在這裏能看到許多留學或遊學的中國學生。儲安平就在這裏遇到了光華附中的校友張宗燧(張東蓀之子)、夏鼐和陳鳳書。他國遇故知，可謂人生喜事。[1] 有時，他還應邀去拜訪駐英大使郭泰祺，或拿着余上沅的推薦信去找定居在倫敦的戲劇名流熊式一。但是，他未必真正有心四處訪友。他猶豫的是要不要進學校，以及如何進學校的問題。他要去尋找代其接洽愛丁堡大學的西爾考克先生。

1　平：《英居漫記(九)》，《中央日報·貢獻》1937年2月8日。

在倫敦的中華協會，他終於見到了西爾考克先生。西爾考克聽儲安平解釋數次，才恍然大悟。原來儲安平在二月份將光華的成績單和畢業證書寄給他，由他轉到愛丁堡大學方面，五月份愛丁堡就有了回信，邀請其入學。但是，時隔三個月，西爾考克一時記不清儲安平這個人的來歷，遂將他的材料擱置起來，導致儲安平臨出國前還不知道自己能否入學。既然已經有愛丁堡方面的邀請，他馬上依照手續填好表格並寄去五個先令給蘇格蘭的教育部門，然後再前往愛丁堡，直接接洽入學以及選課事宜。

1936年9月20日，儲安平告別倫敦，乘坐火車正式到達蘇格蘭愛丁堡，開始真正的留學之旅。愛丁堡是一個古老的城市。儲安平顯然非常喜愛這座城市，他讚歎道：「愛丁堡！呵，這一個帶有中世紀風味和宗教氛圍的古城市，她是多麼的虔誠穆肅。這起伏的地形，這孤傲的山巒，這山巒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堡(Castle)，使這一個北歐的城市變得多麼神奇，多麼令人嚮往。這寬闊的街道，這高大巍峨的建築，我們在這建築下的街頭上走過，我們的心境是多麼的舒弛。街巷盡頭那低低的像城門似的圍拱，是如何富有懷古的幽情。房舍的建築，一律是用那些不規則的粗大的石塊，錯縱地堆砌着，使人看了覺得另有一種風趣。」[2]

愛丁堡大學成立於1583年，和牛津、劍橋一樣，是不列顛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愛丁堡也是歐洲貴族子弟首選的學校之一，在文學、醫學等傳統學科方面深具優勢。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電磁理論創始人麥克斯韋、哲學家大衛·休謨、文學家柯南·道爾都曾有就讀於愛丁堡的經歷。民國時期留學愛丁堡的中國名流有美學家朱光潛、翻譯家戴鎦齡和作家袁昌英等。袁昌英曾是儲安平主編《文學時代》的作者，或許儲安平在申請愛丁堡大學之前也諮詢了袁昌英。

但是，儲安平在愛丁堡的生活並不順利。首先是生活問題。

2　平：《英居漫記(一)》，《中央日報·貢獻》1937年1月29日。

學校不提供住宿，他在校外最初租住的房子，位於鬧市區，每當夜晚，窗外車水馬龍，甚不安寧。這對於原本神經衰弱的他而言無異於一場災難。一番周折，費了不少精神、時間和金錢，才換到了更為合適的房子。按照當地法律，搬家後還要在三天內到警察局去登記，否則便會遭到查處。在愛丁堡，支取現金也有麻煩，每次只能領取三磅，且需要領款後將存摺扣押在郵局，寄到倫敦的總稽核處稽核後再退回。在他看來這既無必要，又有風險。其次是文化環境，愛丁堡地處蘇格蘭，雖然也有中華協會，但基本都是華僑的勢力。以前還有一些中文報紙存在，但因為華僑漢語水平太低，基本看不懂，報紙也逐漸取消。[3] 在倫敦還有張宗燧、夏鼐、蘇芹蓀這樣的朋友，可是愛丁堡的中國留學生極少，他又和華僑毫無淵源，在這裏是孤家寡人，感到生活孤獨而無聊。到達愛丁堡數日後，儲安平便開始產生了一種去國懷鄉的強烈感觸。因為這篇名為《愛丁堡暮思》的文章極美，是儲安平作品中不為人知的經典散文，在此大幅照錄：

> 我來這兒雖然只有五天，然而好像在這兒已經挨了五年。這些肅穆的街道建築，這整個肅穆的空氣，一面使我幽然成趣，一面又使我欲引起一縷落寞之感。這兒的氣候應該很冷，這九月底的日子，就已經是初冬的景象，風颳上身，使我回憶起從前在北平過冬的情景。當我們在春天，在夏天，在天氣暖和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永遠只是活躍飛濺的一個方向奔放。可是一到了暮秋冬令，我們就濃濃地留戀着一個家庭的暖和。我們憧憬一個家庭，喝一壺熱茶，烤一回火，有一個人和你答話。一種骨肉之感，一種人倫之樂，就在這冬天的黃昏，最易使你深切瞭解，深切懷望，然而我，我在遼遠的北國，每天自己弄着伙食，聽着那GAS吐出來的單純

3　平：《英居漫記(十二)》，《中央日報·貢獻》1937年2月15日。

> 的聲音，它的火舌告訴我現在的心情是如何的孤獨。我惘然的站在窗口，俯看着那被晚風掃刷了的冷靜的街頭，我是如何的愁情滿懷。今天，我再也不記得我祖國舊時留下來的日曆，就只見迷霧的雲端裏，蕩漾着一個公園的月亮。這向晚的寂靜使我勾引起多少記憶回想！我不會流淚歎息，為的我再也不准我自己變得那樣懦弱。我了然明白我的志趣，我從來只允許我使自己的志趣變得更其剛強。可是，當我站在那迷糊的月色的初冬的黃昏裏，穿過了我那一層剛強的意志：悵惘悵惘——我不可制止地有一份輕微的悵惘！

為抵禦這種悵惘，儲安平故意抑倫敦而揚愛丁堡，試圖讓自己接受愛丁堡的好處：「我們在都市里呼吸得太久的人，對於倫敦沒有一點良好的感情。我駭怕倫敦街道上那股不變的汽油異味。倫敦那晦澀的天幕，那滯拙的空氣，使我們的心靈一天一天的變得冗俗。她有世界頂大頂完備的博物院，她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的惠斯敏斯大寺，她有議會制度之母的巴力門，可是她勾引不起我一點愛戀的感情，我和她沒有一點纏綿的緣份。」[4] 但是，聯繫到前文所說的，儲安平對英國議會制度敬仰有加，而倫敦是觀察英國政治的最佳之地，說「勾不起愛戀的感情」，只能理解為這是他的一種自我安慰之語。

除此之外是生活窮困。當時在海外通過庚款專案留洋的公費生，亦會經常在經濟上陷入困頓，更不必說儲安平這種自費留洋的學生。英國相比於中國，物價太高，費用太貴，他帶來的一點錢必須謹慎使用，因此在生活上極為節儉。他後來自述：「當著者在愛丁堡時，雖不敢自謂中國最窮苦的學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窮留學生名單中。自己燒飯，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僅費四磅，合之國幣約65元左右。」英國人不吃豬爪，豬爪價格

4　儲安平：《愛丁堡暮思》，《中央日報·貢獻》1936年10月29日。

非常便宜，儲安平便每天買豬爪，用來燉白菜。由於豬爪並無特殊營養，一段時間下來後竟然使他體力不支。受房東太太的勸告，他開始食用營養價值稍高的乾酪，將其與餅乾合吃，似乎也可稍微調節一下營養。[5]

儲安平有雄心壯志，不怕吃苦，可以忍受困頓的生活，但是不能忍受的是愛丁堡這所學校。筆者曾多次與愛丁堡大學檔案館溝通，希望能獲得儲安平在愛丁堡不到四個月的學籍資料，但數次無果。對方甚至熱心地蒐索網絡，告訴我這位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並非是愛丁堡大學的學生，而是就讀於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LSE)，可見以訛傳訛已經對異國人士產生影響。[6] 不過，似乎也無需學籍檔案。作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說政治經濟學院培養的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愛丁堡培養的是傳統的英倫型紳士、文史研究專家和貴族博雅之士。愛丁堡大學的史學系，其教育模式也是培養專深的史學研究者，而較少注重實用性。儲安平固然對這種博雅之士心嚮往之，但是告別文學之後，他的志向決不在做一個在學院中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和好友季羨林不同。季羨林可以在德國小城哥廷根埋頭苦讀十年，不問世事，研究艱澀淵深的梵文。儲安平的志向是做一個入世的，可能用言論影響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希望真正學以致用，讓知識成為指引實際行動的基礎。所以，當他在愛丁堡大學接受了那些歐陸刻板、瑣碎、傳統的史學教育時，便會覺得無聊透頂。這不是他想要的留學生活，和自己的初衷南轅北轍，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1936年冬天，儲安平獨自在愛丁堡過冬。他認為自幼孤苦，可以忍受孤獨寂寥的生活，但那年在愛丁堡的淒涼讓他在七八年後仍舊難忘。愛丁堡接近北歐，冬天來得極早，日光照射時間很

5　儲安平：《英國採風錄》，觀察社，1949年，第196頁。

6　**Pagan Sally** 女士信，愛丁堡，2012年5月22日。

短，非常寒冷。愛丁堡亦和倫敦一樣，經常有鋪天蓋地的大霧。某天，他晚餐後上街購物，走在愛丁堡古老的街道上，看到夜幕下一切建築在霧中都化為灰色，顯色格外單調憂鬱。他形容：

> 冷風刺骨，街燈在濃霧中已只剩了一點淡黃的顏色。聽見電車在鋼軌上發出的聲音好久而不見電車在何處，終於看見有幾盞燈火在混沌中搖曳而來，一瞬眼之間，又復消逝。整個的空氣是寒冷、昏暗、蕭條、荒涼，而令人急於回家覓取人生的溫暖。[7]

可是，他的家在萬里之外的中華民國南京，到哪裏去尋覓回家般的溫暖？在愛丁堡清冷的暮色之中，他還是否有當年的雄心壯志？他是否後悔當初的選擇？

再回倫敦

1937年1月10日的《夏鼐日記》有一條珍貴的記錄：「下午儲安平君來，據云對於愛丁堡大學甚為失望，故決計返倫敦自修。」[8] 這說明，僅僅在愛丁堡大學一個學期，儲安平就退學並離開愛丁堡，來到倫敦做一個自學的學生。

儲安平來倫敦，除上述種種生活學業上的不如意之外，應該也與端木露西來英的計劃有關。1937年1月底，端木露西辭去《中央日報·婦女周刊》的編輯職務，將兩個孩子交給娘家照看，收拾行囊前往英國與儲安平會合。[9] 在船上，端木露西給《中央日報》的同事周邦式(也是安平在光華讀書時期的黨義教

7 儲安平：《英國採風錄》，第149–150頁。
8 夏鼐：《夏鼐日記》第2卷，第88頁。
9 端木露西：《向讀者告別》，《中央日報·婦女周刊》1937年1月27日。

師)寫了一系列名為《海外歸鴻》的信，發表在《中央公園》上。根據這些信件的日期，可知露西到達倫敦的日期在1937年3月中旬。[10] 倫敦的大學很多，中國學生亦多，這是適合安平和露西共同生活且都能接受的一個地方。

露西到達倫敦，安平的心情應該是歡樂而愉悅的。我們能從一些文章的隻言片語中重構二人當時在倫敦生活的情況。目前已知的是，兩人在倫敦大學附近的一個三層小樓上租了一個小小的屋子。儲安平可能會經常去圖書館看書或去倫敦大學聽課。端木露西雖然在後來的檔案中標明在倫敦大學攻讀教育學的經歷，但應該也只是選課或試聽，沒有正常拿學位。[11] 為節省故，兩人晚上回家自己烹飪。露西似乎承擔了比較重的家務。她曾回憶道：「某日，我從街上提了一大袋雜貨走回家，那是我家兩口子一星期的食糧。我當時委實要抱怨我這毫無用處的氣力，我簡直不能提着這一大袋東西而無尷尬之相。」[12] 讀到這段話不僅要問，此時的儲安平在哪裏？為什麼沒有幫助露西？或許是儲安平忙於埋頭攻讀，無暇家務，或許是他不願意承擔，認為這是女人的分內之事。或者說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露西有自己的倔強。很多時候，露西都是自己獨行，在漆黑的深夜裏亦然。她曾回憶，有一次晚上十點鐘獨自從一個演講會回來，迷失了路徑，口袋中車費不足，在倫敦黯淡寂靜的街道上摸索，不勝惶恐，在一位英國太太的資助下才勉強找到家。還有一個倫敦大霧的夜晚，十步之內不辨方向，露西獨自回家，行至一路口，險些與一輛急促而來的汽車相撞，受到嚴重驚嚇。回到家後，她看見滿屋子升騰着煙霧，儲安平正躺在沙發上沉思。出乎意料的是，露西並未責怪安

10　露西：《海外歸鴻之六》，《中央日報·中央公園》1937年4月6日。

11　《關於送校長端木新民履歷的報告》，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檔號B1051276132。

12　端木露西：《在英國看英國人》，《露西散文集》，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67頁。

平沒有迎接她或與之同行，而是認為：「自己喜歡獨個兒浸醉在這樣迷茫茫的天地中……假使有一個人走在我一旁，那這種美景將成為俗煙，討厭極了。」[13]

但是，在外出遊玩之類的情況下，兩人是同行的。除了曾與三五朋友租車一起去倫敦郊外的鄉野踏青、小住外，他們還曾受邀去英國普通民家做客。1937年的聖誕前夕，在倫敦中華協會張幹事的介紹下，兩人應K地洛爾夫婦的邀請，前往其家中歡度為期七天的聖誕假期，對方提供往返路費。洛爾夫婦的兒子是虔誠的基督徒，大學畢業後毅然前往中國廣州傳道，他們打算邀請一對中國夫婦來家裏小住七天，近距離觀察中國人，以知其子目前所在國度民眾的程度如何。兩人在他家，受到了主人夫婦無微不至的招待。兩人隨他們一起去教堂做禮拜，接受他們饋贈的聖誕禮物，帶着他們遊戲、聊天、聽音樂會，乘車去郊外踏青。聖誕之夜，主人的女兒邀請安平跳舞，但安平從不會跳舞，頗感窘迫。臨別時，雙方依依不捨，主人用車將安平夫婦送回倫敦，並一直保持聯絡。安平和露西的彬彬有禮、舉止優雅、談吐大方給他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完全改變了洛爾夫婦眼中的中國人形象。[14] 由此更可以印證，兩人在英國時刻注意自己的舉止。他們都有深重的愛國之心，唯恐在海外的行為有失體統，給貧弱的祖國抹黑。他們更知道，中國人的國際形象非常不佳，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給身邊的中國人作一個示範。據露西自述，在一個公共場合，有英國人將她誤認為是日本女子，且表露出尊敬之意。當

13　端木露西：《兩地霧》，《露西散文集》，第62–63頁。

14　端木露西：《懷雪亞黛蘭》，《露西散文集》，第70–80頁。端木露西在這篇文章中說自己也不會跳舞，可知她顯然在有意撒謊。她在光華時就精於舞蹈，可能因為1939年出現了程滄波事件，坊間瘋傳端木露西整日和程滄波跳舞，她出於洗清自己才這樣講。而且，端木露西也有意隱瞞了時間，將這次做客說成1936年聖誕，聯繫《中央日報》上的文章可知，當時她還在國內。她未寫1937年聖誕，因當時抗戰剛剛打響，不久之前便發生南京大屠殺。如此深重的國難之下，類似交際娛樂可能會被人批評。

露西表明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方驚訝地說道：「你們貴國也有像你這樣的女子嗎？」[15]

英倫見聞

在當時中國學生眼中，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是頗負盛名的學府。政治經濟學院是倫敦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立於1895年，由參加英國工人運動的幾位學者創立，是宣傳費邊社會主義的重鎮。尤其是1920年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從哈佛大學轉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講師後，在他的中國學生羅隆基、王造時、錢昌照、杭立武、張奚若等人的引介之下，該校成為中國精英留英學習政治學的首選之地，其後程滄波、龔祥瑞、吳恩裕、鄒文海等人都親炙過拉斯基。至於在政治學院跟隨其他導師學習者，則有費孝通、蕭乾、樓邦彥等許多著名知識分子。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物質條件未必很佳，但是圖書資源一流，館藏社會科學書籍極為豐富，據說可能是全世界收藏社會科學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16] 但是，儲安平並未如傳說中進入政治經濟學院。抗戰勝利後，儲安平在任教於國立復旦大學的履歷中寫着：「儲安平，專任教授，光華大學文學士，英國倫敦大學研究。」[17] 收藏於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1941年版《中國留英同學錄》中則進一步明確標記儲安平的留學經歷為：「倫敦大學大學院歷史系」。[18] 儲安平更沒有親炙過拉斯基。如果他是拉斯基的弟子，必定會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從拉斯基學習的經歷。然而，我們發現，儲安平對此隻字未提。拉斯基的正牌學生龔祥瑞與儲

15　端木露西：《海外一國民》，《中央日報》1938年6月12日。
16　薩本棟：《倫敦政經學院巡禮》，《申報》1948年5月31日。
17　《國立復旦大學一覽》，復旦大學，1947年，無頁碼。
18　中國留英同學會編印：《中國留英同學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9064。

安平出國的時間相仿，但他到40年代末仍然是「對儲安平沒有認識」。[19]

實際上，從儲安平對其留學經歷的模糊處理來看，即使他和倫敦大學大學院有關，亦只是選過一點課程，並未真正想要拿學位。當時的自費生拿學位並不容易。在倫敦大學，如果讀哲學博士，需要在導師的指導下選課，寫作論文，修業至少兩年，每年要繳納數十英鎊的學費。[20]準備畢業論文曠日持久，耗費精力極大，四五年無法畢業者並不鮮見，對一般自費生來說負擔太重。如果只抱着一種增長見識和求知的目的，自由選課，自由探索，所獲未必小於讀學位。儲安平一方面條件不足，一方面有過入學愛丁堡大學的不愉快經歷，決定自修到底。

儲安平在遊學生涯中，閱讀了大量英國歷史方面的原典著作，這從《英國採風錄》後面列舉的引用文獻即可曉得。此時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中央日報》駐歐記者。他需要源源不斷地為《中央日報》發回國外通訊。1936年以後的歐洲風雲詭譎，尤其是納粹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使歐洲局面十分緊張，逐漸形成兩大勢力對壘之勢。儘管如英國不斷調停希望避免戰爭，但是德國對蘇俄和法國的強烈仇視，還是給人一種大戰一觸即發的感覺。儲安平以「歐洲通信」的名義發回了《歐洲的兩大壁壘》《談不干涉》《德國進攻蘇聯的戰略》《奧國的復辟問題》《比國的趨向》《由地中海協定談到西班牙問題》《英國的國防預算》等關於歐洲政局的長篇分析文章。羅隆基亦託人轉達儲安平請其為他主持的北平《晨報》撰寫歐洲通訊。不過，儲安平寫了四五篇卻未收到羅隆基一分錢稿費，他認為羅的做法傷害了他的感情，並成為他不願與羅來往的一個原因。[21] 1937年末，法國

19　龔祥瑞：《盲人奧裏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20　費孝通：《留英記》，《費孝通全集》第8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頁。

21　《儲安平的交代·與羅隆基的來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65頁。

召開世界博覽會，儲安平受報社派遣前往巴黎，觀察法國政局，發回了一系列題為「巴黎夜話」的文章。因為儲安平的採訪和寫作勤奮，甚至引起了倫敦萬國記者協會會長力泰博士的注意，在他的推薦下，儲安平被選為萬國記者協會會員，並受邀參加該會和英國記者聯合會共同組織的歡迎各國記者來英採訪英王加冕的集會。[22]

較之於觀察歐洲政局，儲安平對觀察英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極有興趣。粗略言之，當時的英國至少有三個面相。首先是自由主義的英國，從大憲章到近代民主制度的確立，自由主義是英國政治思想的主流，包括政治自由、民主憲政、市場經濟等元素。其次是保守主義的英國，即英國雖經光榮革命卻仍然保持了虛君共和與貴族制度，使節制、互愛、認同改良等都成為英國的重要傳統。最後是以批判自由主義而興起的社會主義英國，或者說社會民主主義的英國，顯示為支持政府調節的凱恩斯主義、兼綜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平等的「第三條道路」。[23] 在儲安平留學英國的時代，這三個面相在英國政治文化中都有一定的表現，但有趣的是，儲安平當時顯然只對前兩個面相感興趣。

他非常欣賞英國的自由主義。光華時期的儲安平，已經從胡適、羅隆基等處接受過較為正宗的自由主義啓蒙。然而，由於國家危亡日益加重，以及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報的環境影響，他逐漸在言論口徑上接近國民黨的官方話語，甚至一度擁護獨裁，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希特勒式的強大領袖。遊學英國後，才真正對自由民主有着切身的體會。他認識到英國政治中的核心詞彙是自由，而非平等。他說：「英人對平等的觀念固很淡薄，但對於自由的爭取和衛護，則千百年來，念茲在茲，永矢勿忘。」他饒有興致地梳理了從1215年的大憲章以降英國自由主義的演進。他看

22　《萬國記者協會選儲安平為會員》，《中央日報》1937年6月26日。
23　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第74頁。

到，在大憲章時代，英國就已經初步確立了貴族應該享有的各種權利，其後經過不斷抗爭，權利逐漸擴大到全體平民。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成為英國政治制度中的最高原則。他說道：「英人幾乎永遠在監視着政府有無損傷他們自由的行為。」「無論結社或集會，在英國都非常自由。集會自由在英國人看來，是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混合，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既神聖不可侵犯，則集會自由，政府自應承認而無任何限制。」「英國的出版，亦極自由，除通常法之外，另無其他任何特殊的出版法，更無檢查制度。英國報紙除在習慣上不批評英王及王室外，對其他任何領袖，均直言批評，無所畏懼。」「人身自由及居住自由在英國之為神聖不可侵犯，更無待論。」[24]

與英國的自由主義配套的，是運行平穩有效的議會政治。他對英國的議會制非常感興趣，曾經多次到議會下院旁聽，觀察英國政治的實際運作。他在名著《英國採風錄》中記錄了議會制度發展的歷史，詳細描述了上院和下院的規模、組成、功能，以及議事的程序，甚至不厭其煩地畫出了議會的座次圖，以便讀者對此有一個清晰明瞭的認識。在光華和寫作《給弟弟們的信》的時代，他對議會民主制的認識僅來源於一些二手文獻的介紹或抽象的政治理論，而此時卻是親眼目睹，無疑印象深刻。他在此時的文章中讚歎道，議員出於民選，一切通過商議決定，可以有效避免專制的發生；即使某黨治理失敗，也可以對執政者進行問責，或通過和平選舉的形式進行政黨輪替。這實在是一種不壞的制度。

儲安平同樣對英國的保守主義傳統感興趣。英國的保守主義傳統，包括虛君共和的政治體制和殘存的貴族制度。因為有英王的存在，不列顛帝國有了統一的象徵，使國家在遭遇危機時有穩定的權力中樞，避免分裂。貴族的存在則成為尊嚴的象徵，貴族講禮儀、有道德、政治觀點中庸，這些使英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

24　儲安平：《英國採風錄》，第80頁–101頁。

思想上都能夠不走極端，保持一貫性和穩定性。儲安平對這種保守主義非常敬佩，對其背後蘊含的制度、儀式亦相當感興趣。他全程觀看了喬治六世的加冕禮，並給予熱情隆重的報導。對於愛德華八世娶一位離過三次婚的美國婦女為妻，並因之放棄王位的事件，他也表現出極大的敬佩。[25] 他比較認同於英國的保守主義，認為這種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相輔相成，共同成為英國政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儲安平唯獨沒有提到英國的社會主義面相，這一點比較耐人尋味。因為《觀察》時代的儲安平，通常被研究者歸類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學者們一般認為，他受拉斯基的影響，在政治上傾向於英美的自由民主，經濟上取蘇聯的經濟平等，並且以之為未來中國建國的最佳道路。[26] 但是，我們從儲安平這一時期的文章中卻從未發現他有這方面的思想和言論，對於拉斯基和所謂社會民主主義，完全隻字未提。為何情況如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儲安平對英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感興趣，只因這些是英國所有中國所無，可以作為有效的思想資源援引到中國的建國事業當中去。他在英國時，未必沒有受到風頭很勁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但其中存在着一個主次輕重的問題。在抗戰的民族危亡之際，和凝聚國家精神相比，所謂經濟平等還無法成為時代議程，不為一般知識分子所重視。他真正對所謂社會主義感興趣是在1945年以後，抗戰的創傷導致中國經濟面臨嚴重困境，社會上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知識分子普遍陷入貧困，民眾要求經濟平等。同時，英國工黨通過大選取得政權，開闢了一條在憲政民主基礎上的經濟平等新路，給儲安平以進一步的啟示。更要說明的是，在1945年以後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時代流行的

25　儲安平：《英國史上之又一頁，愛德華八世退位記》，《中央日報》1937年1月6日。

26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冊，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27–59頁。

思潮，是時人普遍認同的一種觀念。儲安平未必對此有深刻的瞭解，觀點亦不獨特，只是他作為《觀察》主編，掌握了話語權，其聲音才顯得突出，被研究者納入視野之中。

儲安平採風英倫，除了政治制度，使其感受更深的是英國人的國民性。在他看來，英國人有重行動、自我約束、理性、實用主義等種種優良的品性。他說：「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務重實行。英人不重視抽象的理論，很少幻想，不尚辭令及一切負面的虛文。他們(指政治家)及一般官吏，總是集中精力於職分內的工作，很少參加無關的公共集會，很少發表大而無當的演說。政府各部門總是盡量的在沉默中埋頭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步驟實事求是。英人經營事業大都腳踏實地，不誇大，不遊移，不僥倖，並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英國人這種務實重行的精神使整個英國社會蓬勃有朝氣，使社會各階層各方面，都能結結實實，熱力充沛，潛有無限堅韌的力量。」

英國人還具有良好的合作能力及組織能力：「公共事業不可避免地要經過集體的行動，而在集體生活集體行動中，必須人人自我約束。英人都非常真實，都能盡其本分，都有強烈的服務感，並有自省的習慣，所以他們在團體中都能成為良好的分子，各盡其職，各盡其能，他們不需要他人的監督，他們也不甚有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私意識。」英國人重視理性：「理性是英人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唯一出發點」。理性的產物是政黨制度：「政見不同的各方面，不訴諸武力而訴諸人民的裁判，為人民所擁戴者，上台執政，實現其政策；不為人民所擁戴者，掛冠而去，以順民意。」理性的另兩個產物是公道和實用主義：「英人愛好直道，是非公私，分明清楚。有才有智有德之士，總有人頌揚他、愛戴他、鼓勵他、酬勞他，而出賣公共利益的人，則必為眾口所不容。英人的公道精神最高表現在他們能容忍異己，尊重對方。賴有這種精神，英國人才能保持他們千百年來的種種

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賴有這種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兩黨制度，在社會上才能和衷共濟，融融洽洽。」「英國人都非常現實，他們素不死抱着任何不變的主義或任何不變的原則。英人對於一切制度，都以實用為主，任何事物制度，只須其不妨礙實際的運用，即已滿足，並不強求其合於理論或者合於邏輯。」[27]

為什麼英國會有如此良好的國民性？儲安平認為得益於英國的教育。這是一種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英國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一個優良人的性格和優良的風度，重視的是品格的培養和意志的鍛煉，養成負責、誠實、可靠、服務的精神。在家庭時代，父母就將一些基本的理念如衛生知識、公民道德、人生觀念、做事精神告訴給孩子，到了學校，不只是知識的教育，而是行動和實踐。到了社會上，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之下，人人守法而行。除此之外，還有宗教文化的薰陶等種種因素。[28] 相比之下，中國所缺的恰恰是這種教育。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儲安平對英國的觀察有不少美化。某次他在倫敦的圖書館讀書時，新買的雨傘被英國人順手牽羊拿走。他評論道：「我們總以為英國的社會不致下流到如此。不料我們想像中『紳士的英國』也只是一個紙糊的臉具。我來倫敦還不久，但已聽到許多中國同學批評英國的意見，自己也親眼見到過好幾件英國人做出來的並不高尚的行為。這許多材料都在我心中，將來如有機會，當再寫出來。」[29] 然而，儲安平最後並沒有寫出來，而是對英國人極盡讚美之能事。究其原因，無非是為了讓中國人有一個參考的典範，普遍提升道德意識，進而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有意識地迴避英國不佳的一面，其中可見儲安平的策略性。

27　儲安平：《中國人與英國人》，《英人法人中國人》，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49頁

28　儲安平：《英國採風錄》，第124–128頁。

29　平：《英居漫記(九)》，《中央日報·貢獻》1937年2月8日。

總之，英倫兩年，對儲安平的影響不可小視。英人的所謂重行動、自我約束、講公道、寬容異己等特質，在其後儲安平的身上都有極為明顯的表現。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成為一個學院派理論家，而是持續以一種任事的精神，從事用言論改變中國社會的活動。遊學英國也使儲安平親眼目睹西方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由此更強化了對自由主義的認識。中國的政治遲遲不上軌道，知識分子普遍無解於「中國往何處去」時，英國的政治制度始終是儲安平心中的一個參照標準。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自由的原教旨主義者，由於受英國的實用主義影響太深，他也採取一種實用的態度來評價政治制度，只要國家富強，其他方面的斟酌損益似乎都可以考慮。這些思想特徵在來英之前，已經有一定的表現，英倫兩年之後，則更是成為一種內化的堅持。

歸國

雖然身在海外，儲安平的愛國之情非但沒有減退，反而更加強烈。1936末和1937年初，日本在華北製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平津危急，戰爭危機似乎迫在眉睫。他在倫敦經常讀報，從已經過期甚久的報紙中瞭解祖國的消息。1937年7月7日，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攻擊宛平城，侵華戰爭正式開始。儲安平從報紙中得到了這個消息，坐臥難安，憂急萬狀。用端木露西的話描述便是：「我們兩人蹲伏在倫敦三層樓上那間小小的屋子裏是多麼的焦急，憂慮和苦悶。你(指儲安平)每天一開眼就問我要報紙，我們在興奮和緊張之中送去了多少擔心的日子。上海戰事爆發了，南京被轟炸了，每件消息都使我們的熱血沸騰，軀體像被燃燒着一樣。你常歎息着自己遠在國外，一切飛機、轟炸、炮火的聲音都不能親切地體味，而這些聲音是多麼使像我們這樣的人刺激、奮感和醉心的。」

儲安平在海外目睹英國的反日氣氛，對國際友人的道義支持表示深深的感激。他也想像着萬里之外的祖國，政府是如何振作，軍隊是如何勇猛，人民是如何團結，國內上下如何的呈現出一種全民一致、同仇敵愾的景象。他熱血沸騰，希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參與抗戰，就像當年九一八事變後，他領導南京請願，跟隨援馬團北上一樣。此次真正遭逢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分子，更應該馬上義無反顧地投入。他打算回國，他要親眼目睹、親身參與這個大時代。正如端木露西所言：「我們何幸生長在這大時代裏，我們應該是大時代裏的一員。我們需要生命，但是我們更需要燦爛的生命，於是我們計劃着回國去的事情了。」[30]

實際上，回國對於儲安平來說，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東北、華北、東南大部分國土都已經淪陷，只剩下武漢、重慶、長沙等幾個中西部重鎮還在嚴防死守，與日軍作持久而慘烈的拉鋸戰。國內到處都是戰場，每一天都有無數同胞犧牲，回去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一般國家民族觀念淡漠的留學生，身在海外，遠離戰場，生命財產可保無虞，除非官費停發，決不會作回國之打算。但儲安平滿懷愛國豪情，一定要馬上回去參加抗戰，或為抗戰宣傳鼓吹。

1938年1月，儲安平帶着端木露西從倫敦取道德國，經由瑞士由海路乘船歸國。就在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回國的途中，露西懷了他的第三個孩子。後來知道，這是一個女孩，她的出現可謂生不逢時。戴晴在書中提到過：「可惜儲安平是個重男輕女的典型，對新生的女嬰，他居然說過『弄死得了』一類的話。」[31]此說目前並無旁證，如果為真，理解此語決不可脫離時代語境。前文提過，儲安平和端木露西都不打算多生，一直苦於在節育方

30　端木露西：《送×去前線》，《中央日報·星期增刊》，1938年10月9日。
31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229頁。

面不得要領。此時國難在即，儲安平既然已經決定回國參加抗戰，端木露西懷有身孕乃至將來生育，無疑是一種負擔和累贅，給他們的生活造成極大不便。事後證明，當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分手後，端木露西隻身帶着五歲的女孩逃難，的確是受盡磨難，苦不堪言。[32] 因此，儲安平的話，只能理解為一時的無奈和激憤之語。不過，既然新生命到來，只能默默接受。因為發現孩子孕育時，二人到達瑞士，儲安平便決定將來給孩子取名為「望瑞」。

32　端木露西：《前線之邊》，《露西散文集》，第1–5頁。

第七章　後方與前線

我們永遠忘不掉這一天，我們後世千千萬萬的子子孫孫也永遠忘不了這一天。這一天是我們歷史上遭遇空前的苦難的一個開始，這一天是我們大中華民族，又復照耀出他無比的光彩的一個起點。

——一年，1938

初遇章伯鈞

1938年春，儲安平與端木露西乘船到達香港。由於端木露西身體欠佳，遂暫時滯留在港，儲安平獨自前往內地，尋找機會以便參加抗戰。不久，儲安平到達中央各機關臨時駐地武漢。在這裏，他與章伯鈞、彭澤湘等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發生關係。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原名「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又被稱為「第三黨」，由鄧演達於1927年在莫斯科創立。1930年8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幹部會議，開始正式在國內活動。該黨集中了鄧演達、譚平山、黃琪翔、章伯鈞等從國共兩黨中脫離出來的人士，他們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將國民黨定義為「新軍閥土豪紳士地主及剝削農工分子的集團」，自稱廣大農民、工人的代言人，以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為目標，希望在中國建立勞動平民階級的政權，逐步走向社會主義。[1] 該黨同樣對中共持保留意

1　彥奇：《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22頁。

見，認為中共是第三國際下面的一個支部，而非真正能代表廣大工人農民的政黨。他們對中共過份誇大主觀力量，進行無系統的農民暴動，輕視城市工人運動等做法，亦表示不能認同。

1935年11月，第三黨在香港召開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決定更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選舉黃琪翔為總書記，章伯鈞為宣傳委員會書記。同年冬，章伯鈞、彭澤湘、彭澤民等到達武漢，從華北、華東撤退下來的許多黨員幹部也集中在武漢，成立了武漢臨時工作組，通過青年抗日工作團和黎明劇院，宣傳抗日救亡活動，一時間影響頗大。1938年2月，第三黨中央機關刊物《抗戰行動》創立，以「民族至上、民主至要的意識，抒陳有利於民主國家的政見」為宗旨，鼓吹抗戰言論。[2]

儲安平剛剛回國，一時還難以聯繫到合適的接收機構，大概是第三黨素聞儲安平之名，邀請其為他們的機關刊物撰稿，參與該黨的宣傳。正如一則資料提到：「《前進日報》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機關報，該黨還同時出版《中華論壇》(後改為《抗戰行動》旬刊)。《前進日報》社長為彭澤湘，總編輯為鄒靜陶，撰稿人有章伯鈞、周覺、彭澤湘、王一帆、儲安平等。」[3] 不過，儲安平顯然只是一種臨時性的加盟，其為《抗戰行動》撰稿，也是只署筆名「儲平」。「儲平」與章伯鈞之名，一道出現在《抗戰行動》的各期雜誌上，有時雙方還分工撰寫較短的評論。

耐人尋味的是，儲安平在這一時期，注意到了抗戰中軍隊的政治工作問題。他意識到，弱小的軍隊對抗強敵，若要取得勝利，必須重視軍隊政治工作。他以俄國紅軍十月革命成功奪權和國民黨北伐取得勝利為例，說明在軍隊開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2　余天武：《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武漢》，《武漢文史資料》2011年Z1期。

3　王文斌：《抗日戰爭初期武漢報業簡況》，《中國現代報史資料匯輯》，重慶出版社，1996年，第300頁。

在他看來，開展軍隊政治工作，應該確立新的全國一致認可的政治工作綱領，並調整政治工作的組織，訓練合格的政工幹部，以團結士兵的思想，用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員士氣。眾所周知，在軍隊中設立政治部，源於蘇俄，在中國最初實行於黃埔軍校，其後在中共的軍隊中被發揚光大。儲安平表揚中共說：「比如第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所產生，且已經有了成績。」這是現存文獻中儲安平第一次提到中共，說明中共此時在民眾心中的印象尚可。[4]

除了做好政治工作，還需要放手動員民眾。儲安平認為，以往的政府在民眾動員方面動輒採取拉夫、抓丁的強迫手段顯然不當。民眾是人不是機器，有自己的意志。只有在政治上給予民眾民主自由，經濟上減輕他們的負擔，才能真正使他們瞭解到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的關係，願意接受動員。[5] 而且，還要讓民眾自我動員。那就是在統一行動的基礎上，賦予民眾以結社的自由。他認為，應該讓民眾依照職業不同，建立起工農商學兵的職業團體，或依照信仰不同，組織起各種政治文化的團體。在此基礎上，廣大民眾自下而上發動起來，共同為抗戰努力。當時的國民政府並不支持民眾自由結社，其中既有統一行動，集中抗戰力量的需要，又有防止民眾結合起來反對政府，並避免各團體之間摩擦損害抗戰的考慮。但儲安平認為，統一行動和結社自由並不矛盾。只要國民政府集思廣益，制定一個完備的抗戰原則和行動綱領，全國各民眾團體自然會集中在這一綱領之下，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和團體利益之上，一致對外。[6] 實際上，儲安平是在呼籲，只靠政府抗戰遠遠不夠，更大的力量集中於民間，中國應該擁有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健全的民間社會。

4　儲平：《抗戰中改造軍隊政治工作提要》，《抗戰行動》1938年第2期。
5　儲平：《抗戰第一期的教訓與現階段的認識》，《抗戰行動》1938年第1期。
6　儲平：《統一行動與結社自由》，《抗戰行動》1938年第5期。

儲安平與第三黨以及《抗戰行動》，只是一個臨時的關係。但是，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儲安平與章伯鈞的關係問題。[7] 1957年，儲安平應中共統戰部之命，經各民主黨派同意，擔任由章伯鈞任社長的《光明日報》總編輯一職，並開啟了悲劇命運的閘門。儲安平後來在檢討中說：「我和他(指章伯鈞)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8] 這句話還是有所隱瞞，從以上情況看，即使雙方並不熟悉，還是一度有過交集，儘管這只是很淺的交集。

鼓吹抗戰

儲安平與第三黨的交集相當短暫。1938年6月初，他與已經遷往長沙的《中央日報》取得聯繫，遂離開武漢前往長沙，重返報社服務。端木露西在香港滯留了三個月，亦不安於香港遠離前線的「苟安」生活，輾轉到達長沙，與儲安平團聚。[9]

抗戰爆發後，各政治團體一致對國民黨作出讓步。在1938年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上，各黨派代表均表示全力支持政府的《抗戰建國綱領》，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和三民主義為「戰時最高指導原則」，群策群力支持政府抗戰。因此，重回《中央日報》的儲安平，更成為配合政府宣傳抗戰的喉舌。6月20日，《中央日報》在社長程滄波的主導下，由儲安平創辦了《平明》副刊。平明即黎明，取「長夜漸過，平明將臨」之意，寓意抗戰事業雖然艱巨，但必定會衝破重重黑暗之陰霾，迎來中國新的黎明，取得抗戰建國的偉大勝利。《平明》的目的，在於蒐索抗戰時期的

7　筆者曾就儲安平和章伯鈞最初交往的時間諮詢過章詒和先生。她亦不知詳細情況，說儲安平從未有筆名為「儲平」。然而，儲安平的確有筆名「儲平」。1944年第9卷第1期的《新東方》雜誌中，有《政治上的英人與法人》一文，署名儲平。從內容上看，該文是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的一部分。

8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90頁。

9　端木露西：《江行雜緒》，《中央日報》1938年8月26日。

一切民歌、戲劇、戰記等和抗戰有關的文字，以記錄下這個黎明之前的大時代。[10]《平明》每逢一三五出版，儲安平重申了當年編輯《中央公園》公平公正認真負責的態度，希望將《平明》打造為一塊發表抗戰文藝的中心園地。[11]

《平明》依託國民黨中央黨報，其抗戰宣傳的作用，遠非第三黨的宣傳刊物可以相比。儲安平終於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遂以無比洋溢的熱情在《平明》上鼓吹抗戰。1938年7月7日是抗戰爆發一週年的紀念日，儲安平發表了長文《一年》。他高聲歌頌七七抗戰道：「呵！七七！這一個偉大神聖的日子，這一個偉大神聖的日子。我們再也忘不掉，我們永遠忘不掉，我們永遠忘不掉這一天，我們後世千千萬萬的子子孫孫也永遠忘不了這一天。這一天是我們歷史上遭遇空前的苦難的一個開始，這一天是我們大中華民族又復照耀出他無比的光彩的一個起點。」[12] 七七是中國的受難日，為什麼要歌頌？因為近代中國一直忍氣吞聲，飽受東西方列強的欺辱，歷史悠久的天朝上國，變成列強的次殖民地，在世界上已經降到末等國家的地位。而這次，東方的睡獅終於驚醒了，怒吼了起來，拿起了武器開始抵抗侵略者。抗戰的勝敗是一回事，但這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行動，這種誓死抵抗、永不屈服的精神，向世界昭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由於這次抵抗，中國贏得了世界友邦的交口稱讚。由於這次抵抗所顯示出的不屈精神，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甚至有成為強國的希望。當年儲安平採訪柏林奧運，目睹德國的強盛，發出了「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的呼聲，那麼，這次抵抗是否可以視為一次中國揚眉吐氣、浴火重生的解放機會？

儲安平甚至不希望抗戰很快結束。他看到，雖然戰爭造成生

10　程滄波：《平明》，《中央日報·平明》1938年6月20日。
11　儲安平：《我們的編輯態度》，《中央日報·平明》1938年6月20日。
12　儲安平：《一年》，《中央日報·平明》1938年7月7日。

靈塗炭，滿目瘡痍，大半河山淪於敵手，但抗戰之於中國並不完全是創痛。首先，抗戰使中國完成了十年未完成的國民教育工作。如儲安平以前批評的，中國人素來沒有國家觀念，但這次亡國滅種的危機，這場全民抗戰，使全體民眾接受了一次絕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國家觀念已經非常普遍。其次，沿海和內地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差異極大，然而這次抗戰引發的工廠內遷，使偏遠大後方的經濟有了一次再造的機會。全國的教育機構都播遷到後方，使西部各省的文化，一年之內走完了過去二十年的路程。第三，抗戰前全國政令軍令不統一，中央政府的權力難以延伸到西部各省，但這次抗戰得到地方實力派的諒解，各省軍隊都集中到中央的旗幟之下，奇跡般解決了自辛亥以來的政權和軍權分裂的問題。由此，儲安平甚至覺得，中華民族的所經歷的抗戰苦痛還很短，苦痛越短，越容易遺忘，抗戰之於中國的正面作用就越不明顯。他希望戰事延長，使每一個國民都真正感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讓國家民族觀念在他們心中徹底植根，讓後方的工商業和文化徹底發達，讓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西部暢行無阻成為常態。[13] 總之，儲安平念念不忘的是，通過抗戰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中國，其思考的落腳點，始終和民族國家的富強有關。

上前線

1938年8月，《中央日報》決定再遷重慶。儲安平與端木露西一起跟隨報社同人乘坐輪船從長沙啟程趕往重慶。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在船艙內，艙門外和窗戶外都擠滿了逃難的人群。不時有繈褓中的嬰兒啼哭，讓端木露西不由得熱淚湧上眼眶，船上的局促也使端木露西感覺異常煩躁。[14] 相比之下，儲安平第一次在這

13　儲安平：《我們歡迎戰事延長》，《中央日報·藝文》1938年11月27日。

14　端木露西：《江行雜緒》，《中央日報》1938年8月26日。

條「九千九百九十九里」的長江上航行，卻顯得情緒樂觀。他看到了長江的遼遠廣闊，波濤雄壯，足以與世界上一切大江大河媲美，他想到了長江對中國的航運和農業的貢獻，對江南億萬民眾的滋養，不由得發出感歎：「長江，這條同負世界盛名的大河，它的離奇險峻，它一路的詩情畫意，世界上有哪條河流能夠比他得上？呵！這條萬里大江，橫流在亞洲的中部，幾萬萬劬苦耐勞、忠勤樸實的善良人民，生活在它的流潤撫拂之中。當我們讀着它的中文名字，我們感覺它的偉大雄壯，當我們讀着它的英文名字，又會在感情中泛起無數美麗的意緒。」[15] 由長江的壯美聯想到長江下游已淪於敵手，儲安平情不自禁地發出豪言壯語：「中華子孫將以赤血頭顱來爭取我們國家的獨立，我們民族的生存。在今日我們要以鮮血灑遍這大江南北，我們不要予以長江以辱蔑，我們要給長江以光榮！」[16]

將鮮血灑遍大江南北，讓人想起了九一八之後他意欲北上抗日，發出的用鮮血澆退敵人氣焰的豪言壯語。當時他想抗日卻遭到政府阻撓，這次政府全力支持抗戰，他有了真正的機會，決定再次以個人行動支持抗戰。他希望親自參加抗戰，也是因為回國之後，看到國內的情形和想像的仍有一段差距，仍有一些人一如既往的散漫，缺乏國家觀念。知識分子亦然，其抗戰言論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儲安平一直鄙視知識分子的空談誤國，反復呼籲國人要像英人那樣行重於言。[17] 他覺得有必要用實際行動來踐行自己的言論。當時，一百多萬國軍在蔣介石和陳誠的領導下防守武漢，與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展開殊死鏖戰。這場大武漢保衛戰，橫跨河南、安徽、江西及湖北四省，長達四個多月，是抗戰期間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場戰

15　儲安平：《江上》，《新評論》1940年第10期。
16　儲安平：《大江行》，《中央日報》1938年8月22–24日。
17　儲安平：《事在人為，行重於言：歸國雜感之一》，《中央日報》1938年7月10日。

役。這是一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鬥，剛剛到達重慶的儲安平，馬上主動提出代表《中央日報》去前線採訪戰爭情況。

從理性上講，端木露西同意儲安平作為一個男子，有上前線為祖國貢獻力量的義務。作為一個曾經在淞滬抗戰的後方蘇州參加過救護服務團的女性，她甚至也希望能夠上前線，經受那種血與火的洗禮。只是她有孕在身，產期臨近，已經到了行動不便的地步，無法如男子那樣自由行動。[18] 不過，從情感上講，她又不希望儲安平走。這是一次冒險行動，如果儲安平一去不回怎麼辦？而且當時重慶經常遭受敵機轟炸，不時傳來朋友在空襲中喪生的消息，如果儲安平自己離開，露西及孩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但是，儲安平並沒有表現出一點留戀，也沒有一點惜別之感，反而為這次可以真正自由飛翔，到前線一展身手而興奮。端木露西這樣描寫儲安平急於離開的場景：

> 你裝得沒有一點惜別的樣子。我知道這是一個男子的驕傲。而我也拿出勇氣，忍着心底的淒涼安排着你所交給我的事務。我安慰你、鼓勵你，希望你愉快的出去，勝利的回來。當你提着那只小皮箱很匆忙的走出大門時，我喘着氣跟在你後面，我以為你完全不知道有一個人跟在你後面的，我那時真佩服一個男子的忍心，我突然情感湧上來了，所以你返身對我說要我回進去，我幾乎像一個孩子那樣，哇的哭了出來。」儲安平走後，她形容：「我一個人慢慢的回進房裏以後，我忽然討厭這間房子，它太空洞了，燈光又是那麼慘澹的，整個的房間就是一個冰壕，因為沒有了你，沒有了你在一起，溫暖從我心中躲藏起來了。[19]

18　儲望瑞的出生時間是1938年11月27日。儲望瑞女士信，墨爾本，2013年6月16日。

19　端木露西：《送×去前線》，《中央日報·星期增刊》1938年10月9日。

端木露西在文章中似乎表達了對儲安平的想念之情和支持之意，但更多顯然是對他的不滿。此時她應該想到了1931年儲安平參加援馬團路過蘇州，對她說愛情不是一個男子的全部的話。兩個場景是何等的相似，她心底的失望與淒涼可想而知。

時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主管《中央日報》宣傳的周佛海在日記中留下了1938年9月5日接見儲安平的記錄，似是他去向周請示前線宣傳工作。[20] 由此可知，儲安平離開重慶的時間約為9月中旬前後。在武漢，他給《中央日報》發回了關於戰地前線的第一手報導。儲安平看到的是一個固若金湯的武漢，一片軍民協力抗戰的景象。高級長官兢兢業業，情緒高昂：「衛戍武漢的上層官長，精神也表現得極其旺盛。他們的戰鬥情緒極高，並且都下了極堅毅的決心。陳辭修將軍說，我們的生路只有向東衝！他這話說得真悲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退了，所以我們必須以決死之心保衛武漢。」他還看到民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動員：「武漢民眾能參加戰時工作的，約有五萬人左右。這裏面分若干組織，一種為防護團，擔任防空事宜，約有九千餘人。另有義勇警察，約有三千餘人。最近武漢衛戍司令部政治部又成立了戰時工作隊總隊部，將全市民眾除了參加上述已成組織之外，分職業的與一般市民兩種，嚴為分配，希望每一個武漢市民，都能參加保衛武漢的工作。」[21] 儲安平過去一直痛心中國人民缺乏國家和「公」的觀念，而這次武漢的觀感，實在讓他大大欣慰！

程滄波事件

1938年冬，武漢戰役結束，國軍撤守，儲安平回到重慶繼續為《中央日報》服務。他開始擔任《中央日報》國際方面文章的

20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165頁。
21　安平：《金湯一般的武漢》《戰地的文化服務》，《中央日報》1938年10月3日。

撰述，寫了《德國與東南歐》《德國的泥腳》等大量分析國際局勢的長文。同時，他還負擔了一些政治新聞的採寫工作。1939年2月，他旁聽了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肯定了民主人士對政府的擁護：「抗戰發動以來，人民都一致熱忱擁護政府，且覺悟非熱忱擁護政府不可。前者出於良心，後者由於環境，既有客觀的因素，又有主觀的熱情。」他又肯定政府的開誠佈公，禮賢下士的態度：「政府領袖，有極重要的報告，報告於參政會。」他認為，相對於英法的民主議會，帶有中國特色的參政會顯然更勝一籌：「至於會場秩序儀容的嚴肅整齊，原是參政會的一個特點，比英法的議會高強，比英國下院開會之雜亂叫囂，身為首相之人，且亦腳架得比頭高者，又自不同。」[22]

然而，就在他埋頭寫稿編報採訪，一頭紮進鼓吹抗戰的事業之時，沒想到家中發生了內亂，妻子端木露西與《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有染。這段故事在當年的重慶轟動一時，但由於目前存世的文字資料太少，各方又眾說紛紜，已極難重建史實。現在能看到的一些記錄，普遍都有對端木露西污名化的傾向。比如《中央日報》編輯劉光炎在《梅隱雜文》中說：「《中央日報》的副刊，也花樣百出，最鬧猛的是女記者端木露西鬧桃色新聞，把報館幾乎搞垮了。這位女記者非常風騷，她其實很喜歡我，曾百端挑逗，喊我是：可憐的孩子！我因心有專屬，絕不動心，她終於把我沒有辦法，搖搖頭去了。」[23] 劉光炎是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四十年代末任《中央週刊》主編，組織刊發了許多攻擊儲安平與《觀察》的文章，對儲安平偏見極大。[24] 其晚年如此記述端木露西，可能帶有詆毀的成份，需要謹慎對待。當時遠在淪陷

22　安平：《記參政會》，《中央日報》1939年2月22日。

23　范泓：《歷史的複盤：百年紛爭人與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219頁。

24　劉三：《觀察「觀察」記者》，《中央週刊》1947年第9卷第51期；小鳳：《儲安平的「噱頭」》，《中央週刊》第10卷第31、32期合刊。

區的《蘇州新報》則道聽塗說地講，儲安平留端木露西一人在英國，程滄波抵達意大利時，露西斷糧，向其索取資助費用，二人烈女曠夫，在意大利同居，隨後前往英國，竟孕育一子，並攜帶其私生子返國，公然在雲南同居。[25] 這種說法非但時間地點錯誤，更是小報文人不負責任的隨意污蔑。

相比之下，時任行政院參事、與儲安平夫婦有直接來往的陳克文在1939年8月29日的記載更為嚴肅：「郭斌佳(光華同學)告訴我，《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愛上了該報副刊編輯端木露茜(應為露西)。露茜的丈夫儲安平也是該報一個編輯，因此要離開該報，不再幹了。」[26] 低儲安平一級的光華同學伍丹戈在1939年9月4日給業師呂思勉的信中講道：「今日訪問友人，知儲安平已辭去中央日報總編輯職務。據說其辭職原因，為程滄波勾引其妻，種種醜狀，不堪忍受，遂憤而辭職。但職雖辭而程勾引如故，故聞不久將來與程破面，不知究竟如何？但此笑話則在渝市新聞界中傳播甚廣，想亦非完全揑造，世道人心，險惡無比，無怪衛道君子痛心疾首也。」[27] 右派報人陸鏗回憶道：「儲安平在程領導下任《中央日報》主任，其妻女作家端木露西，不僅人長得漂亮，文章也寫得好，程為之動心，乃趁儲安平赴英學習機會，窮追而得手。」[28] 左派報人惲逸群以此事評論道：「程(滄波)私德極壞，其屬員眷屬之年輕貌美者，輒多方勾引，不理人口。」[29] 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中亦說：「有錢有勢的社長

25　《程滄波姦佔社員妻》，《蘇州新報》1940年9月21日。

26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474頁。

27　張耕華：《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中冊，自印本，2011年，第610頁。筆者手中的自印本由作者贈送，目前已經出版，可能出於節省篇幅考慮，此信涉及儲安平的文字已被刪去，參見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4–565頁。

28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1997年，第92頁。

29　惲逸群：《蔣黨真相：三十年見聞雜記之一》，東北書店，1948年，第46頁。

對他的妻子仍有覬覦之心。」由此似乎可以推斷，在這場桃色事件中，主要是程滄波主動糾纏，端木露西似乎處於劣勢。

如前文所言，儲安平與端木露西對程滄波一直抱信任的態度。儲安平出國，程滄波將露西由《婦女周刊》的兼職編輯提拔為正式的記者，免去儲安平的後顧之憂，使儲安平心存感激。但儲安平沒有意識到，此時程滄波應該即已對露西產生覬覦之心。儲安平在國外時，程滄波或許也曾私下對孤身一人的露西表露過這種傾向。其後端木露西出國，也未必沒有希望擺脫這種糾纏的意思。1938年初，露西歸來後三個多月都滯留在香港。程滄波因公去歐洲，亦於1938年4月離英返國，在香港短暫停留，5月13日才由香港飛回長沙。他在香港短暫停留，或許目的之一也是會見端木露西。但是，程滄波可能一直沒有找到機會乘虛而入。

我們從端木露西於1938年10月公開發表的《送×去前線》一文中看到，端木露西此時仍是愛儲安平的。她說：「千萬頁白紙都寫不盡我現在的感情，我對你的相思。×，當你在火線上休息下來的時候，別忘了這世界上有一個人將她的心念永遠飛環在你的左右，她每一個時辰都在熱情地期求着你的音訊。而且，×，常常鼓勵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常常幫助我，因為我原不是無用的人。有了你的鼓勵，你的幫助，我會好好的生活下去，因為你是我生命的源泉。」[30]這樣公開的示愛，以及奔放地表達男女之情，對劉光炎這種虛偽保守的文人衛道士而言，不免是一種「作風不正」。而她在這篇文字中透露出的孤寂資訊，也可能啟發了程滄波，讓其有了乘虛而入的機會。抗戰時代的大後方，儲安平和端木露西一家的生活完全仰仗《中央日報》。在一個強勢社長的面前，或許拒絕就意味着要付出全家失業的慘痛代價。何況，儲安平獨自去武漢，毅然決然丟下露西，為了抗戰事業拼

30　端木露西：《送×去前線》，《中央日報·星期增刊》1938年10月9日。

命地工作，本身又無意浪漫，不作無用之娛樂和交際，更給了程滄波可乘之機。

不過，此事處於地下狀態，儲安平一直蒙在鼓裏，到1939年夏秋之際才揭發出來。似乎儲安平最初不知道此事到底有多嚴重，未因此事影響和端木露西的關係。翻檢《陳克文日記》可知，1939年9月19日，陳克文和陳之邁、郭斌佳做東，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受邀來寓晚餐。不過，到10月9日，陳克文、陳之邁、郭斌佳、儲安平等在張平群家聚餐時，已不見端木露西出席。12月3日，儲安平獨自到陳克文家中去談話。1940年2月13日，郭斌佳做東，宴請陳克文和端木露西等，未見儲安平出席。1940年3月18日，儲安平單獨宴請陳克文等人。[31] 由此可見，面對同一撥人，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已經分開行動。儲安平似乎意識到，這是一段很嚴重的「風流豔史」。

儲安平最愛惜名節，此時名譽受損，痛苦不能自已，並視之為奇恥大辱。尤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全民抗戰的國難背景下，更不能接受。儲安平決定與程滄波決裂。但是面對一個具有絕對權勢的社長，他如何才能扳倒程滄波？他善於宣傳，會寫文章，但這種家醜又豈是能大肆外揚的？他只有向吳稚暉求助。據說，吳稚暉將此事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召去程滄波一頓訓斥，程滄波被迫以辭職告終。實際上，程滄波並未因此事受到懲處。時任中宣部部長王世杰在1940年8月的日記中寫道：「《中央日報》程滄波欲辭職，改就他職。予甚覺覓人不易，惟滄波亦有弱點，如能覓得適當之人，擬允其解除社長職。」[32] 這說明，風波已過一年，程滄波仍安然在任。反而是其不願擔任社長，反復主動請辭。後來程滄波辭職，更被于右任調到監察院擔任秘書長，更未

31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上冊，第483、492、513、552、566頁。

32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287頁。

受到懲處。這樣的結果實在讓儲安平難以接受。足以相信，此事使儲安平對國民黨官員的官官相護、裙帶作風、恃強凌弱產生嚴重不滿。有傳說儲安平後來辦《觀察》，很大一個原因是妻子被程滄波奪佔，從而忌恨國民黨。此種說法當然看輕了儲安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希望用言論影響中國的努力。但是，當儲安平咒罵國民黨「一團爛污」的時候，誰又能保證他的心中沒有當年這件事的陰影？

中央政治學校

儲安平沒有選擇離婚，而是最終忍下這口氣，原諒了端木露西。這也說明，此事程滄波當負有更多的責任。但是，重慶新聞界已經沸沸揚揚，端木露西被污名化，似乎陪都已經不是久留之地。大概在1940年9月，她獨自離開陪都，到內遷成都的光華大學成都分部擔任附中英語教師。證據是一則出自新文學史料專家陳夢熊先生之手的《端木露西生平小傳》提到：「回國後，初由長沙轉重慶，任《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編輯和《婦女周刊》主編，兼任記者。一年餘轉去成都光華附中任英語教師，兩年後又轉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附中英語教師。」[33] 一份中共上海教育局任命端木露西的檔案資料顯示，她「曾任光華附中、交通部扶輪中學、國立師範學院附中、市立敬業中學教員十一年(1940–1951)。」[34] 筆者就此段經歷訪談儲安平幼子儲望華時，他雖然不知此事，卻說他岳母曾說自己是端木露西在光華附中的學生。[35] 由此更可確認這段時間端木露西的去向。當然，根據《陳克文日記》的記載，端木露西去成都也並非是躲避，而是求職，去找出路。他評

33 徐乃翔編：《中國現代文學詞典·散文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4頁。

34 《關於送校長端木新民履歷的報告》，上海市教育局檔案藏，檔號B1051276132。

35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論道：「露茜小姐把自己親生的三個小孩子給別的人養，自己卻離開丈夫，找生活去，也不是普通的女性可以常見的。」[36]

儲安平亦無顏面在《中央日報》繼續工作。當年秋，經中宣部次長兼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張道藩的介紹，儲安平進入位於重慶南溫泉的中央政治學校工作。中央政治學校創辦於1927年，因國民黨深感缺乏黨務幹部人才而創。中央政治學校由蔣介石擔任校長，初為短期幹部訓練班性質，1931年設大學部，後逐漸發展出行政、法律、財政、經濟、外交、教育、新聞等系，並為管理蒙藏及培養土地人才，建有蒙藏學校和地政學院等。[37] 1935年又設研究部，聘請駐院研究員，以研究實際的政治、經濟、財政、法律、教育社會諸問題。[38] 政校的師資隊伍頗為雄厚，抗戰期間，王世杰、薩孟武、王贛愚、樓桐蓀、馬寅初等均任教於此，孟憲承、言心哲、嚴恩椿、楊蔭溥、端木愷等教授則是儲安平在光華或《中央日報》時期的師友。[39]

據戴晴說，儲安平在政治學校擔任研究部的研究員，但目前從該院研究員的名單上並未發現儲安平之名。而且，這些研究員多半是名不見經傳的角色，基本成為了歷史上的失蹤者。資料顯示，實際儲安平擔任的是新聞專修班甲組的教師，和俞頌華合開「新聞寫作課」。[40] 有學生回憶道：「政校於1939年秋創辦了新聞專修班，分甲乙兩組。甲組招收國民黨新聞機構的編輯、記者和黨務工作人員，修業半年。乙組招考大學畢業或肄業的學生。所上的課程現在能想起來的有新文學概論、新聞寫作、文學與寫作、採訪學、廣告學、報業經營與管理、報紙與心理學等。任課

36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上冊，第654頁。

37　《十年紀要》，《中央政治學校十週年紀念刊》，中央政治學校，1937年，無頁碼。

38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概況》，中央政治學校，1937年，第1頁。

39　《中央政治學校概況》，中央政治學校，1942年，第59頁。

40　《入學訓練完畢舉行檢閱：各專修班正式上課》，《中央政治學校校刊》1939年第155期。

的老師現在想得起來的有俞頌華先生、儲安平先生、黃天鵬先生、趙敏恒先生。」[41]

實際上，儲安平對這種為期一年半載的短期訓練班並不滿意。在他看來，這樣的班，甚至包括大學裏的新聞系，培養出的只是一種平庸的「新聞工作者」，而非卓越的輿論領袖。儲安平對新聞輿論在一個國家中的地位非常看重，他認為民主國家中，國家政策經常被新聞輿論所引導，一個健全進步的國家也需要新聞輿論來督促，這就對新聞從業者提出極高的要求，要求他們有豐富的知識，高於常人的見識和優秀的組織才能。除此之外，還需要有獨立的精神、客觀的立場和公平的態度，不為金錢所動，不向權力屈服。當下的教育不但無法培養這樣的人才，報界待遇低的現狀亦使真正的優秀分子不易投身。[42] 這樣的觀點決定了儲安平在教育崗位上，必定會不斷向學生灌輸自己的新聞理念。當然，這種理念在學生當中起到多大影響，必是因人而異，難有定論。

教師之外，他的另一個職務是《新評論》的編輯。《新評論》的創刊和「渝社」有關。「渝社」是中央政治學校的一批教授們組織的社團，由儲安平的好友周子亞主導，參加者有沈昌煥(光華同學)和陳紀瀅等。該社以學術討論為主，並未大量吸收社員，最初有一二十人，其後只剩六七人。該社曾以「未來中國的前途」為題展開了兩次討論。[43] 作為「渝社」的同人刊物，《新評論》依託於中央政治學校，於1940年1月創刊，由儲安平擔任編輯。

儘管儲安平已經離開《中央日報》，但從國家民族命運的大局出發，仍然主動延續了一個戰爭鼓吹者的身份。就如他為創刊號撰寫的發刊詞《強國的開端》一文，其思路與《我們歡迎戰事

41　葛思恩：《記早期的政治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資料》1989年第45輯。
42　儲安平：《論報業》，《新經濟》1941年第5卷第3期。
43　謝泳：《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1–12頁。

延長》相同，都是希望這次對外戰爭能增進國民凝聚力，使中國從散漫走向統一，從衰弱走向富強。他再次高聲歌頌了民族主義：

> 民族主義在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時代，原已光芒四射，浸至今日，復達到了它最炫耀奪目的一段。我們看，今日世界上哪一片土地上有大同主義的影子？今日統治蘇聯的並非主張全世界革命的托洛斯基，而是以民族主義為範疇的斯大林。今日的世界就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界。我們已把我們的血肉智慧與靈魂砌成了一條新的民族的大城。我們先須愛我們的祖國，方能成為一個中國的國民。我們先須動盪我們的信念。三十個月前也許無人想像到我們今日有這樣一副莊嚴雄壯的局面，然而三十個月的奮勇戰鬥與刻苦建設，終使我們以及我們的友人敵人，了然中國民族潛力的渾厚。這一份渾厚的民族的潛力，非三十個月來磨礪之果，乃是五千年中華文化所孕育的結晶。我們全無疑問，中國要成強國，必須經此一戰，而戰爭的勝利，方是走向強國的一個開端。[44]

儘管經歷「程滄波事件」，他已經對國民黨官員的官官相護、裙帶作風、恃強凌弱產生嚴重不滿，但仍沒有受個人恩怨影響，出於抗戰建國的考慮，仍對領導抗戰的國民黨表示支持與肯定：「抗戰以後，中國國民黨以外的三個政黨，宣言擁護現政府及其政策，與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攜手合作。……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一個政府，現在全中國有志行的人民，無不擁護當今政府及其所施行的國策。他們不僅遵守政府的法令，並以全力及熱忱協助政府從事於各種變革與建設。」他津津樂道的例子是連小學生都「擁護蔣委員長」：「據傳漢口偽政府地方派

44　儲安平：《強國的開端》，《新評論》1940年第1卷第1期。

員在各小學訓練小學生。漢奸先問：『我們打倒誰』，囑咐小學生答：『打倒國民政府』。問：『我們擁護誰』，答：『擁護日本帝國』。訓練三月，預備歡迎某某敵酋，但到了那一天，指揮的人問：『我們打倒誰時』，小學生齊口同聲的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問擁護誰時，都答『擁護蔣委員長』。」[45]

當然，與其說儲安平支持一黨一派，不如說他支持在強有力政府領導下的中國統一。在他看來，歷史上沒有一黨可以萬世執政，但若某黨在位執政，便具有執行全國事務的權力。無論政府的性質如何，中央政府必須具有執行國家一切命令的最高權力，這樣才能集中力量領導抗戰建國，使中國成為一個政治上軌道的國家。由此，儲安平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增強這一個中央政權的向心力，消除一切對中央權力的離心作用」，這對中國的抗戰建國而言關係重大。

儲安平在這一時期的文章中，以抗戰為民族主義的原動力，以戰爭為實現建國的手段，以國民黨為領導中國復興的希望，其民族主義觀念比以前更加濃烈。此時儲安平的政論也更加成熟，逐漸顯露出一種宏大的氣象。他已初步具備了成為中國輿論領袖的實力。

45　儲安平：《論抗戰之影響》，《新評論》1940年第1卷第5期。

第八章　暫駐衡山湘水

在這幾個月中，他及他數以百計的同事，大都將整天的精力花費在日常的飲食瑣事之上，心情因局勢的動盪極不安定。然而在那種混亂、困頓、幾乎無所依歸的生活中，有時究不能不做一點較為正常的工作，以維持一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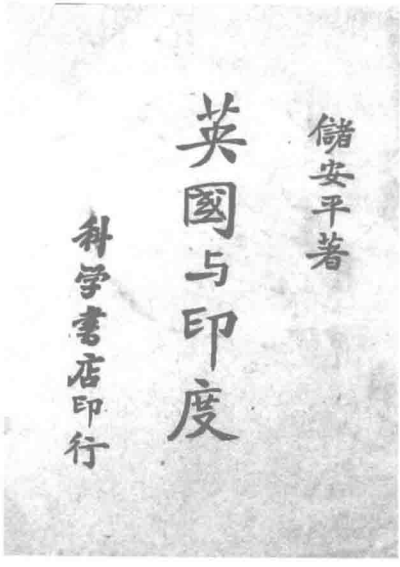
——英人法人中國人·自序，1944

國立師範學院

在中央政治學校期間，儲安平的宏大政論經常出現在學校系統下的《新評論》《新政治》等雜誌中。就雜誌規格而論，影響雖然不如《中央日報》大，但這些文章也延續了儲安平作為一個報人的生命。然而，政校卻非久留之地。據戴晴言，儲安平離開政校的原因是，1940年暑期政校續聘時，送來了國民黨特別黨員的申請書，只有入黨才能繼續任職。[1] 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章程》，只有「本校學生須為本黨忠實黨員」的規定，卻無教師和研究員必須為黨員的明文規定。[2] 然而，在抗戰期間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推廣教員入黨、學生入團的背景下，國民黨的中央黨校作此規定並不意外，此說當有其真實性。這種以政治干涉學術的蠻橫規定，註定會引起儲安平的強烈不滿。他一定會因拒絕加入國民黨而放棄教職。

1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39頁。

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章程》，《中央政治學校十週年紀念刊》，無頁碼。



《英國與印度》封面



儲安平在《力報》上的社論



袖珍書店廣告



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領取教育部補助的名印

而且，政校的官僚氣非常嚴重，黨派色彩濃厚。就如1938年在政校擔任賀麟助教的任繼愈回憶：「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學校，當官的多，沒有什麼學術空氣。這個學校有學生200人，職員200人，校內工人200人，上下等級分明。有一位高級職員，在食堂飯桌上大講某年某次，『委員長親自罵過我，罵的什麼話』，說者不以為恥，反引以為榮。更令人詫異的是，許多聽者不以此舉為恥，反露出某種豔羨之色。在中央政治學校，親眼見到國民黨上層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更生了一層反感。」[3]任繼愈尚且如此，政校的氛圍也必定為儲安平鄙視。

儲安平離開中央政治學校，不能忽視的原因還有程滄波的存在。程滄波此時恰好也在政校兼職。當時的新聞專修班分甲乙兩班，兩班的「評論作法」課程，主持者竟然都是程滄波。[4]這就意味着，到了中央政治學校，儲安平與程滄波仍是同事，甚至教的是同一撥學生。這個讓他恨之入骨的報社社長如影隨形，似夢魘一般揮之不去。程滄波當然不能離開，只能是儲安平再度出走。

二十年代，各高等師範學校紛紛升級為大學，導致中等教育人才缺乏、素質低下，到抗戰時這一問題更加嚴重。教育部為培養中等教育人才計，決定在後方建立一所獨立的師範學院。1938年，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光華大學副校長廖世承、光華大學原副校長、時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等人的籌劃下，「國立師範學院」在湖南中部商埠安化縣藍田鎮(今涟源市)成立，由廖世承擔任院長。國立師範學院以地主莊園李園為基地，在光明山一帶建起土樓房作為校舍。學院因係初建，設備儀器十分簡陋，生活條件艱苦，師生們白天上課要經常提防警報的騷擾，晚上睡在臨時搭建的板床

3　任繼愈：《念舊企新：任繼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79頁。
4　《入學訓練完畢舉行檢閱：各專修班正式上課》，《中央政治學校校刊》1939年第155期。

上，在油燈下學習。然而，由於廖世承豐富的辦學經驗和勤勉踏實的辦事精神，以及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這樣一所學校竟然在大後方偏僻的山中巍然屹立，弦歌不輟。

這是一所和光華大學有着深厚淵源的學校，廖世承廣泛動員光華舊部來國師任教。以教授而論，錢基博、汪梧封、孟憲承、任孟閑、周澂、錢鍾書、周長憲等曾是光華教師，張振鏞、馬厚文、胡昭聖、朱有瓛、薛熾濤、錢蘋等教職員則為光華學生。廖世承經常往來重慶求賢，遂向學生儲安平拋出了橄欖枝。對儲安平而言，去國師任教可謂利弊皆半。弊者在於，藍田鎮雖然水陸交通便利，但仍距主要城市較遠，文化事業不發達，這意味着可能暫時與新聞界無緣。利者在於，在戰亂年月，國立大學的專任教授是一個穩定的職業，足以使人衣食無憂。遠離重慶是非之地，也是徹底告別過去難堪往事的一個最佳方式。

1940年9月26日，一封廖世承的電報發到重慶南溫泉鶴林2號儲安平手中。電報中說：「請兄任『政治概論』及『中國政府』課程，聘書航寄，務盼早臨。」10月9日，廖世承再次發電：「兄任課照舊。」24日，廖世承三度發電：「開課在即，請示行期。」[5] 11月中旬，儲安平終於到達國立師範學院。11月18日，學院為儲安平、朱友瓛和另一位新聘教師陳定謨舉行了歡迎會。不久，國師將儲安平等新教員的名單上報教育部，以申請教授資格。教育部回文批覆，儲安平、朱友瓛、劉佛年等七人只准給副教授資格。[6] 國師的薪資待遇差距極大，共20餘級，最高的是校長廖世承，月薪550元，最低的是一般書記員，工資僅22元。[7] 其

5　傅宏星：《給儲安平的四封電文及其文獻價值》，《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6　《教育部令函國立師範學院發給該院教員汪西林等四十人證書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檔號五-2759。

7　《國立師範學院三十年度十月份至十二月份補發教職員生活補助費印領名冊》，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檔號五-4437。

中副教授分3級，240–280元，教授分6級，300–400元。[8]至於儲安平的工資，以1941年1–3月為例，分別為320、360、380元，這說明雖然其身份是副教授，但國師給予教授待遇。1944年7月10日，儲安平成為正教授。[9]

國立師範學院為培養中學教師而建，所設皆為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理化、生物、教育、體育等基礎學科。儲安平任教的公民訓育系為建校初的七系之一，大約相當於政治系、教育系和法律系的初步組合，卻又不完全相同。[10]公民訓育系的課程設置相當龐雜，據系主任袁哲總結，總共包含四類：一、普通基本科目：黨義、國文、外國文、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哲學概論、本國文化史、西洋文化史。二、教育基本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心理、中等教育、普通教學法。三、分系專門科目：政治學、法學通論、總理學說、倫理學、中國政府、中國政治及倫理思想史、青年心理、社會心理學、心理衛生、公民教育、訓育原理與實施、教育哲學、學校衛生與體育、民權行使與實習、升學及就業指導、畢業論文。四、專業訓練科目：公民科教材及教法研究、教學實習，總學分為155。公訓系的目的是培養中等學校的訓育人員和公民課教師，但中小學公民課的每週課時太少，要求教師兼任其他課程，因此公民訓育系畢業生還必須充分學習國文、英文或政治、法律或教育方面的知識，以備將來之需。[11]儲安平的專業是政治學，公訓系政治學方面的課程由儲安平擔任。

從現有的記錄看，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初期，相對較好地融入到國師的教學事務當中。他受邀參加公訓系的系務會議，

8　孔春輝：《以師為本：國立師範學院的歷史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164–166頁。

9　《國立師範學院教員登記表》，長沙，湖南省檔案館藏，國立師範學院檔案，檔號6112243。

10　《國立師範學院概況》，國立師範學院，1947年，第9頁。

11　袁公為：《本院公民訓育學系選修科目分組意見書》，《國立師範學院旬刊》1940年第27期。

並擔任了公訓系導師的職務。1940年和1942年，他擔任校刊的編輯委員會委員、課外作業指導委員會委員。1943年，擔任建築委員會委員、三民主義學術研究會指導委員。當然，這些所謂的委員可能未必都是實職。儲安平經常受邀在學院演講。如1941年2月10日，儲安平演講《英國政治》，聽眾師生五百餘人，他主要講了英國人公允、守秩序、重理智等種種美德。[12] 據端木露西回憶：「連走廊都坐得滿滿的，中間不曉得要拍多少次掌。」[13] 又有學生記錄，儲安平「身材魁偉，瀟灑豪邁，主講《各國政府》，縱橫捭闔，旁若無人，其演說才華，令人傾倒。」[14] 由此可見儲安平在學校受歡迎的程度。

儲安平僅被教育部評為副教授，應該與其只有留學經歷但無學位有關，也因為他沒有學術著作。此時他意識到，作為國立大學的教授，應該在報章文字之外有所著述。1943年，他在桂林科學書店出版了《英國與印度(1600–1943)》，在國立師範學院以小冊子的形式印刷了《行政院與英國內閣之權責比較》。

《英國與印度》由他在國師的一篇演講稿鋪展而成，講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征服、統治和衰落，以及19世紀末至今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他對印度的獨立前景進行預測，認為印度終將擺脫英國獲得獨立，但至少在二十年以內難以實現。因為無論在商業還是軍事上，印度之於英國都有不容替代的重要性，英國絕對不會輕易放棄這顆「皇冠上的寶石」。從外交上看，美蘇中在戰後都無暇或無力給予印度獨立運動援助。從印度本身看，仍然是仇英衝動居多，尚不具備濃烈的民族觀念。他更不相信甘地消極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可以獲得獨立，因為「武力之為復國

12　王雨霖：《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書屋》2006年第12期。

13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39頁。

14　伍大希：《七十年家與國：伍大希演講實錄》，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9頁。

的主要憑藉」，「單單只有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而無槍、炮、彈藥、汽車、汽油、飛機、火車等集一切科學方法的組織與訓練」，無法將敵人逐出國境。[15] 印度於1947年獲得獨立，印證了儲安平的預測錯誤。但從此書中可見他對英國史的深入瞭解，亦可見他治學的特點，那就是研究歷史的現實關懷，着眼點始終放在當代，不做脱離現實的學術研究。

《行政院與英國內閣之權責比較》是一本只有34頁的小冊子，寫於1943年2月。該書簡要比較了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英國內閣的異同。他認為，中國行政院與英國內閣在精神上相似，表現為：(1) 國家元首虛擬，不負政治責任；(2) 行政院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內閣對國會負責；(3) 行政院院長與首相的權力相似。但是，兩者精神相似卻實質相異：(1) 行政院完全服從於國民黨，內閣與國會是平等關係；(2) 行政院權力小，僅有行政權，英國內閣非但擁有絕對的行政權，還兼有一部分司法和立法權力；(3) 即使是行政權，行政院亦比內閣小。中國的行政院在人事、外交、軍事、預算方面都無決定性的權力，英國內閣中首相則對內政外交具有絕對權力。之所以如此，因為中國是一個黨治國家，一切內政外交莫不出自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以黨的決議為準，行政院不過是一個聽命辦事的機構。正如儲安平評論道：「中央政治委員會是黨的系統裏的一個機關部，但它並不過問黨的事務，它所過問的是政府的事務，但它又不是政府系統裏的任何一部分。它成為黨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及連鎖，在地位上及作用上，都非常微妙。」[16]

由於儲安平不在政府中任職，他的觀察很可能未必絕對準確。在他看來，行政院只是一個執行機關，真正掌握政治實權的

15　儲安平：《英國與印度(1600–1943)》，科學書店，1943年，第127–154頁。

16　儲安平：《行政院與英國內閣之權責比較》，國立師範學院，1943年。原文另見儲安平：《中國行政院與英國內閣比較研究》，《新評論》1943年第9卷第2期。

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然而，今天的史學界一般認為，由於蔣介石獨攬大權，中政會雖是法理上的最高政治指導機關，但其職能和地位卻很虛，並無多少實權。與其說行政院一切對黨負責，不如說對蔣個人負責。而且，從各種檔案、報刊、日記、回憶錄中可知，行政院承擔着國家從上到下的一切大事審議，職責極其繁重，決非橡皮圖章，各部部長更是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儲安平過份注重「以黨治國」的一面，卻沒有看到黨治之下行政運作的實際。不過，從這本小冊子中可以看出，儲安平開始用隱晦的觀點表達了對中國黨政不分、一黨專政現狀的不滿。這是他在抗戰時期從擁護政府鼓吹抗戰到批評政府的一個重要轉折。

國立師範學院的同事多為光華舊人，按理說儲安平對學校應該大體滿意，但也有很多不滿之處。除了身在偏僻之地，交通阻塞，無法繼續從事鼓吹輿論的立言工作，最讓他不滿的應屬該院濃厚的黨化教育色彩。抗戰期間，國民黨對教育的滲透達到頂峰。尤其在1938年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部長後，更是利用戰時各大學急需中央資助的軟肋，要求大學普遍設置黨團組織，在課程設置、教員聘用、學生訓育等方面對各校進行全方位的控制。[17]國立師範學院既是教育部直接創設，且由CC骨幹潘公展籌建，就意味着它必將成為黨化教育的重鎮。儘管廖世承當年主政光華時，對胡適、羅隆基、王造時、潘光旦等教授在校內外批評黨國的言論並不干涉，但此時的他再無當年的包容和氣度，只以辦好教育為目的，逐步蛻變成為一個保守的官僚型學者。

錢鍾書在《圍城》中虛構了一所知識騙子橫行、教授勾心鬥角、教學一塌糊塗的「三閭大學」，該大學的原型正是國立師範學院。(主人公方鴻漸留學卻沒有學位被降為副教授，獨身的趙辛楣是校長高松年的舊學生，在校教政治學，兩人的經歷都有儲安

17 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106–120頁。

平的影子。)從當時學生的回憶看，國師的氣氛也是相當恐怖而壓抑的。就如儲安平所在的公訓系：

> 第一學年全校學生的必修科目中有一門黨義，包括的教材很廣，有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實業計劃、國民黨歷屆宣言、唯生論、民生史觀、國民黨史、抗戰建國綱領十大類。黨義教授由公民訓育系的主任兼(袁哲)，這位主任過去是上海市政府的中等教育專員，抗戰後做過國民黨戰幹團的政治教官。上第一課時，他對全校的同學說，為什麼師範學院的學生都要上黨義課呢？因為你們過去只學得片段的黨義知識，將來你們出去都是為人師表，所以必須堅定對於本黨的信仰。他平時談話，總離不開本黨二字(這也是國師的院長、教授們講演、行文的作風)。公民訓育系，這恐怕是中國大學教育中的創舉，目的在培養中等學校的訓育主任和公民教員。這位本黨主任經常愛找學生個別談話，有一次將七個學生全部都找去，很鄭重地告訴他們，將來中學校的訓育主任和公民教師必須是本黨黨員，於是單刀直入地要他們集體入黨。[18]

國立師範學院黨部直屬於中央黨部，又受湖南省黨部的重點監視。與儲安平同時來校並任教於公民訓育系的國民黨員陳定謨，因傾向自由主義，在課堂上指斥國民黨徵收黨費是苛捐雜稅並執意拒交黨費，在課下支持學生組織獨立的劇團與國民黨、三青團控制的官方劇團對壘，國師黨部書記袁哲多次勸說無效，湖南省黨部遂以「言論乖謬、違反黨紀」為罪名秘密上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要求對陳定謨予以嚴辦。中央組織部為此專程命便衣秘密來校調查陳定謨的言行。[19]

18　張昂：《國立師範學院的教育與學生》，《中國青年》1940年第2卷第5期。

19　《湖南國立師範學院教授陳定謨言行乖謬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一般檔案，檔號446.157。

儲安平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其不滿顯而易見。他日後曾向他人抱怨，說國立師範學院「是一所國民黨實施黨化教育的重點學院，空氣異常沉悶。」[20] 在這個沉悶的學府中，儲安平並不如意。他從國立師範學院獲得的朋友資源似乎也比較有限。從《觀察》雜誌封面的撰稿人來看，只有教育系主任高覺敷、英文系主任錢鍾書、中文系教授吳世昌日後名列其中。據公訓系主任袁哲的哲嗣袁道之言，儲安平與袁哲此時相識，而且終生成為摯友。山河變色前，袁哲本擬前往台灣大學任教，受安平勸阻而未走。[21] 但是，根據前面所提及的袁哲的情況，儲安平是否真能與他成為摯友，實在有很大疑問。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意外收穫了一個學生，那就是來自四川簡陽的雷柏齡。雷柏齡原就讀於國立湖南大學，1938年轉入國師史地系一年級，是校中的活躍分子，曾創辦民刊《新星》，排演曹禺的話劇《雷雨》。他受儲安平的魅力和人格影響，在校積極配合儲安平的講學和活動。[22] 後來儲安平主辦《觀察》，雷柏齡成為左膀右臂，負責雜誌的發行事務。建國後，性情敦厚的雷柏齡一度在儲安平身邊，對其子女多有照顧，如今儲的子女對其仍心存感念。[23]

袖珍書店

1941年初，任教於成都光華附中的端木露西來到藍田與儲安平相聚。從現存的聘書可知，她被聘為國立師範學院附中兼職英文教員，聘用時間是1941年1月–7月，每週授課五小時，每月薪

20 王西彥：《窗口朦朧發白：鄉土·歲月·追尋之十六》，《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21 袁道之：《家父袁哲與儲安平》，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d0730102eqdk.html。

22 金全忠：《白髮難忘師友情》，孔春暉編：《師範弦歌：從藍田到嶽麓》，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5–216頁。

23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金40元。8月正式續聘，到1942年7月截止，每週授課10小時，每月薪金100元。[24] 這僅是儲安平300餘元教授薪資的三分之一。實際上，端木露西自視甚高。她雖然在文筆和思想上不如儲安平，但也做過《中央日報》數種副刊的記者、編輯，又有遊學的資歷，但她只能擔任初中的英語教師，為了每月這100元錢，需要不厭其煩地循循善誘，用三年時間教會學生從零基礎到可以寫一封通順的英文信。[25] 儲望華也說過，母親有擔任大學英語教師的強烈願望，但父親只同意她教授中學課程。[26] 儲安平的做法，既和他一貫對女性主內的定位有關，更主要的是害怕「程滄波事件」之類的事情再度發生。露西認為儲安平在此事上限制了她，對此十分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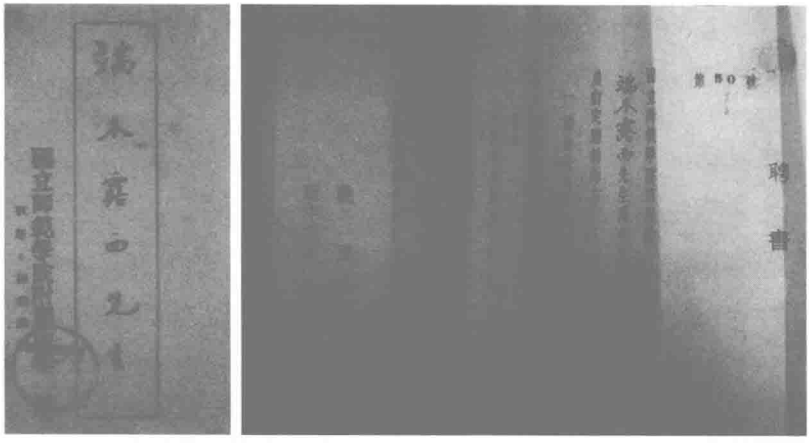
稍微愉快一點的是，端木露西在這期間出版了第一本書，名為《海外小箋》，收錄她發表在《中央日報》上給周長憲的六封講船上生活的信，以及五篇寫倫敦生活的小品文。[27]《海外小箋》是「袖珍綜合文庫」中的一種，出版方為「袖珍書店」，這個書店需要着重講述。該書店由儲安平和端木露西一起於1943年創辦，位置位於光明山國立師範學院附近。按理說，抗戰時期通貨膨脹嚴重，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物價如脫韁野馬般不可控制，大後方民眾普遍陷入經濟貧困的境地，儲安平為何有資金開辦書店？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教育部給予國立大學教授的待遇是非常優厚的，常有房膳津貼、研究學術圖書物品補助費等各種常規或臨時補貼，數額甚至超過薪金。以創辦袖珍書店的1943年為例，當年國立師範給予儲安平的報酬，除月薪380元之外，尚有全年生

24　國立師範學院附中端木露西聘書，上海江宏明先生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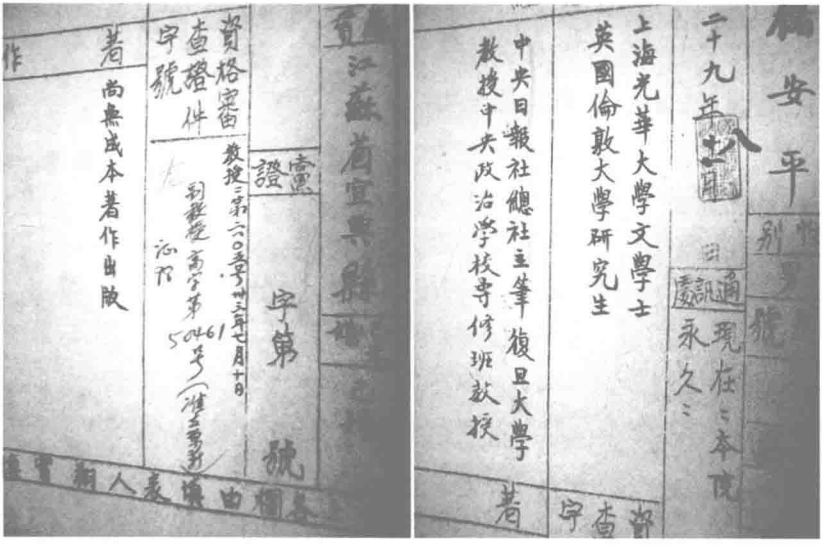
25　端木露西：《國師附中初一班三年來之英語教學》，《三年來的國師附中》，國立師範學院，1943年，第19–21頁。

26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27　端木露西：《海外小箋》，袖珍書店，1943年。



端木露西國立師範學院附中聘書



儲安平國立師範學院教師登記表

活補助費5110元，合計年收入近萬元之多！[28] 儲安平原本生活節儉，加之薪水優厚，在山溝中開一個小成本的書店並不算難。

儲安平創辦書店的宗旨在書店的廣告中可見一斑。他說：

> 一、戰時交通困難，新出報刊不易流通，青年學生缺少適當讀物，精神生活十分枯燥。我們想替青年解決這個困難。我們不僅希望供給青年讀物，並且希望替青年選擇讀物。我們只出好書，有益的書，或長學識，或廣見聞，或啟發思想，或撫慰身心。總之，我們的出書是非常嚴謹慎審的。
>
> 二、年來物價激漲，書價跟着上升。我們不僅要供給青年良好讀物，並且要使青年有能力購買讀物。因此……定價必須盡量的低，我們必須盡可能的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再三考慮之後，決定採用土報紙三十二開的小版本。我們的主要目的：小本書成本小，定價可以低，使大家都能購讀；小本書易於郵運，不致擱置，讀者亦可早日收到；我們的版本雖小，但每中頁容納七百二十八個字……凡此各端，無非都是我們要替讀者設想，想種種方法來減輕讀者的負擔。
>
> 三、最後我們尚有一言，我們都是文人，我們的目的是替社會做一點事情。我們的態度是嚴肅的、誠懇的、服務的。我們辦事絕對負責，我們接受讀者意見，我們盼望讀者合作。讀者諸君對於我們如有任何建議或批評，我們都是非常歡迎。[29]

希望通過辦出版來服務戰時社會，豐富大後方的文化生活，為青年提供思想食糧，體現出儲安平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從用紙、開本到定價，如此細微周到的考慮和安排，更加顯

28　《國立師範學院三十二年度教職員生活補助費計算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檔號五-4438(1)。

29　《袖珍書店廣告》，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袖珍書店，1943年，無頁碼。

示儲安平的細心和穩健的辦事能力。

袖珍書店出版的主要圖書是「袖珍綜合文庫」，分前後兩批，第一批有陳之邁《最近五十年之中國政治》、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吳稚暉《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謝貽徵《縱橫談歐洲》和端木露西的《海外小箋》。[30] 第二批有儲安平的《英人法人中國人》、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後集)、袁昌英《生死與友誼》、張文昌《旅美散記》等。兩批叢書中都有錢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學風》，是因儲安平出書心切，又受袖珍文庫定價的限制，將該書拆分成上下兩冊出版。據時人回憶，這些書樣式別致，售價低廉，多在二三元之間，相當於一碗陽春麵。[31]

為辦好袖珍書店，儲安平想盡一切辦法吸引讀者。他創立了一種「註冊讀者」的制度。儲安平感覺到，雖然書店壓縮成本、定價低廉，但新書出版時外地讀者需來信購買，郵費負擔頗重。因此，讀者可以選擇成為「註冊讀者」，事先繳費，出新書時書店自動郵寄給讀者，以減輕讀者索書的郵費負擔。具體的辦法是：

> 一、凡一次繳納五十元者為甲種註冊讀者。一次繳納三十元者為乙種註冊讀者。
>
> 二、甲種註冊讀者購買本文庫，一律照定價七折優待，乙種註冊讀者七五折優待。
>
> 三、本文庫約每兩個月出書一批，每批冊數不等。各書內容由本店妥為支配，務使各方面之需要與興趣均照顧到。出版後即由本店儘先寄上，讀者無需時時留意廣告，亦無需每天來函選購，既省精力，又省郵票。
>
> 四、本店所出其他書籍(即不屬於袖珍綜合文庫者)，註冊讀

30 《袖珍書店廣告》，《國力月刊》1943年第3卷第5期。

31 俞潤泉：《舊籍重光》，《讀書》1987年第4期。

者亦得享受特殊之優待，甲種註冊讀者八折優待，乙種註冊讀者八五折優待，一俟通知，即照寄。

五、本店接到款項後，發給一註冊證，上列詳細表格，讀者每次接書後，可將書名、書款、郵費等分別填記，尚餘若干，一目了然。

六、書款郵費已滿繳款之數額時，本店當專函通知，或續繳，或結束，悉由讀者決定。

七、讀者加入時，請開明姓名、年齡、籍貫、現在通訊處、永久通訊處，連同納款一併寄上或掛號寄上。

八、註冊讀者繳納之款項，本店專案保管，萬一因非常之喪，致使本店業務不可進行時，所繳或所餘之款項，必分別退還，決無倒閉，吞吃貨落空等事發生，此點本店絕對負責保證。[32]

若註冊讀者制度順利運行，袖珍書店必會有條不紊，生意蒸蒸日上。甚至，經過多年努力，袖珍書店逐漸成為湖南地界乃至大後方的文化傳播中心亦未可知。但是，儲安平在註冊讀者章程中提到的「萬一因非常之喪，致使本店業務不可進行時」，就像一句讖語，真正預測到了袖珍書店其後的命運。

婚變

儲安平的確遭遇了一種「非常之喪」，那就是當年冬天，他與端木露西協議離婚。兩人在程滄波事件發生後，並未馬上離婚，而是四年之後才離異，說明當年的事件雖有陰影，卻也並非是兩人離婚的直接原因。更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書店經營不善導致嚴重虧損，種種生活上的問題由此突顯，多年積累的矛盾到此時終於爆發，彼此對這段感情都已心中厭倦，實在沒有意願再繼

32　《袖珍書店廣告》，《三年來的國師附中》，無頁碼。

續走下去，遂痛下決心，給這份婚姻一個最徹底的了斷。

最主要的當然是性格因素。端木露西一直對儲安平不滿。其子儲望華曾經說過：「(母親)總是提父親那些令他不喜歡的方面。在我看來，母親不喜歡的不一定是我父親的問題，而是兩人性格不太一樣。父親與母親的個性都太強了，尤其是我母親。母親的才能也比較高，她那時候跟父親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報》副刊主編，但她感覺父親總是壓着她一頭。母親後來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學校長，在母親看來，是父親限制了她。」[33] 這種限制，《中央日報》一章已經多次提到。端木露西作為民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義者，時刻以性別平等為思考出發點，雖然對一般婦女提倡「新賢妻良母主義」，自己顯然不願意做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內助。

據說，端木露西對儲安平為人處事也有種種不喜。儲望華曾對筆者提到過幾個生活上具體的小事。比如，當年家裏常常來客，端木露西熱情留客人午飯，儲安平卻無動於衷，甚至有催促客人離開之意。露西責怪這種西方式遠近適度、節制有加的待客方式缺乏人情味。安平卻說，是否留客人吃飯是他自己的事情，對於那些有必要留飯的客人，他一定會留，無需露西來操心。當然，與其說儲安平不通人情，不如說他不想將時間用在無謂的應酬上。但這種處事方式有很大問題，揆諸實際，儲安平交往的多半是事務和思想上的朋友，缺少生活上的密友，有時甚至近似於一個孤家寡人。另外，端木露西也不滿於儲安平只對和大知識分子交往感興趣，在她看來，與其說是儲安平眼界很高，不如說是在處心積慮地攀高枝，為自己未來的發展鋪路。[34]

從待客與交往這兩件事情上，都能看出儲安平的現實主義態

33 儲望華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懷念父親儲安平》，《文史博覽》2008年第12期。

34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度和事功心態。這種心態發展到極致，便可能成為兩人婚姻破裂的致命因素。在這裏引入1943年11月端木露西在重慶《新中華》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幸福的婚姻》，為儲安平的這種態度和心態提供最有力的旁證。端木露西在這篇小說中描寫了一對大學時代相戀、結婚數年的夫婦。妻子志文本來生於豪富之家，因為這份「濃得化不開」的初戀，下嫁給中產階級子弟仲英。兩人原在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帶花園的大房子裏過着幸福的生活，並有小玲玲和小琍琍兩個孩子。抗戰爆發，兩人一路從長沙、武漢、宜昌逃難到重慶。仲英失業，在大學同窗擔任校長的中學裏勉強謀得一份教師的差事。仲英的教書匠生涯並不如意，因考試過於嚴厲遭學生全體罷課，校長令其回家暫歇。仲英心懷大志，不滿足於中學教師的生活，希望能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裏施展自己的才華。因為工作的不如意、生活的壓力，經常與志文發生糾紛。仲英對婚姻有一貫的邏輯。對他而言，婚姻開始就意味着愛情的結束，妻子不該再如戀愛時試圖尋求那種「濃的化不開」的浪漫。他不讓妻子出去工作，將妻子完全限定在家庭主婦的地位。即使這樣，他還將妻子在家庭裏帶孩子、煮飯、收拾家務的功績貶低得一文不值，侮辱她說「女人只知道吃飯」。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在國難期間，家庭、妻子和子女對男子來說都是連累。若沒有家庭，他可以自由去任何地方，毫無顧慮地為國家和社會盡一個男子應盡的責任。他可以死可以生，但是不能忍受庸常的工作，忍受瑣碎的家庭生活，忍受像一潭死水般的生命。因此，他偷偷離開志文，去了前線參加抗戰。志文本身並不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傳統婦女，因深愛仲英，才願意屈身做一個家庭主婦。隨即，他去仲英的中學接替了他的課程。不久，第×軍團招考後方服務人員，她毅然報名並考取，將兩個孩子送到保育院，跨出家門去為國家民族服務。志文和仲英一樣，都決定將個人的小我奉

獻給國家民族的大我，投入抗戰的洪流以尋求生命的價值。[35] 這篇小說有虛有實，但原型顯然是儲安平和端木露西。

儲安平從小是孤兒，沒有體驗過家庭人倫的快樂，性格中自私的一面非常明顯。他有極為強烈的事功心態，時刻希望能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些什麼。這次抗戰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是一個人施展抱負的最好機會。他將婚姻和家庭視為自己的限制，使其不能真正施展能力，有所作為。1938年秋，他毅然決然地離開端木露西奔赴前線，正是出於這種心態。身在偏遠的藍田鎮，躲在山溝中過一種教書匠的苟安生活，時刻為衣食掙扎，也和他的理想遠甚。他希望自己能親眼見證這個大時代，時刻保持着與時代同步的脈搏，並在時代中脫穎而出，青史留名。這種對家庭生活的厭倦，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露西的長期冷落和缺乏理解，使得露西對安平失去了最後的興趣，不再忍氣吞聲地受他限制。

與小說的情節相反，兩人的分道揚鑣，很可能是由端木露西主動提出。她不願再待在儲安平身邊，希望獨立自強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大概是露西私下投考了政府或軍隊招募文員的考試並被錄取，先行提出離開儲安平。儲安平聽到這個消息，先是錯愕、驚訝，其後是無奈並點頭接受。1943年冬，兩人在當年光華大學共同的朋友姚品璵的證明下，通過協議和平分手。望英、望德歸端木露西，望瑞、望華歸儲安平撫養。

關於兩人分別時的場景，端木露西竟然在文章中也有隱晦提及，為我們留下了至關重要的寶貴資料。在這篇名為《秋行》的文章中，她將兩人分離時微妙而複雜的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她說：

> 一個要趕早車的人，她的睡眠是不會安寧的。一切都不能改變了。晴天，有什麼藉口呢？一個人有時候在做着違反自己意志的事情的時候，恰如一個廢人懷着妄想，真有點兒希望

35 端木露西：《幸福的婚姻》，《新中華》1943年復刊第1卷第11期。

着天給她一點幫助。但是，今天的天也不想「留」啊。房間裏的兩個人的心都是沉滯的，憂鬱溢漾在空氣裏面，苦痛鎖鏈着兩顆不甚康寧的心靈。我的眼睛躲避着他的目光，我真怕他眼眸中不言不語地抖動着的那股淡淡的神情，就像一條在靜穆的晚天裏的河流般的，在默默中永遠含着一股憤懣和哀怨，使人見了悲愁難抑。他也沒有一點流盼過來的意思，只是優婉地俯視着地面，或者呆呆地眺望着天空。他也在我的視線裏逃了開去。兩個人都不預備用一句語言來衝破這不易承受的默靜，提防別離的悽楚。前面的那個人為我帶着一件行李。當他那種外表的漠然的情緒溶合在秋的悲哀裏，在後面的我看來，真感到他是顯得過份的鎮靜了。

他為我去買票，衝進人堆去，在排列的人行中屹立着，守望着售票處開啟那一扇小小的窗門。檢察員用敏捷的手法老練地翻動着皮箱的每一個角落，一面用上司的口吻：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到什麼地方去呢？突然，我感覺到了一個罪人被宣佈了酷刑似的，渾身急速地掣動了起來，喉管裏像給什麼東西窒塞了似的，但終於用澀澀的音帶說出了我的去處。我無精打采的，像一個臨終的病人交出他的遺囑一樣，將我的那件新職業的證件抽出來讓他看。他閃着輕蔑的目光，斜視着紙面上的字句——原來我是做着這樣一件不屬於富貴的圓圈裏的工作的人。

去買票的人沒有移動過一步，我從他的腳跟凝神注望着他，一直到他的鼻部，又激動地拿我的視線收了回來。我不敢接觸他的眼光，我知道他該用怎樣的一副目光來回答我的瞥視，那也許會使我忽然改變決心，走一條相反的路。要最後一次在這個地方留下一點寶貴的沾戀，我惴惴地凝視着他，一直到四條光芒接連在一起的時候。呵，他那炯炯有光的圓大的眼睛，流動在喧囂的熾浪裏，像一隻鑽針，刺炙了我的

> 靈魂的。突然，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和一種不安和憐憫交合的情感，當我想着我必須使這個人為我忍受苦痛的時候，我的眼睛裏滿含着眼淚。×，你回去吧，車子不知什麼時候開呢。我惑亂的說着，伸出我的軟弱的手，握別這人生旅程上忽然拆夥的伴侶。兩顆晶亮的水珠子洗着他的眼眸，他的目光變得陰慘，我知道這是被一種過去的回憶所攪擾了的結果。他捏着我的手……一層濃密的霧靄蔽遮着我的眼簾，景物在我前面模糊起來了。[36]

這段描寫明顯說明，端木露西最先離開了儲安平。這一離開儘管非常艱難，卻也意味着這份締結近十年的婚姻結束。如當年儲安平離開她去前線採訪一樣，端木露西也要讓自己變得堅強甚至殘忍，她要徹底忘記這個人，與這段感情說聲再見。心情更複雜的是儲安平。他從前一直認為婚姻是負累，妻子和孩子是負擔，而今妻子先行離開，主動解脫了他這種負擔。他終於可以大展身手了。但是，他似乎心情無比沉重。這些年他的驕傲，他的事功心態，他對她的限制與漠視，導致了她的毅然出走。他高傲而倔強，雖然擺脫不掉憤懣和哀怨，卻選擇了接受現狀，而沒有做任何挽留的努力。

桂林力報

端木露西走後，儲安平也選擇了暫時離開藍田鎮。只是這次他去的不是重慶，也不是武漢、長沙而是桂林。抗戰期間集中在桂林的文化名人達百人以上，其中既有詩人、作家、戲劇家、報人，也有自然科學家和文史學者。整個抗戰時期，桂林先後出現各類書店出版社160餘家、印刷廠100餘家、雜誌200多家、文化戲劇團體

36　端木露西：《秋行》，《露西散文集》，第47–51頁。

近30個，可謂名副其實的「文化城」。桂林的文化繁榮，因北京、上海、廣州、漢口都已淪陷，陪都重慶交通不便，迴旋餘地小，而桂林作為廣西首府，是西南和東南的交通樞紐，進可到重慶、昆明、陝北，退可到香港、越南，是內地與海外聯絡的主要通道。而且，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和蔣介石始終若即若離，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文化人採取開明政策，也造成了桂林文化的興盛。[37]

當時桂林的報紙有《大公報》《廣西日報》《救亡日報》《掃蕩報》《力報》等。其中《力報》出版於長沙，由於宣傳抗戰積極，在湖南一帶擁有廣泛讀者。1938年，張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出資五千元資助《力報》，並派秘書張稚琴做報社發行人。但是，由於人事糾葛，張稚琴並沒有將這筆錢投資到長沙《力報》，而是前往桂林，創辦了桂林《力報》。該社社址位於桂林城外的社公岩，營業處設在桂西路。《力報》的條件非常艱苦。據馮英子回憶：「社公岩這個地方在漓江的東岸，介於七星岩與觀音山之間，距離市區約六華里左右。岩在公路的二三百米處，岩上樹木蔥蘢，四周是一片平原和稻田。《力報》社址就建築在岩下，通過兩三條田塍就可以走上公路。那時所謂的房屋，大都是竹木結構的，在平地上豎立木樁，用蔑片編成牆壁，外面塗上泥，泥外用白灰一粉；屋頂則是用樹皮蓋的，星月之夜，可以透光，下大雨的時候，裏面自然也滴水成流。桂林《力報》的社址就是這麼一幢佔地幾百平方米的房子，房子的一半作工廠，有一架手搖的對開機和一個排字房；一半作編輯部和經理部，幾位主筆和編輯也住在這裏。」[38]

桂林《力報》於1940年3月正式出刊，每天出刊四版，第一版是報頭和廣告，第二版是社評和國內重大新聞，第三版是國際新聞，第四版是經濟新聞或副刊。《力報》由馮英子、歐陽敏訥

37　魏華齡：《桂林抗戰研究文化研究文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9–16頁。
38　馮英子：《我和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先後擔任總編輯，邵荃麟、千家駒等人先後任主筆，設有副刊《獨秀峰》《新墾地》，編輯有聶紺弩、彭燕郊、王西彥等人。1943年冬，千家駒離職，作為光華大學肄業生的張稚琴，在徵得總編輯歐陽敏訥的同意後，從湖南找來校友儲安平，邀請儲安平來桂林擔任主筆。[39] 儲安平本身對教書興趣不大，不過將其當成一個糊口的職位而已。他的心思片刻都沒有離開過新聞界。此時遭逢婚變，又逢國立師範學院寒假，南下桂林客串報紙主筆，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對於儲安平來《力報》一事，總編輯歐陽敏訥表示歡迎和敬重，但內心並不以其為然。就資歷而言，歐陽敏訥並未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三十年代後期才由小學教員轉投新聞界，在上海灘擔任一些邊緣小報的撰稿人，無論學識、見識還是文筆、資歷，都遠遠不及儲安平。這從歐陽敏訥擔任主筆時期的社論中即可見一斑。他所寫的社論，集中於國際問題分析、戰情戰況分析方面，很多文字都是肯定政府的抗戰功績，所宣揚的是積極和正面的輿論。當然，國難當頭，需要這種積極正面、鼓舞人心的輿論。抗戰初期，儲安平的文章基調也是如此。但是，歐陽敏訥的文章總體而言沒有什麼見識，多是大團圓式不溫不火的評論，少有宏大氣象。而儲安平筆底常帶感情又不無鋒芒，氣象恢弘，見識深遠，與歐陽敏訥形成鮮明對比。他的到來，對《力報》而言必將構成一種脫胎換骨的改變。

由於《力報》社論初期並不署名，後期才在結尾署名「訥」或「儲」，因此不易判斷一些文章是否出自儲安平之手。據歐陽敏訥回憶，儲安平每隔一天寫一篇社論。筆者在桂林市圖書館翻閱《力報》，可知實際情況大體與此相近。不過，儲安平也經常寫作篇幅很長的專論，連載兩到三天。《力報》時期的儲安平，

39 歐陽敏訥口述、譚瑞芝整理：《回憶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擺脫了國民黨系統報刊雜誌的羈絆，又處在桂系的地盤，終於可以放言無忌。他最大的轉變，便是不再單純地歌頌抗戰偉大，或引導正面的抗戰輿論，而是對政府在抗戰中的一些過失進行批評。他也開始將從英國學來的自由主義理論，正式應用到批評中國政治的實踐上。從此以後，儲安平的言論基本沿着這個思路進行下去，真正開始以一個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在中國輿論舞台上。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更大的轉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首先是時局的變化。1938年末，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速亡中國的迷夢破滅。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對日宣戰，中國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大力援助，戰勝日寇只是時間問題，結果已無懸念。民族危機逐漸紓解，各黨派擁護國民黨抗戰、與中央政府合作的短暫蜜月告以結束。張君勱、章伯鈞、左舜生等在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上提出最短時期內頒佈憲法，結束一黨專制，開放黨禁的要求。1941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人權運動再次興起，知識分子開始通過辦刊、集會、結社等各種形式呼籲民主憲政。知識界的關注點從「抗戰」逐漸轉向「建國」，他們更關心的是，戰後中國將成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實行一種什麼樣的制度。

當然，民主運動的高漲，更多是對國民黨政治控制收緊的反動。國民黨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容忍相當短暫，1938–1939年冬間，監獄裏又塞滿了政治犯，重新興起的憲政運動是對最近一輪政治迫害做出的回應。面對愈演愈烈的政治壓制，知識分子意識到，抗戰與民主並不衝突，追求民主並不會分散救亡的力量。假如戰時不能實現民主，將各黨各派的利益妥善整合到政治框架當中，戰後所得到的將是國家的分裂和毀滅。而且，追求民主還會促進抗戰。如果民眾享有人身、居住、宗教信仰、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將會調動起抗戰積極性，為國家統一作出貢獻。[40]

40　馮兆基：《尋求中国民主》，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0–198页。

就儲安平個人而言，在《中央日報》多年，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專制和統治無方，本積累下一些不滿。經過「程滄波事件」，以及中央政治學校要求他用黨證換教職，還有在國立師範學院目睹的黨化教育，更加劇了這種不滿情緒。抗戰勝利在望，已經無需再支持政府鼓吹抗戰，他遂重新思考國民黨的性質，認定國民黨的統治是一個讓人失望的統治。他要為監督這個黨和政府，爭取個人自由盡一份努力。

首先是重申自由。其中最主要的是人身自由。儲安平說：「所謂人身自由，就是一個人的舉止行動，絕對自由，非觸犯法律，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中國素來缺乏人身自由保障，現在仍然如此：「現在中國一般人民最感威脅的，便是非法機關的濫行逮捕。一個警察可以任意的來蒐查你、盤問你，甚至逮捕你，一個保甲長可以任意拘禁一個老百姓，一個××人員可以很輕易的將你帶到一個不公開的地方。一個人被拘押後，竟不知何時可以被審，甚至有時雖被捕而竟不知所犯何罪，更甚至有時一個人無端失蹤而其家屬竟不知向何處營救，向何處申訴。至於警察一類人物隨意的闖入人民的寓所，更是習見而不足為奇的事了。」「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假如人身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那其餘的各種自由也就是一句空話了。」[41] 儲安平的老師羅隆基當年在《新月》雜誌上對國民黨侵犯人權，隨意逮捕人民的行為給予最激烈的批判。此時已經成長起來的儲安平，攬過羅隆基的接力棒，對自由和人權昂首高呼。儲安平在1932年寫作《給弟弟們的信》時，雖然肯定民主政治，但對自由關注甚少，更多強調中國人如何提升道德和發揚「公」的精神。然而，經過英國遊學的洗禮，目睹英國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儲安平開始真正對自由的價值予以重視。

作為一個報人，最感痛徹的是出版不自由。當時實行書報檢

41　儲安平：《論人身自由》，《力報》(桂林)1944年2月24日。

查制度，文章在見報前都要送審，批准後方可發表。負責檢查者都是政工官員，文章稍涉批評政府者，即可能遭受懲處，若執意發表，報社極有可能面臨着封門的命運。儲安平援引歐美各國先例，提出今後應當改良檢查手續，並行特許、檢查、追懲三種制度。所謂特許，即出版社向官方登記，經特許後便可自由出版，不再受檢查系統的限制；檢查指出版社無需向官方登記，各項圖書文稿經政府檢查許可後予以放行；追懲指凡是登記檢查合格的刊物，如有毛病發生，政府不再追懲發行人。[42]

其次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評論。此時，儲安平對國民黨的腐敗，行政機構的低能已經有很深的認識。在《論行政上的刷新》一文中，他批評了中國的行政機關冗員充斥，機構設置疊床架屋，雖然有考試制度，但真正通過考試而任官者少，大部分仍然是私人關係的援引。這就導致，真正有才者沒有進階之道，各級行政機構被眾多平庸無能之輩盤踞。[43] 在《論官僚與政客》中，他批評了政府「媚上欺下畏強凌弱的官僚作風」，以及政府中那些「無一貫政治主張，專門以玩弄政治為終身職業」的政客。[44] 如何解決這些行政弊端？如何革除官僚作風剷除政客？儲安平顯然意識到必須從政治制度改革和民眾程度提高兩方面求根本的解決。只有真正實行民主制度，讓具備健全政治意識的人民，通過選舉、監督、罷免等許可權的行使，才能革除這些陰暗，改變現狀。

從歐陽敏訥的回憶中，也可以佐證此時儲安平在言論上的批評國民黨立場。有一次，儲安平與歐陽敏訥等談到蔣介石和宋美齡，說蔣介石搞獨裁，宋美齡主張民主。歐陽敏訥認為這樣的說法毫無根據，儲安平「頭腦顯得非常糊塗」。歐陽敏訥還說：「儲安平對國民黨的特務政治極端反對，在社論和專論中都曾經

42　儲安平：《研究憲章與發表自由》，《力報》(桂林)1944年1月28日。
43　儲安平：《論行政上的刷新》，《力報》(桂林)1944年2月22日。
44　儲安平：《論官僚與政客》，《力報》(桂林)1944年2月3日

加以抨擊，有時措辭還相當激烈。不過，他不瞭解《力報》在政治上的處境，我只好對他作出說明，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機關來找麻煩，得到他的同意，把語氣改得隱晦而緩和一點。」[45] 總之，這一時期的儲安平，政治批判意識再度明顯。這種自由主義立場上的批判基調，成為他其後幾年論政最主要的旋律。

此時儲安平的言論，另一個特徵是更加具備了一個政論家的深刻。在這些言論中，最能反映儲安平見解深刻的是對蘇聯修憲案的評價。1944年春，蘇聯最高會議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提出的修改憲法案，將蘇聯的十六個聯邦中的每一邦都賦予與其他國家建立直接關係並簽訂協定的權力，又賦予每邦自行招募軍隊的權力。2月4日《力報》以《蘇聯的明智措施》為題刊發社論。社論認為，這次修憲是因為蘇聯經過這次戰爭的創傷，意識到了以往對外孤立政策和自保政策的錯誤，為了彌補以往的過失，蘇聯很自然地產生和其他國家密切接觸的願望。這是蘇聯政治家有意跨出國門之外，和其他各國政治家共同謀求人類福利的舉動，是值得稱讚的明智之舉。這個舉動表明蘇聯正式向各邦及臨近國家表示自己並無吞併鄰國的野心，更是向英美證明，並無圖謀世界霸權之舉。這是蘇聯適應時代的一種表現，而非像一些西方報刊評論的那樣，是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的一種有預謀的行為。[46] 這篇文章顯然出於歐陽敏訥之手。因為我們從其後連載三天的雄文《我們對於蘇聯修憲案的看法》中，看到了與此完全不同的觀點。

儲安平首先認為蘇聯的這一動作並非簡單之舉。他判斷，戰後必將形成美蘇英中四強領導世界的局面，而在國際問題磋商上，可能會採取四巨頭主導下的多數國家表決制。相對於英美

45 歐陽敏訥口述，譚桂芝整理：《回憶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46 歐陽敏訥：《蘇聯的明智措施》，《力報》(桂林)1944年2月4日。

在歐洲的勢力，蘇聯在歐洲必將十分孤立。由此蘇聯讓十六個「邦」變成十六個「國」，讓每一國都有外交權，都有參加戰後世界和會的權利，必將壯大蘇聯的外交力量，為蘇聯在世界舞台上贏得更多的發言機會。這次修憲還允許蘇聯各邦建立軍隊。儲安平預測，戰後必將出現世界各國大範圍的裁軍活動。將來討論裁軍標準時，結果必將是蘇聯的海軍空軍比英美任一國家的規模要小，陸軍也不會超過英美兩軍的總和。這樣的限制便是緊緊扼住了蘇聯的咽喉，使其從彼得大帝以來的越日本海出太平洋、衝過達達尼爾入地中海的慾望徹底破滅。蘇聯允許各邦保留軍隊，實質是將蘇聯的軍事單位從一個變成十六個。即使將來蘇聯的軍事力量被削弱，至少還有其他十六個獨立的軍事單位，其總和必定比裁軍之前的蘇聯軍事實力雄厚。而且，雖然允許各邦擁有外交權和軍事權，也不必擔心蘇聯因此分裂。蘇聯本身是共產黨國家，共產黨對整個國家都具有絕對嚴密的控制權力，各邦的政治中樞和蘇聯的政治中樞必將完全一致。何況蘇聯憲法本來規定，各邦的法令和蘇聯法令相抵觸者無效，而且並未賦予各邦和戰權。總之，蘇聯的這一行為並非簡單的融入主流世界的友好之舉，實際處心積慮，別有深意。

儲安平在這裏十分敏銳地預測到了戰後蘇聯可能採取擴張態勢，可能採取一種新的方式與美國一決世界霸權的雌雄。他說：

> 這次戰後的世界，究將建築於什麼一個基礎上面，世人對此都非常關切。正義、自由、和平，這些崇高的理想，是大家憧憬追求的，許多思想家都在絞盡腦汁，希望能使人類得到一個持久的和平。不過，我們心中雖不能不具有遠大的理想，但我們的眼睛卻不能不注視現實。……現在每一個主要強國，他們在國際政治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逃出這兩種方式：(一)求均勢，(二)再進而求在這個均勢裏自己能取得主動的地

> 位。……我們認為這個老原則是不會被遺棄的，而且在亞洲也將會更加強化運用這個老原則。……要知蘇聯對於世界的霸權，素非毫無興趣者，不過今昔的環境不同，所采的方式也不同罷了。現在蘇聯即將積極參加國際間的種種競爭，他自須採用各種必要的手段，俾助其外交上的運用。蘇聯對於戰後之歐洲，抱負究為如何，我們尚難具體論列，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戰後歐洲問題的解決，蘇聯必有蘇聯獨特的計劃。我們都知道蘇聯對於波羅的海、東南歐、巴爾幹等地帶，是非常有興趣的。而大斯拉夫主義，也並不能說完全成為一個歷史上的名詞。這一憲法的改變，將來能發生多大作用，固尚有待事實表現，但我們不能不說，這一憲法上的改變，其間所含的意味是很深長的。[47]

將儲安平與歐陽敏訥在同一報紙上對同一事情的評論比較，可謂高下立現。儲安平並不同意歐陽敏訥將蘇聯修憲案理想化，而是以新聞報導的隻字片語判斷這是別有深意之舉。他對於戰後世界局勢也保持一個謹慎的樂觀估計，認為戰後仍將是一個各國試圖擴張自己，保持勢力均勢的態勢，而不是想像中的打倒法西斯以後便成為一個大同世界。似乎他真正學得了英國人的思維，在保持對未來世界的理想主義之餘，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看問題，而不作天真樂觀的書生之見。這表明儲安平此時已經真正具備了一個政論家的遠見卓識。

這篇宏文被國立師範學院師生改名為《我對於蘇聯修憲案的看法》，轉載到1944年4月25日出版的《國力月刊》上，並稱：「國立師範學院公訓系教授儲安平先生適在桂林，因為某報撰寫《我對於蘇聯修憲案的看法》一文，連刊三日。查國內報紙對於此次蘇聯修改憲法，當無一報能詳為論解有如儲氏此文之精深獨

47　儲安平：《我們對蘇聯修憲案的看法》，《力報》(桂林)1944年2月8–10日。

到者。儲氏此文在桂林發表後，大受各方注目，凡注意蘇聯問題以及研究憲法人士，無不將此文剪下，珍藏參考。」[48] 這從側面說明此文在當時產生的影響。

歐陽敏訥回憶，儲安平曾對別人說，歐陽敏訥的社論是《新華日報》式的，他的社論是《大公報》式的。[49] 這篇文章便很好地說明這種區別。不過，這並不表明儲安平輕視《新華日報》以及其背後的中共。相反，他也會偶爾閱讀《新華日報》，並對共產黨發出的有代表性的言論相當重視。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10月，該文由《解放日報》發表。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用一整版摘登了講話的主要內容。毛在講話中正式了提出文藝必須成為革命機器中的一部分，必須成為教育人民、團結人民和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文藝服從於政治，文藝具有階級性，文藝是鬥爭的武器，這是與當年儲安平崇尚的新月派文學觀背道而馳的。這篇報告出台後，引起了儲安平極大重視。他打算在《力報》上登出這篇講話，先發表幾篇反對的文章，再發表幾篇贊成的文章，讓不同的意見進行辯論。儲安平的同事王西彥也是中共黨員，他與另一位黨員艾蕪商量。艾蕪表示不能同意。[50] 他們的邏輯應該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整風運動的經典文獻，是廣大共產黨員應該遵守的金科玉律，這樣的文稿只能學習領會其精神，豈能辯論，豈可以有反對的意見？

48　儲安平：《我對於蘇聯修憲案的看法》，《國力月刊》1944年第4卷第4期。

49　歐陽敏訥口述，譚桂芝整理：《回憶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50　艾蕪：《黨領導下的大後方抗戰文藝運動》，《往事隨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頁。

逃難與著述

1944年2月24日，國立師範學院院長廖世承給身在桂林的儲安平發去一電：「丑皓(2月19日)上課，盼即來。」[51] 這是廖世承催促儲安平回校上課的急電。儲安平在《力報》拖到2月27日，當天見報文章是儲的社論《告內歸的青年》。[52] 寫完這篇文章後，他馬上離開桂林回到藍田鎮。可能是服務後方的計劃未成，端木露西也從重慶回到藍田，一對離婚怨偶再次同處一地。

然而，無論儲安平或端木露西都無法預料的是，此時戰雲已經在三湘大地上空密佈。1944年4月，在太平洋戰場屢屢失敗的日軍為保持本土與東南亞軍隊的聯繫，決定打通從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並摧毀沿岸的中美軍事勢力，調動大軍五十餘萬發起了豫湘桂戰役，打算在垂死之前進行最後的搏擊。6月，第四次長沙會戰打響，中國軍隊一觸即潰。其後，湘潭失陷，衡陽被圍，敵軍前部到達藍田鎮東南140里的永豐鎮。藍田鎮的郵局和銀行馬上停止付款，各商家紛紛關門，街上到處都是日軍已經殺到藍田的謠言。國師附中的師生們正準備排練畢業遊藝會，學校聽到消息後馬上決定於6月21日提前放假。家鄉尚未淪陷的學生丟下行李隻身向着處於火線的家中趕去，希望能活着與家人團聚。那些家鄉已經淪陷者，留在學校裏茫然無措，成了一群流浪學生。[53]

1944年6月28日，國立師範學院宣佈向藍田鎮以西的新化縣城疏散。端木露西匆忙整理了簡單的行李，帶着病中的五歲女兒望瑞一步步向縣城跋涉。露西本不願走，因為從年初以來，望瑞一直在生病，經過多方醫治，終於從死神手中奪回生命。獨身攜

51 傅宏星：《給儲安平的四封電文及其文獻價值》，《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52 儲安平：《告內歸的青年》，《力報》(桂林)，1944年2月27日。

53 端木露西：《前線之邊》，《露西散文集》，第1–2頁。

女，孤苦伶仃，投入陌生而又冷峻的人海之中，前路漫漫，不知何處，讓她心中畏懼。但不走卻可能是死路一條，她還不能死。她將十年來的信札和一部分日記鎖在衣箱裏，留在宿舍中，裏面放置了一封書信。信封寫：「開啟此箱者拆閱」，信中寫：「我為江蘇人，因家鄉早已淪於敵手，年來流亡在外，卜居此鄉亦已三年，現又欲去他處流浪，日後如不能攜回此箱，請先生將箱內信札和日記代為保存，探訊小女×××之下落，將該物送交小女。伊知其母在生時之生活與思想，必可有所警惕與發奮也。或將為其母一吐終身之抑鬱，則余必含笑九泉。先生大恩，來生圖報。」[54] 1941年生於湖南的儲望華回憶，逃難時儲安平肩着挑擔，左右兩個筐中放着望瑞和他。[55] 但沒有資料表明，在這期間儲安平曾給予端木露西以保護和支持。雖然是跟着學校逃難，兩個人始終分開行動。

1944年8月7日，衡陽陷落，國立師範學院必須再次遷移。9月10日，學校西遷至更加偏遠的溆浦縣。11月初，國師在溆浦重新開學。奇跡的是，在逃難五個月的過程中，儲安平竟然克服風餐露宿、缺衣少食的條件，寫出了一部《英國採風錄》。據他在序言中說：「本書作於自長沙失守至桂林淪陷這幾個月近乎逃難的生活之中。在這幾個月中，他及他數以百計的同事，大都將整天的精力花費在日常的飲食瑣事之上，心情因局勢的動盪極不安定。然而在那種混亂、困頓、幾乎無所依歸的生活中，有時究不能不做一點較為正常的工作，以維持一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紀律。著者因於離亂之中，每日仍舒卷濡筆，稍事記述，當他所執教的學院西遷粗緒勉可復課時，他雖然隨作隨輟，亦終寫成了十章。」[56]

54　端木露西：《前線之邊》，《露西散文集》，第2–5頁。
55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56　儲安平：《序》，《英國採風錄》，第1頁。

《英國採風錄》分十章，包含《王·后》《國會·上院·下院》《內閣·首相》《貴族·貴族社會》《大憲章·自由主義》《種族·外族入侵遺留之影響》《性格·風度》《霧·雨·潮濕》《鄉村生活》《女子·結婚·家庭》等十個主題，其論述遍及英國的政治、文化、國民性和生活各個方面。此書中儲安平對英國的觀感，《採風英倫》一章中已經提及，於此不再贅述。需要注意的是儲安平超凡的毅力和精神，即使在逃難的朝不保夕、衣食不定中，他卻沒有被艱苦的環境打倒，思考如何有所作為，仍舊心系著述。從端木露西對逃難的記述可見，當時的教授們多家合居於一個大院之中，師生在同一桌上進餐，經常為糊口飯爭得不可開交，求生的本能勝過一切，所有禮貌和文化都可不顧，知識分子的尊嚴競相掃地。[57] 但儲安平卻盡可能維持一種「生活的紀律」，他要努力維持一種「人」的尊嚴，他在這方面有一種孤傲的態度。

儲安平在寫作此書時的思考更值得注意。他念念不忘的問題是：「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似之處？英國為一強國而中國為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及社會的風氣究竟有無異同，其間得失又為如何？」他在寫完全書之後，打算寫一篇序跋來談他對這三個問題的思考，卻因心潮澎湃，一發不可收拾，寫成一篇近三萬字的文章，名為《中國人與英國人》。

在這篇長文中，儲安平以英國人的務重實行、熱心公共事業、合作能力強、崇公道、愛理性、信仰思想自由等種種優點為參照，對中國的國民性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儲安平先將中國人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農民，一種是知識分子。他看到，中國的農民也頗具備英國人般注重行動、腳踏實地、勤奮任事的特點。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則不然，其醉心於表面的虛文，好發表不切實際的演說，好高騖遠而從來不切實際，喜歡放言而從不埋頭實行。

57　端木露西：《前線之邊》，《露西散文集》，第5–6頁。

中國社會因此只是充斥着各種各樣的「理論、口號、標語、宣言、計劃、報告、教規、條文、守則、言說、座談」，從表面上看中國是蓬蓬勃勃，但卻無不出於一時的衝動，而不長久。他說：「中國知識階層之重言不重行，好虛文而不好實質，是中國社會可怕的慢性肺結核症。幸而中國的農民務勞務實，又幸而克勤克儉的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如沒有他們的勤勞汗血，我們真不知道我們的國家，要貧窮虛弱到何種程度。」

他再度批評中國人缺乏合作精神：「中國人無論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盡量放縱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約束。中國人只知一己而不知他人，只知獨行其是而不知與他人協力合作，所以中國的社會散漫而不凝結，鬆弛而不嚴密，只有一時的集合而不易有經久的組織，只有小規模的經營而不易樹立大規模的企業，人民的能力總是分散而不易集中，不能發揮出龐大的威力。」中國人缺乏理性精神，一切以人為中心，國家的制度和決策亦以人為轉移：「在中國，既無事不講人事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佔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聯絡、接納、奔走、趨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務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人人重私的結果是社會無是非，無公道。無是非無公道的社會必是一個黑暗的混沌的退步的社會，所以我們的人心總是不能振奮，而我們的國家社會遂亦總是停滯不能前進。」[58]

不過，儲安平認為這些中國人性格的弱點，歸於民族性者少，歸於後天教育多。他相信通過合理的教育改革，中國的國民性有革新的可能。儲安平的話語，繼承了自晚清以來、經五四新文化運動而發揚光大的「國民性改造」話語餘緒。在《中央日報》工作時期，儲安平就曾撰寫刊發大量文章，批評文人無德無行，反復呼籲國人普遍提升道德，發揚「公」的精神。抗戰中出

58　儲安平：《中國人與英國人》，《英人法人中國人》，第22頁。

於全民團結一致抵抗外侮，振奮中華民族精神的需要，他幾乎沒有再作過類似批判。而今抗戰勝利曙光已現，建國大業即將開始，但中國的國民性似乎並未較之戰前有很大提升，因此他重新拾起了改造國民性的話語。儘管這一話語經嚴復、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魯迅等人深刻呼籲，最後並未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改造效果，但儲安平對此仍然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再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教育改革，有可能會初見成效，失望悲憤無補於事，知識分子應該繼續踏踏實實，為改進國民性做一些實際工作。

中國晨報

儲安平在湖南溆浦期間，獨身居住於縣民眾教育館，並經常應邀開設講座，向民眾講解抗戰形勢。[59] 這時，一家剛剛創刊的報紙《中國晨報》從湘黔邊界的晃縣遷到溆浦西南70公里的偏僻的山城辰溪縣出版。

《中國晨報》創立於1945年春，社長李宗理，畢業於湖南大學，在沅陵稅務局長任上大發橫財，附庸風雅而投資辦報。李宗理並不懂辦報，只管出錢，將報紙完全交由副社長嚴怪愚和總編輯馮英子等人負責。李宗理對儲安平的辦報能力早有耳聞，通過關係重金聘請儲安平來辰溪擔任主筆。恰好當時日軍在湘西發動了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次進攻，前鋒部隊幾乎抵達溆浦，國師再度停課疏散，儲安平借此機會離開師範學院，於4月20日乘坐美國汽車抵溆浦大江口鎮，兩日後到達辰溪《中國晨報》社。[60]

《中國晨報》的編輯部設在辰水邊的小村莊銅灣，營業部設在辰溪街上。編輯部如同《力報》，是沿坡而築的兩層木屋，樓

59 黃孝暘：《國師在湖南溆浦》，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19/06/349878_219114212.shtml。

60 傅宏星：《給儲安平的四封電文及其文獻價值》，《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下是排字房和機器房，樓上為簡陋的編輯住所，非常艱苦。編輯部和營業部之間是一條辰水，其上沒有橋樑，僅有小划子擺渡。儲安平經常身背不滿四歲的幼子儲望華，過河擺渡，上船下船。報社同人見安平勞累，表示願意幫他背背孩子，他總是含笑拒絕，表現出一種知識分子的堅韌和傲氣。

由於辰溪地理位置太偏，該報目前已全部亡佚，並未發現存報。[61] 只知道儲安平在《中國晨報》寫社論。1945年5月，歐戰急轉直下，希特勒自殺，納粹德國宣佈投降，儲安平寫的第一篇社論即是談論此事。他分析了歐戰的形勢，對希特勒的死顯出惋惜之情，認為希特勒也是「一代人傑」。他的這個看法，應該源於當年採訪奧運時對希特勒的觀感，覺得希特勒雖然是發動世界大戰的罪人，但將德國引上強盛之路的本事值得稱讚。然而，此時發表類似言論已經屬於「政治不正確」，總編輯馮英子拿到這篇稿子後非常頭疼，不知如何處理。他和嚴怪愚商議後決定原文照發，但第二天由馮英子再寫一篇社論，以否定儲安平對希特勒「一代人傑」的定論。

據馮英子說，在《中國晨報》能執筆寫社論者，還有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吳希之，出身清華大學的姚家積，湖南著名文人黃達三等，他們的社論都各有長處，其中吳希之甚至準確預測到了日軍投降的時間。但是，儲安平「落落寡合」，對他們並不看好，也不與這些人深入交往，只是和馮英子交流較多。他對馮英子說，一個記者要有一支筆，一隻照相機，一輛汽車。有了汽車，可以交結許多重要的人物，得到許多獨門消息。他還說，並不想留在這個偏僻的山城，希望馮英子和他一起去重慶，合作辦一份晚報，他負責評論和編輯部，馮英子負責經理和採訪部。但是，馮英子表示，不會離開《中國晨報》，這項合作並未談成。[62]

61　《湖南省志·新聞出版志·報業》，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70頁。
62　馮英子：《回憶儲安平先生》，《追尋儲安平》，第169–170頁。

《中國晨報》的發行量大約是三千份。該報經常抨擊政治和地方事務，也算頗有風骨，其中副刊編輯蔣牧良甚至在報社秘密組建了共產黨支部。因此，該報被國民黨視為湘西的《新華日報》，搬遷到辰溪的國立湖南大學明令禁止學生閱讀。[63] 但是，《中國晨報》的天地實在太小，該報取名「中國」，影響卻從未超出湘西地界。何況儲安平只是主筆之一，上有社長和總編輯，他對報紙的言論和風格並沒有決定權。日本投降在即，抗戰任務完成，建國大業馬上要開始。可以預料的是，不久的將來，舉國上下必將出現一種「五四」後鮮見的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熱潮，人人都心潮澎湃，躍躍欲試，希望在全新的建國大業中扮演一個關鍵角色，為未來的中國尋找出路。儲安平更是如此。日本還未投降，他在山溝中就已經為自己戰後的新聞工作勾畫出了一幅藍圖，並一度離開辰溪前往重慶。據《陳克文日記》記載，1945年5月26日，陳克文在重慶端木愷的家中見到了剛從湘西歸來的儲安平。[64] 這應該是他的探路之舉。

重慶歸來後，國立師範學院重新向儲安平發出邀請，但學校因遷校問題再起風波，不久廖世承亦辭去校長職務。儲安平再無意回到這個黨化教育的重鎮做一個教書匠，遂徹底拒絕了學院的邀請。大約1945年7月，儲安平在《中國晨報》執筆兩個多月後，獨自離開辰溪，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陪都重慶。他想要大幹一番事業，他希望能在即將到來的大時代中承擔重要責任。

63　馮英子：《勁草：馮英子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72頁。
64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下冊，第980頁。

第九章　陪都初論政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只是一個奴役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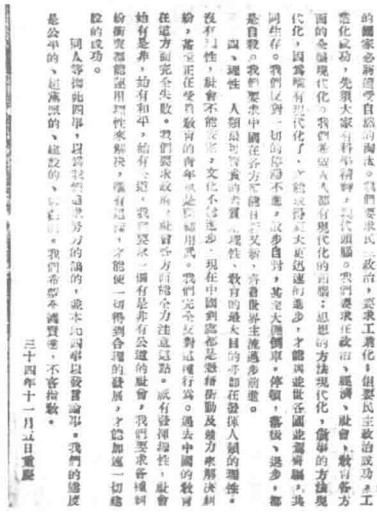
——我們的立場，1945

《客觀》創辦

在陪都重慶，儲安平利用留英時期的關係，開始和杭立武組織的「中英文化協會」取得聯繫，據說還擔任了協會秘書。[1] 他準備聯合「中英文化協會」裏的朋友，充分調動多年積累下的人脈資源，創辦一份有影響力的刊物。

在近代中國，國共兩黨以外的知識分子大抵以三種方式介入政治。首先是「個人諫諍型」，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通過和黨國上層人物的關係，扮演諍友或諍臣的角色，對權力既容忍又內部抗議，不斷督促政府改進。其次是「組黨介入型」，以張君勱、曾琦等為代表，他們試圖通過組建小黨派，以政黨政治的方式逐步使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這些小黨派於抗戰時期合組為民盟，成為戰後知識分子組黨介入政治的主體力量。第三是「公共論壇型」，儲安平是典型的例子。他希望用言論影響政治，論政而不參政，在中國建立一種獨立、客觀的輿論，通過輿

1　目前並無官方材料證明，儲安平之前曾是中英文化協會會員，1940年代前期出版的《會員錄》中尚無其名。參見：《中英文化協會中國會員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14037。



我們的立場

本社同人

戰爭結束，勝利開始。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但要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須先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政治不清明，經濟建設無從談起，社會不安定，則以求富反而招貧，今日中國面臨險惡的局勢，許多國家的人士都為我們如何努力。同人等創辦此刊，實緣稍貢芻見，藉布微誠，一申立場。

一、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強可抗阻。我們不贊同以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組織國是，實現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故府的一切措施都最為了一部份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或黨派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應以多數的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應隨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在技術上，我們絕不幻想，以為可以一步登天，但在精神上，我們要求這種徹底的一切民為有」。

二、自由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言論基本人權。自由是相對的，自由仍須守法。但法律須先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須先能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須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人民必守法律之不暇。政府固需要人民的人格，即自由與為維護人格所必需。故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應是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關力，作充分溝通的觀察，以增加團結社會之福利，而自由是人類所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是一個奴役的社會。我們要求人人擁有各種基本的自由，並應確保有效而合理的政治。不論是世界大勢趨勢，或是國家必需，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止不前。

三、集多　我們要求國家多，我們絕對要求民主政治的成功，工業化成功，先須大家有科學精神，現代頭腦。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要求各部有現代的組織；思想的方法現代化，管理的方法現代化，國家能有現代化了，全體國民自然迎頭趕上，共同生存。我們反對一切的保守不進，或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後，退步，都是自殺。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能日新又新，青春與世界進步前進。

四、理性　人類最可寶貴的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進步，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到處都是感情衝動及暴力來解決糾紛，甚至在受教育的青年也是如此用武。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行為。過去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完全失敗。我們要求改正這一點。我們要全力注意這一點。我們要求各種團結，社會始有和平，始有安定，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團結衝突都能用理性來解決，像利益團體，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發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設的成功。

同人等抱此理想，因緣湊合，遂集力量的薄，就本此理想以發言論事。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超然的，建設的，負責的。我們希望本此態度，不客指教。

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重慶

《客觀》發刊詞《我們的立場》

論來監督政府，影響中國社會。[2]

這三種方式中，個人諫諍型知識分子與權力中樞關係密切，最後極有可能成為當局的辯護者，失去批判的力量；由於國共兩黨都以軍隊和武力論英雄，組黨介入者既無軍事力量，又無群眾基礎，只能在兩黨的夾縫中生存，一旦均勢的天平傾斜，必須要依附某方，在兩者中間做出選擇；相比之下，通過公共論壇干政，向整個知識階層發聲，引導全國輿論，逐漸對權力形成一種輿論督促，並逐步啟蒙民智，不失為比較理想的一種手段。以在野的身份守住公共領域的陣地，也是知識分子保持人格尊嚴的一種最佳方式。就如當年傅斯年對胡適說過：「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3] 可見即使是「個人諫諍型」知識分子也對「公共論壇」普遍重視。

儘管儲安平久有在戰後辦刊之意，但真正塵埃落定是在1945

2　陳儀深：《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

3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第124頁。

年10月5日。他選擇了與《力報》的主事者張稚琴重新合作，由張稚琴出資，儲安平等一干留英同學出力，創辦一份名為《客觀》的刊物。與張稚琴合作是儲安平的權宜之計。從經濟上講，當時他還沒有足夠的資金；從時局上講，抗戰大業完成，政府必將回遷，重慶並非久居之地。儲安平不敢冒進，選擇一種觀望待變的態度。10月8日，在重慶臨江門大井巷9號的臨時社址，《客觀》完成編輯部的「組閣」工作，由儲安平擔任主編，吳世昌、陳維稷、張德昌、錢清廉等留英同人擔任編輯。

吳世昌，燕京大學學士，哈佛、牛津大學碩士，時任中央大學教授，青年時與儲安平都是《新月》的作者，後來成為國立師範學院的同事，是至交好友。陳維稷，畢業於英國里茲大學，專業紡織，任職於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張德昌，畢業於清華大學，留英學習經濟史，前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時在外交部任職。錢清廉，畢業於東吳大學、倫敦大學，專業法律，時任中央大學教授。[4] 儘管張稚琴並不干涉辦刊的方針與風格，但仍對《客觀》產生一定影響。比如，《客觀》不取雜誌的裝訂形式，做成八開大張的報紙，這似乎源於主辦《力報》的經驗。《客觀》設置副刊兩種，其中「副葉」的編輯，由張稚琴指定《力報》舊部、共產黨員、左翼作家聶紺弩擔任。

儲安平在11月11日推出的創刊號中，將《客觀》定位為「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刊物」，並為刊物設定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種立場。他說：

>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無可抗阻。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國是，漠視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設施措置都只是為了一部分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須由人民決

4　安平：《編輯後記》，《客觀》1945年第1卷第1期。

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之福利，而自由即為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只是一個奴役的社會。

我們要求國家進步，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滯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思想的方法現代化，做事的方法現代化，因為唯有現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進步，才能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共同生存。

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社會到處都是憑藉思想衝動及強力來解決糾紛，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動輒用武。只有發揮理性，社會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衝突都能運用理性來解決。[5]

這篇氣勢磅礴的文告，完全可以視為一篇戰後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宣言，在紛繁複雜的言論場域中獨樹一幟，給那些真正憂思於中國進步事業的人們以巨大鼓勵。

議政建言

儲安平在《客觀》，親自擔綱撰寫頭版的「客觀一週」專

5　本社同人：《我們的立場》，《客觀》1945年第1卷第1期。

欄。這個欄目類似今天的時評，用四至八篇千字短文回顧評點一週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以突出雜誌的時效性。

首先當然是對國民黨的批評。

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擲下的兩顆原子彈，對敦促日本投降起到決定性作用。抗戰勝利來得過於倉促，國民政府來不及做周密細緻的回遷準備。因此，在接收敵偽資產的過程中，大量出現接收官員貪污腐化、濫用權力、搶佔財產、化公為私的惡劣現象，給淪陷區民眾心中留下極壞的印象；政府又推行了錯誤的貨幣政策，過高規定法幣與淪陷區偽幣的比率，導致接收官員提前上下其手，在兌換上投機倒把，無數淪陷區民眾手中的偽幣盡成廢紙，淪為赤貧階級；政府又對淪陷區採取教育「甄審」，不承認在淪陷區求學大學生的學歷，導致青年學生怨聲載道。抗戰勝利對國民政府而言，是修復自身形象的最佳機會，卻因接二連三的錯誤政策，使政府在短時間內喪失人心，聲望很快由高峰跌到低谷。[6]

儲安平將國民黨的接收回遷稱為「第二次淪陷」，用「一團糟」形容戰後重建工作。他說：「從我們後方的人來看，在任何方面，只覺得政府沒有準備，沒有辦法。軍事，軍事處處仰求美國的援助：空中運兵坐美國的飛機，水上運兵坐美國的軍艦，到頭，還要美軍在天津登陸。財政，財政弄得捉襟見肘，顧此失彼。收復區固然弄得怨聲載道，大後方也是一片紊亂。工業，工業沒有辦法，到處是停業倒閉，請求救濟。經濟建設始終拿不出一個成功的辦法。外國的工商業代表，到達重慶後，除交際外，竟無所事事，不得要領。交通，交而不通。迄今三月，連長江航運都未能恢復常態。」

他認為，戰後的重建工作之所以一團糟，是因為國民黨有病。貪腐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缺乏一種新陳代謝機制。

6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1–25頁。

在他看來，國民黨內有不少朝氣蓬勃、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黨員，他們談到國民黨，批評之烈甚至遠大於黨外人士，對國民黨改革之願望亦不可謂不迫切。但是，佔據國民黨高位的都是像閻錫山那樣「老朽、昏庸、封建」的過時人物，真正有抱負的年輕黨員反而被邊緣化，不受重用。這是一個進步的時代，應當有一種新陳代謝的淘汰機制。那些在體力和智力上已經沒有能力追隨時代的老人必須退休，以給後起之秀留出為國效力的機會，加快國家進步的腳步。[7] 當然，儲安平認為，國民黨本身已經形成一種惰性，若無壓力決不可能消除腐敗，更不可能改革老人政治。知識分子所應該做的是，領導輿論，用言論督促老邁的國民黨，使之革除弊端，完成建國重任。但是，他還意識到，知識分子的輿論力量固然重要，還需要其他政治力量相配合。最有實力的政治力量無疑是中共。

儲安平並不相信共產黨在短期內有能力取得政權，僅將其定位為國民黨的督促者和反對黨。他與共產黨並無深入接觸，但有肯定，也有希望。所謂肯定，那就是肯定中共的民生政策。國民黨自執政以來，人力物力都耗費在政治控制上面，並未真正實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共產黨承諾改革現狀，讓全國民眾都有飯吃有衣穿，縮小貧富差距。儲安平認為，如果中共真能做到其承諾，即使執政也未嘗真是壞事。所謂希望，他希望中共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黨，擁有武力卻不使用武力，在民主憲政的軌道下，合法宣傳他的主義，並監督國民黨，使其不敢胡作非為。[8]

在思考共產黨的問題時，儲安平常會聯想到英國工黨。1945年7月，工黨在英國大選中取得議會的絕大多數席位而成為執政黨。儲安平給《東方雜誌》撰寫了一篇特稿。他在文章中介紹

7　安平：《閻錫山》，《客觀》1945年第1卷第1期。

8　安平：《共產黨與中國政治上的需要》，《客觀》1945年第1卷第2期。

道，工黨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政策，以解決英國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但是，工黨又是一個在憲政體制下活動的黨派，採取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取得政權，絕對尊重人民的自由、權利和意志。其施政意在用有計劃的經濟和國有化手段重新分配財富，並提高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增進社會福利。[9]共產黨也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承諾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國共妥協，憲政成功，共產黨豈不是也可以在民主政治之下，像工黨那樣走一條通過和平選舉取得政權的道路？

不過，他對共產黨的態度仍然是複雜的。他看到，目前共產黨雖然沒有能力取得政權，但並不怕用武力與國民黨決一雌雄。[10]從表現上來看，共產黨擁兵自重，在前方要槍要錢要地盤，在後方破壞煤礦，拆毀鐵路，破壞交通，考慮的只是一黨的利益得失，而非如其宣稱的那樣，以國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為念。何況，共產黨決不能簡單地和工黨對等。在一個缺乏憲政傳統的國家內，如果真正由共產黨執政，民眾是否真正會擁有民主和自由不好判斷。他說：「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共產黨能否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我們何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出版物？」[11]儲安平目光銳利，在這個判斷上顯示出了驚人的準確。

不過，無論如何，儲安平都對國共兩黨給予最善意的期待，期待雙方都能拿出誠意，不要再打內戰，一切以國家大局為重。然而，內戰陰雲盤踞在中國上空，國內政局始終處於一種微妙的

9　儲安平：《英國工黨執政》，《東方雜誌》1945年第41卷第18期。
10　安平：《共產黨在爭取政權中所走的途徑》，《客觀》1945年第1卷第5期。
11　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客觀》1945年第1卷第5期。

狀態。國民黨在戰後接收失地的同時，共產黨也發佈命令要求「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12] 雙方的軍事方針針鋒相對。1945年秋，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談判，但與和談相伴隨的是前線的各種軍事衝突，呈現出一種又打又談、打打談談的複雜局面。尤其在一些關鍵的軍事戰線，國共雙方的衝突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有越打越大的趨勢。和談結束，雙方亦未能在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兩個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遂各自重新部署戰略規劃，劍拔弩張，兵戎相見。

但是，國內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不同意開戰，廣大民眾也反對內戰。在國際方面，英美蘇三方也都不支持中國繼續內戰，希望以國民政府為基礎容納國內其他政治勢力，和平、團結地推進中國的民主改革。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以強硬的措辭和明確的態度表示不支持內戰，並派馬歇爾元帥來華調停國共政爭。國民黨迫於美國和國內中間輿論的壓力，且意識到無法短期內消滅中共，遂考慮決定停戰。中共在軍事上處於弱勢，還不具備以武力推翻國民黨的實力，也支持停戰。雙方停戰後，重慶和談中約定的召開由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便成為當務之急。[13] 召開政協會議，意味着各黨派可以重新坐下來共同商議和平建國方案，解決重慶和談懸而未決的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問題。如果政協會議成功，下一步便是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這是使中國回到和平建國軌道的天賜良機，也是所有中間階層知識分子的殷切期望。儲安平當然要對政協會議有所建言。

政協會議中討論最核心的是政府改組問題。按照題中之義，

12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第29頁。

13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81–285頁。

國民黨必須結束一黨政府的局面，允許共產黨和其他小黨派加入政府，並佔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權。但是，各方就代表名額分配問題爭執不下，似乎有陷入僵局之趨勢。此時，儲安平在《客觀》上認為，這個改組顯然不能是一種分贓式的民主政治，不是各黨派按實力分配閣員，而是一種「精神改組」，那就是通過改組徹底實現民主政治，使每一個人都服從於這個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超出這個制度之上。由此，他對參加政協的在野黨代表提出建議。在他看來，這些代表如果在政府改組之後，不參加政府才是上策。如果這些平日裏批評政府的在野黨領袖，在改組政府之後，馬上參加政府，極容易被民眾誤解，以為他們批評政府無非是為了求官。那些反民主的人也會以此為把柄，大做文章，批評這些在野黨領袖。如果產生這種誤解，必將使民主受到污名化，對中國的民主運動產生不利的影響。他還認為，政黨活動和行政活動不同。從事政黨活動需要頭腦敏捷、口齒伶俐、行動果斷，從事行政活動需要精密周詳、任勞任怨、有效率和操守。平時縱橫捭闔的在野黨領袖，是否都能勝任未來的行政活動？每個人必須反躬自省，不要因為一己的得失和功名，毀壞國家的前途。另外，在野比在朝更自由，如果批評政府者進入政府，便無法再對政府的弊端進行批評。而且，若非像共產黨那樣在組織、群眾和主義三方面都有根基，一旦加入政府，一定會馬上被國民黨邊緣化，處於被動地位，喪失原來的優勢。[14]

儲安平對民主的理解，決非西方利益分配式的博弈政治，而是帶有強烈的共和主義色彩，那就是所有政黨都應該以「公」的精神，和衷共濟，共同為國家謀福利。這樣的觀點在他當年寫《給弟弟們的信》時即已初見端倪，到此時仍未改變，甚至終生未變。他認為，社會各有分工，各人能力高下不同，知識分子不

14　安平：《我對於所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非政府代表的一個重要進言》，《客觀》1946年第1卷第10期。

是萬能的，每個參政者都要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和弱點，發揚自己所長，迴避自己所短來為國家服務。每個人都應該視功名富貴如浮雲，注重操守。儲安平的政治觀點和思維方式，實在具有一貫性。

福利政治

這一時期，儲安平建言最多和最頻繁提到的一個詞是「福利政治」。正如他所言：「我個人對於政黨活動的興趣十分淡薄，而對於福利政治的興趣異常濃厚。政府的組織可以變，政府的政策可以變，政府的人選可以變，但政治的目的不能變，政治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障並增進人民的自由、權利和幸福。不論哪一批人來，哪一個黨來，總要認認真真揀幾件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事業，在為民謀福利的原則及目標下，大刀闊斧做一下。福利政治在各國都是佔第一位的。而福利政治在中國的需要尤為切迫，因為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實在太無保障，和現代國家的生活水平實在相差太遠！」[15]

儲安平開始談福利政治，實際仍是其國家民族觀念的一種表現。國家強大不僅是主權領土的獨立，更包括經濟繁榮，民眾富裕。而今抗戰勝利，中國獲得空前的國際地位，所需要繼續爭取的，當然是經濟繁榮，民眾富裕。他在《中央日報》時代曾關注民生問題，但當時還沒有出洋，沒有先進國家的樣板可以參照。而今，有了留學英國的經驗，目睹英國歷屆內閣都將「人民的狀況問題」放在第一位，他很自然地參照英國的經驗，談論改善民生的諸多問題。儘管其建議相當細緻具體，但方案不外乎三個字：「現代化」。

交通必須現代化：

交通是流通金融傳播的文化血脈，必須全力加強。不要只顧到

15　安平：《以不變應萬變》，《客觀》1946年第1卷第9期。

全國性的大動脈，應同時顧到城與城之間，城與鎮之間，鎮與鎮之間，以及鄉與鄉之間的短途交通。鄉村城鎮之間的交通發達以後，農村間的養雞、蔬菜、水果種植作業，自可逐漸發展，而農村經濟亦得日漸復蘇。此實大有助於一般農民的生活；生活裕後始能談教育，講衛生，增加常識。政府必須用全力來推動一個交通啟蒙運動。鄉村間的公路上即使還不能行駛汽車電車，但至少可以製造大量的自行車和三輪車，以行駛於鄉村間的道路之上。船舶也應竭力利用比較簡單的摩托機器，以增加航行的速率。我們應當設法將機器插入人民的實際生活中，我認為這是使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農業必須現代化：

今日我們對於農事的改革，至少應當具有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下，向農村機器化的方向進行。我們一時之間固然無法完全仿照高度工業國家之那樣什麼都用機器，但是我們應當考慮，是不是我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法以達到節省人工效率的目的。舉例言之，是不是我們可以利用橡皮管輸水的辦法，以代替完全用人工戽水的辦法？是不是我們可以利用比較簡單的機械，以馬或牛來拖行，從事翻土耕地以及收割穀子？是不是我們可以相當地擴大農村田畝的平面，減少交錯在田畝與田畝之間的田埂，一方面減少廢地，增加耕種的面積，同時可以適宜於各種比較簡單的器械或車輛，以從事耕種。

生活也必須現代化：

這種公用事業，自然應當由政府出面主持，一切內地河流的開浚，垃圾的運輸及消滅，傳染病的隔離，時疫症的撲滅，鼠的殺滅，公共廁所制度的建立……國家必須對於這種衛生費用，給予很大的預算，並能認真從事，勿徒作為門面的點

綴。……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從事廣大的衛生消防工作，同時我們要在根本上改變人民的生活頭腦，使他們明瞭日光、空氣及水的價值，使他們覺得衛生的重要，而養成一種自我清潔的習慣。……對於一般人民的住宅，也應加以指導，這種指導決不是問他要幾個錢才肯給他建築執照，而是在房屋的結構上，如式樣的美麗，避寒避暑的程度，日光的吸收，空氣的流通，耐久與安全，對於外部風景的點和等等，作合理的指導。[16]

當然，儲安平也不是無條件地談論現代化。比如中國城市普遍存在人力車，雖然以人拉車本身是不人道的方式，對現代城市似乎也有礙觀瞻，還經常釀成交通事故，但是人力車在東方社會存在有其社會背景，那就是國家沒有現代化，缺乏應用現代機器的能力，交通工具只能靠人力。人力車從原則上講應當消滅，但如果政府沒有能力改善交通工具，不能妥善地處理失業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人力車當然無法廢止，也不該禁絕。[17] 由此可見，儲安平的現代化觀點，不僅是以國家富強為依歸的現代化，更是以民眾幸福為依歸的現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民生主義已經日益成為他判斷一個政府具備合法性與否的標準。雖然他對國共在戰後的做法各打五十大板，但無論其中的哪方真正有誠意解決問題，尤其是解決戰後最急需解決的民生問題，他都不吝辭藻地加以稱讚。就如1945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了最高經濟委員會，目的在於實行民生主義，說明中央今後將大力推進民生的建設和發展，似乎真正顯示了政府尋求作為的魄力。儲安平評論蔣介石在經濟委員會成

16　安平：《交通啟蒙運動·耕耘方法的改革·衛生狀況·住宅問題》，《客觀》1945年第1卷第5期。

17　安平：《談人力車的廢止》，《客觀》1946年第1卷第10期。

立大會上的演講：「這是一篇完全談具體問題的演說。這是一篇完全談物質建設的演說。也可以說，這是一篇象徵我們的國家在結束戰爭以後必須步入另一個新時代的演說。」對蔣介石提出的充分訓練技術人員，懲辦貪污腐化之徒，承認私人的才幹等等，他都給予無條件的肯定。[18]

結怨聶紺弩

由於《客觀》的言論公正、批評犀利、建議理性，剛一出版即洛陽紙貴。第一期印刷了4500冊，在11月11日早晨進入市場，到12日晚已經售罄。報販紛紛請求續貨，雜誌社臨時勉強在一些書店收回若干，仍不能滿足需要。11日天降大雨，還有數十名讀者冒雨來到社址購閱。[19] 儲安平執筆的《敬告馬歇爾元帥》《動盪中的國民黨》等文章，甚至引起了陳誠的讚賞，差副官到雜誌社打聽儲安平。[20] 在第7期的編輯後記中，儲安平提到，隨着政府回遷，該刊不久將遷至京滬出版。[21] 這說明，《客觀》的運行狀況極佳，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他選擇在第12期出版後急流勇退，離開雜誌。為何他會突然有這樣的決定？一部分原因是和聶紺弩的矛盾。

儲安平與聶紺弩結怨，正是由於那篇他稱讚蔣介石演說的文章。聶紺弩曾是國民黨員，出身於黃埔軍校，曾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工作，如果留在黨內，日後獲得高官厚祿自無問題。但是，他卻對國民黨的腐化和官僚化十分不滿，最終逃離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並受中共委派，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一直

18　安平：《蔣主席的新演詞·人民的才幹》，《客觀》1945年第1卷第5期。
19　安平：《編輯後記》，《客觀》1945年第1卷第2期。
20　謝泳：《儲安平的編輯生涯》，《舊人舊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頁。
21　安平：《編輯後記》，《客觀》1945年第1卷第7期。

顛沛流離。聶紺弩到重慶後，受張稚琴委託，編輯《客觀》副刊。聶紺弩在副刊用稿上完全自主，本不必與主編儲安平發生關係，但他和儲安平的立場、見解差異頗大。儲安平雖然對國民黨並無好感，但出於國家前途和大局起見，仍以國民黨為中國政治的重心，對國民黨持一種「小罵大幫忙」的態度。聶紺弩對國民黨恨之入骨，欲推翻其統治而後快。而且，他終身反蔣，以蔣介石為獨夫民賊，凡是與蔣有關的一切無不反對，甚至到了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

不過，與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聶紺弩也不希望國共內戰，同樣認為抗戰勝利後中國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所以，他在《客觀》創刊號的副刊上發表詩歌《命令你們停戰》：

> 我們是中國的人民！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中國境內，無論山林、原野、沼澤、河流、大陸、海洋、天空、地底，都不許打仗！我們是主人，我們沒有叫你們打仗！誰叫你們打的！你說他先打你，他說你先打他，都不承認自己先打，不是你們自己亦知道，打仗就是罪惡麼？為什麼還打？你說他進攻你，他說你進攻他，都不承認自己進攻，不是你們自己亦知道，進攻就是罪惡麼？為什麼還進攻！戰爭是雙方的，我們要的是停戰，先停後停，我們都嘉許！不容推諉！不容強辯！更不容拖延日子！你們只管停戰，真正的戰犯，我們自會審判！命令你們停戰！誰遵守這命令，誰就是我們的忠僕！我們將承認他過去的榮名！現在勳績！將來的約言！我們將給予他，更多的權力！命令你們停戰，誰不遵守這命令，誰就是我們的叛徒、罪人、惡奴！他的一切仁義道德，花言巧語，我們都絕不相信！聽見沒有！命令你們停戰！[22]

22　紺弩：《命令你們停戰》，《客觀》1945年第1卷第1期。

聶紺弩在這首詩中將國共各打五十大板，被中共認為敵我不分而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教育。他以「主人」自命，「命令」雙方停戰，表現出一種文人的一廂情願和幼稚病。儲安平自《中央日報》時代就對舞文弄墨、嬉笑怒罵、陰陽怪氣的左翼作家和小知識分子缺乏好感，對聶紺弩的詩歌並不感興趣。不過他也無意批評，只是在《客觀》第2期的文章《內戰解決得了一切嗎》中感歎道：「可是悲哀得很，一談到現實，人民雖然反對內戰，而捨呼籲之一途外，竟無他路可循，呼籲始終是呼籲不是命令，今日中國人民還沒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內戰的人停止內戰！」儲安平此語也算持平而論，但是在敏感的聶紺弩看來無疑是對他的諷刺。他說：「《命令你們停戰》發表之後，頗引起了一些物議。本刊《客觀一週》的作者的諷示『今日中國人民遠沒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內戰的人停止內戰』。他認為自己『跌了一跤』，而且跌得非常慘重。[23] 因此，當儲安平在第5期發表讚許蔣介石的演講的文章後，聶紺弩立即在《客觀》副刊上發表了《傷風樓自語》一文指桑罵槐地說：「言論自由決不包含替宣講聖諭，演說《施公案》《彭公案》。」[24] 其後又含沙射影地發表了《韓青天》一文，重提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親自審案，被阿諛奉承者稱為「韓青天」的事，批評這種「闊人崇拜」心理。他說：「中國人的頭腦系統，當以為無論什麼知識，都是可以由一個人具備的。同時，封建的、君主專制的、官僚主義思想深中人心，形成一種闊人崇拜的心理，以為闊人就是具備一切知識的大知識者，以為闊人真是替人民伸冤的。」[25] 聶紺弩所說的「聖諭」，指的是蔣介石的那篇演講，「闊人崇拜」指的是儲安平稱讚蔣介石。這篇

23　紺弩：《感謝與寄慰》，《客觀》1945年第1卷第4期。
24　紺弩：《傷風樓自語》，《客觀》1945年第7期。
25　紺弩：《韓青天》，《客觀》1946年第1卷第9期。

文章明顯是針對儲安平來發洩心中的不滿。這正好印證了八十年代一位聶紺弩傳記作者所說的那樣：「儲安平發表了一篇吹捧蔣介石的文章，紺弩看不慣，就撰文罵儲。」[26]

諷刺的是，聶紺弩批評儲安平崇拜「闊人」，自己卻也在對其他「闊人」進行崇拜，而且不惜扭曲文意來為他崇拜的「闊人」辯護。1945年10月，在重慶參加和談的毛澤東將作於陝北的名篇《沁園春·雪》贈給柳亞子。不久，該詞經吳祖光之手在《新民報》晚刊發表，經《大公報》轉載後，在重慶廣為流傳。毛澤東在這首詞中歷數各代雄主「略輸文采，稍遜風騷」，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自況，頗有與歷代帝王比肩一爭高下之意。此文一出，引起了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層的震驚。重慶的知識分子亦表示驚訝。王芸生在給傅斯年的信中道：「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吳組緗說：「昨日《大公報》轉載毛澤東填詞《沁園春》一首。毛主一切為大眾，於文藝尤主『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卻作這樣的詞。毛反對個人英雄主義，而詞中充滿舊的個人英雄主義之氣息。看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霸主比高下，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與蔣先生爭勝，流露躊躇滿志之意。說山河壯麗，所以古今英雄都要爭霸、逐鹿，他亦自居於此類英雄之一。這些氣味，使我極感不快。」[27] 然而，這樣一首被知識階層普遍反對的詩，卻被聶紺弩刊發在《客觀》副刊上，而且附上了柳亞子等人的和詞，並自己做了一篇《毛詞解》。

聶紺弩說，毛詞中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實為象徵「日本法西斯強盜、漢奸政權、封建餘孽對中國人民的壓制」，「長城內外，惟餘莽莽，欲與天公試比高」指的是「強盜們、漢

26　周健強：《聶紺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頁。
27　謝泳：《關於沁園春·雪的兩則史料》，《南方週末》2008年5月7日。

奸們、封建餘孽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群魔亂舞」，「惜秦皇漢武」指的是毛澤東反問「強盜、漢奸、封建餘孽」：「你們想用武力統一中國麼？你們想做皇帝麼？你們以為可以成為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麼？你們錯了！那不過是歷史上的一些無知識、無思想的野蠻傢伙。他們過去了，他們的時代過去了，今天，不光是靠武力，光靠蠻橫可以得到天下的。」他說，毛澤東不可能以自己所否定的人物自況，即使自負，這個自負也是每一個現代中國人應該有的：「不想比過去了幾千年幾百年的獨夫民賊專制魔王們幹得像樣一些，那算什麼東西呢？」[28]他還和了一首不高明的《沁園春》，附在《毛詞解》的文後。

聶紺弩的言論引起了重慶知識界的批評，認為其過於強詞奪理，有失客觀性。儘管《客觀》是一個同人刊物，文責自負，各位編輯的觀點並不一致，但毛詞和《毛詞解》一出，無疑給刊物籠罩上了一層紅色，使其帶有政治傾向性，對雜誌構成了一種不良影響。聶紺弩在批評政府的時候不遺餘力，一味抹殺，但面對他人對自己所屬黨派領袖的批評，卻不顧客觀情況一味辯護。而且，他在內部與儲安平打筆仗，作無謂的意氣之爭，實在是短視的文人之舉。可以想像，儲安平必然會覺得聶紺弩難以共事，並萌生出走之意。

當然，也並不完全是聶紺弩，其中還應該有主事者張穉琴的因素。儲安平後來在回顧自己出走的原因時說：「有許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瞭為什麼我們驟然放下《客觀》，另立《觀察》。我們無意在此追述那些業已過去的瑣碎事情，只能就原則上補敍一筆。我們平常有一種基本的理想，即立言與行事應當一致。假如一個言論機構，在紙面上，它的評論頭頭是道，極其動聽，而這個言論機構的本身，它的辦事原則和辦事精神，與它所發表的議論不能符合，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極大的失敗。假如我們主張政

28　紺弩：《毛詞解》，《客觀》1945年第1卷第8期。

府負責而我們自己做事不負責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們自己腐化，這對於一個懷有高度理想的人，實在是一種難於言說的苦痛。當時的《客觀》只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29]

商人和知識分子在辦刊的理念、邏輯、路線、風格、追求上難免存在着不一致。儲安平此語，或許也在指主辦者張稚琴有「腐化」和「言行不一」之處，即張稚琴辦刊，很可能是將其當作自己博取名利的一種手段。當時已經有人指出，《客觀》影響日大，陳誠命副官召見主事人，有意將其延攬入政府。張稚琴對此事頗為熱心，甚至捷足先登云云。[30] 聶紺弩也評論張稚琴常接受各種政治勢力的資助：「拿這個資本(指辦報刊)向國民黨鑽，和當地的、和過路的有點什麼的人勾勾搭搭，主要的是勾錢，借報勾錢，勾錢養報。」[31] 如此看來，儲安平覺得張稚琴並非理想的合作者，也不屑與之合作。

不過，儲安平的出走，也並不完全是負氣離開，而是他有更大的雄心。他看到，無論政局走向如何，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已是不可避免之事。政治重心一旦東移，陪都重慶馬上將失去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他要提前復員，提前去上海，在中國新的文化中心籌辦一種新的刊物，佔領一個言論陣地，使之在中國的公共輿論舞台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儲安平在這一點上，有着其他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深謀遠慮。

29 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觀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30 士司：《觀察〈觀察〉儲安平》，《人物雜誌》1947年第7期。

31 聶紺弩：《歷史交代》，《聶紺弩全集》第11卷，武漢出版社，2004年，第18頁。

第十章　輿論建國

> 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真正的「建國工作」！
>
> ——辛勤·忍耐·向前，1947

籌備《觀察》[1]

1946年1月17日的《客觀》編輯後記中提到：「編者事忙，本期《客觀一週》請吳世昌先生代筆。」[2] 所謂事忙，實際指儲安平此時已着手於創辦新刊事宜。他創辦新刊，主要建立在兩個預測之上：其一，抗戰勝利，百廢待興，國內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中心刊物，但是中國擁有一大批自由知識分子，他們需要有地方說話；其二，中國的知識階層絕大多數都超然於黨爭之外，只要刊物無黨無派，內容充實，一定會贏得讀者的歡迎。[3]

如果說加盟《客觀》是他的投石問路，籌備新刊則是押上全部賭注。名列新刊發起人者，除了儲安平，還有錢清廉、伍啟元、吳恩裕、陳維稷、笪移今、吳世昌和雷柏齡。錢清廉、陳維稷、吳世昌是《客觀》的編輯，伍啟元(清華大學教授)、笪移今(上海銀行經濟研究專員)、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是《客觀》的主要撰稿人。雷柏齡是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的學生，知悉老師創

1　關於《觀察》的研究成果極多。本書的處理方式是，着重講述前人忽略的部分。
2　安平：《編輯後記》，《客觀》1946年第1卷第11期。
3　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觀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辦新刊，毅然辭去中學校長之職，說服父親變賣祖田，資助儲安平並追隨左右。

這些人都是普通知識階層，沒有雄厚的財力，只能採取集資辦刊的形式。八位發起人於1946年1月6日在重慶召開會議，定刊物名為《觀察》，向社會申明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種辦刊立場，公開徵股。儲安平預算，每期雜誌成本約50萬元，如果有600萬元可着手辦刊，為保險起見，要有1000萬元才能確保順利運行。然而，戰後物價飛漲，工薪階層貧困，說服大家投資文化註定非常困難，他的籌款並不順利。讓人欣慰的是，很多《客觀》的讀者表示願意入股新刊。儲安平勸他們慎重考慮，如果是節衣縮食拿出的股本，他無法心安理得接受。他還勸告讀者，與編者未曾謀面，似乎也不能單憑《客觀》的文章水平便對《觀察》寄予信任。雖然如此勸告，仍有一位讀者在薪水中抽出5萬元入了一股。

集資的同時，儲安平開始邀請撰稿人。他想辦的是「明星刊物」，走的是上層路線。光華時期的老師潘光旦、張東蓀、吳澤霖、何永佶、沈有乾，同學趙家璧、沙學浚，《中央日報》時期的作者季羨林、宗白華、周子亞、張沅長、郭有守，英倫時期的朋友戴鎦齡、樓邦彥、費孝通、鮑覺民、黃正銘、夏炎德、蕭乾，中央政治學校結識的陳之邁、王贛愚、馬寅初，國立師範學院期間的同事錢鍾書、高覺敷，《客觀》時期的楊人梗、戴文賽、陳瘦竹、陳衡哲、任鴻雋、李浩培、陳友松、馮至、蕭公權、呂復等，都列入「擬約撰稿人名單」。除此之外，他還向淵源較淺，但在學界享有盛名的馮友蘭、雷海宗、傅斯年、錢端升、韓德培、張忠紱，在報界大名鼎鼎的王芸生、許君遠、徐盈、李純青、楊剛、趙超構，政府內的學者型公務員孫克寬、葉公超、錢能欣、程希孟等發去「擬約撰稿人」的函件。

他在邀請信中附有申明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義的發起

函和一封擬好的覆信。撰稿人只須在覆信的「遵約擔任」或「不克擔任」兩者擇一寄回即可。大多數函件還附有儲安平的親筆長信，他用最大的熱忱和誠懇邀約大家共同為國家的命運出力。擬約撰稿人中，除了一位回函拒絕，八位沒有回信外，其餘皆函覆同意，並附有私人郵件鼓勵。

1946年3月，儲安平攜帶子女及募集到的一小部分股金，搭乘中英文化協會的飛機由渝飛滬。到上海後，儲安平通過已復員的陳維稷、端木愷等幫忙集資徵股，[4] 又回宜興變賣了祖母留下的一百畝良田。[5] 經過多方周折，到7月底股款大體收足。據統計，至9月刊物開印前夕，共有款項240股，1200萬元。其中儲安平20股，沈昌煥20股，伍啟元、吳世昌、笪移今、錢清廉、顧翊群、端木愷、陳銘德、陳維稷各10股，總計600萬元。[6] 據不完全統計，其他投資入股者有：秦德芳、吳中一、陸菊森、馮覃燕、雷柏齡、陸靜孫、曾憲立、戴文賽、陳澄之、儲百福、羅吟圃、潘光旦、盧順慰、王冠保、劉新志、徐少緒等。[7] 據說，馬寅初、梁實秋、錢鍾書、楊絳等也佔股份，但應是後來入股，這說明股東經常變動。[8]

其中有四位股東值得一提。

沈昌煥，光華大學1929級校友，時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甚得倚重。沈昌煥在1946年日記中四次提到「安平」，與他面談、通信或接待他來南京，陪他遊覽風景名勝，可見私交極好。[9] 沈

4　端木俊民、端木偉民：《緬懷我們的父親——端木愷(鑄秋)先生的一生》，《端木愷校長紀念集——紀念先生一百晉一歲冥誕》，第714頁。

5　何雨文：《懷念儲安平》，《天文台》1957年6月22日。

6　《觀察週刊社概況調查》，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聯合徵信所檔案，檔號Q78215196。

7　陳正卿選編：《觀察週刊社史料一組》，《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6期。

8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165頁。戴晴說儲安平僅認購1股，笪移今一人認購48股，前者錯誤，後者沒有切實證據。

9　周琇環、蔡盛琦、陳世局編：《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1946》，台北：國史館，2013年，第43、61、204、257頁。

昌煥是國民黨內的開明分子，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卻對國民黨腐敗、政府無能、官吏慵懶奸猾痛心疾首，頗有改革之志，遂大力支持儲安平。其後，每次儲安平去南京打探新聞，都住在沈昌煥家。[10] 沈昌煥哲嗣沈大川先生言，其父與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李惟果交厚。[11] 毫無疑問，後來《觀察》多次擬遭中宣部查辦卻絕境逢生，背後多半有沈昌煥挽回之功。端木愷，上海灘著名大律師，1947年後官至司法院、立法院秘書長。《觀察》登記註冊時，端木愷曾親自寫信給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開先請其照顧。[12] 其後成立觀察社，他受邀擔任理事長。後來政府下決心封刊抓人，端木愷竟通風報信，暗示儲安平逃往北平，得以倖免於難。笪移今，九三學社社員，受中共委派，在上海從事秘密反蔣活動。陳維稷，公開身份是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中國紡織廠第一印染廠廠長，實際是中共特別黨員，受中共上海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委派，負責工商界的統戰工作。沈昌煥與端木愷和儲安平是老朋友，資助辦刊多半出於朋友的信任與道義。陳維稷和笪移今與儲安平是新相識，以金錢資助卻隱藏身份，其用意如何，不言自明。

集資股份的同時，儲安平多方奔走租賃房屋。抗戰復原後，淪陷敵偽的房屋或物歸原主，或被接收大員侵佔，沒有金條，租房比登天還難。1946年4月23日，儲安平以「觀察週刊社」之名致函「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請求在敵偽房產中指撥一幢房屋作為社址。事過三月，對方沒有正面回應。儲安平再次去函催促，對方仍然沒有回應。幾經周折，才在朋友的幫助下，租得牯嶺路34號的一處小房產，租期半

10 孫承佩：《揭發儲安平並駁斥黨天下》，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編：《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發言專輯》，九三學社，1957年，第61頁。

11 沈大川先生訪問記錄，台北，2013年12月7日。

12 《觀察週刊登記申請書》，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社會局檔案，檔號Q61216059。

年，每月租金20萬元。[13]《觀察》暫時有了落腳之處。

儲安平自述，正在積極籌備股份、租賃房屋的時候，南京方面兩次以「高級公務員見委」，但被他婉拒。實際上，橄欖枝並不是來自中樞，而是來自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他派人來滬訪儲，轉達延攬之意。但是，儲安平婉拒了這個委任。他在5月30日給錢昌照的回信中說：「資源委員會先生全力主持，前後十年，成績昭著，中外傳頌。若得追隨左右，朝夕請益，藉求提攜，幸何如之。平在滬籌備之事，規模甚小，經營至艱，前途成敗尚不可知，惟既努力數月，若中途放手，不僅有違平之立身器度，即向之期望於平者亦將以為平不耐澹泊，此亦非所以報先生之道，思維再三，甚為歉悵，謹具寸箋，肅致謝忱，異日如有機會再圖報命。」[14]

他瞭解官場的不自由，不願做官，只是在8月接受了國立復旦大學的聘任，擔任政治學系的專任教授，並在新聞系兼課。[15]儲安平始終抱着用言論影響政治的理想，相信以超然在野之身為國效力，作用未必會低於在政府擔任一個部長。在上海這個遠東第一豪華都市中，他孤單而清苦地堅守。這些堅守的日子幽暗、落寞，但他心中始終有一盞希望的明燈，這盞燈掛在他的心底裏，「吹不滅，搶不掉；這盞燈發射光亮，衝散着周圍的昏暗。」[16]

一個人的雜誌

《觀察》和《努力週報》《新月》《獨立評論》不同，發起

13　《觀察週刊社為海寧路百官街四號房屋糾紛致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函》，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檔案，檔號Q30120495。

14　《儲安平致錢昌照函》，《資源委員會錢昌照一九四六年來往函件及電報(三)》，台北：國史館藏，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003000003919A。

15　《國立復旦大學一覽》，復旦大學，1947年，第34頁。

16　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觀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人各有職業，分散在外埠，只是入股資助，並不插手具體事務。《觀察》也不存在編輯討論會，雜誌的約稿、審稿、編輯、出版，儲安平全部親力親為。諸如調度款項、核對賬目、人事管理、購買紙張、設計版面、招徠廣告、校閱大樣以及一切對外事宜，儲安平更要親自過問、處理。雜誌社包括雷柏齡在內的數名員工，只負責發行之類的打雜工作。至於《觀察》封面下方列舉的撰稿人，也只是與儲安平單線聯繫，負責提供稿件。儲安平將撰稿人名單印在封面，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增加雜誌的份量，造成一種聲勢；二是讓撰稿人從心理上對雜誌感到親近。從這個角度講，《觀察》雖然是全國知識分子的公共論壇，卻也是儲安平一個人的雜誌。年僅37歲的儲安平就像一個舵手，決定着刊物的立場、風格和思想傾向。

《觀察》的發刊詞《我們的志趣和態度》，基本是《客觀》中《我們的立場》的翻版。其辦刊的目的，仍是知識分子以獨立身份評論國事，用言論影響政治，促進中國的進步。週刊的基本立場仍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只是在個別解釋和表述上與《客觀》發刊詞有所更易。略有不同的是，儲安平為《觀察》增加了一個新的宗旨，那就是「希望對於一般青年的進步和品性的修養，能夠有所貢獻」。他說：

> 今日大多數青年，不是偏狹衝動，厲氣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們瞻念國家，中心憂懼，莫此為甚！我們都是愛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們對於青年，一無成見，他們信右信左，盡可信其所信。我們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發較之思想的歸宿，遠為重要，所以信從一種政治上的思想，必須基於理性而非出於感情。而於重視自己的思想自由時，亦須同時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我們國家一線前途，全繫於今日一般青年肩上。衝

> 動、偏狹、強橫，都足以造亂而不足治亂；自私、麻木、消沉，帶給國家的是死氣而非生氣。我們極望這一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態度、氣息，能給一般青年讀者以有益的影響。[17]

當然，這並不是說儲安平有意對青年思想作具體指示，更不代表他打算做訓練青年的組黨工作。他做的只是一種啟蒙工作，通過影響青年的思想，來改變國家民族的命運。

《觀察》篇頭設置的「專論」欄目是刊物的重頭戲，長達四五千字，一般由儲安平約重要學者執筆。在政治和內政方面，有王芸生預測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吳世昌論述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的關係，蕭公權討論自由主義的內涵和外延，傅斯年評論內蒙古的自治問題，張東蓀回顧為建立聯合政府奔走的經歷，還有費孝通談美國對華政策，梁漱溟談為何中共拒絕和談，朱自清談知識分子何以對現狀不滿，陳之邁談如何進行經濟改革，吳晗談中國式的代議制度，季羨林談民社黨與青年黨等等。在經濟方面，有伍啟元講中國的經濟形勢，戴世光講未來的經濟走向，笪移今分析物價的變動，馬寅初講土地稅，胡先驌談改造經濟，陳志讓辨析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異同等等。思想教育和文化方面，最常見的是潘光旦、費孝通、陳衡哲、梁漱溟、張東蓀、吳恩裕等人針對自由主義、憲政與民主、中國文化、紳士與知識分子等問題的反復辯難和學術討論。

其後是「特稿連載」，連載名家們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思想問題的著作或長文，相對而言比較學理化。連載之後輪流出刊的欄目，有「科學叢談」，供理科出身的名家撰寫科普文章，「生活與文化」，登載名家的文化小品文，「海外通信」，供海外撰稿人郭有守、楊剛、錢能欣、陳之邁等議論世界局勢，或託

17　儲安平：《我們的志趣和態度》，《觀察》1946年第1卷第1期。

特約譯者翻譯英美學者的最新宏文。再之後是「觀察通信」，刊載全國各地特約記者發來的獨家報導。最後是「文學、藝術、戲劇、音樂」，以活躍點綴刊物之用。尾頁是「讀者投書」(後來更改到首頁)，刊登無名讀者的來信。他將《觀察》定位為「硬性的高級刊物」，卻知若所有文章都過於硬性，一定會影響銷路，這便需要軟性的一面加以調和。

其中精彩程度不次於專論的欄目是「觀察通信」，類似一種深度採寫，專門報導有價值、有影響的事件，使讀者瞭解從其他刊物上無法獲知的真相。「觀察通信」一般約各地記者採寫，撰稿人遍佈南京、北平、天津、杭州、重慶、成都、漢口、昆明、長沙、蘭州、西安、迪化、康定、西寧、長春、台北等地，其中既有徐盈、浦熙修、張高峰等知名記者，也有任職於地方報紙的徐景星、馮覃燕等無名記者，還接受一般讀者的投稿。知名記者多以南京政界和北平學界為關注焦點，表現的是國民黨的官場百態；一般記者負責偏遠地區的報導，如新疆、青海、蘭州、東北、台灣等地，展現的多是戰後各地經濟極度凋蔽、民生殘破不堪的狀況。一般讀者投來的，多半是戰亂中的個人遭遇和廣大民眾在死亡線上掙扎求生的慘況，讀起來觸目驚心。

這些「特約記者」，多半是經儲安平篩選考察後，受邀長期為《觀察》寫通訊。時任天津《民生導報》記者徐景星在文章中透露了儲安平聘任「特約記者」的情況。他回憶：「編報之餘，嘗試向外地比較著名的報刊投通訊稿，當時《觀察》暢銷數萬份，自然成為我投稿的首選目標。我給它寄去的『天津通訊』很快登出來，隨即寄來稿費和聘書，主筆儲安平親筆寫信聘我為天津特約記者。其辦事效率之高和對於無名作者之尊重，使我感動。我為《觀察》供稿並不多，絕想不到儲安平會來天津找我。1946年9月或10月的某一天上午，我正在樓上編輯部看稿子，樓下經理部喊我，說有人找。我跑到樓下來看到一位紳士模樣的人

站在那裏，西裝筆挺，皮鞋鋥亮。他脫帽向我致意，我看到他的頭髮油光熨帖，一絲不亂。我自報姓名。他也自報：我是儲安平。態度高雅而親切。」[18] 儲安平以禮賢下士的態度對待特約記者，並給予千字四千至八千元的稿費，記者自然會被其精神感動，盡最大努力寫稿。

《觀察》的自我定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以「高級知識分子」為閱讀對象。這些人一般都受過大學教育，在政界、文化界、教育界、銀行界任職。按照《觀察》對訂戶的調查，具體身份有「主任科員」、「稅吏」、「秘書」、「銀行職員」、「軍佐」、「工廠技術員」、「日報主筆」、「醫師」、「著作家」、「警察」、「大學講師」、「新聞記者」、「會計」、「氣象員」、「郵務員」、「律師」、「合作社社員」等，他們被視為這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具有開明的態度和現代化頭腦。儲安平認為，應該培植中產階級，讓他們都能關心國事、過問國事，形成一股決定性的政治力量，方能穩定時局，促進中國變革。

《觀察》預設的讀者也包含政府的高級官員。儲安平一直希望通過影響政府的高級官員，直接促進政治的變革。由於沈昌煥等人在《觀察》出版前便大力推薦，很多政府高級公務員都訂閱《觀察》，立法院院長孫科還專門來函訂閱雜誌。據政府內的朋友回饋，至少有六至八位國民政府的特任官員閱讀《觀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可能也會偶爾閱讀《觀察》。至於全國各地中上級官員閱讀《觀察》的，不可勝數。[19]

18　徐景星：《我與觀察儲安平》，劉瑞琳主編：《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9–40頁。這個回憶時間有誤，應為1947年。

19　儲安平：《323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觀察》1947年第2卷第12期。



1947年上海報亭出售的《觀察》



反映《觀察》同人被捕入獄的木刻

中間路線

當然，《觀察》能夠受歡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一開始便以犀利論政的姿態出現在國人面前。就如儲安平，議論時局、批評當道毫不留情，仍像《客觀》一樣，開篇便將國民黨的統治定性為「失敗的統治」：

> 國民黨一黨專政，前後垂20年。20年執政的結果：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愈來愈艱難；一般社會的道德生活愈來愈敗壞。言軍事，我們根本談不上國防，人家已走進原子和雷達的世界，我們還停留在步兵和機關槍時代。言政治，這幾年來政治的技術大有進步，德國式的集中營和英美式的參政會，無不隨時應變，應有盡有，但政治在本質上則愈來愈開倒車，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無改善，而政治道德尤見江河日下。至於經濟改革、土地建設，這一切有關民生的大問題，大都空言多於事實，計劃多於時效。從來沒有見到政府有興趣和決心推行過任何全國性溫和的社會改革。二十年來中國的執政者，只有在徵稅和壯丁兩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幾不復佔到任何重要地位！

他認為，國民黨只對鞏固政權感興趣，在維穩方面耗費了無數人力物力。由於將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控制上，在積極的國家建設方面便無所作為。他預言，若繼續積極控制，消極建設，必然導致人心憤怒。人心憤怒導致政權動搖，政權動搖促使統治者收緊統治，收緊統治則進一步加劇人心憤怒。惡性循環的結果便是統治全面崩盤，不可收拾。因此，他呼籲國民黨，不要只考慮如何消滅敵黨，應該趕緊做幾件像樣的事情，讓沒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沒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沒有

飯吃的能有飯吃，只有這樣才能人心歸附，挽回危局。[20]

在他看來，國民黨一直以共產黨為最大敵人，卻很少自我反省，正是自己培植了共產黨。或者說，對南京政權人人厭惡、個個離心的現象，完全由國民黨造成。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本不反對國民黨，然而政府暮氣沉沉、貪污腐敗，讓他們深惡痛絕。工商業者本不反對國民黨，然而官員上下其手、處處侵佔，使他們經營艱難。公教人員本不反對國民黨，但待遇刻薄、壓制言論，使他們熱情全失。一般市民本不反對國民黨，但經濟失策、物價飛漲，使他們怨聲載道。然而，國民黨卻沒有想過收拾人心，只是一味迷信武力，大打內戰。這樣的結果只能是間接為其對手共產黨增加聲勢，將更多的人推向左傾，進而瞭解同情共產黨。

當然，儲安平對國民黨的批評，實際是一種「消極的容忍」。[21] 這決不意味着他要支持共產黨。他對共產黨不夠瞭解，但憑直覺認識到，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政府」口號，不過是取得政權的一種宣傳策略，高喊民主，也無非是借民主之名，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對國家和人民，共產黨並不比國民黨更有誠意，他們仍是為自己的軍隊和地盤考慮。他們表面上呼籲和平，實際也不惜開戰，不怕與國民黨一決雌雄。如果共產黨取得政權，知識分子的處境可能更為不利。儲安平在《客觀》時期就預測到，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知識分子不可能獲得意志自由和言論自由，也不會允許批評共產黨的言論存在，如今他用一句精準的預言概括了這一說法，那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22]

既不滿於國民黨，也不認同共產黨，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何

20　儲安平：《失敗的統治》，《觀察》1946年第1卷第3期。

21　杜邁之：《再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兼評觀察週刊與世紀評論的幾篇文章》，《文萃》1947年第23期。

22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處？誰能穩定中國的局勢？儲安平此時明確提出是第三勢力。所謂第三勢力，包括民盟，以及散佈在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知識分子。不過，他並不看好處於國共之間的民盟。他認為，民盟只是一個以反對國民黨為情緒勉強集合起來的鬆散組織，成員貌合神離，領導者或是過時人物，或在能力上有致命缺陷。他對民盟與共產黨唱和的立場也不太認同，認為現在共產黨處於劣勢，才以民盟為團結對象。但若有朝一日共產黨取得政權，未必會與民盟再有這般緊密的關係。所以，無黨無派、態度中立、散佈在各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或許可以成為穩定時局的力量。他們沒有槍桿，沒有組織，但有思想的優勢、輿論的優勢和道德力量。他大膽判斷：

> 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為大家怕共產黨，怕他們那一套殺人放火的暴行。無論這種畏懼是不是出於一種誤會，總之大家在畏懼共產黨。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自由思想分子。國民黨的腐化已是眾目昭彰，有口皆碑，無論三民主義這塊招牌如何，總之人民對於國民黨已難維持希望的信心。在這兩種趨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中心附和。[23]

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出來領導，獲得一種中庸的穩定，呼籲的實際是一種「中間路線」。這在當時是知識分子的普遍看法，認為國共兩黨分別代表中國社會的兩極，社會基礎都不算雄厚，中間派所代表的是社會中廣大的中間階層，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24] 不過，這只是儲安平等一廂情願的想像，他對此問題的認

23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24　衛春回：《理想與現實的抉擇：中國自由主義學人與中間道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98頁。

識相當模糊。知識分子各自為政，自由散漫，很難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力量。大概在儲安平看來，在這個「犧牲自己，為後代造福」的時代，像自己這樣挺身而出，召集知識分子為國事發言，努力替中國造就一種「不偏不倚」的輿論，便已經是一種朝此方向努力的表現。一般人也對儲安平的這種做法表示稱讚，如陳衡哲在給儲安平的信中說：「日前拜讀創刊號中之《我們的志趣與態度》，感到無上欣慰。國事如此，社會一般情形又如彼，若非有後起英秀如先生者，我等之灰心將更無法挽救矣。」[25]

這種「中間路線」，也被時人稱作「第三條道路」。在政治、經濟方面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間制度。在政治上，應該較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在經濟上，應該較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採取自由民主，但不要資本主義，採取社會主義，但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在國際關係上，要調和美蘇，不做任何一方的附庸，走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之路。儲安平是「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之一。《觀察》的主要撰稿人費孝通(39篇)、張東蓀(23篇)、吳世昌(22篇)、潘光旦(18篇)、樓邦彥(15篇)、吳恩裕(9篇)，儘管每個人思想都不盡相同，但與儲安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基本都是「第三條道路」的擁護者。

在《觀察》上，他們發表了大量文章討論「第三條道路」的理念與主張，並吸引了大量作者來稿參與討論。其中張東蓀的《知識分子與文化自由》《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平等與剷除剝削》《增產與革命——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後》，潘光旦的《讀自由主義宣言》，樓邦彥的《論官吏的民權》，蕭公權的《說民主》，吳恩裕的《自由乎？平等乎？》《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鄒文海的《民主政治與自由》，楊人梗的《自由主

25 《作者·讀者·編者》，《觀察》1946年第1卷第9期。

義者往何處去》《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李孝友的《讀「關於中國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施復亮的《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都已成為經典文獻。這方面的研究已成老生常談，在此不予贅述。我們只討論儲安平個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以便瞭解其思想傾向，並為他最後的政治選擇提供某種解釋。

在自由和國家之間

眾所周知，《觀察》時代的儲安平以自由知識分子自命，《觀察》被視為中國大陸最後一份自由主義刊物，但儲安平的自由觀是怎樣的？自由主義究竟在儲安平的思想譜系裏佔有多大的份量？以往的學者常常先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預設，再去討論他的自由觀，這種處理方式存在的問題不小，還有繼續討論的餘地。

如果從學理上講，儲安平的自由觀，基本是ABC的水平，並無任何創造性突破。如他對自由的論述：「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26] 從這段話可知，儲安平的自由觀不以個人為終極價值，而是認為自由的目的是促進國家的進步。這種功利主義的自由觀決定這樣的意識：自由並非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國家的進步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由便是可以取捨的某種價值。

他對民主的認識也很類似：「爭取民主，就是希望國民黨開

26　儲安平：《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觀察》1946年第1卷第11期。

放政權，使國內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機會過問國事，為國服役。就知識分子與國民黨的關係言之，在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裏，並不是要打倒國民黨、排擠國民黨或消滅國民黨，而是希望能聯合國民黨共同從事建國大業。」[27] 從這段話可知，儲安平的民主觀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他認為多黨存在的意義，並不是為了讓更多的利益主體分享權力，而是讓更多的人有機會過問國事，為國家服務。民主政治決不是爭權奪利，而是一種大公無私、唯才是用的政治。在野黨參加政府是為了實現政治主張，而不是解決飯碗問題。參政者必須德才兼備、能力卓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這種民主觀決定這樣的意識：民主政治與議會、選票未必相關，如果多黨政治只是湊人頭充門面，還不如開明的一黨執政。只要執政黨能大公無私、容納異己，未必不如西方政黨輪替式的民主政治。

相對於可以取捨的自由民主觀，儲安平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儲安平幾乎在《觀察》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國家。實際上，他創辦《觀察》的目的也絕不是宣揚什麼自由主義，而是為了挽救國運：

> 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在這樣一個混沌悲痛的歷史中，有志之士，實應挺身而出，不顧一己的得失毀譽，盡其天良，以造福於他所屬的國家。[28]
>
> 我們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國家做的，不是為了我們做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我們創辦本刊的目的是替國家造福，我們絕不忘

27 儲安平：《論張君勱》，《觀察》1947年第1卷第19期。
28 儲安平：《我們的志趣和態度》，《觀察》1946年第1卷第1期。

懷我們最初的動機。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一種真正的建國工作！[29]

有關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項，在當時曾經佔據過我的心靈，就是國家的前途。我們當時曾經確切的感到，萬一我此去一悶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實莫過於今日我們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軌道的一點。[30]

我們必須本着我們的良心，為祖國的前途努力奮鬥。我們一切都為了國家，除了國家，我們另無其他。[31]

從九一八之後儲安平南京請願、北上抗日，抗戰時期拼命鼓吹抗戰建國的表現來看，可以想像戰後儲安平這些話語的真誠性。他期盼的是，抗戰勝利後中國成為獨立、富強的世界大國，走上一條民族復興之路。然而，美國不斷過問中國的內政，國民黨也習慣於依賴美國、宗主美國，希望在美國強大武力的支持下，消滅國內一切反對勢力。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尊嚴感的知識分子，儲安平尤其不能容忍這一點。因此，《觀察》期間他曾多次對美國以及附庸於美國的國民政府予以激烈批判：

我們根本反對任何一個外國來過問中國的內政。但是我們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沒有能力，20年的統治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局面，到頭要外國人來調節……我們全中國人民的人格尊榮，實在給那些台上的人物剝光殆盡了！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美國人，橫衝直撞，任意毆打學生，調戲婦女，碾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國。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國走；在經濟上，沒有錢就向美國要；在內政上，請美國參

29　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觀察》1947年第1卷第24期。
30　儲安平：《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觀察》1947年第2卷第9期。
31　儲安平：《風浪·熬煉·撐住》，《觀察》1948年第3卷第24期。

> 加和談。我們幾乎可以誇張地說，今日中國在精神上實已亡於美國了！[32]

1947年6月，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在接見記者時，指出蘇聯在東北支持中共活動，違反了《中蘇友好條約》。然而，孫科卻不敢以國民政府的官方名義向蘇聯提出抗議，而是寄希望於美國有所表示，並希望美國援助中國軍火。孫科認為，如果美國不理中國的要求，就等於事實上放棄中國，讓蘇聯勢力侵入中國。儲安平對國民黨這種缺乏民族自信，喪失民族氣節的行為大為不滿，批判道：

> 假如在這一個國際問題中居於最主要地位的中國，不首先負起責任來直接和蘇聯解決困難，卻只希望美國有所表示，我們認為此種態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們應當自己先挺起來，然後希望人家來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來替我們撐腰，替我們收拾，這種心理和作風是要不得的。再進一步說，中國自有其主權，自有其獨立的國格，對於任何一個外國的對華關係，根本談不到什麼放棄不放棄。按照孫氏談話，不啻公開認為中國已是別國勢力之內的東西，所以假如甲國放棄中國，中國只好投到乙國的勢力中去。我相信沒有一個有自尊的中國人能夠接受孫氏這種論調。[33]

1947年10月，美國前駐蘇大使蒲立特訪問中國以後，在《生活》雜誌發表了萬言訪華報告。他在報告中主要講了如何反蘇防蘇的問題，認為目前對美國而言，蘇聯是最有可能統治中國的威脅勢力，意欲利用中共奪取政權，將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由

32　儲安平：《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觀察》1946年第1卷第11期。
33　儲安平：《讀孫科談話》，《觀察》1947年第2卷第18期。

此，他建議美國政府必須對國民政府進行全盤援助，給予軍事支持和貸款，將共產黨驅逐出去，防止蘇聯霸佔中國。蒲氏的演講，使國民黨心花怒放，似乎拿到了必殺王牌，認為美國真正下決心支持國民黨剿共，遂不惜工本將全文用電報拍回，在全國廣泛宣傳。

儲安平異常憤怒於蒲立特的報告：

> 蒲氏不願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然則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在過去幾年中，到底是蘇聯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還是美國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假如每一個國家，都恐懼別的國家控制中間某一個國家，大家都要採取行動以防止對方國家統治這某一國家，則世界還有什麼和平？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美國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脅着中國的獨立與自主，業已成為一個世人共同感覺的事實。[34]

儲安平對美國的更大不滿在於，美國雖然在國內奉行自由主義，對外仍舊執行帝國主義霸權政策。儲安平認為，美國是民主國家，如果支持國民黨，本應督促這個政府走民主之路。但國民政府並無走民主之路的跡象，美國卻仍繼續支持這個政府。美國的立國思想是自由主義，而今中國社會上的自由分子，在思想傾向上本來親和於英美，卻沒有見到美國給予他們實際的聲援和支援。他窺到了其中奧妙，顯然由於美國的偏私。那就是在美蘇對立的兩極格局下，美國出於國家利益，必須要扶持明確反共的國民黨，使其成為對抗蘇聯的橋頭堡。如果轉而扶植自由主義者，就可能會削弱中國反共的勢力，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利。[35]

綜上所述，可以下結論說，內戰時期的儲安平，在自由主義

34　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第3卷第9期。

35　汪榮祖：《自由主義在戰後中國的起落：儲安平及觀察的撰稿群》，《傳記文學》1979年第36卷第4期。

和民族主義之間，基本傾向於後者。無論他在表面上如何標榜獨立與自由的立場，都認為自由的價值僅僅在於促進國家強大，他所有的言論最終落腳點都是民族主義，關心的都是國家的命運。他認為，即使被視為共產極權的國家蘇聯，至少在維護民族尊嚴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其政體雖然另樹一幟，但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勵精圖治，到底把國家弄得像個樣子，在國內，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國際上，能夠打退強敵的侵犯。只要政績良好，人心自然歸附。人民擁戴政府，政權自然不愁動搖。」[36] 所以，即使儲安平在《觀察》初期就作過國共統治下自由存在「多少」和「有無」之別的結論，但是如果中共能夠引領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他未必懼怕這個「有無」。

儲安平重視民族國家的命運而輕視自由的另一個表現是關注民生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的當務之急未必是立憲或行憲，而是馬上停止內戰，實行「經濟民主」和「福利政治」。因為中國的民眾太窮太苦：「本來有白米吃的，現在已無白米吃了；本來可以一天吃兩餐飯的，現在只能吃一餐飯了；本來穿長衫的，現在不穿長衫或穿不起長衫了；本來有房子住的，現在沒房子住了！我們看，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裏，不知有多少人沉淪在饑饉和寒冷的死亡線上。就是在這不夜的城市裏，街頭巷尾，也到處都是無食無宿的流民乞丐。在這樣一片錦繡山河的土地上，竟有萬萬以上的人民，過着與畜生無殊的生活。」[37] 所以，必須推動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改變人民的生活情形，照顧到底層人民的生活，否則必將引起社會革命。

在他看來，國民黨顯然沒有意願走經濟民主之路。國民黨雖然也說計劃經濟，推動鐵路、銀行和工業的國有，從表面上看似乎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這種國營化的本質是官僚化。特

36　儲安平：《失敗的統治》，《觀察》1946年第1卷第3期。
37　儲安平：《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觀察》1946年第1卷第11期。

殊利益群體利用權力，通過公私合辦、投資滲透、業務代理等方式，以國家的經濟資源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形成千夫所指的官僚資本。由於國民黨內部積弊太深，利益盤根錯節，官員層層相護，根本不會下決心去革除官僚資本。他認為國民政府也沒有意願實現福利政治。國民黨一意孤行大打內戰，將人力財力都充當軍費，不顧百姓死活，本身就是對福利政治的最大蔑視。

在他看來，經濟民主與福利政治，不能等待統治者的恩賜，甚至有必要通過一定的抗爭手段實現。就如他對上海攤販反抗政府事件的評論：「騷亂群眾中有呼『為什麼不讓我們做生意』，『為什麼不讓我們吃飯』等口號者。此說果確，則這些口號無不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同時在這次騷動中，亦流露着階級的意識。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場電影院的被打，過路汽車的被打，都是出於一種貧者仇視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現象，未嘗不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就後者論，貧富階級的懸殊本不合理，貧民階級開始瞭解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並以行動表示其意志，足以說明中國社會已有進步。」[38]

值得玩味的是，儲安平並沒有否定這種打砸活動，反而認為這種仇富心理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一種階級意識和政治意識的覺醒。在一個沒有福利政治的國家裏，廣大民眾追求平等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打砸搶和暴力騷亂，是否可能會對無辜富者的合法財產造成侵犯？儲安平對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過於痛恨，逐漸認為如果和平改革逼國民黨實行經濟民主的路走不通，就應該進行革命，其中向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暴力話語靠攏的傾向，已經隱約可見。

38　儲安平：《論上海民亂》，《觀察》1946年第1卷第16期。

與傅斯年、胡適

在經濟觀念方面，儲安平與傅斯年比較契合。傅斯年曾經說過：「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39] 因此，儲安平非常注意爭取傅斯年，認為只有像傅斯年這樣學識、權威、地位兼具的知識分子，其言論才有份量，能夠為政府垂聽，發揮輿論的作用。因此，他邀請傅斯年成為《觀察》的首批撰稿人，並親自登門拜謁，請其支持《觀察》。

1947年2月，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主張清查孔宋產業，並發表名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時間全國震動。儲安平致信傅斯年，希望將批評文章分一篇給《觀察》發表。傅斯年很快便發來一篇《論豪門資本必須剷除》的文章，由儲刊登在《觀察》第2卷第1期。文章認為，中國的官僚資本極為發達，以孔宋二家為首。孔祥熙頗有土豪作風，全家老婆孩子上下其手，用政治勢力壟斷商務，有利歸於自己，有害則歸於國家，有時類似扒手。至於宋氏的作風則是另一種面貌，將所謂的國營，基本都變成了宋營，全國公共事業基本都由宋家壟斷。政府必須對官僚資本予以清算，徵用兩家財產平衡預算，才能穩定經濟。[40] 宋子文果然被傅斯年猛烈的炮火轟下政壇。

儲安平非常感激傅斯年的文章。他在信中讚歎道：「先生真不失信，別人不失信，不難，先生開會甚忙，且已連寫二文，仍不失信，按時賜下，衷心感佩。此文為敝刊生色不少，自先生文章發表後，人心大快，風氣亦可大變。言論自由本須吾人奮起而爭之，然爭此自由，開此風氣，非人人能為之，必須其人之學問

39 傅斯年：《評英國大選》，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9頁。

40 傅斯年：《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觀察》1947年第2卷第1期。

見識聲望地位足以赴之，始能發生領導作用，故就言論自由一事而論，先生之文章，亦居大功。」[41] 言下之意，如果有更多的傅斯年，中國言論界的氣氛必將好轉，政治風氣也必將發生大的變化。

儲安平更希望獲得胡適的支持。他與時下很多人一樣，對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來擔任民主運動的「最高領導」，批評政治、影響時局，將中國逐步引向民主之路。籌備《觀察》時，他曾託陳之邁轉求胡適支持，胡適未予回覆。其後，他每期都為胡適寄上雜誌。1947年農曆除夕，儲安平在燈下給胡適寫了一封信：

> 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我希望這個刊物能得到許多前輩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發展和穩固，我現在正着手計劃第2卷的方針。我寫這封信給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請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先生對於這個請求，自須加以考慮，不致輕諾，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幾個人能不顧一己的利益，忘私從公，獻身於一種理想，盡心盡智，為國家造福。到底有幾個人，能這樣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做人做事？
>
> 當我在籌備本刊最艱苦的時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難籌足)，南京方面約我幾次，我都未加考慮，因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為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於他的國家。刊物出版以後，我除了我的寓處、社裏、學校三處之外，任何集會不參加，任何人物不周旋，這就表示，我不以這個刊物為私人進身之階，不以這個刊物為活動的根據。今日中國需要者，就

41　《儲安平信一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檔號II-239。

是有浩然之氣的人。我們請求先生俯允擔任《觀察》的撰稿人，是為對於我們的鼓勵，並非要先生鼓勵我這個個人，而是鼓勵並贊助我們這種理想，這種風度，這種精神。

儲安平以「前輩的道義責任」為由請求胡適，胡適不得不禮節性同意暫居撰稿人之列。但是，儲安平希望胡適為《觀察》第2卷第1期專門寫一篇專論，胡並沒有答應。7月4日，《觀察》第2卷出版完成，儲安平再度致信胡適，告知10日前後將赴北平，專程晉謁胡適，「懇求」、「誠懇地求」其為《觀察》第3卷第1期寫一篇稿子。胡適這次略顯熱心，數次與他會面，似乎還對《觀察》做出了一些指示，也答應下為第3卷撰文的請求。歸滬後，儲安平於8月12日致信胡適表示感謝，請他在18日之前寄上文章，並希望為《觀察》題字。胡適沒有回信。9月22日，儲安平四度致信胡適，報告《觀察》的盈餘情況，並寄上一些紀念品，希望胡適將最近關於十年教育計劃的言論寫成文章，交《觀察》發表。胡適亦未將文章交給儲安平，而是發表在《獨立時論》上。實在推託不過，他只給儲安平題了九個字：「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儲安平在10月5日的回信中說道：「先生只寫了九個字，然而意義深長。我希望我們大家來栽，讓我們的下一代得到收穫，讓整個國家來享受所能收穫到的果實。」[42] 儲安平並未將這九個字發佈在《觀察》上，顯然，他已知道兩人對「栽」的理解並不相同。

或許是年長的胡適更瞭解政治運作的複雜和政府的難處，此時已經抱定決心，幫政府的忙，支持政府，替它說公平話，給它面子。他支持蔣介石用武力解決中共問題：「政黨爭奪政治權力，應遵循獲得大多數人民支持的合法方式。用軍隊武力推翻政

42 《儲安平信五通》，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1，黃山書社，1994年，第1–11頁。

府，並不是一種法律方式，而是革命方式。為了自衛，政府有責任鎮壓共產主義的造反。」他在發表於1947年7月20日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中還說：「一種是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黨員有言論行動的自由。這種黨靠爭取選票取得政權，同時容忍並且尊重少數黨的權利。英美的政黨屬於這一種。另一種是有嚴密的組織紀律，黨員沒有言論的行動自由，沒有個人秘密行動，這種黨的目的在於一黨專政，並不惜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權，以至絕對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以鞏固一黨永久專政的權力。」[43] 胡適看到，國民黨雖然政治腐敗，卻在逐步妥協，有讓渡出部分政權給大家分享的姿態。這是一種非常偉大的轉變，雖然腳步很慢，卻可以保證國家的穩定。知識分子應該允許政府一步一步來，不能把它逼到角落裏，要給它時間和機會。

在胡適看來，儲安平雖然認為他對國民黨的批評也是一種「栽」的工作，在為國家培養元氣，但很可能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以諍友的身份批評建言當然沒有問題，但問題在於度。在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下，這些痛快淋漓的檄文式不但無法觸動政府，反而會對人心向背產生巨大的影響。今天一個「失敗的統治」，明天一個「國家將要遭遇革命」，後天一個「現政權業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力量」。「現政權」、「南京政權」這種稱呼就足以代表他對政府的不認同和蔑視。這種言論必然對廣大民眾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影響，使他們在心中形成一種政府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現象。甚至，這可能構成一種不自覺的煽動，多少熱血青年可能會因為閱讀了《觀察》的檄文，而投入到了瓦解這個政府的行列？治國亦如尋常事業，需要一步步的逐漸改良，知識分子應該有足夠的耐心允許其改進。胡適認為，儲安平雖然標榜客觀、理性，但顯然在這方面過於急迫和激進。

43　程巢父：《儲安平與胡適：兩代自由思想精英分子書信中的歷史消息》，《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29頁。

商業的成功

儲安平對胡適講，《觀察》已經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在儲安平看來，這種成功或許歸功於理性的論政和對國事發言的嚴謹態度。然而在胡適看來，《觀察》的成功完全靠罵政府和煽動民心取得。在外界看來，《觀察》最大的特徵也是罵政府。就如一位重慶民生公司低級職員何現倫在日記中評論道：「《觀察》這個雜誌，我非常欣賞它，因為它的言論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實在直爽，敢說敢寫，這才是促成民主的現實，真是人民的喉舌。他的執筆者，都是知名的學者與社會名流、大學教授，主編是復旦大學教授儲安平先生，他的言論更直爽，開口大罵，恰恰說到現政府的痛處！」[44]

儲安平每「戳到政府痛處」一次，《觀察》銷量便飛躍一次。創刊號的印數是5000份，第3期上漲到9000份，第13期時突破10000份。其後印數略有下降，到第2卷第8期又回到10000份，2卷17期突破15000份，第24期達到17000份。1947年9月出版第3卷第1期，發行量達19000份，3卷24期時，這個數字漲為25000份。第4卷第6期，達到30000份，4卷11期，35000份，13期突破40000份，20期以後突破50000份。偏遠地區供不應求，便出現了書商競相提價的現象。比如在貴陽和昆明，《觀察》每期定價500元，到書商手中已經抬到1500元或2000元。在台灣，早晚市面上出售的《觀察》，售價也有不同。

《觀察》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刊物，四川、華中、江浙、華北、西北等地均有訂戶，偏遠的東北、雲貴亦有訂戶，還有部分是海外訂戶。至於銷售點，更是遍及迪化、雅安、綏遠、蘭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區。其後又與北平書商合作出版華北航空版，使平津和東北地區的讀者可以第一時間看到《觀察》。儲安

44　冉雲飛：《民生公司職員六十年前的日記》，《書屋》2007年第1期。

平自豪地說：「全國恐怕沒有一個刊物甚至一個報紙，可以和本刊比擬，平津出版物大都局促於華北東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發行，亦多以京滬東南一帶為主要市場。我們很難相信蘭州、成都、貴陽、昆明的讀者能夠看到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大公報》有上海、天津、重慶3版，3版若合為一體，其分佈之廣，便約與本刊相似。本刊雖在戰後發行，但其分佈並不限於東南一隅，以京滬杭為中心的東南一帶，在本刊的發行額中，僅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都是分佈在華北、華中及西南西北各地的。這是本刊在中國出版界中最特殊的情形。」[45]

戰後因「漢奸罪」在南京獄中服刑的周作人，也閱讀《觀察》雜誌，稱讚其「言論犀利透徹，令人佩服」。[46]日後成為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回憶過從《觀察》獲得的自由啟蒙：

> 1947–1948年間，我曾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的一個年輕讀者。當時在思想上、知識上所受到的種種新鮮刺激至今記憶猶在。當年的《觀察》以「獨立」、「超黨派」自律，而且也確實做到了這點。《觀察》作者從左到右都包羅在內，他們之間也往往互相爭論，針鋒相對，一步不讓，使我這樣一個初入大學的青年大開眼界。我自然是沒有能力判斷其間的是非正誤，但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在一個刊物中紛然並陳，對我後來的思想形成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我從那時起便不敢自以為是，更不敢自以為代表正義、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與我相異或相反的論點都看成「錯誤」、「邪惡」了。[47]

45　儲安平：《艱難·風險·沉着》，《觀察》1947年第2卷24期。
46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2頁。
47　余英時：《容忍與自由》，《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0頁。

北京大學的某學生宿舍，每期《觀察》均人手一冊。[48] 廈門大學的學生將《觀察》簡稱為 I.N.O (Independent, Nonparty, Observer)，如果延期收到雜誌，就會互相探問雜誌是否被封，主編是否生病，表現出強烈的關切和愛戴。[49] 一位名叫古傳賢的重慶讀者說，《觀察》在重慶知識分子心中是目前中國唯一權威刊物，每期到時都是大家交換閱讀，平均每本的讀者在十人左右，讀完後又把刊物寄到鄉下，給家鄉中學做教員的親友閱讀。[50] 讓人意外的是，很多人過去不在儲安平設想的「讀者之列」，亦閱讀《觀察》。在軍警界中《觀察》有很多讀者，常有人來信表示對雜誌的擁戴，還有一位駐河南的師長來信訂閱數份，分寄同事。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招生，公民試題中有《試評日常所閱讀的日報及刊物》一題，絕大多數中學生都填寫《觀察》。甚至原本沒有閱讀習慣的下層煙販、排字工人等也閱讀《觀察》。[51]

知識分子們看到了《觀察》的影響，經常將他們的呼籲發表在《觀察》上，以引起公共注意。比如1947年第2卷第2期發表了朱自清、俞平伯、陳寅恪、張奚若等十四教授聯名抗議特務濫捕民眾的《保障人權》；第2卷第14期登載了王鐵崖、沈從文、向達等三十二位北大教授呼籲政府同情學生的來信；第3卷第11期發表了周炳琳、金岳霖、許德珩、朱光潛四十八人的聯合聲明《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呼籲勿解散民盟。第4卷第10期發表了《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教授九十人來函》，抗議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威脅大學教授的演講。第4卷第14期發表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來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抗議》等等。

有志報效祖國的留美學生也集體致信《觀察》，請儲安平給

48 儲安平：《323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觀察》1947年第2卷第12期。
49 金穀穗：《I.N.O》，《觀察》1947年第2卷第15期。
50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觀察》1947年第3卷第14期。
51 儲安平：《吃重·苦鬥·盡心》，《觀察》1948年第4卷第23、24期合刊。

予幫助。比如，第3卷第3期上刊登了李克佐等留美學農的八位同學來函《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八位同學在文章中講，明年畢業歸國後，預備創辦若干農場來改良農業，改造社會，希望《觀察》能代為發佈，徵求支持。該文刊後第三天，儲安平就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職業教育科陸厚仁、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王公嶼、司法行政部科長聶建英、江蘇省地政局鄭君平、常熟縣縣長張禮綱、上海中央銀行業務局朱漢民等數十人的來信，紛紛表示願意為上述同學提供場所進行實驗。[52] 這說明，在一定程度上，雜誌可以聚攏人心，讓有理想、有志向的人們合攏起來，為改造社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當時有讀者來信稱，《觀察》已經成為廣大讀者群心中的旗幟，希望儲安平「以更堅決、更明朗的態度領導我們」。[53] 讀者中有人希望儲安平負起責任，組織一個團體，將社會上散沙般的自由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改變中國現狀而努力。[54] 儲安平也意識到了《觀察》的巨大作用，希望利用雜誌進行某些動員活動。比如，他曾拿上海律師程孟明以民告官，反抗不合理的政策為例，向廣大律師讀者呼籲模仿程孟明，犧牲自己的一些時間和收入，設定一個力所能及的範圍，就不合理的制度，集體向政府打官司。他認為，中國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知識分子應該起來使之合理公平。律師作為中產階級，應該起來爭權益，做些公共事業，逐步促成政府的點滴改變，甚至形成一個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55] 但是，這樣的言論動員必然是回應微弱，不了了之。因為言論背後缺乏實際的組織支撐，僅靠所謂的道義力量和一時熱情，其動員能力必然有限，更不會持久。

52　儲安平：《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觀察》1947年第3卷第5期。
53　文繼武：《士大夫的考驗》，《觀察》1947年第2卷第16期。
54　儲偉：《散沙要集合起來》，《觀察》1947年第2卷第7期。
55　儲安平：《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觀察》1948年第3卷第24期。

儲安平對實際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更無意於組黨工作。他認為，中國的黨派林立，從事組黨工作，只能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亂。他最喜歡的是通過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構建紙上的言論王國。對於青年，他只願從事影響思想的工作，而不願做組織訓練工作。但是，沒有實際政治組織作為依憑，所謂的第三勢力如何能形成一股真正的力量？受他啟蒙而覺醒的有志青年，覺醒之後該往何處去？1947年夏，一位既不認同國民黨、又不接受共產黨的西北工業大學學生林牧，專程前往上海投奔儲安平。儲安平對他說：「現在像你這樣的進步青年很多，我愛莫能助。」林牧聽畢非常失望。1948年5月，林牧在走投無路之際投奔延安，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最後做到胡耀邦的秘書。[56] 在一個「不歸於楊，即歸於墨」的時代，促使他們覺醒的導師不能收留他們，他們只能在國共的某一方做出選擇，林牧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救世主心態

儲安平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的缺陷，反而以商業的成功和讀者的支持，認為自己開創了一番事業，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儲安平對自己的政治選擇和判斷非常自信，認為自己確實是不偏不倚、毫不偏私，認為自己在中國的輿論界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甚至自我美化，將自己的行動上升到維繫國運的高度。他從來不迴避自我標榜，也不怕高調。他將辦刊發表輿論，說成是一種「建國事業」：「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我們願在這兒毫不害羞地向廣大的社會宣告：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一種真正的建國事業！」

56 林牧：《燭盡夢猶虛：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第96頁。

他謙虛地自稱「我們」，實際指的只是「我」，言語帶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態度。這也是一種「才氣橫溢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的態度。[57] 就如他居高臨下對民盟諸君的點評：

> 像張表方(瀾)、沈衡山(鈞儒)等幾位老先生，實在都是過去的人物了……黃任之(炎培)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了。張君勱先生(現已脫離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個憲政學者，一個最好的政論家，然而他只是一個論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於任國會議員，而不宜於掌行政責任。張東蓀先生也不適宜從事實際的政治生活，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貢獻的還是在思想及言論方面。……羅隆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筆都來，有煽動力，有活動力，而且對於政治生活真正感興趣。可惜羅氏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58]

民盟所有的重要人物都不能入其法眼，這也是他一直「跑單幫」，拒不加入民盟的原因。

對於因刊登軍事新聞而被封門的報業同行，《觀察》雖然是國內唯一敢挺身出來支援的報刊，儲安平卻仍看不起那些報業同行：「我對於文匯新民兩報的作風(我不常看《聯合晚報》)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兩家報紙的編輯態度不夠莊重，言論態度不夠嚴肅。我很少在《文匯報》上讀到真有重量的文字。我認為這三家報紙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他們的言論，而是由於他們的新聞。這被封的三家報紙都有一個共同的脾氣，就是專門喜歡刊載那些為政府當局引為大忌的新聞。他們所登的大都是事實，無奈今日發生於社會各方面的事實，都是

57　馮英子：《回憶儲安平先生》，《追尋儲安平》，第13頁。
58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第2卷第2期。

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這三家報紙的發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經營商業的人物，他們腦子裏想的，第一件事還是能夠多賺幾個錢的問題……若說他們有顛覆政府的意圖，那真是捧了他們。」[59]

儲安平從未提過自己的缺陷和弱點，有的只是對自己的定位和期許：「當編者想到，他在這樣一個芸芸眾生的大城市中的這樣一間窄小的房間裏，希望娛樂沒有娛樂，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這樣驚風駭浪的波濤中，在這樣長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撐着這條船，他雖不禁感觸多端；然他相信：他必能噙住眼淚，帶領着他那數以萬計的讀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進！」[60]

他雖然偶爾也會為自己單槍匹馬掌握着這本發行量數萬的刊物感到惶恐，覺得自己能力有限，但這多半可以理解為一種自謙之詞。他顯然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知識分子領袖，他認為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充滿正義性：「我們平時，憑這支千鈞之筆，發揮我們的理想，陳述我們的抱負，替一切受難的人們呼籲，抨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和掃蕩各式各類的人渣，保持有一種雖然飄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堅硬卻勝過鋼鐵的意志。」[61]

他將自己視為正義的化身，光明磊落，守身持正，能夠抵禦所有腐蝕：「假如一個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無形中可以抗拒許多邪道的侵襲」。

他的對立面，當然都是「人渣」，都是惡勢力，或一些自私自利、蠅營狗苟之徒：「請看今日天下，芸芸眾生，奔波終日，究為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是為了幾張鈔票，為了若干權勢。可是國家已經糟到這個地步，假如我們每個人還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頭、絞腦汁，我們的

59 儲安平：《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示的態度》，《觀察》1947年第2卷第18期。

60 儲安平：《323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觀察》1947年第2卷第12期。

61 儲安平：《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觀察》1947年第2卷第9期。

國家怎麼得了？假如人人為私，國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菲薄，隨波逐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有我們的勇氣，向前邁進，義無所辭。」[62]

言語之中，似乎是一種「舉世皆醉我獨醒」的自負。這種過於良好的自我觀感和啟蒙救世主心態，以及自我神聖化，最直接的作用便是，加劇了他指點江山的快感，使其更加偏離了理性的軌道。以後的文章，多半是「熱淚盈眶、悲從中來」之後的情緒和衝動。而且，這種衝動的嚴厲程度，隨着時間推移呈現出一種日益增強的趨勢。

批判加劇

1947年，學生群體發出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怒吼，走上街頭。學潮最初源於經濟危機，戰後的通貨膨脹日益加深，公費補助的增幅遠遠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導致學生群體普遍貧困，處於食不果腹的邊緣。學生本身敏感易衝動，加之中共地下學生組織的推波助瀾，很快就在各地掀起了反饑餓的請願遊行。與此同時，積壓已久的教育經費問題、教授待遇問題、遷校問題、護校問題、校長問題一齊發作，南京、上海、北平、杭州的學生直接湧入南京，罷課遊行示威，很快就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洶湧學潮。儲安平在光華時曾兩次進京請願，目睹此情此景必然非常熟悉，對學生的熱血也深有體會。

他在《觀察》上連續發表文章積極支持學潮。他說：「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之疲乏與饑餓，憑着一股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國家內，亦何幸尚有這一批熱

62　儲安平：《風浪·熬煉·撐住》，《觀察》1947年第3卷第24期。

血青年，能責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面對着政府的鎮壓，以及當局對背後有中共蠱惑的猜測，他反駁說：「學生的意志是絕對自發的，而非被動的，他們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而非卑鄙的，他們的精神絕對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他看到學潮愈演愈烈，歌頌鼓吹道：「他們現在正企圖以他們的熱血來旋轉這個天地！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終會爆出光彩奪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國就在這火花中孕育成長！」[63]

儲安平對學潮的看法，當然過於理想化。這一點與胡適的認識有很大不同。胡適認為，學生對政治的不滿可以理解，應該讓他們發洩。但是，發洩完了，還是要以學業為重。「學生罷課，決不是改革政治的一種好方法。……犧牲學業方式來干涉政治，這確實一種錯誤。」[64] 在他看來，學生應該「朝理智上走」，輿論也應該鼓勵學生往理智上走。然而，儲安平太相信學生舉動的正義性，拼命為學潮鼓吹，甚至呼籲學生改天換地、創造歷史，言語中似有呼喚革命之意。這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煽動性言論。

因此，學潮期間，《觀察》每出版一期，儲安平都感覺到刊物在死亡邊緣掙扎。不過，風波平息後，雜誌安然無事。在儲安平看來，這似乎是政府放寬了言論的尺度，「容許國內繼續有公正無私的言論」。[65] 政府的這種容忍，在民主國家是最基本的要求。儲安平亦如民主國家的知識分子領袖一樣「不識時務」，並未因政府的容忍與遷就便停止批判，反而因政府的寬容而增加了批判的力度。因此，當儲安平看到美國前駐蘇大使蒲立特訪華報告時，對國民黨將美援視為尚方寶劍，不惜損失國家獨立主權人格，喪盡民族氣節之舉極為憤怒，借題發揮大罵政府：

63 儲安平：《大局浮動，學潮如火》《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觀察》1947年第2卷第13、14期。

64 胡適：《向記者談學生運動》，《胡適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0–711頁

65 儲安平：《艱難·風險·沉着》，《觀察》1947年第2卷第24期。

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20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他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他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於取巧、投機、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兇霸道、為劣作惡。因此我們很公平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他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這個政府不僅已與人們脫節，而且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脫節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在他的統治下，人民將愈來愈沒有希望，餓死的人必然愈來愈多，自殺的人也必然愈來愈多。[66]

這篇文章顯然挑戰了國民黨的底線。上海市黨部看到此文，馬上要求市政府查封《觀察》。

1947年10月27日，上海市黨部秘書長來社尋儲安平未遇。11月7日，上海社會局用公函召儲安平到局談話。9日，上海市黨部秘書長約談儲安平一次。據說，兩次的談話都不嚴重。或是儲安平意識到了《觀察》的危險，主動向其他報刊求救。很快，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首先披露了這個危機，上海、香港、重慶、成都、昆明的報紙也陸續刊登此事。[67] 就在黨部約談儲安平的時

66　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第3卷第9期。

67　《查封觀察，滬當局有此意見，儲安平避不出頭》，《益世報》1947年11月8日。

候，據說中央有急電到滬，告知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社會局局長吳開先等人，不主張查封《觀察》。對上海市黨部而言，雖然不能查封，卻也需要懲戒。11月11日晚，儲安平接到消息，知悉其人身可能受到威脅，臨時決定離開寓所。據其自述，午夜11點，他去其他地方投宿，經過外灘江邊，看見「江水泊泊，大地如此，整個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構成一幅淒涼的人生圖畫」，突然之間竟不悲傷，也不憂慮，獲得一種難得的寧靜雍容。[68]

他秘密躲藏起來，外界認為他已經「離滬不知何往」。[69]這次躲避，使他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假期，可以會見朋友、整理講稿、寫信敘舊。到11月下旬，此事終於平息，不再有人追究。儲安平認為，各地的新聞報導以及前輩朋友的關心形成一股道德力量，使事件暫時平息下去。但是，如果道德的力量奏效，政府也就不會連封《文匯》《新民》《聯合》三報，不敢解散民盟，與自由知識分子決裂。政府對儲安平網開一面，應是確定無疑之事。

實際上，如沈昌煥這樣的朋友必定會對此與儲安平講，希望《觀察》多刊載些建設性的建議，少一些苛責和批判，然而儲安平自陳心曲：「今日的時代是一個建設性的時代嗎？今日的政府又是一個建設性的政府嗎？請問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壞性的工作，我們發點建設性的言論，政府能採納嗎？又能實行嗎？我們一貫的態度是希望結束內戰，這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我們這個建議嗎？」[70]

他認為：「生死之權操之於人，說話之權操之於我」。他不感激政府的網開一面，而是認為，查封刊物悉聽尊便，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決不退讓。在意識到發表在第3卷第9期的《評蒲立特的

68　儲安平：《風浪·熬煉·撐住》，《觀察》1947年第3卷第24期。

69　《觀察命運不可知：儲安平已離滬不知何往，該社並未接到停辦命令》，《益世報》1947年11月13日。

70　儲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觀察》，《觀察》1948年第4卷第12期。

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一文可能引發時忌的情況下，他在第11期仍對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呼籲政府謹慎解散民盟的宣言照刊不誤。《觀察》的風格，也並未因遭遇危機或恐怖的「戡亂動員令」而有所改變，言論依然固我。

國民黨沒有拿辦儲安平，御用文人卻按捺不住，對其進行打擊批判。最集中攻擊儲安平的是《中央日報》旗下的《中央週刊》，主編劉光炎曾是儲安平在《中央日報》時期的同事。1947年第9卷第51期中有一篇題為《觀察〈觀察〉記者》的文章，作者認為，儲安平以罵人而起家，將罵政府當成自己的登龍術。儲安平故意用浮躁、張惶的言論，去迎合大眾的喜好，投合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安浮動的心理。[71] 第10卷15期刊登了《民主運動中的逆流》一文，批評了儲安平的好友樓邦彥在《觀察》發表的批評國大選舉的《如何粉飾得了太平》一文，認為此種灰色的言論宣揚「失敗論」，是民主運動中的一股逆流。[72] 第10卷第31、32期合刊中的《儲安平的「噱頭」》一文認為，儲安平雖然標榜客觀民主，可是兩年多來卻沒有發表過一篇反對自己觀點的文字。儲安平在《觀察》上為學潮煽風點火，實際是在耍一種噱頭，用聳人聽聞的言論來引起社會關注，增加雜誌的銷路。儲安平在每卷終結所寫的終卷報告，左一個坦白、負責，右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讓人覺得肉麻，充滿了表演性。[73]

發表在《正論》上的一篇題為《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觀察〉儲安平》的文章，則充滿了惡意的誤解和謾罵。這篇文章強詞奪理地認為，儲安平尊重各人的獨立發言，但必須文責自負，實際是一種伎倆：假如文章可以引起大家的喜愛，名聲便為編者所有，如果有風險，自己可以擺脫干係。封面上的撰稿人名

71　劉三：《觀察〈觀察〉記者》，《中央週刊》1947年第9卷第51期。
72　楊柳：《民主運動中的逆流》，《中央週刊》1948年第10卷第15期。
73　小鳳：《儲安平的「噱頭」》，《中央週刊》1948年第10卷第31、32期合刊。

單則是他的護身符，列舉很多要人的名字，可以免受責難。儲安平對《大公報》的批評，在這裏則成了「無情謾罵」。儲安平的一切行為，目的都是為了推倒政府。儲安平的本質是「奸詐、陰狠、投機、取巧」。作者先入為主地判斷道：「倘使儲安平執政，在現在情況下，儲安平必限制言論、思想、出版等自由，嚴厲實行新聞檢查，首先封閉《大公報》，即筆者在發表此文之後，亦必遭逮捕槍決或長期緊閉。」[74] 這些當然是無端的揣測。

這些文章署劉三、楊柳、小鳳、蕭源等假名，代表了國民黨文人的立場，在文風和思想上都帶有一種小報趣味，常歪曲事實，無理謾罵，但是他們所講的也並非都是謬論。蕭源以儲安平批評蒲立德的文章為例，將美國和蘇聯對比說：「美國蘇聯，儘管他有錢，有勢，都在高唱幫助中國，但誰是真的幫助，誰是假的幫助，誰攫去了我們的工業建設，誰攫去了我們的物資，都是明明白白擺在眼前的事實，如果睜起眼睛看見這種事實，還辨不清誰好誰壞，我真懷疑這個人還有沒有一點心肝，有沒有一點人性存在！」「楊柳」在《自由主義者的抉擇》中認為，所謂第三勢力或自由主義者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時代只有主流和逆流之分。國民政府建築在三民主義之上，歡迎自由分子加入政府，並承認國民擁有思想信仰的自由，代表着時代主流。共產黨不允許一切自由主義者和反對勢力的存在，代表着一種時代逆流。所謂的中間勢力，必須在主流和逆流之間作最後的抉擇，否則一旦共產黨執政，他們必將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75]

這個判斷和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的判斷並不衝突。從後來的歷史看，他們的預言也都成為真實。但是，問題可能在於，國民黨的形象已經狼狽不堪，宣稱自己代表主流，實在讓人難以信服。儲安平也一向相信自由知識分子的力量，這種宣佈中

74　蕭源：《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觀察〉儲安平》，《正論》1947年第1期。
75　楊柳：《自由主義者的抉擇》，《中央週刊》1948年第10卷第17期。

間勢力沒有市場，強令知識分子站隊的言論，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侮辱。

經濟危機

在遭遇第一次政治危機的同時，《觀察》同樣遭遇了經濟危機。

《觀察》開辦之初，一直處於盈餘的狀態。儲安平在1947年2月的第1卷終卷報告書上宣佈：「本社的資金是1000萬元(實為1200萬元)，但是現在的在賬面上，本社的資金已超過2000萬元。」當年9月14日，儲安平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召開股東會議，統計一年盈餘。他在稍後給胡適的信中說，《觀察》在一年之內資產竟然達到2.33億，等於一年之內賺了20倍。一般辦雜誌，都是要賠本，本賠光了便關門大吉。《觀察》不賠反賺，實在讓儲安平和股東始料不及。

然而，揆諸實際，所謂的20倍有水份在內，應該考慮其中的通貨膨脹因素。戰後的通貨膨脹，主要是軍費開支過於龐大，財政收入都填入軍費的無底洞，政府只得濫發沒有準備金的紙幣。紙幣氾濫，貨幣貶值，直接導致物價飛漲。1947年3月《觀察》出版第2卷時，儲安平已經感覺到了經濟壓力。以雜誌用紙為例，第1卷結束時尚未超過5萬元一令，第2卷第1期印刷時已經達到15萬元。第2卷結束時，竟然達到了32萬元左右，比開辦時上漲了8倍。1947年下半年，物價飛漲更是已經到了離譜的程度，紙的漲幅駭人聽聞。1947年9月前後，紙價已經漲到53萬元每令。10月14日，上漲到90萬元。12月漲到150萬元。1948年2月，漲到250萬元，7月到達4200萬的天文數字。市場可謂每天都有新價格，甚至一天有多種價格。

官方本有對報刊配發白報紙的政策，但是對黨報黨刊配給

多，非黨報配給少，有關係有背景的報刊配給多，無權力無背景者配給少。《觀察》是民營雜誌，並不能獲得與官方報紙同等的待遇，白報紙的費用突然變成大項支出，拉高了雜誌的成本。如果說只是單純的高價也可以接受，最可怕的是有價無市，或乾脆買不到紙。比如，1947年10月第3卷第9期出版時，印刷前三天雜誌同人仍在四處瘋狂購紙，最後只購買到所需紙張的三分之二。紙張缺乏導致不法商人囤積居奇，即使庫存有貨，也不交易。儲安平四處申告，向中央信託局申請購紙，對方數月不予回覆。但是，那些官方報紙，甚至出版黃色書籍的書店竟然可以獲得大部分用紙配額。由此，儲安平在《觀察》上發表《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一文，要求政府公佈白報紙配額的具體情況。

除了紙張緊張以外，各項開支也在節節上漲。儲安平曾就排字工、印工、訂工的成本進行過統計。從統計情況看，這個漲幅是驚人的。尤其是將其與雜誌售價提高的幅度相比較，更是大虧其本。同時，觀察社工作人員的薪水也由創刊時的每月700萬上漲為1947年底的5000萬，再到1948年7月的14億。各種雜項開支一直增加，稿費已經調整了十餘次，而且仍奉行稿到即付稿費的制度。由於儲安平將刊物委託各地出版商代銷，這些出版商多半是一段時間後統一算賬，法幣不斷上漲，每日行情不同，按照過去的價格算賬時，已經賠得一塌糊塗。

物價飛漲的同時，是雜誌發行量的飛速增加。第1卷的最高發行量為10000份，第2卷為17000份，第3卷增加到25000份，第4卷竟然增加到50000份。在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發行量越大越能盈利，但在通貨膨脹嚴重，甚至經濟瀕臨崩潰的情況下，往往是攤子鋪的越大，虧損越嚴重。因為發行量增加需要投入更多資金，而物價逐日變動，資金回籠時只能是加倍虧本。1948年2月第3卷終卷的時候，雜誌社勉強收支平衡。第4卷時，發行量突破

50000，雜誌已經開始全面虧損。儲安平理財一向精細，處處節約預算以減少開支。比如省略雜誌封面，縮小文章字體，減少篇幅等等。甚至他還發動廣大訂戶，將郵寄雜誌的信封寄回，以便重複利用。若不是儲安平辦事縝密、考慮周詳，雜誌面臨更大的虧損是可想而知的。

雜誌成本增加的另一面，是普通讀者已經買不起雜誌。戰爭造成的物價飛漲，已經使人們越來越窮。經典的場景是，市民們拿着一整麻袋錢去搶購生活用品，最後卻只能換來二斤大米。人們已經沒有餘力消費文化，更無心閱讀雜誌。儲安平託朋友在大學中推銷《觀察》，但收穫甚微。售價一萬元的雜誌，學生已經承受不起。雜誌不能沒有青年讀者。儲安平不惜虧本，從1948年5月開始推出了「半價訂戶」制度，那就是選出1500名清寒訂戶，享受半價。儲安平呼籲，若非經濟絕對困難者，不要佔用半價訂戶名額，使清寒讀者能夠有書可讀。上海外圍的讀者，也盡量不要申請半價訂戶，將機會留給那些大後方偏遠地區的讀者。為了做到公平公正，他甚至不惜麻煩，請申請半價者先來函索取表格，填好後寄出，由雜誌社審查後給予其半價待遇。和過去一樣，儲安平仍然拒絕熱心讀者的捐款。他認為，這樣平白無故接受讀者的捐款，違背良心，有失公道，與其捐款，還不如用這筆款項訂閱《觀察》，送給親戚朋友，作為饋贈。

另一個增加經濟負擔的，是「觀察叢書」的出版。1948春，儲安平在雖然遭遇經濟危機，但仍略有積蓄的前提下，着手推出「觀察叢書」。其目的有兩個：首先是就思想和知識方面作系統的介紹，以補充《觀察》篇幅有限，時效性短的不足；其次是希望在戰亂頻仍、文化凋蔽的時代，為荒蕪的出版界增加精神糧食。第一批出刊的有潘光旦《政學罪言》、吳恩裕《唯物史觀精解》、費孝通《鄉土中國》、吳世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朱自清《論雅俗共賞》等六

冊，多者印行到第五版，銷量五六千冊。第二批出刊的有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費孝通《鄉土重建》、何永佶《中國在戢盤上》、塔塔木林(蕭乾)《紅毛長談》等四種。其後又出版了樊弘《兩條路》、吳晗《皇權與紳權》、王了一《龍蟲並雕齋瑣語》、潘光旦《優生原理》、儲安平《英國採風錄》等數種。

「觀察叢書」的出版本身帶有公益性質。儲安平為了優惠讀者，事先採取了預約折扣政策，那就是出版前匯款訂閱的享受折扣待遇。考慮到讓青海、西康等地的偏遠讀者同樣有機會預約，他盡量將預約時限拉長，結果紙價上漲過快，出現了預約越多，賠本越多的情況。對於作者，都是在出書之前結清版稅。為避免物價飛漲，損害作者權益，版稅每月一結，這在中國出版史上是絕無僅有之事。「觀察叢書」賠本無疑，但是他認為，此舉在精神上有收穫，對社會有貢獻，即使賠本，也無所謂。

轉向

通貨膨脹駭人聽聞，民窮財盡達到極點，經濟處在崩潰的前夜，政治上亦日漸陷入於黑暗。1947年7月，國民政府發佈了「戡亂總動員令」，號召實行全國總動員，對「一切煽動叛亂之集合及其言論行動，依法懲處」。從此開始，「國民黨的統治日趨嚴酷，對輿論的鉗制不斷加強，異議聲音的表達日漸受限，國民黨統治區呈現出一派肅殺之氣」。[76] 11月，被視為最重要的中間群體——民盟因「為匪張目」，而成為「反動團體」，被正式解散。對於北平等地的校園抗議活動，國民黨竟然打算對教授們痛下殺手，試圖製造第二個聞一多事件，完全把中間知識分子當作異己力量，給予不遺餘力的打擊。

76 汪朝光：《簡論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的「戡亂動員」》，《上海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就如一位《觀察》讀者所說：「我現在感到嚴重的，倒是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之下，那些在國共雙方夾擊之下的愛好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今後究竟向哪裏走？跟着國民黨去搗亂，大家不肯，跟着中共去鬥爭，大家也未願意這樣做法。眼看國家已面臨毀滅的危機，不能閉目不管，但又不能有所作為，就在這樣徘徊苦惱的當兒，卻自然而然地成了國共雙方的敵人，遭受到兩面的壓迫。」[77] 這已經說明，中間路線的使命已經徹底結束，在政治上沒有存在的空間，必須考慮向何處去的問題。儲安平也在考慮自己的出路和定位。

從軍事上看，1947年是一個轉折年代。5月，共軍在山東孟良崮整殲國民黨王牌師，重挫國軍銳氣。7月，劉鄧大軍挺近大別山，陳粟南下江淮，中共由防禦轉為戰略性進攻，將戰場引向國統區，形勢極不樂觀。到1947年底，國共均勢進一步扭轉，毛澤東已經在考慮如何徹底打敗國民黨，建立新政權的問題了。[78] 1948年以後，國民黨內普遍瀰漫着對自身命運濃重的悲觀氣氛，無人再敢誇下海口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共產黨問題，很多人甚至已經預測到國民黨的失敗。與此同時，共產黨在宣傳上表示，一定要打敗國民黨，建立一個全新的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新政府將是共產黨主導的民主聯合政府，民眾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政府也將實行溫和的社會主義，改變廣大人民群眾的貧窮地位。新政權既不依賴於美國，也不宗主蘇聯，將要走一條真正屬於中國的獨立自主的道路。總之，共產黨宣稱，國民黨無法做到的，自己都能做到。這樣美好的許諾吸引了絕大多數中間派知識分子，在言論和行動上進一步遠離國民黨，親近中共。

此時，儲安平也對通過言論改變中國社會不再有信心。如其

77　梁子奇：《左鞭右打》，《觀察》1947年第3卷18期。

78　金沖及：《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所言：「今天我們所見所聞，不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社會上各種惡勢力、惡習慣的根基實在太深了，這使我們簡直不敢希望在這個現狀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過來。」[79] 他已經不太相信改革了，甚至很少在《觀察》刊登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一方面當然是「戡亂動員令」對言論活動的威懾，另一方面是他已經消沉，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或者說了也沒有任何用處：「我們平時的職司，就是議論政事，然而處此危局，幾乎無政可論，無政足論；仰望長空，廢筆三歎！」[80] 當然，無話可說更可能是因為已經不想再說：「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經沒有了！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連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81]

儲安平注意到了知識分子和一般人的思想似乎逐漸發生了一種微妙的轉向，在1948年4月評論道：「本來對於政府感覺失望的，慢慢兒的對政府感覺絕望了；本來對於政府感覺絕望的，終於對於政府不望了；本來無所謂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的左傾了；本來稍稍左傾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左得厲害了；本來絕對仇視共產黨的，現在也漸漸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了。這一種變化是一種沒有聲音的變化，然而卻是一種重大的變化。」[82] 實際上，他說的也是自己的變化。1948年中，國民黨的進一步壓迫更促使他加劇這種轉變。

1948年2月，政府中又有人主張徹底查封《觀察》。但是，此事又被擱下，只由內政部發了一封警告函。3月20日，上海市政府新聞處來函召儲安平談話，對其出示了內政部的警告，罪名是「言論偏激、歪曲事實、為匪張目」。奇怪的是，到4月，《時與文》和《世界知識》兩刊收到警告函，《觀察》的警告函

79　儲安平：《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觀察》1948年第4卷第10期。
80　儲安平：《政治失常》，《觀察》1948年第5卷第13期。
81　儲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觀察〉》，《觀察》1948年第4卷第12期。
82　儲安平：《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觀察》1948年第4卷第10期。

竟然沒有下達到雜誌社。[83] 這顯然是政府中的朋友向權力中樞作保的結果。政府不好明查，卻行暗扣，各地經銷《觀察》的，常常受到威脅，閱讀《觀察》的，已經成為忌諱，很多地方的郵局將雜誌社寄出的「觀察叢書」列為禁書，給予查扣。當年7月，儲安平意識到《觀察》的危機迫在眉睫，再次決定先發制人，發表了《政府利刃，指向觀察》，打算在接到查封令之前，對政府公開說幾句話：

> 我們創辦刊物，獻身言論，其目的無非想對國家有所貢獻。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其組織既極繁雜，其活動尤極錯綜，全賴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崗位，有所建樹，分而言之，各盡一己之獻，合而言之，充實國家之命。政府雖是治理國家事務的一個最重要的機關，但是政府並不就是國家。政府官吏，受民之託，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並非國家禍福最後主宰之人。我們不僅認為執政人物，假如他們政策錯誤或不盡職責，可以令之去職。同時，對於過問國事，我們堅決認為，這既是我們的權利，亦復為我們的義務。在朝執政和在野論政，其運用的形式雖異，其對國家的貢獻則一。若以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議政，務使一切民間報章雜誌歸於消滅，尤可謂糊塗太甚。
>
> 我們不相信封了一個《新民報》，再封一個《觀察》，社會即能趨於安定。《文匯報》被封，業已一年，社會秩序又何嘗因《文匯報》被封而稍改善。我們在此忠告政府，你們要挽回你們的頹局，就得全盤檢討，痛改前非，人民受你們的迫害，已經到了歷史上少見的程度，假如你們以為封幾個報紙刊物就能挽回你們的頹局，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願意在

83　儲安平：《吃重·苦鬥·盡心》，《觀察》1948年第4卷23、24期合刊。

> 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罷，不封也罷，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84]

「明天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這種話非常耐人尋味。

中共的態度

共產黨當然留意到了儲安平的態度。

從現有資料看，毛澤東也在關注《觀察》，他會通過這個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刊物，瞭解中間階層的政治態度。毛澤東在《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最近看到外面的報刊如《觀察》雜誌上有文章這樣說：『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轉而寄託其希望於共產黨？』去年春天有個人寫文章說：『現在全國人民對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秋天這個人又寫文章，說蔣介石和中國政府業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85]「離心厭惡」一語出自儲安平《中國的政局》，

84　儲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觀察〉》，《觀察》1948年第4卷第12期。

85　毛澤東：《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影子」一語出自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不過，毛澤東並未直接提儲安平的名字，而是耐人尋味地稱之為「有個人」。這個詞似乎能說明，儲安平這種人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在毛看來，儲安平不過是一個暴得大名的書生，其主辦《觀察》的動機令人懷疑，或是獨樹一幟嘩眾取寵，或是一種政治上的投機。儲安平這種書生手無寸鐵，雖然標榜第三條道路，一旦國共某方勝出，必須調整立場，選擇站隊。毛澤東可能希望儲安平對國民政府的批評越激烈越好，但他不會感念這樣的批評，反而還會覺得如儲安平這樣的知識分子非常危險，若將來不加整治，便可能危及自己的統治。

對於儲安平這種態度曖昧不明的中間知識分子，中共黨內的文人也要求他「站隊」。1947年7月19日，楊光時等在《觀察》頭版發表文章，呼籲建立「民主國際」，以對抗共產勢力在世界的蔓延，引起了中共的強烈不滿。1947年的《時與文》上發表了《偽自由主義者的真面目》，對《觀察》及諸作者表示鄙棄，認為他們反人民而且賣國，是「反動派」的幫兇。香港的中共報紙《華商報》則將儲安平比作《紅樓夢》中的焦大，認為儲安平對國民政府小罵大幫忙，是一種對主人忠心的表示。但是正如焦大忠心為賈府打算，酒後大罵卻吃了馬糞，《觀察》遭到政府的迫害，說明當主人荒淫無恥又昏庸垂死的時候，即使是焦大這樣的僕人同樣會受到壓迫。1948年初，《華商報》更是公開要求《觀察》站隊，勸告儲安平看清楚國共鬥爭的是非後再加入到「是」的方面來，如果看不清楚，請站到旁邊先看一看，如果在中間模棱兩可，鑽來鑽去，立場曖昧不清，最終必定會與國民黨一樣受到鞭打。[86]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謠言的中傷和襲擊。儲安平在《觀察》

86　曹建坤：《中國共產黨與自由主義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0–153頁。

上的犀利言論，一次次觸碰到政府底線，卻仍然安然無恙，中共方面懷疑，儲安平有國民黨背景。其中署名孟南者在《揭開偽自由主義者集團的畫皮》一文中，將儲安平與胡適、傅斯年、王芸生等並稱為「亦朝亦野」的人物。[87]《觀察》遭遇第一次政治危機而安然無恙，《華商報》稱儲安平已經將《觀察》賣給了CC系，遭遇政治危機時，他親自登陳立夫、李惟果之門請罪，表示一定會改變言論立場。至於儲安平借朋友的證件旁聽「行憲國大」，在這些報紙上則變為「受邀列席」。

不過，這些打擊只是表面，在背後還有統戰的一條脈絡，那就是笪移今、張志讓、陳維稷等一批日益與儲安平接近的朋友。

笪移今(1909–1998)，江蘇句容人，曾就讀於中國公學大學部。早年因反蔣而入獄。抗戰初期受周恩來間接委派，在江西蔣經國身邊潛伏。1942年任重慶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教授，期間結識褚輔成、許德珩，參與籌建九三學社的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上海商業銀行經濟研究室研究員，並在潘梓年、許滌新的授意下，發展九三學社組織，在知識分子中做聲援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在重慶時，他因投稿《客觀》而與儲安平相識，後資助儲安平辦刊，成為《觀察》的大股東。

儲安平開始時並不依靠笪移今，在用稿上多徵求伍啟元和吳世昌的意見。1947年，二人雙雙出國，身在上海的笪移今開始被儲安平倚重。笪移今也投其所好，主動接近。在中共和九三學社的統一戰線計劃裏，儲安平和《觀察》是他們「兩點一線」中的一點。如笪自述：「所謂兩點，一是民治新聞專科學校校長顧執中，兼課教師孟憲章、焦敏之和我都是九三學社成員，彼此見面機會多，對反美扶日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易於取得一致的看法；二是《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當時是不參加九三學社活動的九三學社成員，我是該刊創辦發起人和撰稿人之一，儲同我常

87　孟南：《揭開偽「自由主義者集團」的畫皮》，《光明報》1948年第1卷第2期。

在一起分析政治形勢，討論編務和選稿標準等問題。」[88]

笪移今所說的「反美扶日」，指的是1947–1948年由中共授意、九三學社發動的反對麥克亞瑟扶植日本的行動。美國支持國民黨，反美的根本目的便是反對國民黨，支持中共。儲安平對美國評價極差，笪移今的統戰工作遂進展得非常順利。九三學社在組織知識分子座談和召開大會發表宣言之外，利用《觀察》發表了大量反美的文章。原本不參加黨派，很少參與活動的儲安平，甚至在笪移今的遊說下，參加了1948年6月26日在國立交通大學舉行的反美扶日運動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還有馬寅初、陳叔通、史良、許廣平、王造時、周谷城等，在會上，他們對美國及其支持的國民政府進行了嚴厲抨擊，並借國民政府阻止該運動之題發揮，控訴當局壓迫自由。這些行動對中共構成一種無形的支持。

這次反美大會，張志讓、陳維稷也是參加者。

張志讓(1893–1978)，字季龍，江蘇常州人，曾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柏林大學，大革命時期受張太雷影響，同情共產革命。1932年起任復旦大學法律系主任，同時與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單線聯繫。抗戰後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編輯《憲政》月刊，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聯誼會」，成為中共的外圍組織，影響頗巨。[89]儲安平任教復旦大學，就是通過張志讓的關係。他對張志讓也非常敬重。張志讓從事地下活動，一個主要任務便是統戰儲安平。如尚丁所說：「季龍先生所說的『許多』事情之中，就有幫助《觀察》雜誌的工作。《觀察》雜誌本來是鼓吹中間道路的有影響的刊物，但儲安平對季龍先生很敬重，在季龍先生的影響下，《觀察》雜誌一步步前進。後來，儲安平被迫離滬，就把《觀察》雜誌的編務委託季龍先生全權處理。這是外界少有人知的。」[90]

88　笪移今：《九三學社的源起和在上海解放前的鬥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2007年第124輯。

89　張志讓：《張志讓自傳》，《文史資料選輯》1983年第85輯。

90　尚丁：《民主憲政運動的先鋒戰士張志讓與憲政月刊》，《文史資料選輯》

陳維稷(1902–1984)，安徽青陽人，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英國里茲大學。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任中國紡織公司總工程師兼第一印染廠廠長。受中共上海工委的委託，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掩護，在上海開展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活動。期間，他參與籌辦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在上海紡織系統建立了中共外圍組織——中國紡織實業協進會。[91] 目前沒有直接資料證明他曾做過儲安平的統戰工作。但是，他是《觀察》的股東，與儲安平交往比較密切。從這幾點來看，這些都是有目的的行動。他也絕不可能對儲安平沒有任何影響，至少在幫助認清形勢，做好思想準備、或提供中共的文獻資料方面，可能影響過儲安平。

據儲安平的同學何雨文說，還有一位光華同學夏建國，也曾投資《觀察》，最後還做了經理，掌握了社裏的實權。此人大概也是中共派到社中做儲安平工作的，夏建國後來還擔任了上海市某公安局的副局長。[92] 觀察社內確實有夏建國其人，還曾被警察軟禁在社中。不過，據沈昌煥的夫人黎蘭講，夏建國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臥底說尚須考證。[93] 但可以確定的是，地下黨與儲安平有直接通信，當時在上海做學徒的沈昌文先生回憶，1947–1948年前後，他曾受地下黨員虞天石之託，去青年會宿舍給儲安平送過信。[94] 據唐寶璋先生回憶，儲安平於1948年秋請人寫軍事評論，交談時就有地下黨在場。[95]

這一點從交往圈子上也可證明。1948年9月22日的《葉聖陶日記》留下了儲安平與張志讓交往的記錄。當時儲安平宴請了葉

1983年第85輯。

91 薛慶時等：《陳維稷傳》，中國紡織出版社，1997年，第54–62頁。

92 何雨文：《懷念儲安平》，《天文台》1957年6月22日。

93 沈大川先生訪問記錄，台北，2013年12月7日。

94 沈昌文先生信，北京，2013年8月27日。

95 唐寶璋：《民主雜誌〈觀察〉封閉前後》，《追尋儲安平》，第53頁。

聖陶、張志讓、施復亮、葉篤義、吳晗、高祖文等人，在宴席上，他們談論了政府迫害拘捕學生的情形以及其他時事。[96] 從聚餐的參加者來看，都是清一色的共產黨或左派教授。據此判斷，到1948年前後，儲安平基本疏遠了端木愷、陳之邁、沈昌煥這批有國民黨背景的朋友，也疏遠了吳稚暉、傅斯年、王雲五等長輩，交往圈子都是左翼人士，甚至與地下黨有一定的聯絡。這些人的立場註定會影響儲安平的判斷，使其逐漸傾向於共產黨。

即使如此，儲安平也並未完全將《觀察》變成中共的文宣機器。

1948年10月，《觀察》發表了張申府的《呼籲和平》和楊人梗的《再論內戰》兩篇文章。張申府說：「一個國家絕無可以百年內戰或百年戡亂的道理。與其將來全國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計，替國家保留一點元氣，使人民得喘一口氣？」楊人梗則認為，長期內戰必將造成新的軍人集團，流血革命不過是以暴易暴，無法保證大亂之後實現大治。他說：「根據革命的理論，有人提出了內戰本質問題，認為今日的內戰非普通封建集團對立的內戰可比，他是一次必須徹底完成的革命，惟有繼續內戰始可完成革命。我們清清楚楚記得，主張革命的人在一年以前曾經提出『反內戰』的口號，為什麼在當時反內戰便沒有內戰的本質問題？我很懷疑，今日努力爭取民主的人，在將來是否會要提出民主的時間問題來延遲民主，是否也會像國民黨一般主張有一個訓政時期？……我們不曾料到受三民主義支配的武人會如此跋扈，我們又有什麼把握斷定受共產主義支配的武人不會專橫呢？」

這是兩篇不合時宜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發表時，具有決戰意義的遼沈戰役已接近尾聲，共軍在東北殲滅國軍47萬，打下江山的目標已近在咫尺。如此巨大的內戰傷亡，實為民國以來未有。

96　葉至善等編：《葉聖陶集》第2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5–316頁。

張申府、楊人楩呼籲停止這種恐怖的屠殺式決戰，是自由知識分子良心的一種表現。但是，內戰的天平已經扭轉，這兩篇文章顯然對當前的勝利者不利，也不符合「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宗旨。張申府由此被《人民日報》斥為「叛徒」、「賣身投靠」，在香港的民盟開除了他的盟籍，妻子劉清揚也登報，宣佈與之脫離關係。[97]

儲安平刊發了這篇「政治極不正確」的文章，難免引起中共的不快。據笪移今回憶：「有一天施復亮同我談起《觀察》週刊傾向性的問題。他坦率地指出在鬥爭的關鍵時刻，不宜刊登張申府那篇《呼籲和平》。我們都認為此文已落後於形勢的發展，忽視了國共軍事地位的變化。之後，我約儲安平與施復亮在延安中路紫竹林飯店便餐後回到青年會儲安平的住處，分析戰局的趨勢，論證共產黨解放軍在戰略上已由防禦轉為反攻，國民黨軍隊已開始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和平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體內容，應以人民根本利益為轉移的。當人民需要和平，國民黨卻違反民意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當共產黨武裝鬥爭有利於人民，則必須堅持反攻，直至徹底打垮國民黨政府，這是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願望和要求的。經過這次長談，我們在政治上取得一致的看法。」[98]

所謂共識，大概是施復亮對儲安平曉以利害，戰爭或者全贏，或者全輸，已經沒有了妥協的可能。這個道理儲安平也懂，只是情感上難以接受。經過施復亮的一番勸解，以及對未來共產黨執政的美好展望，他逐漸打消了這種疑慮。或許他這樣思考，儘管一直認為共產黨統治之下無法獲得自由，但毛澤東畢竟在講聯合政府，講新民主主義，中共的言論機關也在呼籲民主憲政。難道這一切只是欺騙，只是收攏人心的策略？至少中共有決心有意願解決民生問題。相對於國民黨，中共的形象也的確比較正

97　舒衡哲：《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第219–226頁。

98　笪移今：《九三學社的源起和在上海解放前的鬥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2007年第124輯。

面，至少目前作風廉潔，政治清明。有這麼多知識分子督促，中共未必真會如想像般壓制自由。即使自由暫時受到壓抑，換取的是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似乎也是值得。反觀國民黨治下，政治獨裁，經濟崩潰，軍事失敗，已經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面臨的必將是被民眾遺棄的命運。兩相對比，孰優孰劣？於是，儲安平這位原本「中間偏左的戰士」，終於決定將砝碼壓在中共身上。

逃亡

從此，儲安平以「拆爛污」的心態對待國民政府。1948年秋，國民政府歷時七十天的幣制改革告以失敗，國民經濟面臨全面崩潰。儲安平評論道：「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20年來拆足！爛污！」然而，最終導致《觀察》被查封的，卻並非他的「爛污」評價，而是「觀察通信」刊載的軍事通信。

1947年下半年以後，當儲安平意識到論政的作用已經有限時，為吸引讀者，他開始有意識地刊登軍事通信，甚至經常親自撰寫不署名的軍事通信。不過，他畢竟不是軍事專家，除了利用公開的報刊資料，並無內部消息。1948年秋冬國共決戰之際，欲將這場可能改天換地的戰爭的來龍去脈第一時間呈現在讀者面前，必須有高手相助。在朋友的引薦下，他找到了軍官張今鐸。張今鐸，生卒年不詳，山東東平人。早年就讀於北洋大學，後參加大革命，任黃埔軍校教官，與周恩來相識。三十年代在天津活動時，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從此矢志終身反蔣。抗戰中，先隨周恩來任教於延安抗日大學，後任職於葉挺的新四軍中。皖南事變後脫離軍隊，任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顧問。據稱，該人對孫子兵法頗有研究，又精讀德國軍事學說，對軍事的觀察異常深刻。張今鐸害怕《觀察》不敢登自己份量重的稿子，儲安平承諾說，

只要敢寫，他就敢登，語氣之堅決，讓張今鐸非常吃驚。[99]

張今鐸果然敢寫，在《觀察》第5卷中連續發表了《濟南之戰》《政局報告》《大局的搶救》《徐淮戰局的變幻》《大局外弛內張》等通信。在《濟南之戰》中，張今鐸透露了濟南失守的真實情況，預測了國共雙方其後的戰略部署。在《政局報告》中，他透露了蔣介石北平之行召開軍事會議，揭露了國民黨中一部分人希望「以外戰救內戰」，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盡快爆發，由美國出兵挽救國民黨失敗的命運。在《大局的搶救》中，他透露了國民黨將要在華中和東南建立新兵團，建設新防線的機密，並預測到蔣介石為顧全大局，很可能會犧牲親信豪門大族的利益。至於《徐淮戰局的變幻》《大局外弛內張》兩文，則是全面揭示了國軍在淮海戰役中的部署，包括參戰的兵團數量、戰略佈局、應對策略等等，這些都屬於高級軍事機密。也就是說，在未決戰之前，張今鐸就將國民黨的戰略部署都公佈在《觀察》之上。據說，蔣介石在最高軍事會議上指着《觀察》上的《徐淮戰局的變幻》一文說：「我們的軍事機密已被人家在雜誌上洩露了，還打什麼仗？」他立即下令，徹底查封《觀察》，逮捕儲安平，並懸賞金圓券三十萬元捉拿為觀察寫軍事通信的記者。

實際上，儲安平目睹國民黨日薄西山，節節敗退，勢如纍卵，預測到在現政權徹底崩潰之前，極有可能針對他這樣的民主人士展開行動。因此，12月以後，他已經很少公開出現，並隨時準備撤離。時任司法院秘書長的端木愷在政府中得知國民黨將要對儲安平下手，立即通過秘密管道暗示儲安平趕快逃亡。儲安平得到暗示後，於12月11日下午趕到社裏編好第5卷第16期，次日一早便飛往北平，名義是去北平與潘光旦、費孝通等商議今後如何辦《觀察》，實際是逃亡。他臨走前，將編輯和經營業務交由雷柏齡和另一位新來的編輯林元負責，並囑託張志讓、筧移今代

99　唐寶璋：《民主雜誌〈觀察〉封閉前後》，《追尋儲安平》，第53頁。

為照顧。幾人商議，決定將《觀察》支撐下去，遂照舊發行第17、18期。儲安平走後，查封《觀察》的消息越來越多，各界人士紛紛打電話到雜誌社來，求證雜誌是否已被查封。[100]

1948年12月21日，內政部查封《觀察》的公文到達上海市政府。電文稱：「查觀察週刊，言論態度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經本部予以警告處分在案。乃查該刊近且變本加厲，繼續抨擊政府，譏評國軍，為匪宣傳，擾亂人心，實已違反動員戡亂國策，應依照國家總動員法第廿二條及出版法第卅二條之規定，予以永久停刊處分。相應電請查照辦理，飭繳原領登記證送部註銷。」上海市政府接電後，市長吳國楨立即命令上海市社會局、警察局聯合查封《觀察》。24日下午4時，三個陌生人來到雜誌社，出示查封令，由雷柏齡代儲安平簽收了具結書。雜誌同人商議，要求援引其他刊物被查封的先例，出版休刊號。雷柏齡遂於25日致書社會局：「敬呈者：屬社出版之《觀察週刊》，昨已奉到鈞局轉達內政部代電一紙，着即停止發行，政府法令，自當遵辦。惟屬社週刊，擁有萬餘定戶，倉卒停刊，無法結束。以是特懇援《國訊》《時與文》《再造》等週刊之前例，准予出版休刊號一期，以請手續。」[101] 12月26日，社會局尚未回覆，同人決定照常上班，準備出版休刊號。下午5時許，一群彪形大漢手拿機槍闖入雜誌社，先是蒐身，其後是蒐查每一個角落。在林元身上，特務蒐到了給儲安平未寄出的信以及《徐淮戰局的變幻》原稿。傍晚時分，來社商談休刊號事宜的笪移今被捕。那些陸續來社問事、買書、探望的人和職工家屬也遭到拘禁，很快就關了六十多人。期間，警察打開保險箱，拿走現金和期票，大吃大喝。當晚，警察抓走了林元、雷柏齡、笪移今，職工黃立天、周興美、徐

100　林元：《從〈觀察〉到〈新觀察〉》，《追尋儲安平》，第68頁。

101　《上海市社會局關於查禁觀察週刊事同該刊、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的來往文書》，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社會局檔案，檔號Q61216072。

焰、朱宜咸、羅培根等八人，其他員工被監禁在社內。[102]

林元寫給儲安平的信，地址為北京燈市口《大公報》辦事處徐盈收轉，北平方面的警察遂於12月30日晚闖入大公報社，等待抓捕儲安平。與此同時，上海方面對林元、雷柏齡進行疲勞審訊，要其說出特約軍事記者的下落。林元、雷柏齡守口如瓶，答來稿都寄給儲安平，自己沒有權利過問。警察無奈，從已被撕成碎片的觀察社來信中，發現與林元身上相同筆跡的信件，上有署名「邨民」、「張寄」、「今」等字樣，稿紙為國防部史政局用紙，國民黨軍事參謀總長顧祝同遂下令在國防部查找「張邨民」。但此時，身在上海的張今鐸已經秘密逃往香港。1949年1月26日，筧移今等被捕的九人，經王造時的保釋出獄。其後，林元、雷柏齡二人被押解到南京，到共軍渡江攻佔南京時才獲釋。

身在北平的儲安平，在樓邦彥、王鐵崖等好友家中暫避。由於事先得到《大公報》社被控制的消息，便切斷了與徐盈的一切聯繫。1949年1月31日，共軍接管北平防務，北平和平易手。儲安平已經真正身在「解放區」之中。

102 唐寶璋：《民主雜誌〈觀察〉封閉前後》，《追尋儲安平》，第55頁。

第十一章　在新政權之下

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裏。

——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和編輯方針，1949

東北考察

儲安平在北平避難期間，經常和樓邦彥、王鐵崖來龔祥瑞家聊天。儲安平談得最多的是他傾注了全部心血的《觀察》。他認為，已經在上海開創了一番事業，擁有數萬名讀者，一定要讓《觀察》作為中共的「諍友」繼續存在下去。[1] 然而，中共最初並沒有給予這位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以足夠的重視。

隨着三大战役的節節勝利，中共邀請分散在海內外的民主人士前往共區，醞釀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當時有兩個中轉站接待民主人士，一是哈爾濱，接待香港和海外的民主人士，如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馬敍倫、彭澤民、沙千里、蔡廷鍇、章乃器、朱學範、李德全、茅盾等人，一是河北平山縣李家莊，接待平津等地的民主人士，如周建人、翦伯贊、劉清揚、楚圖南、田漢、胡愈之、吳晗、宦鄉等人。[2] 1949年1月中

1　龔祥瑞：《盲人奧裏翁：龔祥瑞回憶錄》，第199頁。

2　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338頁。

旬，中共還特意安排北平四教授張東蓀、費孝通、嚴景耀、雷潔瓊秘密趕往西柏坡，商討召開新政協事宜。

儲安平不在中共通知之列。一個多月後，費孝通歸來，儲安平責怪他，為什麼沒有帶上他去？然而，這是中共的安排，費孝通只能保守秘密，無權擅自決定。[3] 這說明，雖然他主動來北平投效新政權，也很想接近新政權，但並不是組織上信任的民主人士。或許是出於邊緣化的憂慮，他採取了主動示好的策略。

1月14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提出的元旦求和文告發表嚴厲聲明，提出和平談判八項條件，即廢除憲法和法統、改編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接收國民政府一切權力等。各民主黨派紛紛發電表示擁護。儲安平、樓邦彥、王鐵崖等五十餘位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亦聯名通電表示擁護稱：

> 和平原為人人所企求，但是我們所爭取的並非偽裝陰謀的反動的和平，乃是真正的和平，民主進步的和平。基於帝國主義封建制度以及豪門資本的種種勢力，造成多年來全國人民遭受壓迫的反動統治，這些勢力一日不徹底剷除，真正的和平就一日不能實現，民主進步的中國也無以建立，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先生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和平條件，應當是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所以我們主張經由民主的黨派及民主人士所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嚴格以八條件為基礎，以求達到推翻反動統治，解放全國人民及創造民主進步中國之最後目的。[4]

2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司令部、北平市委市政府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盛大的歡迎會，招待從各處到達北平的民主

3　朱學勤：《費孝通訪談錄》，《南方週末》2005年4月28日。

4　《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擁護毛澤東八項主張》，《新民報》1949年1月26日。

人士共410人。或是之前的聯名通電起了作用，此時的儲安平已經引起中共重視，作為文化界代表受邀參會。[5] 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進駐北平。4月9日，儲安平隨即在北平文化界三百二十九位民主人士的聯名抗議上簽名，譴責傅斯年、杭立武、朱家驊、王世杰等「喪心病狂、助桀為虐」的「文化戰犯」將故宮博物院文物遷台。[6] 表示與幫助過自己的傅斯年、杭立武劃清界限，是聲明與舊政權徹底決裂的再度表示。

國民政府一路倉皇南逃，大江大海，北平卻是各路人馬齊聚，一片熱鬧繁盛的景象。民主人士尚未聚齊，召開新政協也需要時間籌備，而其中一部分直接從國統區來的民主人士還沒有到過東北共區，很有必要讓這些人去那裏參觀考察一番，進而瞭解中共的治理能力。1949年4月22日，一支由高層安排組織，自願申請參加的「民主人士東北參觀團」登臥車前往東北，其中包括了儲安平、馬思聰、譚慕愚、常任俠、吳羹梅等五十九名民主人士。火車經昌黎、山海關、錦州、瀋陽，最後抵達哈爾濱，返程則繞道遼東等地考察，歷時一個半月。參觀團一路上時走時停，參觀古跡、工廠、礦山、學校、醫院、監獄和基層組織。東北方面按照高層指示，對這些民主人士可謂禮敬之至。每到一處，基本都是由最高首長在車站迎接，既美酒佳餚款待，又送錢送物。參觀團成員常任俠在日記中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 (4月24日)十時到瀋陽，市長朱其文、軍區司令林楓皆來迎至車站，招待極其豐盛。
>
> (4月25日)東北局招待所送錢50萬。……五時赴東北政府宴會，酒餚甚盛之至。
>
> (4月26日)晚間工廠招待，大吃大喝，酒餚極豐。

5　《儲安平成民主人士》，《申報》1949年3月3日。

6　《北平文化界發表宣言，聲討南京反動政府盜運文物》，《人民日報》1949年4月11日。

(4月28日)晚間大宴，計四菜盤，四鹹盤，四甜盤，其次燕窠、銀耳、魚翅、海參、八寶飯、蝦仁、海鯽魚、口蘑、叉燒、饊桃、三仙，又四小盤，花餅、饅頭、米飯，酒三種：啤酒、葡萄酒、白蘭地。筵宴豐盛之至。[7]

當時的中共剛剛接收東北數月，經濟上並不能說有多寬裕，但為籠絡人心，採取了不惜工本式的招待。這些盛情款待，民主人士看在眼裏，暖在心上。或許在出發之前，內心深處還對中共有某種保留，東北參觀之行多少讓他們打消了疑慮，覺得中共是誠心邀請他們參加建國事業。一路上刻意安排的參觀，也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看到了一個和國統區不一樣的天地，愈加佩服中共改造舊社會的力度。

1949年5月9日，參觀團一行參觀了哈爾濱市法院和監獄，這顯然是一次組織上精心導演的參觀，卻給儲安平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以法院為例，他認為，過去的法院都是有理無錢進不來的衙門，統治階級剝削勞動大眾的工具。改造後的法院最大的特徵便是勞動人民有了真正申訴的機會，訴訟程序已經大大簡化，法官沒有架子，以親切談話的方式調節糾紛。過去一項案子要聘請律師，數次開庭審理，而今不需要辯護，結案的時間大大縮短，一兩週即可結案。對於監獄他更是多有稱讚。在他看來，哈爾濱的監獄不像是監獄，像一所學校，監房寬敞明亮，空氣清新，內務整潔，犯人有的在讀書，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讀報給他人聽，甚至還有人在編劇本。監獄還有犯人俱樂部和圖書館，每天都會組織犯人進行思想學習。思想改造之外是勞動改造，監獄組織犯人建立起印刷、紡織工廠，進行手工生產，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甚至多有盈餘。這是一種可以向全國推廣的良好經驗。[8]

7 常任俠：《春城紀事(1949–1952)》，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3–34頁。

8 儲安平：《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觀察》1949年第6卷第4期。

在旅順、大連，參觀團主要瞭解當地的土改情況。儲安平觀察的可謂相當認真、仔細。他記錄道，這兩個地方為了鼓勵生產，暫時並未進行土改，而是在勞資關係、租佃關係、生產方式等方面尋求改進。首先，將公有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其次，由政府提倡增產增收作物的種植，並幫助運輸行銷。第三，保留現有租佃關係，但不許包租轉租隨意停租，租金也要雙方協商。第四，保障勞資關係，簽訂契約，尤其保障勞動者的權利。第五，一定程度減免農業稅。第六，改變過去的零散幫工模式，貧農建立互助團體，以平等的身份與有牲口的富農展開合作。[9] 儲安平認為，共產黨在農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而且有策略有理性。過去土改那種極端粗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鬥爭模式，在這裏已被摒棄。

6月中旬歸來之後，參加東北考察的五十九位民主人士聯名致函毛澤東陳述觀感：

> 首先，使我們感到最重要的是，向來被人看作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主席領導之下，經歷了長期的鬥爭鍛煉，現在已經組織成並教育成鋼鐵一樣堅強的身體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經充分發揮了效能——群眾有發表意見的絕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貫徹到最下層去。這樣堅強的集體，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將來，革命在全國勝利，中國對世界和平事業將起極偉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其次，我們看到了東北在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現在都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發揮前所未有的創造力量，這是中國前途富強並能迅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保證。綜觀這次參觀所得，

9　儲安平：《旅大農村中的生產、租佃、勞資、稅制、互助情況》，《觀察》1950年第6卷第5期。

> 使人感覺振奮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贅述。我們深深感到，一切優美的成績，應當歸功於人民力量的偉大，歸功於共產黨領導的成功，歸功於主席英明的決策和指示。同人等參觀歸來，感到今後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和信念，將愈加堅實，這是可以告慰於主席的。謹向主席致最崇高的敬禮！[10]

這樣熱情洋溢的話，當然同樣是主動示好，也很難說完全不是發自內心。

政協代表

歸來後，儲安平被安排住進了遠東飯店。[11] 這意味着，儲安平已經正式成為內定的政協代表，中共的座上賓。周恩來親自到遠東飯店噓寒問暖，竟然還順道去房間看望了儲安平。即使不是專訪，這種禮賢下士卻足以表示誠意，成為儲安平在朋友面前津津樂道的談資。[12] 7月12日，周恩來又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宴請胡愈之、儲安平、浦熙修、薩空了、鄧季惺等新聞界人士，詢問他們是否有困難，表示組織一定幫助解決。[13] 儲安平利用這次機會，向周恩來提出了《觀察》復刊的問題。周恩來指示即將全面主持中國文宣工作的胡喬木具體負責此事。不久，政府正式發文，表示歡迎《觀察》復刊，但希望把總社遷到北京，以便易於瞭解政府的政策。此時的林元、雷柏齡已被國民政府釋放，留在上海主持滬社。儲安平隨即給他們去電，要他們整理滬社，早日來京籌備復刊。

10 《民主東北參觀團參觀歸來，致書毛主席陳述感想》，《人民日報》1949年6月27日。

11 常任俠：《春城紀事(1949–1952)》，第45頁。

12 戴晴：《梁漱溟儲安平王實味》，第176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4頁。

與此同時，儲安平參加了胡喬木組織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類似協會是仿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團體，將各種專業人員組織到不同的協會內，名義上屬於群眾群體，實際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代表政府對知識分子進行管理。[14] 該會將「推舉」出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參加新政協。1949年7月13日，代表名單出爐，胡喬木、金仲華、陳克寒、張磐石、鄧拓、惲逸群、楊剛、邵宗漢、徐邁進、劉尊棋、王芸生、趙超構為正式代表，徐鑄成、儲安平為候補代表。按照新政協規定，候補代表可以列席會議，有發言權，但沒有表決權。[15]

老友費孝通是民盟的正式代表。以《觀察》的貢獻和影響，這個「候補」對儲安平來說有些委屈。但是，名單經過統戰部門再三斟酌，新聞界代表中僅有四位民主人士，能得一席已屬幸運。而且，從理論上講，新政協是臨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有立法權，負責制定、通過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有「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國旗國徽，確立國名，決定國都所在地的權力。全國有四億七千萬民眾，政協代表不過六百多名。四十歲的儲安平名列首屆政協代表，親眼見證新中國的誕生，也算是一種可以載入史冊的殊榮。

而且，儲安平雖是「候補」，也足以讓人嫉妒。儲安平的老師潘光旦，作為民盟中央委員卻無緣入圍；王造時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反復懇求救國會提名他參加新政協，言辭淒婉，也未能入選。[16] 同去東北考察的常任俠亦未列政協，對儲安平當選候補委員多有非議。他說：「此次政協分子，有殺人屠夫，手血

14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8–59頁。

1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議事規則》，《人民日報》1949年9月23日。

16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4頁。



參加新政協會議留影

未幹者，有政治投機，朝秦暮楚者，包容過去反革命分子，殆不止一二，如黃紹雄及其姘婦譚惕吾尚能出席，如李健生庸俗貪鄙，亦能列席；儲安平第三路線，亦在候補。」[17] 他顯然不滿，那些「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者，竟然也被視為座上賓，和中共成為親密的朋友。

舉世矚目的新政協召開了十天，陸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多黨聯合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列強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均被取締，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穩步將中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中國的民眾，都將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聯合世

17　常任俠：《春城紀事(1949–1952)》，第68頁。

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共同反對列強侵略，維護世界永久的和平……按照毛澤東「聯合政府」的構想，政協「選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裏，副主席6位，3位黨外人士，副總理4位，2位黨外人士，政務院委員15位，9位黨外人士，34個部委、會、署、院、行的領導人中，14位黨外人士。[18]

儲安平資歷低微，在政協中屬於最普通的一分子。但是，從理論上講，這份《共同綱領》完備周詳，中央人民政府架構合理、安排得當，大體能夠讓他滿意。新政協閉幕的次日是開國大典。作為政協候補委員，他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毛澤東檢閱群眾。此時他內心滿懷期待，甚至狂喜。就如儲望華說：「令我難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白日，作為全國政協代表，他有幸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上觀光檢閱，晚上帶我們全家到天安門廣場參加群眾狂歡。建國之夜，我是騎在爸爸的雙肩上，在天安門前度過這難忘的一宵。爸爸在建國日當天當夜所表現出來的興奮、激情，至少在於我們這一個孩子，是一生中所從未見到的一次。」[19]

失落的諍友夢

新中國成立，可謂是冠蓋滿京華，民主人士多半都在新政權裏分得紅利。就儲安平的師友而論，張東蓀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羅隆基成為政務院委員，張志讓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陳維稷成為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如果從政，儲安平應該也能夠謀得一官半職，但他還是對新聞工作感興趣，念念不忘延續自己開創的事業。他仍希望以自由報人的身份繼續從事言論事

18　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年卷》，第622頁。

19　儲望華：《懷念我的父親儲安平》，《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6頁。

業，成為新中國的無冕之王。他將所有精力都用在《觀察》復刊上。然而，來北京探望的學生張嘯虎意識到了問題，對老師說，《觀察》這類刊物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恐怕還要尋求新的起點。他建議老師仍回復旦大學任教，遠離北京政治中心。但是，他靠《觀察》起家，並以之為身家性命，沒有《觀察》就意味着一無所有，他不能放棄。甚至當他受邀到燕京大學開講座，也不忘向同學們報告《觀察》復刊，秉承四個階級兼容並包的立場，希望燕大學生來稿。[20]

當北京房價還沒有上漲時，儲安平就為觀察社買到新房，地點在東城區交道口北吉祥胡同二號，房子是前後兩院，共有十幾間，非常寬敞。1949年10月底，他在一塊已經漆成白色的大木條板上，用黑色油漆寫了三個成熟規範的大號仿宋字體「觀察社」作為社牌。[21] 11月1日，《觀察》正式復刊，林元留在上海主持滬社，京社的正式工作人員有儲安平、雷柏齡、劉慶平、張宗煒四人，一切仍由儲安平親力親為。

然而，國家的新聞政策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49年後，逐漸形成一套黨領導新聞界的模式。新聞總署成立，管理全國所有報刊雜誌。新華社成為發佈新聞的唯一權威機構。黨報制度確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黨報作為權威報紙。私營報紙多半被改組或停辦，少數進步報刊雖被允許繼續存在，卻逐步走向國營化、政治化。延安時期由毛澤東確立，陸定一、胡喬木詮釋的黨報原則，經過不斷貫徹，成為新中國新聞界的指導性原則。這個原則包括：「黨性第一」，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

20 余英時：《回憶1949年秋季的燕京大學——巫寧坤先生〈孤琴〉序》，巫寧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2008年，第11頁。余先生說，儲安平宣佈最近接受《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希望燕大學生來稿，屬誤憶，此時正值《觀察》復刊。

21 儲望華：《懷念我的父親儲安平》，《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5頁。

超階級的客觀報導；「反對『虛假真實性』」，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反對「搶新聞」等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運用報紙指導運動」，報紙應該被用來運動宣傳，教育幹部，打擊敵人……[22]

就《觀察》而論，復刊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長、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領導，上述原則必將更深入地貫徹到其言論活動中去。將《觀察》從上海調入北京，本身也是防止儲安平再有任何「興風作浪」的可能。無形的網罩在上空，儲安平的心態可以用「如履薄冰」四個字來形容。儲安平是個聰明人，此時已不像年初時那樣樂觀地說要做「中共諍友」。他多次與領導商談，反復請教，不但覺得政策不好掌握，群眾心態也不好琢磨，沒有辦好的信心。[23] 因此，復刊後的《觀察》，獨立、無黨派的英文標識不見了，為避免突出個人，「儲安平主編」的字樣也從封面消失，即使出自編輯部的文章也不署作者之名。

《觀察》復刊號的開篇文章便是《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和編輯方針》，主動對過去的工作進行檢討：

> 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會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裏。我們只批評了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去解剖揭發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着反動的國民

22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4頁。

23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第45頁。

> 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致我們在客觀上不知不覺地好像自居於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24]

清算自己，檢查過去，在當時的知識界是一種流行趨勢。王芸生正是主動承認《大公報》「始終維持着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才得以保住《大公報》的招牌繼續存在。當然，儲安平的檢討也不無真誠的成份。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廢待興，全國人民團結在中共周圍，確實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中共的情況和政策，對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而言十分陌生。儲安平覺得，為了更好地利用報刊為新中國服務，確實應該謙虛地向執政黨學習。

那麼，《觀察》的定位是什麼？儲安平說，對讀者而言，《觀察》的任務是向走在前面的讀者學習，團結改造那些和自己一樣，思想上比較落後但又有進步意願的廣大讀者群眾；對政府而言，聯絡一切進步專家學者撰文，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計劃、方案、報告，供社會討論，讓政府參考；就黨群關係而言，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讓政府有更多的機會瞭解到民間的聲音。儲安平畢竟還是沒有完全忘記做「中共諍友」的願望，在最後卑微地提出，如果各級政府有違反政策或偏向行為，《觀察》可能會根據具體事實，提出建設性批評。對《觀察》的新定位，顯示出儲安平的矛盾之處。既然承認《觀察》是一個落後的刊物，又認為它還有可能對政府提出建設性批評，就說明他內心並不承認《觀察》真正落後。只是，新舊新聞原則之間完全無法調和，必須以放棄過去的原則為代價才能換取生存。但他又捨不得完全放棄。

24　本社同人：《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和編輯方針》，《觀察》1949年第6卷第1期。

實際上，對各級政府提出建設性批評，也只是儲安平的一種幻想。他已經沒有資格作這樣的批評。在過去，知識階層是社會重心，以輿論影響政治是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在新的階級架構下，工人階級是領導，工農聯盟是基礎，知識分子只能算小資產階級，需要向工農群眾學習，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以符合新社會的需要。知識分子本身就必須嚴格地自我批評否定，還有什麼資格批評政治？

由此，復刊後的《觀察》，完全採取歌頌社會主義國家形勢一片大好的態度。儲安平在努力學習新名詞，體會新思想，試着運用馬列主義的精神指導寫作。比如某期開篇社論《斯大林教導了我們》，歌頌斯大林在中國剛開始革命的時候，為中國指出了正確的革命道路；稱讚斯大林帶領蘇聯取得革命勝利，為中國提供參照對象。這篇社論，應該是儲安平執筆，成稿後和其他編輯字斟句酌商討，反復修改，並請示了胡喬木等上級領導的產物。這期還有御用文人郭沫若那篇著名的《我向你高呼萬歲》：

> 斯大林大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
>
>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
> 你的光熱將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將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
> 你的智慧將使江河改流，山嶽奔走，大地永遠年輕，人類永遠如兄如弟！[25]

《觀察》言論的單一，還因觀察社沒有獨家採寫新聞的權利。建國以後，政府通過登記審批的辦法，幾乎取消了所有舊的

25　郭沫若：《我向你高呼萬歲》，《觀察》1949年第6卷第4期。

通訊社或新聞社，基本上只允許新華社的存在。對國際新聞、國內政治新聞、軍事消息等，各報刊必須以新華社稿件為準，涉外消息更不能私自報導。對於本地新聞，如果涉及政府機關，也要層層審批或經審查同意後才能刊登。[26] 因此，過去以揭露批判為主的「觀察通信」，登載的是《三十一年來在戰鬥中成長的上海職工運動的總回顧》《東北工礦運動的創造新紀錄運動》《中蘇簽約，舉國歡騰》《廣州中山大學的新生》《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等完全肯定歌頌新中國的文章。雜誌也多了「思想與生活」一欄，配合方興未艾的思想改造運動。老友費孝通的《不改造就落後》《什麼叫搞通了思想》《從為人民服務引起的談話》等文章頻繁刊出。雜誌末尾開始刊登學習性的文字資料，以滿足廣大「落後群眾」學習新精神的需要。比如：「什麼是計劃經濟？中國目前能否實行計劃經濟？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名字有什麼區別？在無階級社會中的社會發展原動力是什麼？」……《觀察》從馬列著作和權威資料中摘抄出答案，詳細解答這些問題。

由於舊讀者期待《觀察》在新中國再創輝煌，最開始的幾期還被讀者關注，復刊號竟然發行了一萬多份。但是，發行量很快就一落千丈，雜誌已經完全虧損，不能自給。為什麼會虧損？林元的看法是：「人民已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在蔣政權統治下得不到的東西，已經得到；所關心的時局資訊，已由全國報刊敞開介紹，《觀察》的讀者轉移了。」[27] 事實恐怕未必如此。毫無疑問的是，如果人民只要看《人民日報》就已足夠，根本沒必要再看什麼《觀察》雜誌。而且，由於中共對報業的改造，報人已從自由流動的職業者變成國家工作人員，與人事編制、職稱條件、福

26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5–116頁。

27 林元：《從〈觀察〉到〈新觀察〉》，《追尋儲安平》，第73頁。

利待遇正式掛鈎。[28] 觀察社是民營組織，編輯一無編制，二無地位，三無職稱，四不被一般組織承認，社會地位非常低，身份十分尷尬。

若不是親身經歷，儲安平不知道其事有多麼難為，最後終於意識到，在集體主義的時代，由私人來主持刊物已不合適。《觀察》要走到哪裏？恐怕真的是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再辦下去只能是自取其辱。1950年春節剛過，儲安平就已經向朋友們諮詢《觀察》的歸屬問題。2月，他直接和胡喬木等接觸，希望政府接管雜誌。5月，政府同意改組《觀察》，工作人員可以在京滬兩地自由選擇工作。雷柏齡進入了人民出版社，林元繼續留在改組後的《新觀察》擔任編輯。《新觀察》由新聞總署領導，黎澍擔任主編，辦公場所從北吉祥胡同搬到新聞總署。剛剛籌備《新觀察》時，儲安平還和黎澍碰過幾次頭，後來就完全不來了。

1951年4月15日，已經名存實亡的觀察社召開了第二次股東會議。與1947年的慶功會不同，這是一次關門會。沈昌煥、端木愷、顧翊群等股東已經隨政府遷台，只剩下殘存的潘光旦、陳維稷、樓邦彥、費孝通、雷柏齡等人。

會上，儲安平報告了《觀察》從創刊到封門再到復刊的財務狀況，並提出善後事宜。他說，對復刊後的訂戶，一律改寄《新觀察》。京滬兩地工作人員，全部推薦到政府機關工作。雷柏齡、林元在社工作多年，功勳卓著，各贈送八個月薪水、舊腳踏車一輛。滬社庫存的舊《觀察》合訂本全部運京，折價買給機關單位和學校，目前已經售出七十餘套。「觀察叢書」在1948年末出版了一批，還未及銷售便被查封，這些書已經不符合新時期的政治需要，已作廢紙變賣。印刷用具等賣給新華書店和國際書店……儲安平認為，觀察社創立於他手，也結束於他手，說明他

28　賀碧霄：《新聞範式更替：從民間報人到黨的幹部——以上海私營報業改造為中心的考察(1949–1952)》，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46–57頁。

的才能經驗不足以勝任主持這項事業，當此結束之時，誠懇地向股東謝罪。

股東一致同意，觀察社從本日起正式結束。結餘股款按照股份平均攤發，身在海外的股東由於無法聯繫，股款由儲安平私人代為保管。賬冊在一年後由儲銷毀。少數合訂本及「觀察叢書」，每位股東及寫稿較多者各贈送全套一份。有股東提議，希望向股東贈送《新觀察》，並出版《五年來的政治文化上與舊社會鬥爭的總結報告》，決議由於事實困難，無法實行。儲安平提議，對笪移今、徐盈、樓邦彥三位幫助觀察社、掩護自己的先生贈送禮物並書面致謝，以股東會議名義致謝林元、雷柏齡。大家一致同意。

股東張似旅、周子亞、馮覃燕都提出，儲安平經營社務，煞費苦心，犧牲很大，應該將結餘款項提出一部分酬謝他多年的辛勞。費孝通提出，將觀察社在北吉祥胡同的房子送給儲安平。在場股東都表示同意。尤其是陳銘德認為，過去投資文化事業，實際就是捐贈，從不指望把錢收回，但是像儲安平這樣有始有終者實在罕見。股東孫冰如認為，觀察社能做到企業管理，已是難得，如今有始有終，更了不起，從中可以看到儲安平的辦事能力和負責精神，對他的人格更加欽佩。儲安平再三推辭，堅決不接受金錢酬勞和房子。最後大家一致決議，將房子以半賣半送的方式，按照購買時的原價讓給儲安平。時隔兩年，北京房價已有很大漲幅，儲安平要求在原價基礎上加價百分之五十。幾經推讓，議決以原價127.2%的價格讓渡。[29] 名噪一時的觀察社，由此壽終正寢。儲安平心中的感想，或許五味雜陳。

29　陳正卿選編：《觀察週刊社史料一組》，《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6期。

第十二章　做官與出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開過三次。通過一年一次的大會，它正在逐步奠定它自己的傳統。我們看到有兩個傳統正在育長之中。一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通過他們自己的業務、視察和見聞，在大會上對國家大政陳述主張，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並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另一個是國家機關的負責人員向大會並通過大會向全國人民報告他們的工作。特別在今年召開的大會裏，這兩點都給人們以異常鮮明的印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傳統，1956

從新聞到出版

建國後不久，儲安平受邀請加入九三學社。1952年9月，他被選為九三學社候補中央委員、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6年2月任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1] 大約1950年下半年，儲安平由潘光旦、費孝通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2] 儲安平加入這兩個民主黨派，為自己增加了雙重身份，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在新政權之下，已經不存在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幾乎所有城市人口都被整合到各種「單位」之內，沒有「單位」就等於沒有地位。他在新政協中僅為候補代表，便和自己沒有黨派身份有很大關係。不

1　《九三學社第三屆中央委員名單》《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名單》，九三學社中央社史辦公室編：《九三學社歷史資料選輯》，學苑出版社，1991年，第142、177頁。

2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登記表·儲安平》(1951年2月7日填表)，北京，民盟中央藏，民盟組織部人事材料。

過，這只是一種政治身份，不是工作單位。統戰部領導詢問儲安平，希望在什麼部門工作。儲表示仍願意留在出版界，於是便來到出版總署。

出版總署是建國後新成立的出版管理機構，隸屬於政務院，首任署長胡愈之，副署長葉聖陶、周建人。成立出版總署是新中國高度重視出版工作和文化事業的表現。民國時期，出版業主要是私營，據說各自為政，良莠不齊，盲目競爭，缺乏統籌規劃。出版總署將出版納入到計劃管理體制，負有統合全國出版資源，經營國家出版、印刷、發行事業，掌控出版物的編輯、翻譯、審訂和發行工作，指導所有公私營出版業，調整各出版事業之間關係的責任。[3] 當然，這也是中共加強文化管理的一種方式，出版總署可以審查、查禁一切誨淫誨盜、格調庸俗、「思想反動」的出版物，以保證出版市場的純潔性和政治正確性。

出版署成立後，很快便計劃召開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確立出版總署對一切出版發行事業的領導權，解決出版業的分工和公私關係問題。1950年7月21日，出版總署召開第18次署務會議，通過以胡愈之、葉聖陶、周建人領銜的全國出版會議籌備委員會，儲安平成為19名委員之一。[4] 隨即，儲安平和沈靜芷、張靜廬三位委員受命由京去滬，配合先期到達的工作組，召集上海私營出版家開會。8月2日，200多人參加了上海市公私營出版業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實際是一個思想動員會。組織者向上海出版界傳達了最新精神，即出版、印刷、發行三者分離，出版社只有某一類圖書或期刊的編輯權，印刷權統一歸新華印刷廠，發行權歸新華書店總管理處以及五大私營出版社聯營的中國圖書發行公

3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暫行組織條例(草案)》，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506–508頁。

4 《第一屆全國出版籌備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2，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500頁。

司。這是國家對私營出版機構進行限制的第一步。後來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壟斷行為，必將掩蓋矛盾、取消競賽，造成思想僵化和企業衙門化，扼殺出版事業的生命。[5] 不知道儲安平當時是否注意到這個問題，或許是在其位者當謀其政，他儼然已經變成宣講政策的國家工作人員，在會議結束時還代表出版總署發言，讓同業們打消出版專業化的顧慮。[6]

9月15日–25日，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在北京舉行。儲安平作為期刊組組長，組織了歷時5天的小組討論並在大會上做了報告。這次儲安平沒有單純宣講政策，還收集了私營期刊業的意見，替他們反映困難：「按照這些收到的材料，從中看到了很多共同的困難。首先，大家覺得稿源缺乏；其次覺得不易掌握政策；再其次，覺得不能更好地結合實際與作聯繫讀者的工作。在私營期刊方面，除了這些之外，還一致表示願在思想政策上得到有關政府機關的領導，但到現在未能很好解決。私營期刊還希望公營期刊適當地給以照顧(如稿子問題等)。在發行方面，他們希望新華書店打開大門，一視同仁的做期刊發行工作。」[7] 儲安平是過來人，《觀察》復刊的經歷讓他知道私營事業難為，盡可能為他們爭取合理權益。

這次出版會議正式決定，新華書店總管理處改組為新華書店總店，直屬出版總署，作為國家最高發行管理機構，領導全國一千多家分店，建立起世界上最龐大的國營圖書發行網路。儲安平被任命為新華書店總店七名籌備委員之一，其後又任總店第二副總經理兼計劃室主任。[8] 這個副司局級幹部是否「有權」不太

5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年，第157頁。

6　《上海市公私營出版業座談會情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2，第436頁。

7　《期刊組組長儲安平報告》，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紀念刊》，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89頁。

8　《新華書店主要負責人名單》，《內部通報》1950年第19、20期合刊。

好講，但還算是「有職」。據說這已經是胡愈之的大膽任命，他瞭解儲安平辦《觀察》的輝煌，知道他的辦事能力和苦幹精神，破格委以重任。[9] 從此，儲安平擱置了提筆為文的「影響思想」的工作，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的一顆螺絲釘。

新華書店總店初建，規章制度皆不完善。儲安平親自起草了請示報告制度和統計制度，由集體討論修改後頒佈執行。從《統計制度》來看，其包含的內容非常複雜：「『制度』所制定的報表為全店統一使用的報表，分為月報、季報、年報3種，共15個表。不僅規定了購、調、銷、存、發行網點報表，而且規定了經營水平報表。書刊分類為：書籍、課本、畫冊、雜誌、進口中文書刊、進口外文書刊。『制度』還從業務、會計、統計工作的密切配合和業務上、各種原始記錄的統一等方面作出了規定。」[10] 這確實需要一定的業務知識。

在任上，儲安平還參與了全國大部分圖書，包括《毛澤東選集》在內的計劃、發行工作。這些工作多半帶有計劃性和宏觀性。比如，年度要發行少兒圖書多少萬冊，科普讀物多少萬冊，都需要他參與安排、籌劃。每天有做不盡的市場調研，填不完的資料表格，其複雜程度要遠遠大於發行一本《觀察》雜誌。年幼的儲望華曾經回憶：「回到家中晚飯之後，總是還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加班加點地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好像總是有那麼多的資料、報告、報表要書寫整理。在深夜工作時，有時他在並不寬敞的書房兼臥室內，自己一個人來回踱步，心中仍或有所思。」[11] 工作起來不要命，這一點儲安平可能還要勝過那些純粹的共產黨人。

1952年4月，出版總署增設發行事業管理局，與新華書店總店合署辦公。4月，儲安平被任命為發行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在

9　王益：《在胡愈之領導下做出版工作》，《中國出版》1987年第1期。

10　徐明琛：《新華書店統計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新華書店總店史編輯委員會編：《新華書店總店史(1951–1952)》，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

11　儲望華：《懷念我的父親儲安平》，《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4頁。

三位副局長中排名第末位。這個職務負責的工作和之前類似，但要求減少對具體業務的管理，着重加強對全國發行事業的計劃、指導工作。[12] 同年7月，總署召開全國出版工作計劃會議，其他領導前往華東、中南各地主持分會，儲安平留守北京，與出版管理局副局長金燦然主持華北區會議。[13] 儘管新職務要求他負責更多的宏觀工作，他仍不忘基層工作，期間解決了新華書店門市營業的問題。

當時認為，新華書店門市工作普遍存在問題。比如，管理者不懂書，經常盲目進書；營業員不懂書，無法為讀者介紹圖書；書店沒有銷貨記錄，經理只知道營業金額，不知道具體銷售情況；開架售書，致使書刊污損嚴重等等。1952年12月，總署聯合新華書店總店組成工作組，到北京王府井門店進行門市改革試點，儲安平擔任了工作組的副組長。經過數月的駐店蹲點調研，上述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經驗向全國一千多家分店推廣。

但是，這次改革也有失誤，那就是實行了「專櫃專責制」。這項制度採取當時百貨商店的做法，在書架面設置櫃檯，由營業員負責。讀者買書，由營業員拿取。據說這樣做既可以使營業員分工明確，又使其熟悉書籍，能夠主動向讀者推薦，還避免了書刊的污損、丟失問題。[14] 然而，計劃經濟時代的店員是國家工作人員，缺乏獎懲和監督機制，多數是門難進臉難看服務態度差。一般讀者請店員拿書卻不買，常常會遭到對方的白眼。改變民國以來的開架售書傳統，限制讀者自由翻閱，必定會引起讀者的不滿。這項制度，邊遠縣城的新華書店直到1990年代仍然存在，可謂天怒人怨。

12　《出版總署黨組關於署的機構人事等問題向文委黨組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4，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36頁。

13　《出版總署關於派遣調查組往各大區召開出版工作計劃會議呈文教委員會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4，第110頁。

14　高文龍：《王府井新華書店瑣憶》，《北京出版史志》1998年第12輯。

黨外幹部

這一時期，他人印象裏的儲安平，可以用「春風得意」四個字來形容。如王火回憶：「大約1953年春天，在熱鬧的王府井大街上突然遇見了儲教授。他好像是從新華書店出來，手裏還拿着些書，仍然是頭髮梳得很整齊，滿面紅光，神采奕奕，微微含笑，穿的是一套藍色的當時流行的樸素的幹部服。」[15] 馮英子回憶：「1953年秋……那時安平在出版總署作出版局局長，開始做官了。我去出版總署找他，發現他穿了制服，有如玉樹臨風，一表人材，人也微微發胖了，不復是在辰溪時的憔悴。」[16] 這說明，在新華書店和出版總署工作，儲安平並未受到較大的政治衝擊。

眾所周知，中共建國之後，在全面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拉開了政治運動的序幕。1950年7月，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3年才徹底完成。1950年冬，土改。1951年12月，三反運動。1952年2月，五反運動。在教育界，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從1951年9月開始，高校知識分子採取人人過關的形式，根據職位高低、名聲大小、「錯誤」輕重，在規模不同的群眾集會上公開、反復地做自我檢討，接受群眾批判，最後由群眾決定是否通過。以儲安平的師友為例，張東蓀由於「特務事件」，此時已經被打入另冊，成為裏通外國的美帝分子，在燕京大學各個院系輪流檢討，老淚縱橫仍無法通過。潘光旦在清華大學先後檢討了12次，歷時兩年才勉強過關。[17] 報刊界亦然。王芸生為了自保，建國後便「衝上階級鬥爭第一線」，在鎮反、三反、五反中成為批判先鋒，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順利過關。[18] 文

15 王火：《憶儲安平教授》，《追尋儲安平》，第29頁。

16 馮英子：《回憶儲安平先生》，《追尋儲安平》，第11頁。

17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頁。

18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第131–148頁。

藝學術界則開展了接二連三的政治批判，如批《武訓傳》，批陶行知、陳鶴琴教育思想，批梁漱溟……文學和學術問題成為政治問題，極左思想在全國蔓延。

這些檢討和批判運動，幾乎沒有哪個知識分子能自外於此。報刊雜誌上，到處都是個人改造思想，宣佈否定過去的文章；每一次批判活動，都有無數知識分子爭先恐後發言，揭批他人，爭相表態。按理說，像儲安平這樣背景複雜的人難逃此劫。幸運的是，他脫離文化界，放棄了「影響思想」的企圖，在新華書店和出版總署埋頭於各種瑣碎事務，意外地躲過歷次運動。或者說，在新華書店和出版總署，即使有頻繁的學習活動，有思想檢討會、整黨會，甚至審判會，但行政單位的標準和要求遠比文教界寬鬆。儲安平或許在小範圍內有檢討報告，但沒有在報紙雜誌上公開看到任何他檢討的文字。他工作任勞任怨，生活作風簡單樸素，和工人吃食堂，拒絕配小汽車，僱三輪車夫接送上下班，更不是三反衝擊的對象。

即使在很多時候必須公開表態，他既不批評揭發別人，更不自我「懺悔」，多將矛頭指向了國民黨這只死老虎。1950年末，民盟為配合鎮反召開大會，他作為中央文教委員會委員必須發言，講的是《觀察是這樣受迫害的》，控訴國民黨對《觀察》的壓迫。[19] 1951年4月，出版總署內部舉行「新聞出版界控訴大會」，儲安平受命演講，講的還是那套話語。[20] 儲安平在這些活動中，絕對不會積極表現。他在這方面異常「乾淨」，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非常少見。

未經嚴酷的思想改造運動衝擊，實際是一把雙刃劍。從好的一面講，知識分子較少將生命浪費在各種報告和檢討之中，避免

19　儲安平：《觀察是這樣受迫害的》，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編：《鎮壓反革命宣傳學習手冊》，光明日報印刷廠，1951，第93–95頁。

20　葉至善等編：《葉聖陶集》第22卷，第185頁。

了人格上過度的自我羞辱。然而，從另一面講，自我反思越不徹底，越沒有按照新的標準對過去的思想進行「懺悔」，便越不能領會新的時代思想和意指，無法真正從「靈魂深處」實現轉變，乃至無法與新政權達成實質性共識。1951年儲安平在參加土改中流露出「政治不正確」的言行便是一例。

1951年秋，中央政協號令民主人士參加土改工作，儲安平以九三學社社員的身份跟隨中南土改團，到達江西省進賢縣鐘陵鄉參加土改。進賢土改，全縣共沒收地主、富農、廟宇和教會土地共251007畝、房屋13934間、稻穀95000石、耕牛3208頭、農具26萬件。[21] 土改運動一般採取訴苦會和公審大會的形式，均分財產後往往會大規模處決地主，期間多有駭人聽聞的殘暴行為。進賢縣的土改，更接近當年《觀察》來稿中那些中共殺人放火的報導。當年儲安平在老家就有田地，四年大學的費用多半由地租供給，後來為辦《觀察》才賣掉土地。他對租佃關係有所觀感，與進賢土改敍事中地主殘暴壓迫佃戶的情況不符。他顯然也對農民在土改中表現出的貪婪非常厭惡，甚至多次與農民發生衝突。後來在反右中有進賢農民舉報他：

> 你隨中央政協土改團來到我們這裏參加土改，成天的板起臉孔對待我們，動不動就發脾氣，不採納我們的意見。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農民胡結才吵嘴相罵。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財，為了一口腳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發雷霆，拍桌子兇人，樣子實在難看，群眾見你害怕，背後罵你和強盜一樣。你以為自己了不起，舊知識分子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們種田人看在眼裏，你和我們之間不僅有高牆，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對敵鬥爭上，總是縮頭縮尾的，沒有掌握過

21 江西省進賢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進賢縣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7頁。其後經官方覆查，有670戶被錯劃地主，實際情況應不止於此。

一次鬥爭會場(鬥爭會總是周尉文同志掌握)。我們在鬥爭地主，你就在會場旁邊看看和溜溜。我們想了一下，你那次來我們這裏根本談不上參加土改，只是看了一看。看過以後，你的真實感覺怎樣，你雖沒有說出來，但我們比較了一下，覺得你的立場是大有問題的。[22]

這說明，儲安平對類似的政治運動並不滿意。只是他平時不敢說，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才敢「放肆」地發火，但仍不敢放言無忌。他回到北京後仍不敢說。他對發行管理局第一副局長王益說的是：「中央政策不折不扣地在基層得到貫徹，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23] 實際這是一種模棱兩可的中性評價，可以從兩個不同方面理解。

在新華書店和出版總署的工作中，儲安平也是異類。新華書店發源於陝北，本來就是紅色出版發行機構。在新華書店總店，總經理徐伯昕，副總經理王益、儲安平、史育才，只有他是黨外人士。在出版總署，署長以下辦公室主任黃洛峰，副主任程浩飛，出版管理局局長陳克寒，副局長謝冰岩、金燦然、傅彬然；印刷管理局局長李文，副局長卜明、沈靜芷，發行管理局局長徐伯昕，副局長華應申、王益、儲安平，只有他和傅彬然是民主人士。[24] 而這位傅彬然，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還擔任過地下縣委書記，此時只是身份未公開而已。

陝北來的老革命和國統區的留英知識分子、著名大學教授，在教育程度、知識結構、價值理念等方面具有明顯差異。比如，

22　《對農民大發雷霆，鬥地主躲躲閃閃，儲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動立場，江西省進賢縣鐘陵鄉農民給儲安平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57年6月25日。

23　王益：《新華書店雜憶》，《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發行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0頁。

24　《出版總署黨組關於署的機構人事等問題向文委黨組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4，第37頁。

在黨員看來，出版發行事業就是一項政治任務，一本書能不能發行，發行多少，要看它的政治性。領袖著作和宣傳書籍，即使銷量不佳，也必須不計成本地多發行；一般文化、學術和大眾書籍，如果和國計民生無涉，則應少發行；至於建國前出版的大部分書籍，更屬於反動書刊，完全不能發行。然而，儲安平更習慣從純粹經營企業的角度考慮工作。在他看來，出版發行是一項社會事業，要考慮經營成本，把握市場脈搏，增加出版品種，注重行銷方式，還要滿足人民大眾的真正要求。至於揣摩政策，增加工作的政治性，他完全不擅長。這種觀點顯然會被視為純技術觀點，缺乏「政治敏感性」。

實際上，新華書店作為國營企業，在指導思想中也多次提出要注意企業盈虧，通過利潤積累來增加國有資本和人民財富。為此，新華書店總店特意制定了前所未有的會計核算制度。[25] 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政治運動的風向頻繁變化，導致指導政策的搖擺不定。從資料來看，新華書店總店常常一方面肯定企業增加利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常常批判單純盈利的「純技術觀點」，以之為缺乏「政治敏感性」。就如1951年王益在上半年總結報告中提到：

> 總店領導中的政治性、思想性不夠，首先表現在不注意把書店業務和政治任務密切結合起來。其次表現在對全店同志的思想情況缺乏分析和批判，各種各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例如僱傭觀念、功臣思想、自滿情緒、單純經濟觀點等等，在我店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發現。但總店對此熟視無睹，採取了庸俗的自由主義態度。第三還表現在佈置具體業務的時候，缺乏明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公佈一些制度和條例的時

25 《胡署長在新華書店第一屆會計工作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內部通報》1950年第18期。

候，很少從政治意義上去解釋，而這些條例和制度本身，在政治性和思想性方面，往往也很貧乏。[26]

1951年9月1日，新華書店總店在給第一屆出版行政會議的報告中檢討：「各級領導店往往重視事務性的領導而忽視政策性思想性的領導，處理問題往往從單純企業經營上去考慮，而不是首先從政治意義上、政治需要與政治效果上去考慮；配合政治任務的敏感性差」。9月18日總店召開全國管理委員會會議，則認為「忽視政治的傾向，在全店相當嚴重地存在着，並已成為我店工作中的主要障礙，這種錯誤傾向如不克服，勢必脫離群眾，迷失方向，不但政治任務不能很好完成，企業本身也不會順利發展。」[27]

總店的領導者，只有儲安平一個人沒有接受過馬列主義薰陶，沒有做過紅色書店的工作，這些報告批評的是誰？最有可能的當然是黨外幹部儲安平。

儲安平給新華書店和出版總署同人的一個印象是過份自負，工作時候常有不同意見。比如王益說：「他曾提出過搞好新華書店的工作，必須調進500名大學生的主張。大家沒有同意，實際上也行不通。」儲安平顯然仍是從業務的角度考慮。如果從政治的角度考慮，不需要什麼大學生，需要的是政治上過硬的文化排頭兵。而且，在各單位內，黨委負責人主管一切。「知識分子必須服從本單位黨員幹部的領導，即使指揮他們的幹部是個文盲。黨員可以獲得各類政治資訊和參加政治會議，他們自然被單位領

26　《糾正忽視政治傾向，為提高工作中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而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3，第448–449頁。

27　《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以來新華書店的工作》《新華書店全國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糾正忽視政治傾向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3，第286、327頁。



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入場券

導視為可靠的、值得信任的。」[28] 儲安平是唯一的非黨員，被排除在黨組會議之外，當然也沒有對重大問題的決定權。王益說：「他覺得擔任副職不能施展他的才華，要求把北京分店劃歸他個人主管，大家沒有同意。」[29] 儲安平又犯了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甚至想超越黨委的領導。這並不奇怪，他自始至終都喜歡親力親為，不願屈居人下。這不是貪慕權位，而是不願讓外行領導內行，覺得被人管束放不開手腳。或許這段當副手的經歷讓他耿耿於懷，在1957年6月震驚全國的發言中，他才重點提到這個問題。

新疆行

儘管儲安平與總署同人經常有理念上的分歧，卻不會真正發生衝突。[30] 已過不惑之年的他，早已鋒芒內斂，一切盡量低調。只是他覺得不適合做官，尤其不適合在黨員手下做官。他大概

28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第62頁。

29 王益：《新華書店雜憶》，《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發行文集》，第10頁。

30 1954年4月24日的《葉聖陶日記》中留下了儲安平將遠遊新疆，胡愈之、葉聖陶和鄭振鐸為之餞行的記錄，說明他離開出版總署的過程應該是和平的。參見《葉聖陶集》第23卷，第102頁。

有意擺脫機械無聊的行政事務，恢復到過去自由報人的身份，最好能四處走走，試着看看能不能再寫點兒什麼。於是便有了1954–1956長達兩年的新疆之行。

需要指出的是，新疆之行，或許未必完全是儲安平一廂情願的想法，背後極可能有中宣部和統戰部的安排。中共建國後解放軍進入新疆，擔負起生產建設的任務，短短數年間新疆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很少有記者來大面積宣傳報導。儲安平在《觀察》時代就對新疆問題感興趣，出版過「新疆專號」，他本身也想看看新疆的新面貌，於是便成為最合適的入疆人選。組織上對儲安平可謂大力支持，給他《新觀察》特派記者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名義，讓他來去乘坐飛機，在新疆境內配給吉普車一輛，司機、警衛員各一名，保衛他的安全。於是，他丟下了家裏的孩子，如同潛龍入海，開始了斷斷續續長達兩年的遠遊。

1954年5月，他抵達新疆首府烏魯木齊。6月到達北疆的石河子新城。這裏原來是一片荒地，解放軍到達以後，披荊斬棘，平地建城，短短四年就已初具規模。石河子完全是一座社會主義樣板城市，市中心是政府大樓，周圍是行政、工業、商業、文教、保健、住宅、公園區。石河子城裏馬路寬闊整潔，工廠效益喜人，醫院條件優良，書店和影劇院生機勃勃，民眾生活井然有序。千百年來無人問津的荒原變成城市，不由得讓人讚歎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儲安平感歎道：「這是一個要永遠記載在人類活動史冊上的巨大變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當然是「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正確的黨，它教育了並組織了人民和自然進行鬥爭，發展生產，改變歷史面貌，把人們的生活、思想和社會的秩序、制度都推前了一步。」[31]

石河子旁邊是瑪納斯河流域墾區。這是一片面積約2萬平方

31　儲安平：《石河子新城》、《新疆新面貌》，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0頁。





儲安平的兩本新疆遊記

公里的土地，駐疆部隊正在這裏屯墾。這裏有數座新建的大水庫和四通八達的水渠，為千萬畝良田提供灌溉。耕地、收割都已經全部機械化，流域規劃、草田輪作、防風造林、觀測土壤、水文調查皆已採用科學化的方法。由於蘇聯專家的指導，棉花生產已經從建國時的畝產20斤上升為402斤，冬麥的產量也翻了兩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32] 由於糧棉豐收，這裏還將出現棉紡織中心和糧食加工業，成為西部重要的輕工業中心。再往西就是克拉瑪依，那裏竟然發現存在着一個很有希望的大油田，如果石油開發成功，必將成為一座重要石油城市。至於煤、鐵等礦產資源更是遍佈全境，新疆真是一塊寶地。

儲安平認為，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團結在一起。人民不再是一盤散沙，積極性得到最大調動。1954年11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以後，內地的知識技術人員大量被招募進入新疆，支援國家的邊疆建設。這些人從安逸的環境來到艱苦之地，卻仍能以國家

32 儲安平：《瑪納斯河墾區》，《瑪納斯河墾區》，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33頁。

主人翁的姿態投入新疆建設，不畏艱苦，不怕困難，在那裏落地生根，發芽結果。1949年以前，國家戰亂，政府無暇從事經濟建設。由於統治者的橫徵暴斂，新疆地區民族紛爭頻仍、暴力叢生、貧瘠落後，幾乎成為恐怖之地，而今新疆則是一片和平、寧靜、團結的欣欣向榮景象，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甚至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儲安平的感歎，並不是對共產黨的阿諛奉承，而是真正出自內心的喜悅。

1955年春季以後，儲安平轉到天山南部。5月，到達巴音郭楞、庫爾勒，6月到達塔里木河、阿克蘇，其後又遊覽了西部邊陲的喀什、疏勒地區。他發現，過去南疆交通不便，而今主要城市都已修建了通往烏魯木齊的公路，甚至喀什、阿克蘇等地還通了航線。蘭新鐵路也開始修建，將來會延伸到南疆地區。[33] 至於農業，南疆呈現出一片民族團結互助，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景象。建國以後，新疆進行了土改和鎮反運動，貧民大多分到土地。自有土地調動了生產積極性，新疆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升。過去穿不上衣服吃不飽肚子的，現在都吃飽穿暖了，過去沒有財產的，現在也都有牛羊和積蓄了。此時正值中共提出農業集體化的方針，南疆農民要更進一步，踴躍報名加入集體合作社，將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生產、分配。[34] 當然，對於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來說，讓他們加入合作社，土地重新歸集體所有，是很大的變動，在心理上不易接受。不過，由於中共和毛澤東在新疆民眾心中的威望，政策的變動似乎也沒有遇到特別大的阻力。

實際上，解放軍開發新疆的過程，並非是一曲溫情脈脈的田園牧歌，伴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而來的，是激烈的暴力甚至殺戮，侵犯了新疆民眾的信仰和傳統。不過，中共將少數民族幹部放在非常顯眼的位置，至少在形式上比中華民國政府做得漂

33　儲安平：《新疆遠景》，《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3日。
34　儲安平：《南疆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新疆新面貌》，第135–158頁。

亮。而且，受打擊的對象多半是貴族階層，下層貧苦大眾基本都得到真正的實惠。因此，建國前維漢民族矛盾頻發的情況，此時在新疆已經很少見了。少數民族群眾基本都發自內心地稱頌毛澤東，對領袖的信仰和認同，甚至超過了對本民族文化宗教傳統的認同。每當儲安平來到一地，新疆老百姓都將他看作是「毛主席派來的人」，甚至感動得老淚縱橫，說毛主席沒有忘記他們。連不諳世事的小學生，也將儲安平團團圍住，詢問關於毛的一切，託他向毛問好。[35]

儲安平的新疆遊記，先是零散地在《人民日報》《新觀察》《新華月報》上刊登，後來結集為《新疆新面貌》和《瑪納斯河墾區》出版。這批大規模報導新疆建設的文字，對提升新中國的形象，號召進步青年去西部建功立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雖然滿篇都是歌功頌德之語，屬於《人民日報》式的口徑，但對於一個有着強烈愛國主義情懷和大一統意識的知識分子，這未嘗不是真正發自內心之語。

新疆之行，儲安平的心情應該是愉悅的，否則不會在那裏遊蕩了兩年。除了醉心於大地的遼遠、沙漠的蒼茫、天山的雄偉、喀納斯河的秀美，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好形勢」之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成了自由人，不必揣摩風雲多變的政治形勢，不必參加單位的政治學習和批判活動。在這期間，發生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胡適唯心主義思想，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反黨集團」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尤其是按照5%的比例揪反革命分子的「肅反運動」，很多知識分子被審查、流放、判刑，可謂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造成的一項最嚴重的傷害。但這些運動都和儲安平無關。這種悠然世外，足以讓身處北京的朋友們羨慕。

35　儲安平：《天山上的紅領巾》，《新疆新面貌》，第225頁。

人大代表

1954年夏前往新疆之前，組織上臨時通知儲安平，即將醞釀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希望他退掉已經訂好的飛機票，等有了結果後再離開北京。[36] 儲安平並未推遲行期，因為正式代表名單出爐之時，他已經在烏魯木齊了。他應該是被出版總署提名，以原籍江蘇省代表的身份參會。這在當時算是一種莫大光榮，甚至親戚在給其伯父儲南強的信中都提及此事並表示祝賀。[37] 1954年9月15–28日，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26日，共有31位代表在會上對周總理的報告發言，儲安平亦名列其中。[38] 1956年6月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儲安平還獲得了報告的機會。他講述的是新疆生產建設的巨大成績。他說，在黨的領導下，新疆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新疆民眾無一不擁護毛主席，雖然距離北京幾千里遠，黨和國家的法令在那裏卻暢行無阻地貫徹。[39]

會議結束後，儲安平還寫了一篇題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傳統》的文章，發表在1956年7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他認為，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比前兩次大會更加進步。國家領導人的發言比過去更加周詳、嚴肅，表現出對人民代表大會的重視。很多代表都對政府工作提出了坦率、深入甚至尖銳的意見。會上還出現了聯合發言的現象，發言稿都經過事先的集體討論，內容更為扎實。發言風格上也出現許多幽默、雋永的語言，可以改變當下呆板的政治文風。這次人民代表大會比過去更加民主、活躍、

36　儲安平：《向人民投降》，《人民日報》1957年7月15日。

37　《儲南強信一封》，無錫蘇迅先生藏。

38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結束第三項議程》，《人民日報》1954年9月27日。

39　儲安平：《儲安平代表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秘書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彙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6–670頁。

團結，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日漸成熟，甚至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為延續這種傳統，國家機關負責人向大會提出施政報告，應該成為慣例。政府各部門還應該根據代表們指出的意見進行集中答覆。大會閉幕後，還有必要由常委會對發言中提到的地方或單位進行適當調查，以檢驗所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缺點和問題是否得到改進，不致會上講完意見便了事，起不到任何作用。[40]

這個發言，表面上是肯定成績，實際談的是政治監督。眾所周知，從理論上講，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實際卻不過是安置民主人士之地。以1954年政府改選後的黨派構成而論，「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都是共產黨員，原國家副主席和政務院副總理中的民主人士均改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新組建的國務院各部、委員35個正職中，民主人士13人，佔37.2%，國務院組成人員共47人，民主人士13人，佔25.5%。」[41] 民主人士集體退出各級政府序列，進入人大常委會，這樣的安排說明，政治體制已由建國初期的聯合政府逐漸變成一黨執政。更致命的是，在官方的政治話語中，這被視為時代的進步，歷史的必然，是國家性質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重要表現。然而，從建國以來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負面作用來看，不受監督的權力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人民代表大會既然成立，並且是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就應該真正擁有權力，在政治監督和建言方面發揮作用。儲安平此時的思想，又回到了建國前夕希望做「中共諍友」的階段。

儲安平的「諍友」思想復萌，與政治形勢的緩和有很大關係。建國後頻繁的政治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使知識分子整體俯首貼耳，徹底歸順。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受歧視，工作中被

40　儲安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傳統》，《人民日報》1956年7月31日。

41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65頁。

排擠，思想壓抑，內心深處並不滿意。1956年，三大改造已經完成，執政黨宣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將全黨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希望擺脫落後的經濟地位，趕超英美便成為世界強國。執政黨意識到應該做好安撫知識分子的工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重新為社會主義服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會議，承認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隨後便是調整知識分子政策，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解決知識分子失業和使用不當的問題，吸收知識分子入黨。從中央到地方，這個新政策得到層層貫徹，知識分子受傷的心靈得到撫慰，普遍產生了一種「早春來臨」的感覺。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暴政，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引發巨大震動。為了營造出一種比蘇聯更為自由、開放的社會主義形象，毛澤東開始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個方針，並試圖將新方針貫徹到社會基層。[42] 雙百方針中，毛澤東明確告訴知識分子，在提倡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辯論的自由、創作批評的自由，甚至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自由一詞在建國後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屬，帶有負面意義，而今毛澤東主動提及自由，甚至肯定自由，對知識分子而言是一種鼓舞。至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主要是強調民主黨派對執政黨具有監督作用，希望他們在工作中多提缺點和意見，督促中共執政。隨即，由統戰部牽頭，檢查黨與非黨人士的關係，組織民主黨派座談會，在全國範圍內開始討論如何真正做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為了貫徹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必須加強輿論機關的地位。毛澤東由此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逐步允許民主黨派獨立辦社，將《光明日報》和《文匯報》還給民主黨

42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4頁。

派。《光明日報》創辦於1949年6月，是民盟的機關報，首任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1952年末改為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合辦，成為各民主黨派的機關報。作為九三學社宣傳委員會的副主委，儲安平有幸在改組時被推舉為12位社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43] 不過，《光明日報》的實際權力掌握在黨組手裏，社長章伯鈞很少來報社，所謂社務委員更是有名無實。雙百方針提出後，中共不但要找民主人士擔任總編輯，甚至要將黨組撤出報社，完全交給民主黨派來辦。這是建國後所沒有的巨大變化。

當然，即使交給民主黨派，總編輯職務也應由中宣部決定，而不是由民主黨派公推。據說，中宣部首先邀請的是原《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1956年6月初，中宣部副部長姚溱找到徐鑄成，希望他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徐鑄成覺得班底都在《文匯報》改組而成的《教師報》，更願意留在原職。[44] 不久，胡喬木親自拜訪剛剛回京的儲安平，希望他出山擔任總編輯。這簡直就是從天而降的意外消息，儲安平當即表示，願意接受這個任命。不過，這只是一種意向詢問，還需要中央正式決定，也需要在表面上獲得章伯鈞同意。而且，事情似乎並不急迫。胡喬木先安排他去青島度假，在那裏的中國作家協會俱樂部休整幾個月，完婚度蜜月，順便修改新疆遊記。[45]

組織上很關心儲安平的婚姻問題。1955年人大開會期間，秘書處曾將一些材料交給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要他幫助解決「儲安平的男女關係」。許德珩還專程找他談話，要他「好好解決」。[46] 新夫人名叫易吟先，湖南人，畢業於長沙周南女中，據

43 馬馨麟編：《光明日報50年歷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15頁。

44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225頁。

45 《儲安平在6月15、16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的發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5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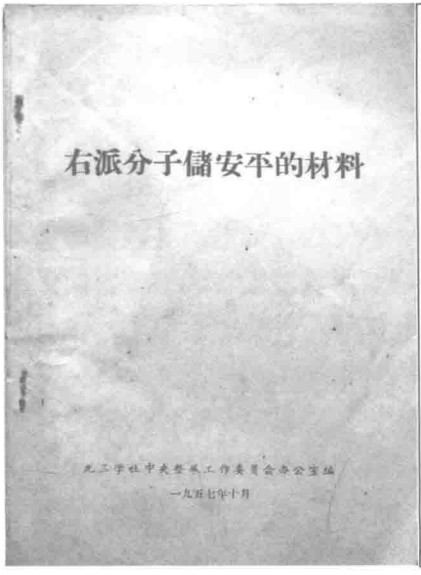
46 《許德珩主席談儲安平的問題》，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編：《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九三學社，1957年，第4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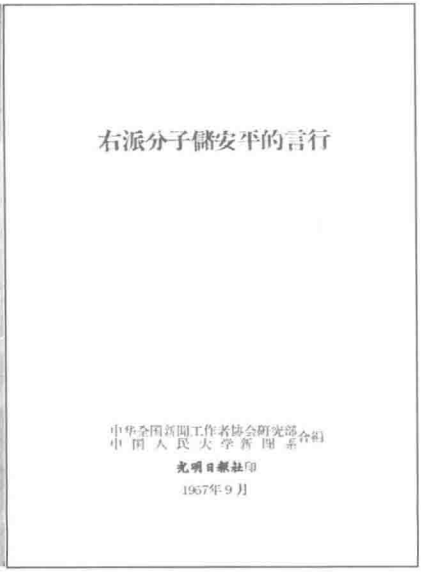
說父親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易吟先小儲安平十餘歲，有過一次離婚的經歷，帶着一個幼年的女兒名叫張欣。兩人相識，很可能和儲安平的新疆之行有關。張欣的美術老師，經常到她家走動的譚文在回憶文章中稱，國民黨將領宋希濂與易吟先是老相識，1947年就曾見面敍談。[47] 當時宋希濂正在新疆警備司令任上，前後三年，兩人的見面地點多半是新疆。[48] 那麼，情況可能是，易吟先曾在新疆生活過，或當時就在新疆，儲安平在新疆遊歷時遇到此人，或是新疆方面的友人將易吟先介紹給儲安平。

儲安平獨身多年已成習慣，本人未必真有再婚的意願，同意結婚很可能是迫於組織的多次關照，以及親朋好友的熱心催促。就易吟先而言，與儲安平也多是一種策略性的結合。她攜帶幼女生活，孤苦飄零，大約急於找人依靠。在儲安平的子女看來，兩人也並不是合適的一對。不過，兩人都已歷經風霜，不需要有什麼真正感情，只要能「搭夥過日子」就好。大約在1956年8月，儲安平攜易吟先前往青島的中國作家協會俱樂部結婚並度蜜月。當時的證婚人，是同在青島休養，時任文化部部長、作協主席的茅盾。

47　譚文：《5號院的特殊公民》，《縱橫》2005年第5期。

48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傳》，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33頁。





反右中批判儲安平的材料

第十三章　光明日報總編輯

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1957

九三社訊

1956年11月，在青島的儲安平收到中國農工黨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的來信。信上說：「經各民主黨派公推」，正式邀請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希望他早日回京。儲安平等待的就是這封信。他已經賦閑了兩年之久，如今終於可以重操舊業，還是委以重任，心中的欣喜真是無法形容。

元旦過後，儲安平前往上海，在那裏拜訪了徐鑄成、笪移今、趙超構等舊友。趙家璧等光華同學知道安平來滬，集體為他慶祝接風。他遲了兩個小時才來赴宴，坐席未暖便被其他邀請者的小汽車接走了。[1] 回到北京，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為他洗塵，舊日在新華書店總店排名第一的副總經理王益也被請來叨陪

1　戴晴：《梁漱溟儲安平王實味》，第193頁。

末座。[2] 儲安平不禁有了一種翻身的感覺。這種久違的禮遇和恭維，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他的驕傲心態，認為共產黨治國必須依靠民主人士，民主人士在輿論監督方面則是非他莫屬，沒他不行。

1957年上半年的國內形勢，用費孝通的話說便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表示要堅決貫徹雙百方針，讓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允許民主黨派獨立辦社。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中共將要開始整風，重點整黨內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解決黨群關係問題。4月，毛澤東南巡，四處宣講雙百方針，說服黨內幹部積極參加整風。這些談話精神被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反復傳達，引起了強烈反響。民主人士可謂人人興奮，不斷在各種會議上熱烈討論。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其中提到，近些年黨內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滋長，需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風，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對於整風中檢查出的錯誤，一律不給予組織上的處分。同時歡迎黨外人士積極幫助中共整風，給中共提意見。5月初，毛澤東親自起草了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共整風的指示，認為兩個月來在雙百方針下，民主人士的鳴放非常有益，應該繼續開展，不可間斷。在統戰部的主導和催促下，各民主黨派紛紛組織召開座談會，給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毛十分注重報刊雜誌在宣傳整風中的作用，為此還點名批評了反應緩慢的《人民日報》，說總編輯鄧拓是「死人辦報」。事已至此，沒人敢懷疑最高領袖的誠意。

儲安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回到北京的。他開始異常積極地參與九三學社的社務工作，每週到社辦公兩次，參加會議。只

2　王益：《新華書店雜憶》，《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發行文集》，第110頁。

是他對這些空洞、溫吞的會議非常不滿，曾對樓邦彥抱怨說：「九三中央的會，怎麼這樣開法？」[3] 或許是即將就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緣故，他利用這個身份說服許德珩，從社員吳鐵峰手中接過內部刊物《九三社訊》的主編之職。3月末，九三學社召開全國工作會議，他提交了改進《社訊》的編輯和發行工作的報告。[4] 很快，在他手中，《九三社訊》變成了九三學社鳴放和整風的陣地。

第7期頭版，他刊登了上海發來的《目前工程技術人員的幾個問題》，這是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組織的工程技術人員座談會的新聞稿。在座談會上反映出的黨群問題有：黨員普遍文化較低，不敢接近非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有自卑感，也不敢接近黨員幹部；黨對非黨工程技術人員有的地方支持，有的地方信任不夠，合理化建議不能得到黨政和工會的肯定；工作安排不當，技術人員的行政工作太多，脫離了本職工作；科學研究往往採取搞運動、定目標、短期突破的形式，犯了急功近利的錯誤；無用的政治會議太多，不能保證研究時間；圖書資料不夠，購買西方國家圖書受限制；技術人員政治上有苦悶，希望參加政治組織等等。[5] 平心而論，這是一篇非常溫和的長文，反映意見的態度也非常卑微客氣，然而卻在後來被污蔑說是儲安平「向黨進攻的第一炮」。[6]

第8期刊登的是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十篇發言稿。這些發言稿中，只有陸侃如、陳時偉兩個人談到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篇幅非常簡短，態

3　《樓邦彥的揭發》，《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47頁。

4　《九三學社召開全國工作會議》，《光明日報》1957年3月31日。

5　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秘書處：《目前工程技術人員的幾個問題》，《九三社訊》1957年第7期。

6　牟小東：《控訴儲安平在九三學社內部放火的罪行》，《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發言專輯》，第91頁。

度也很溫和，主要是呼籲知識分子應該相信黨，打消顧慮，不要怕秋後算賬。其他人講都是講如何鞏固、發展九三組織，冗長無趣。甚至還有人發言反駁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公然站在雙百方針的對立面。這說明，九三學社成員普遍對回應整風態度消極，甚至多有阻力。一部分人不敢說，害怕因言獲罪；另一部分人是教條主義的維護者，比如社訊編輯祁龍威，還希望組織文章「批判雷海宗的反動學術觀點」。[7] 儲安平對這些發言並不滿意，認為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幫助中共整風，發展組織的報告太多實在是顛倒主次。[8]

於是，他站起來發言稱：「二百政策，大家擁護鳴放但鳴不起來。毛主席看到這一點，要創造條件，要民主黨派聯繫群眾鼓勵大家講話；因民主黨派是黨的助手。過去取得一些成就，是否有缺點？民主黨派雖然講代表成員利益，但叫人如何做的多，代表利益少，做法上有教條主義。因此民主黨派和群眾不能水乳交融。進步靠攏黨，雖進步也是保護自己。我們是否可改變，和群眾搞在一起。民主黨派過去沒有很好支持成員好的意見，也不能分別是非、解決問題。我們的話有些是可取的，從建國角度是要取可取處。思想改造另一角度是幫助，今後黨派必須分清是非。民主黨派成員是一家，不能以我是進步者自居，必須互相瞭解幫助。今後黨做黨的工作，我們民主黨派做自己的工作。」[9]

儲安平認為，九三學社這樣鳴放遠遠不夠，甚至都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要求。為了增加鳴放，真正幫助中共整改，造成一種輿論的影響和壓力，在他的推動下，經過主席許德珩的首肯，4月27、29日，九三學社中央、北京兩級科學文教工作委員會聯合舉

7　祁龍威：《儲安平妄圖把九三學社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49頁。

8　安平：《編者前記》，《九三社訊》1957年第8期。

9　《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二中全會小組會上的發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41頁。

行座談會，邀請在京社員談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和互相監督的問題。由於此時毛澤東鼓勵鳴放的力度越來越大，九三學社也明顯向前邁了一步，開始打破謹慎，提出了不少尖銳問題。

在座談會上，袁翰青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要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的表現，一是搬經典，二是搬名詞。有一個時候的《學習》雜誌，盡是搬些名詞，我就不愛看。」

游國恩說：「以教條主義反映在對待古典文學上為例，他們對古典文學一知半解，對馬列主義可能比我們熟悉一些，因此在教學中常常出現一些無理的責備和批評，說你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主義者的情報多是從學生方面來的。如否定屈原是愛國詩人，愛什麼國呢？封建的楚國也值得愛麼？又如他們說，陶淵明不見得好，是地主出身，至少也是個中小地主，羅敷也不是勞動婦女，因此陶淵明的詩和樂府中的陌上桑就不是肯定的作品。又說木蘭是參加侵略戰爭的，竇娥冤是迷信傳說等。我曾為某一學報組織了一篇稿件，內容很好，但內容會涉及到考據，編輯認為胡適是講考據的，於是不予發表。如此說來，胡適曾住過北京，我們連北京也不能住了。」

薛愚說：「黨能不能領導科學？我認為黨能領導科學，但不是黨員領導。黨是從方針政策上領導，但不是技術上領導。」

周祖謨說：「教育部門的官僚主義也很嚴重。高教部發下的莫斯科大學的教學計劃給我們參考，說不準何年所制訂；問到莫斯科大學教研室情形，茫然不知；搞語言學，要儀器，領導總不信。分配來的研究生，思想動搖，基礎又差，事前完全不跟教師研究。

崔谷忱說：「現在是無數不保，無字不密，如結核病死亡統計，總是以1949年100，1950年為百分之幾，不准談絕對數字。外國人追問，弄得我們很窘，只得顧左右而言他。實際外國人根據1949年以前數字完全可以算出來，我們的保密只是欺騙自己。」

王利器說：「過去學術批評不嚴肅，批評人對被批評者不是

從具體問題深入瞭解，而是採取粗暴、幼稚的態度，甚至想一棍子打死人。」[10]

這次座談會之後，儲安平又組織吳鐵峰根據地方社員反映的意見，撰寫了一則綜合性報告。可以看到，基層的矛盾遠遠比中央嚴重，民主黨派成員備受歧視和壓制，自尊心受到嚴重損害。由於地方的黨員領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很多都是採取一言堂的作風，只要有和領導不同的意見，便被扣上反黨的大帽子。文章還提到了武漢肅反的問題，希望黨中央能夠糾正偏差。[11] 這是一篇真正反映問題的文章，揭露矛盾的文章。如果這些問題屬實，確實應該得到解決。但是在教條主義者看來，這篇文章「惡意的加以污蔑和誇大，極其惡毒」。[12] 然而，未經調查研究，無法判斷是否污蔑或誇大，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儲安平在九三學社內的工作，遇到了強大阻力。所謂阻力，最根本的原因是辦社理念的差異。按照建國後的政治設計，如九三這樣的民主黨派，中心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並教育廣大文教科學工作者共同前進」，具體而言可以歸納為兩條：響應黨的號召做好崗位工作，做好思想改造工作直至最終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標準。[13] 然而，儲安平不喜歡這種對民主黨派的落後定位，認為民主黨派不必一定要與中共亦步亦趨。以宣傳工作為例，1953年他就認為，九三學社的宣傳工作任務應該是擴大九三學社的政治影響，比如組織一些專家、學者撰寫文章，以九三學社的名義發表等等。老老實實聽黨話的宣傳委員會主委孫承佩完全不能同意這種意見，認為是脫離了思想改造的中

10 《座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九三社訊》1957年第9期。

11 本刊記者：《在貫徹對知識分子政策方面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九三社訊》1957年第9期。

12 牟小東：《控訴儲安平在九三學社內部放火的罪行》，《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發言專輯》，第93頁。

13 《九三學社的性質、方針和任務》，《九三學社歷史資料選輯》，第136–138頁。

心任務，屬於資產階級政黨的做法。[14] 1956年7月，九三學社中央會議討論雙百方針，儲安平的發言是：希望研究討論怎樣才能進行更有效果的監督，如果是法律上的監督就要訂制度，政治上的監督就要由民主黨派來辦報紙、製造輿論、影響群眾。[15]

這樣大膽的言論，決定保守謹慎的主席許德珩不可能對他支持。儲安平主編了三期社訊，面見許德珩五次，其中一次談了兩小時之久。儲認為，不能業餘辦社，也不能完全依靠共產黨員辦社，那些黨員對許的幫助並不大。他希望許真正信任他、支持他，但是許心存顧慮。比如5月7日晚，在許德珩家召開整風座談會，儲安平詢問是否有必要由社訊出面，召開座談會談教授治校問題，許沒有同意。[16] 許德珩在社內的座談會上，講話也非常謹慎，滴水不漏，若非儲安平拿毛澤東的雙百方針當尚方寶劍，這些座談會能否召開都是問題。

儲安平在九三學社本來就沒有根基。1952年9月他被選為候補中委，1956年2月才進入中委行列，而中委竟多達82人。他擔任宣傳部副部長，但其上還有部長——共產黨員孫承佩。甚至在鳴放立場上和他接近的原社訊編輯吳鐵峰也和他鬧矛盾。他認為吳鐵峰能力差，發佈社訊慢，拒絕了許德珩要求兩人輪流編社訊的建議。吳鐵峰認為儲安平搶了他的位置，心中不服，不斷與他競爭。兩位原副主編，儲安平也只安排他們看看文字，不讓他們接觸核心工作。除了袁翰青、樓邦彥等老友，社內支持他的人不多。因此，他動員樓邦彥，希望他主管的「學習委員會」與宣傳部配合，支持他的工作。

在十分孤立的情況下，他竟然又犯了自傲的毛病。某次，他

14　《孫承佩同志在六月二十一日中常會十六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5頁。

15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座談互相監督長期共存方針》，《人民日報》1956年7月30日。

16　《許德珩主席談儲安平的問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43頁。

曾試着探孫承佩的口風，能否將宣傳部長的職位讓給他來做。學社內部關係錯綜複雜，暗礁遍佈，儲安平的舉動，在很多人看來實際是「奪權」之舉。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很快，他在九三學社已經無法立足了，被迫在《社訊》上發佈了辭職聲明。只是他不甘心放棄《九三社訊》，想要在聲明中寫上「但在今後適當時機，仍願努力為社工作」。他還暗中打聽同人對他辭職的看法，並向上海的笪移今寫信訴苦。[17] 不過，這一切都只能是徒勞之舉，沒有人再歡迎他回社工作，害怕他給九三學社帶來「災禍」。

上任

儲安平已經是《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為什麼不願放棄區區九三學社的內刊？揭發人的控訴是「攫取社中央的地位和權力，加速把九三學社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道路」，這種評價即對又不對。儲安平確實希望掌握九三學社的宣傳權力，這樣可以使《社訊》配合《光明日報》，增加輿論的力度，幫助中共整風並影響群眾。但是，他絕對不是「奪權」，更不是想搞什麼顛覆政權的工作，其出發點仍是，認為知識分子有議論國事的權利，當國家出現問題時，應該有更多的知識分子起來發聲。他無法影響和改變九三學社，只能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光明日報》中去。

1957年4月1日，愚人節，他由章伯鈞陪同來到報社。儲安平這樣記錄這個過程：

> (章伯鈞)在路上向我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希望光明日報以後多登一些人的新聞。他說，舊社會的報紙很重視人的新聞，現在一般報紙都不大注意人的新聞。現在什麼事情都集中在

17 祁龍威：《儲安平妄圖把九三學社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50頁。

> 幾個人身上，報紙上也就只見到幾個人的名字，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怎能弄好？此外，他還贊成少登教條主義的東西。他說，過去有些假馬克思主義者，把文章送到光明日報，還打電話去指定要登，以後這種教條文章，我們硬是不登。到了報社，各部級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分鐘，他又和別人閒聊了幾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做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冷淡的，我和他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不好拒絕。[18]

儲安平說章伯鈞不太歡迎他，是否意在撇清自己和「章羅同盟」的關係不好判斷。確定無疑的是，儲安平認為中共支持他的工作。他對報社同人說，李維漢部長支持他，黨是他的後台。[19]不過，他說自己以中共為後台，卻又說：「黨報的工作經驗過時了，要學習解放前舊報的傳統，要把光明日報辦成一張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20]打着紅旗反紅旗，不知他是否意識到其中存在矛盾。

來報社前三個星期，他沒有馬上接觸日常工作，而是找總編室主任高天(黨員)、各部主任、各級編輯記者談話，有的單獨約見，有的分組會見，總共達94人，向他們談他的辦報主張，也要大家提意見。儲安平對他們說，過去《光明日報》死氣沉沉，不是教條主義，就是歌功頌德。他要將《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講壇，創造條件主動組織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

18　《儲安平的交待》，《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68頁。

19　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25頁。

20　黃卓明：《批判儲安平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辦報路線》，《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發言專輯》，第71頁。

從政治上進行監督。他還說，民主黨派的報紙和黨報不同，其主要任務不是指導工作和宣傳政策，而是要報導消息，要揭露揭露再揭露，如何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21] 他還認為，現在辦報最大矛盾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人民的問題。有些消息政府政策不准登，而政府叫報紙登的東西，讀者又不喜歡。政府和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存在着一定的內部矛盾。[22] 儲安平的理念，無疑還是辦《觀察》的思路。

他與年輕記者談話時，問他們在大學新聞系學得如何。他們回答說學得很少。他否定了建國以後仿照蘇聯的大學新聞教育模式，認為那是誤人子弟。他認為西方國家的新聞教育也有合理之處：「美國的新聞教育，是培養你成為一個採訪員，能寫消息、發新聞就行了，英國就不同，那是要你知道一系列的系統知識，使你成為一個政治家，成為一個具有指揮和影響政局本領的評論員，這也就是用一個主筆、總編輯的水平來培養記者編輯。」他鼓勵這些年輕記者要勇於表現自己，在思想上擺脫從學校裏學來的教條主義，以建國前的老新聞人為榜樣。

4月19日，《光明日報》黨組正式撤出，原總編輯常芝青雖然仍留在報社，卻已不負責具體事務。儲安平此時也已摸底完畢，開始親自佈置報導工作。4月下旬，全國各地都在鳴放，《人民日報》已經有意識地在地方組織座談會，他唯恐落後，遂決定向各大城市派出記者，到基層去報導鳴放的情況。記者一共派出了三路八批，計中南組(武漢、廣州)潘文彬、錢統綱、丘林，西北組(西安、蘭州)歐志培、韓洪文，東北組(瀋陽、長春)王少桐、殷毅，上海、南京則由駐滬記者盧雲、陳楚、巴波負責。儲安平又聯絡了政協幹部梁誠瑞作為廣州特約記者，命先期南下

21 《高天同志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26頁。

22 《張友同志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29頁。

廣州的王強華配合丘林、錢統綱，命已在西安的鄭笑楓配合歐志培、韓洪文。儲安平親自擬定了召開座談會的書面方案，主要內容有：

一、目的和要求：(1) 集中反映各民主黨派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意見，對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意見和要求。(2) 從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通過對某些典型問題，或典型事件的揭發和討論，提出各地對解決當前存在着的各種主要矛盾的意見。(3)希望參加座談會的同志根據放的精神，徹底敞開，暢所欲言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和建議。

二、邀請對象：請當地各黨派組織負責人和當地學術界中心人物提供名單，綜合研究後再和有關方面商量確定。邀請對象應盡可能包括各民主黨派、各高等學校和科學機關等各個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邀請人數不要過多，一般以十人以下為原則。如過多，或者使發言人由於時間限制不能暢所欲言，或者由於內容太多而使本報沒有足夠的版面刊載。因之，在考慮邀請對象時，應先適當地估計被邀請的人士平時是否意見較多以及是否勇於發言。

三、座談會題目：徵求當地各黨派負責人和當地學術界中心人物的意見，根據總的要求，結合當地特點和特殊問題提出座談題目。

四、會前聯繫：(1) 向協助召開座談會的有關方面充分說明本報召開座談會的意圖，並且徵求他們對如何開好座談會的意見。(2) 會前訪問所有邀請參加座談的對象，向他們說明本報的意圖，說明本報在各大城市佈置座談會的計劃，請他們準備盡量敞開發表意見，並要求發言越具體越好。

五、報導方法：(1) 座談會舉行後，當天將座談會情況以及座談中所提出的突出的問題摘要發新聞電，準備在一版頭條

> 地位發表。(2) 在會前訪問中或在當地其他各種活動中，應密切注意抓新聞，隨時發電報導。(3) 每一座談會發言記錄整理後用最迅速辦法寄回報社，全文發表。(4) 整理發言記錄全文時請加按語，說明開會時間、地點、討論的問題，參加者的姓名、黨派身份和工作崗位的職銜。發新聞電時亦須注明發言人的姓名、黨派身份和職銜。……[23]

儲安平指示記者，在哪些地方找哪些人座談，比如復旦大學有位王恒守，率先提出了取消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的問題，一定要邀請他來參加。[24] 有記者問儲安平，有些人雖然有代表性卻無事可鳴，有些人敢於說話卻沒有代表性，邀請哪個？儲安平指示其邀請後者。儲安平還告訴記者，在正式邀請之前，先登門拜訪，以請教和談心的方式，以增加其信任和好感。有記者問，是否要和當地的中共黨委打招呼？儲安平答不必，和民主黨派地方組織聯繫即可。儲安平還親自給各地的知識分子朋友寫信，請他們配合記者工作。

向各大城市派出記者，雖是儲安平的意見，卻得到了常芝青和高天的同意。比如派殷毅、王少桐去東北，任務便由高天下達。臨走前，常芝青和高天還向他宣讀了中央領導的內部指示。這位匿名的中央領導，無疑是毛澤東的語氣(殷毅在接受筆者電話採訪時再度確認所謂的中央領導就是毛澤東)：「現在有些黨委書記對鳴放思想不通，有阻力。我說了，誰阻礙鳴放就罷誰的官。須知，鳴放好了，了不得，鳴放不好，不得了。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可以試試嘛，有什麼可怕？有人提出大學黨委書記不懂

23 《關於召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座談會的意見》，《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21–22頁。

24 《光明日報在章伯鈞、儲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間所犯錯誤的檢查》，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合編：《批判光明日報參考資料》，光明日報社，1957年，第4頁。

教學，可以叫他們去管伙食嘛。」常芝青讀完後還說：「中央貫徹鳴放的決心很大。」因此，他並不覺得常芝青和儲安平的交待有什麼不同。聽完傳達，反而增強了他的責任感，認為應該加倍努力組織報導鳴放，完成領導交給他的任務。[25]

常芝青、高天也實際參與了鳴放新聞的採編刊登。西北組的鄭笑楓是常芝青先期派出跟隨人大政協代表視察西安的記者，臨行前高天指示他，如有意見和看法發內參回來，向中央反映。到西安後，他瞭解到西安市委尚未向各界傳達毛澤東的講話，遂寫了一份內參發回報社。高天收到後，馬上發給他一封加急電報，囑咐他快速將內參寫成新聞稿發回。新聞稿在《光明日報》發表後，高天還寫了一封親筆信，請儲安平派出的西北組記者韓洪文、歐至培轉交，表揚鄭笑楓說：「你發回的專電，反映很好，彭真同志還在中央政治局會上表揚了說，毛主席的講話西安市委為什麼不及時傳達，批評得好。」高天還叮囑他要配合韓、歐兩位的工作，積極報導西安的鳴放。[26]

由此可見，派記者前往各地組織報導鳴放，並非儲安平的獨裁舉動，而是報社內黨和非黨負責人的一致意見。儲安平接觸具體事務之前，《光明日報》已經刊出了不少鳴放的文章。比如，4月9日刊載《知識分子聞放之初》，10日刊登《為放而爭》，10–12日連續三天刊載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座談會對鳴放的討論。14日刊發梅蘭芳談百花齊放，17日刊《對互相監督的理解又進了一步》，18日刊《春天的感應》。這些文章都由常芝青和高天組織刊發。[27] 這說明，毛澤東要求大鳴大放，無論是非黨總編輯儲安平，還是黨委負責人常芝青、高天，都在認真執行這個最高指

25　殷毅：《香花毒草任評說：第一朵迎春花背後的故事》，梁剛建、喻國英編：《光明日報新聞內情》，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第9–11頁。

26　鄭笑楓：《一條內參帶來的厄運：兼記1957年光明日報反右鬥爭前前後後》，《光明日報新聞內情》，第35–37頁。

27　殷毅先生訪問記錄，北京，2014年1月17日。

示，沒有人敢懷疑。可悲的是，由於儲安平發表了「大逆不道」的宣言，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常芝青和高天事後為了自保才百般抵賴，將所有的罪行都安到儲安平的頭上。

改版與尋求支持

派遣記者前往各大城市之後，儲安平開始在報社醞釀改版。他要對《光明日報》來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革。改革之前，他先到社長章伯鈞家彙報請示。章伯鈞提出了增加資本主義國家通信社的電訊、中立國家政黨的介紹、民主黨派領導人物活動新聞等幾點建議。章伯鈞還認為，應該召開社務委員會，成立一個常委會支持儲安平的工作，具體時間另行研究。

5月7日，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編輯部全體大會上做了《關於改進光明日報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這個報告主要是儲安平的構想，結合章伯鈞的建議，以及與九十多位報社同人談話的意見而成。他首先提出了如何將《光明日報》辦成一張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的問題。他說，黨中央為了貫徹雙百方針，調動民主黨派的積極性，指示全黨尊重民主黨派的平等地位，允許民主黨派獨立處理內部問題。中央統戰部已經開會決定，《光明日報》的事全部由民主黨派處理，中共不再過問，如何將其辦成一份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便成為迫在眉睫的要求。以往的報紙在言論方面，教育指導的地方太多，反映民主黨派及群眾的要求太少，今後在教育指導的同時，要注意反映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繫群眾的要求。

那麼，怎樣才能體現《光明日報》的民主黨派報紙屬性呢？那就是多增加民主黨派的報導，民主黨派中央會議、黨派活動新聞、黨派工作經驗、黨派生活、黨派所聯繫群眾的要求等等，都要重點報導。當然，在加強報導的同時，還要增加言論力度。黨

中央雖然提出了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是知識分子普遍有思想顧慮，不敢說話。民主黨派的報紙必須為鳴放創造條件。因此，要用更多的篇幅讓民主人士發表言論，主動聯繫、推動高級知識分子講話，使報紙真正成為民主人士的論壇。不過，他又指出，由於中國的特殊制度，《光明日報》不能也不是一張反對黨的報紙，這一點必須明確。

他說，鼓勵別人起來鳴放，首先要自己思想解放。他引用了一位統戰部副部長的話說，《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他問在座各位：「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他檢查一下子。」他鼓勵大家要敢於發言，不要怕受批評。他說：「我在思想上是準備挨打屁股的，不希望出大毛病，使人人都滿意就做不成。這點上章社長表示完全支持我，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這說明領導上希望我們放手搞。我很感激，《光明日報》改進工作，一定要放手搞。我支持大家放手搞。希望不要束縛手腳。」

他說，以後的報導要突出重點，過去黨派、教育、科學、文化、藝術、政法、民族、體育、國際九個方向都搞，沒有重點。政法、衛生、音樂、體育四個方向不必再搞，其他五個方向，必須加強新聞報導。建國後的辦報思路是用報紙指導工作。這種做法來源於革命老區，交通資訊不便，報紙的主要讀者是幹部，發行報紙是為了宣傳指導。但是在舊社會，報紙又叫新聞紙，記者每天跑新聞，編輯比標題、比編排，做不好就要丟掉飯碗。今天，黨宣佈百花齊放，鼓勵大家獨立思考，自由說話，減少報紙指導工作的要求，《光明日報》就應該重視新聞。從今以後，要明確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務是寫新聞，至少要做到指導工作和新聞兼顧。

社論必須少寫。過去歌功頌德、教條主義的社論不要再寫。

黨對鳴放還沒有定性，互相監督、揭露批評的社論，暫不能寫。國際新聞要有批判地引用一些外國通信社的新聞稿，甚至適當翻譯分析國際政局動向的稿子；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人民日報》已經報導，如果再用新華社電訊，看完《人民日報》的讀者不會再看《光明日報》。文藝要有固定的版面，報導文藝動態，刊登漫畫配合鳴放。政法、民族之類的專刊需要砍掉。過去這些專刊存在是為聯繫知識分子，而今可以通過鳴放來聯繫知識分子，專刊就不必存在了。

出於整合機構，加強效率的考慮，儲安平決定撤銷編輯室，由國際部和文藝部編第四版，學校部和科學部編第三版，撤銷國內政治部和讀者來信部，所有的稿子直接送到總編室，由他統一負責。他還宣佈，《光明日報》不能機關化，要報館化，同人要做好在下午和晚上工作的準備。6月1日正式改版。[28]

實際上，在未正式改版之前，儲安平已經雷厲風行地提前貫徹他的方針。

政法、民族等專刊被提前取消，更多的版面騰出來用於報導鳴放。5月15日，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已有編輯按照慣例寫好四平八穩的歌頌社論，儲安平不准刊登。6月1日兒童節，有編輯提出要發社論，儲安平也予以否決，認為沒有評論的價值。只有在五四青年節那天，儲安平安排記者潘文彬寫了一篇社論，題為《大膽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執筆者將這次貫徹雙百方針的鳴放活動，視為比五四更為波瀾壯闊的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思想革命運動。社論鼓勵全國知識分子不要猶豫，破除害怕挨整的心態，知無不言，為國家貢獻力量；領導同志也要放開顧慮，積極傳達毛澤東的講話，配合整風工作。[29] 儲安平

28 《關於改進光明日報工作的幾點意見》、《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4–18頁。

29 《大膽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光明日報》1957年5月4日。

很讚賞這篇社論。然而，後來有人控訴說，五四運動反對的對象都是敵人，整風是對中共提意見，將整風與五四相提並論，實際就是將中國共產黨當作敵人。

如殷毅所言，儲安平作為中共派來的人，在報社具有絕對權威，他的決定無人敢於懷疑。[30] 不過，或許鑒於九三學社的工作教訓，儲安平覺得自己空降報社，勢單力孤，希望真正獲得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支持，以完全擺脫保守勢力，加強《光明日報》的輿論監督作用。由此，他主動聯絡各民主黨派宣傳部負責人，希望他們支持《光明日報》。農工的嚴信民，民進的馮賓符，民盟的薩空了、費孝通、錢偉長，他都主動拜訪。[31] 他想組織這些人成立一個顧問團，目的是「作為社務委員會助手，加強編輯部力量。」這句話前半句是假話，後半句是真話。舊社務委員會是理論上的最高權力機構，成員有常芝青、高天、孫承佩這些中共黨員，若召開社務委員會很有可能產生分歧。他喜歡親力親為，構想中的顧問團，職責也僅限於顧問，或者單純為《光明日報》提供稿件，而不是決定報社大政方針的權力機構。他還想拉老友費孝通來社工作，不過，費孝通表示只願寫文章，不願意深度介入報社內部事務。儲安平未能如願。

5月19日，儲安平拜訪了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由於對這位老師心存芥蒂，這是二十多年來的首次登門。他談了改革版面的情況，向他請教辦報事宜。兩人自然談到如何貫徹互相監督的問題。據儲安平的供述：

> 羅隆基談到了4月30日毛主席約他們談話的事情。羅隆基說毛主席那天對大家表示，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

30　殷毅先生訪問記錄，北京，2014年1月17日。

31　《8月1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的檢討》，《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62–63頁。

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我聽到羅隆基說毛主席徵求大家對他提意見，我就想到十二位副總理裏沒有一個黨外人士這一點，我問羅這個問題能不能談，他說可以談。……毛主席在2月27日的報告中說，對於肅反問題打算全面檢查一次。我因為看到報紙上鳴放座談中反映一些肅反運動中的問題，所以那時我也贊成由人大常委會聯合政協全國委員會檢查一下這方面的情況。我贊成在肅反中有意見的人，可以列舉事實報告人大常委會請求檢查。我對羅說，假如要在人大發言，我想談談這個問題。羅說，這個問題可以談。[32]

但是，羅隆基後來認為儲安平捏造了部分事實：

談話時他一再請我寫一篇批評黨批評國務院組織的文章，我堅決拒絕，然後他問我，這樣的文章他可不可以寫，我說：「在百家爭鳴的時候，你自然可以寫。」對這點他隱瞞了。大和尚小和尚問題是他提出的，談話時我把陳雲副總理常談「經是好的，小和尚念不好」的笑話說了，並且我把陳雲副總理說：「小和尚經念不好，大和尚亦有責任」這話大意亦說了。我沒有提出向毛主席提意見的話，我更絕對沒有說「希望大家向毛主席提意見」。這點是他捏造出來為他「黨天下」的荒謬發言推脫責任。[33]

由於缺乏第三方在場，誰是誰非已無法證實。毫無疑問的是，兩人談到了「大和尚」和「小和尚」的問題，普遍認為，出現這麼多問題，不只是「小和尚」唱歪了經，更是「老和尚」的責任。儲安平認為，大家對「小和尚」提了那麼多意見，還沒人

32 《儲安平的交代 · 與羅隆基的來往》，《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66頁。
33 《羅隆基的揭發》，《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3–4頁。

給「老和尚」提意見。這次談話，無疑對「黨天下」發言的提出，起到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鳴放

醞釀改版前後，已經有記者陸續發回鳴放的報導。

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回應中央政策最積極，鳴放最早，而且座談會基本由中共領導。4月20日，《光明日報》就刊登了盧雲、陳楚發回的《上海各高等學校熱烈討論毛主席的講話》的報導，記錄了上海各校座談會的盛況。

26日，記者又發回了題為《激動中的上海知識界》的報導。從文中看，市委組織的民主黨派、文教界和科學界的座談會，一開就是十幾個鐘頭，知識分子們爭先恐後發言，普遍以振奮的心情迎接春天的來臨。有人像屈原般滿腹委屈，稱自己帶着告狀的心情參會，向黨告狀，告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狀：「到黨召開的會議上來告狀，這正如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媽媽面前所做的那樣，這是極為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也有人直言不諱，將矛頭直接指向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說教條主義和自由思想有矛盾，很多學術問題，拿反動思想的帽子壓，毫無道理，說官僚主義者的作風，使工作受到很大損失，影響了黨群關係，阻礙了積極性的發揮。還有人提出，知識分子們普遍希望能夠更有尊嚴，讓他們撕破臉比殺頭還難受，應改變暴風驟雨式的改造方法。[34]

27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廣開言路，各抒己見，發揚民主：上海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討論毛主席講話》。其中最有力的發言當屬民盟上海副主委彭文應。他說，有人怕鳴放會引起思想混亂，那是多餘的擔心，讓人民聽到不同的意見，知道全面的事實，都來參加討論國事，通過意見的爭鳴和交流，才

34　《激動中的上海知識界》，《光明日報》1957年4月26日。

能得出真理。28日，刊登《上海的作家們暢談貫徹鳴放方針》，作家們普遍認為，行政不能過多干預藝術，也不能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搞文藝。出版業應該進一步放開，寫作必須消除政治上的清規戒律。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基本出席了這些座談會，將意見認真記錄在案，並表示要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重視這些意見。

上海的記者還個別訪問了上海高校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請他們說話。儲安平知道他的老師王造時最敢說話，心中也有怨氣，交代記者，一定要去拜訪。果然，王造時不負所望，提到了關鍵問題：

> 中央負責同志可以考慮發表一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問題概不在追究之列。在思想改造和肅反運動中產生的一些副作用的問題應該盡快地、分別地、細緻地加以解決。放和鳴需要有園地，我看可以鼓勵私人辦刊物，因為有些人不願意替趣味不投的刊物寫稿。辦一些同人性的刊物，不僅自己能放能鳴，還可以彼此爭放爭鳴，這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有好處的。加緊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與放鳴也不無關係，人民知道他的權利和義務的所在，明瞭自由的界限，就可增加他的安全感。因此，頒佈刑法、民法及訴訟法等等也是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害怕釣魚，擔心鳴放是引蛇出洞，恐懼秋後算賬，這是一般人的普遍顧慮。很多人都有這個顧慮，但不敢說。王造時當年曾經諷刺蔣介石是「流氓天子」，他敢講話。

5月5日，盧雲、巴波等以《光明日報》的名義邀請上海民主黨派成員舉行座談會。

其中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認為，學校的黨員領導掌握着生殺予奪之權，黨員很少與群眾接觸，黨與非黨之間有隔閡。過去民

主黨派也向黨提過不少意見，結果都沒有下文，到了肅反時反被污蔑為民主黨派小圈子，挨整遭受審查批鬥，為了保證百家爭鳴，必須消除肅反的影響。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徐中玉沒有參加座談會，卻在記者的懇切要求下寫了一篇《我看黨群關係》的文章，作為座談會的書面意見。他說：「黨員普遍有優越感、領導感、正確感三大缺陷，馬列主義成為其裝在口袋裏打人的棍子，別人始終是他口誅筆伐的對象。像這樣三大缺陷齊全的黨員雖只佔絕少數，但無論哪一單位哪一行當中只要有幾個黨員是如此樣子，便很難不把好些黨群之間的關係搞糟。」後來，這篇文章成為徐中玉以「急先鋒」姿態向黨進攻的罪狀。[35]

不同於上海，很多地區的領導根本沒有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知識分子沒有途徑鳴放。就如西安，十三所高校竟沒有一所傳達講話，教師們有話說，四處打聽何時可以才能爭鳴。鄭笑楓將西安一片沉寂的消息發回報社，消息立即在報紙上披露，並引起中央的注意。壓力降到陝西省委，不久，在省委統戰部的幫助下，西安順利召開了爭鳴座談會。

武漢的情況也是如此，領導普遍有顧慮，搞不清該放到何種程度，放了以後如何收場。武漢記者潘文彬、錢統綱看見北京上海都已熱烈鳴放，武漢卻紋絲不動，發電報請教儲安平。儲安平也萬分焦急，馬上在報紙上發出了《武漢知識界的鳴放密雲不雨，許多知識分子希望領導大膽放手》的文章，又每天打四個電報指示工作。儲安平告訴他們，去武漢大學找袁昌英、韓德培，請他們聯絡知識分子爭鳴。很快，從5月4日開始，武漢的文藝界、民主黨派人士開始座談會。

武漢的言論普遍比較尖銳，從「舊社會」過來的大知識分子顯然不能適應新社會這種被排斥、被邊緣化，甚至斯文掃地的

35　徐中玉：《有為有不為，抓住重點辦出特色》，張義德編：《名人與光明日報》，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319頁。

「待遇」。這裏以武漢大學的三位著名學者程千帆、韓德培、袁昌英的座談會發言為例。

程千帆說：「有些說法，聽來是很刺耳的。比如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要看他的共產主義覺悟和品質究竟如何，以及他起了什麼作用而定。入黨與否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要知道，黨外也有像魯迅這樣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而黨內也出過叛徒，有品質極端惡劣的人。這本是一句鼓勵的話，結果變成了刺耳的話，使不少黨員自高自大，自視為『特殊材料』，瞧不起非特殊材料製成的群眾。又如常說『紅色專家』。所謂『紅色』，大家知道，這不是一個美學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所謂『紅色專家』，就是指的入了黨的專家。我們沒有入黨，難道我們就是粉紅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黃色的，無色透明體的專家？問題是我們不願做這些專家。」

袁昌英說：「在武大，黨員的特權階級作風，隨處可以看到。隨便舉一個小例子，有一次，家屬委員會檢查各住宅的防火工作，檢查到人事處一位黨員家裏，這位黨員卻大聲叫罵，把那位負檢查責任的女同志罵得哭着出來了。大家只好搖頭歎息，有什麼辦法。又如各家有客人留宿，必須到保衛委員會去報告一下。可是有的黨員家裏來了客人，要他去報告，便說他不必報告，說他們黨員家裏來的客人，沒有什麼靠不住的人。這當然難怪人家把黨員看作特權階級了。」

韓德培說：「有職無權，是最使知識分子難堪的。比如說，前年更換俄文系系主任的事，我事先就一點也不知道。按道理，我是副教務長，又負責處理俄文系等系的行政事務，對這事應當預聞。又如去年全國第三次司法會議，不僅系裏究竟誰去參加我毫無所知，就連召開這次會議的通知，我也沒有看到，而第一、二次全國司法會議都是我出席的，作為高等學校的法律系主任，

難道我竟沒有資格出席這個會議，並且連預聞這事的資格也被取消了？我是副教務長，但是我指揮不動工友，因為他是黨員。這種事說來似乎令人不敢相信。有一次，一位蘇聯專家第二天要到武大演講，要求在當天下午把一些材料翻成俄文交給他，事情很急。我趕忙翻好之後，便親自交給傳達室一位黨員工友，請他派人送去，可是他理也不理，又去請行政組的另一位黨員幹部來處理這事，同樣的，也只說一聲『不行』，就不再理睬。這不是特殊的例子，黨員幹部是不容易指揮的，他要怎樣便怎樣。」[36]

瀋陽、蘭州等地，比西安、武漢還要保守。這些地區，領導不讓鳴放，儲安平又沒有熟悉的朋友可以聯絡，鳴放很遲。

5月8日，王少桐、殷毅才在民盟遼寧省委的協助下，成功邀請瀋陽高級知識分子座談。

瀋陽知識分子普遍對黨群關係現狀不滿已久。東北財經學院某副教授說：「民主黨派組織在高等學校裏像花瓶，是擺樣子的。每逢開什麼大會，總看見民主黨派的人掛着紅條條，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實際工作中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不願意當花瓶了！」民主促進會會員郭厚德說：「有的黨員把黨和黨員的關係搞不清楚，往往把自己代替了黨。他們有一種三段論法：你們既然是接受黨的領導，我是黨員，你就得受我的領導。邏輯的推論無疑是『你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黨。』在這種宗派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在某些基層單位變成了獨立王國。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十分不正常。」瀋陽師範學院講師徐公振說：「過去並不考慮其政治文化的修養和專業與學識的成就，常提拔一些不懂學術的黨員為領導。有人反映尚未學俄文的黨員，領導上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自己的老婆並不懂歷史，叫她作歷史系主任，甚至兩年不檢查她的工作，儘管搞的亂七糟八，他還嘖嘖稱讚。」[37]

36　《武漢知識界談黨群關係》，《光明日報》1957年5月17日。
37　《本報在瀋陽邀請高級知識分子座談》，《光明日報》1957年5月14日。

瀋陽座談會結束後，殷毅本擬去長春召開座談會，得知東北工學院82名教師聯名上書要求市委書記支持鳴放，並於11日繼續召開座談會的消息。他聯想到常芝青傳達的指示，認為知識分子聯名上書是一個大新聞，臨時決定前往會場。得知《光明日報》記者到場，知識分子們無比激動，發言更加猛烈。許多人激烈批評了1955年的肅反，教師們群情激奮，質問市委書記為什麼會在肅反中造成那麼多冤假錯案，導致一人自殺多人挨整。殷毅就此事請示了市委書記，對方認為可以報導新聞，但不要提肅反。殷毅遂以《第一朵迎春花——記東北工學院機械系教師鳴放前後》為題發回報導，絲毫沒有提到肅反問題，總編室高天親自編發該文。[38] 這說明，雖然此時《光明日報》大幅報導鳴放，但新聞已經被過濾，實際情況遠比公開報導的問題嚴重。

5月13日，記者陳楚組織南京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

南京座談會，各發言人情緒熱烈。在講到某些具體情節和警句時，一再關照記者把它們全部記下。原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在會上說，黨和知識分子關係不正常，黨員對知識分子不夠尊重。南京師範學院院長高覺敷說，非黨同志在學校做行政很苦悶，問題何時決定怎樣決定都無權過問。南京體育學校校長陳陵說，他這個校長是泥菩薩，學校裏好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但是出佈告卻要用他的名字，出了問題由他負責。南京師範學院教授、九三學社社員吳奔星則激烈批評黨員的作風脫離群眾，認為黨員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似乎都在代表黨，一舉一動都有原則性、思想性。群眾得罪黨員，就是得罪了黨。他們忘本的情況非常嚴重，經常被少數積極分子包圍，受人蒙蔽聽信讒言。黨不應歧視知識分子，認為他們都從舊社會來，本身帶有無法洗清的污穢。[39] 吳

38 殷毅：《香花毒草任評說：第一朵迎春花背後的故事》，《光明日報新聞內情》，第13–16頁。

39 《南京的鳴放在下層阻礙不少，轟開局面，還看領導，民主黨派人士在本報座談會上熱烈發言》，《光明日報》1957年5月15日。

奔星的長篇發言，儲安平單獨騰出版面發表，並慷慨贈予三十元的稿費，在當時這是一大筆錢。吳奔星後來常常自嘲，「三十元買來一頂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40]

5月16日，記者組織召開蘭州民主黨派座談會。蘭州的知識分子稱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為「三個壞主義」，指出許多黨員領導幹部的個人品行問題。比如，正直的民主人士被排擠，道德品質惡劣的政治積極分子卻被提拔重用。有的領導無故離婚再娶，口碑極壞。學校教務長和負責思想政治工作的兩個人亂搞男女關係，被群眾揭發後不但沒有被處分，一個被提拔到了北京高教部當官，一個被保送到北京高級黨校深造學習。領導幹部對意見不合者開口就罵。黨員幹部沒有起到帶頭作用，而是爭工資、爭職位，分配學生工作時，非黨成員分到中小城市，黨員學生留在大城市等等。[41]

同日，記者組織召開廣州民主黨派座談會。華南師範學院教務長陳子明和中山醫學院葉鹿鳴教授提到了肅反問題。陳說，有一位教師不過是在茶餘飯後說些閒話，便在肅反中被鬥，以後遇到黨員看都不敢看，躲着走。這次有人叫他提意見，他不敢，害怕再被鬥。葉說，他自信愛黨愛國不亞於一些黨團員，卻因1953年向院方反映黨領導的缺點和失誤，遂成為肅反的對象，被扣上反黨反人民的大帽子，不斷被鬥，身心受到嚴重傷害。許多座談會找他參加，他不敢去。這次冒險前來，相信這次座談會或許不致發生意外吧！

組織召開座談會期間，廣州特約記者梁誠瑞來到中山大學陳寅恪家中拜訪。或許這也有儲安平的授意。他在報導中說：「這幾天的報紙，真個是大鳴大放，大概知名的學者、教授無不發表

40　與吳奔星哲嗣吳心海先生的網路對話，http://weibo.com/1232356762/AhFWa2VoH。

41　《本報編輯部在蘭州邀請民主黨派成員座談》，《光明日報》5月26日。

了言論，就是懶於發言的知識分子黨員也被記者將了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已經深深地激起了全國知識界無限的感懷。怎麼，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教授還未發表他的見解呢？」[42] 他希望這位史學界泰斗也放一放，以增加《光明日報》的份量。然而，陳寅恪只是詢問了北京故友的情況，對時局一言未發。智慧的史學家對時代的洞見的確與常人不同，如果他發言激烈，最後也可能成為右派了。

個別記者不願聽從儲安平的安排，比如他指示跟隨政協採訪的王強華在廣州配合鳴放，但王以不是鳴放記者為由逕自回京，結果躲過了一劫。青島本來不在儲安平擬組織鳴放座談會之列，但駐青助理記者鐘光貴卻主動要求在青島組織鳴放。或許是山東人最能忠實執行中央政策，積壓的問題太嚴重，青島的民主人士也強烈呼籲鳴放，5月23日，在山東大學副校長陸侃如的幫助下，《光明日報》編輯部青島座談會舉行。在會上，主持座談的青島紡織管理局總工程師黃建章和青島醫學院副院長徐一貫都談到了肅反問題。黃建章認為，肅反運動是憲法頒佈以後進行的，本應按照憲法行事，卻沒有提前調查研究。肅反是少數黨員的臆斷行事，他個人被蒐查，身體健康受到影響，意志消沉。但事後發現沒有錯誤，卻沒有人向被鬥錯的人道歉。徐一貫說，三反、五反、肅反之後，黨與非黨之間築起了高牆。肅反使大家「知不敢言，言不敢盡，一言難盡，言者挨整，聞者記賬」，肅反後也沒有做好善後工作，只談取得偉大成績，卻不能承認錯誤，卻沒有安撫那些鬥錯的好人。[43]

這些座談會的發言，儲安平用整版全文刊登。據後來組織過蘭州座談會的人控訴，蘭州座談會上所講的個別情況，和實際情

42　本報特約記者梁誠瑞：《訪陳寅恪教授》，《光明日報》1957年5月10日。

43　《本報編輯部在青島邀請民主黨派成員座談，討論人民內部矛盾，根除三害》，《光明日報》1957年6月5日。

況有出入，但儲安平偏聽偏信，沒有找當事人核實。常芝青和高天後來還控訴儲安平有言必錄，毫不顧忌影響。據說，青島座談會談到的肅反問題，他們都向儲安平提過，肅反的具體問題不能報導。儲安平不同意，說「你要刪也可以刪」。高天和常芝青都認為，儲安平步子邁得太大。中央對各地的鳴放有組織有步驟，應該由黨委領導。沒有黨委組織，知識分子反映的問題非常尖銳，散播出來容易造成思想混亂。但是，儲安平認為，民主黨派組織爭鳴，未必一定要經過中共。而且，知識分子有話說，人民也需要知情權，壓制不放反而會帶來更大的積怨。常芝青、高天的自我辯護，不能不信卻也不能全信。而且，儲安平本人也並非有言必錄，會有意識地拒絕刊登更激烈的來稿。如老師錢基博發來一稿批評中共，言辭激烈，儲安平覺得無法刊登，遂私下轉給了胡喬木。[44]

觸碰禁忌

對於留京記者，儲安平指示他們，多跑高校和民主黨派中央，報導座談會，或個別採訪。《光明日報》的版面上於是排滿了鳴放新聞，如《中國人民大學像個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北京師大領導不肯大膽的放》《清華大學教授尚未做到開懷暢談》《北大一百多位教授座談內部矛盾問題》《為工程技術人員鳴不平》《首都經濟學家在座談會上揭發經濟學界壁壘森嚴宗派主義嚴重》《文改會的工作走群眾路線不夠》等等。這些報導對知識分子而言振奮人心，對被批評者而言則是如喪考妣。其中的幾種報導頗為引人注意。

首先是黨委制的報導。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上提出，工廠、

44　《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79頁。

農村、部隊、學校實行黨委制，但學校的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將權力集中於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裏去講。章伯鈞、羅隆基等聽到這個消息異常興奮，遂在民盟中廣泛傳達。不過，據說毛澤東所說的「恐怕不適合」被章羅傳達成了「首先撤銷」，並率先在民盟中央成立『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工作組，討論高等學校的領導制問題。[45] 儲安平顯然也對這個問題極感興趣。他在民國時期就對中央政治學校和國立師範學院的國民黨組織非常不滿。國共內戰時，國民黨黨團組織受輿論壓力退出學校，中共卻在1949年以後在高校重新確立了黨委負責制。高校中出現了許多矛盾，知識分子怨聲載道，其根源就在於黨組在學校的權力過大，妨礙了教學和學術研究。幫助中共整風，改善黨群關係，改變高校黨委負責制是鳴放的重要論題。

儲安平得知清華大學在研究改變黨委制問題，第一時間派記者前往採訪。

5月7、8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發了《中央統戰部、清華大學黨委會、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討論改變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問題》。座談會上比較有份量的發言是九三學社中央副秘書長李毅和民盟中委葉篤義。李毅要求，改變以黨代政的情況，希望黨政分開，加強行政領導的職權。葉篤義則認為，學校中不需要有黨派的組織活動，非但共產黨組織不必存在，民主黨派組織也不必存在，多一種關係就多一個矛盾。不過，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在中共的領導下，由民主黨派協助參與學校的領導工作，加強校務委員會的職能，變黨組領導為集體民主領導。

5月13日，《光明日報》報導《九三學社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高等學校的領導體制》。據說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儲安平的推動有關，九三學社中央領導全部出席。會上，中科院學部委員黃子卿

45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第81、330–331頁。

援引過去清華教授治校的例子，認為重大事情由教授會決定，可以保證決策的民主化，也可以公平評價教授的學術成就。黨委負責制的缺點在於，領導學術水平不夠，教學業務不行，容易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許德珩則堅決反對教授治校，以北大為例，認為胡適、蔣夢麟操縱北大的教授會，將其作為一種迫害進步學生的反動工具。如果成立超黨派的教授會，不僅是極大錯誤，更是不可能的。更多的人則傾向認為，談教授治校不如談民主治校，應該在確定中共思想領導的前提下，加強校務委員會的職能，發揚民主風氣。[46]

6月2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右上方用醒目標題獨家刊發了復旦大學取消黨委制的報導。其文稱：「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舉行的座談會上，復旦大學陳望道校長說，復旦大學已取消了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以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他認為這樣容易發揮老教師的作用，使黨與非黨幹部打成一片，把學校辦好。陳望道校長並說，由於復旦大學在這方面比較有條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認為這個辦法先在復旦實行較好。」然而，6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更正報導，陳望道說復旦並沒有取消黨委制，而是加強校務委員會，這些問題還要送教育部研究討論。儲安平看到《人民日報》的批評，發電報向上海方面諮詢，對方回覆：「校委會制，復旦有此方案，但未實行。」被批評以後，儲安平派記者再訪陳望道，希望得到其親口確認，但未能如願。

其次是新聞自由問題。

《光明日報》在5月中旬連續三天報導了首都新聞界的鳴放座談會。在會上，中國青年報社長張黎群說，去年發表了二百多篇批評性的稿件，受到不少責難和指責，認為報紙沒有資格批評

46　《九三學社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高等學校的領導體制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5月13日。

錯誤。九三候補中委顧執中說，過去很多老編輯都有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可是解放以後都被送到圖書館工作，起過進步作用的報刊多半自生自滅。陳銘德認為，不能關起門來辦報，必須打破教條主義，接受舊報紙的優點。報紙應該替讀者說話，而不是板起面孔來教訓人。鄧季惺認為，應該多辦民主黨派報紙，黨報從上到下貫徹意見，民主黨派報紙從下而上反映意見。王芸生也認為，建國後的報紙宣傳太片面，報喜不報憂，肯定成績，但不讓報導缺點。而且，報社生產力太低，編輯記者成為國家工作人員而沒有壓力。不只是民主人士，新華社和黨刊記者也有顧慮，到底是按照領導的意圖辦事，還是忠於記者獨立報導的職責？《北京日報》副社長周游認為，報紙的指導性在於用事實用新聞從政治上思想上教育群眾，而不是說教，不能因為內容不嚴肅，就認為不像黨報。甚至《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也認為，報紙脫離群眾，搞得很沉悶，報館官僚主義嚴重等等。

5月28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張友鸞的《是蜜蜂不是蒼蠅》。文章說：

> 報紙出現在讀者面前可以有兩種姿態，一種是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教訓人，一種是無所不談的良友。有些人認為報紙只是發號施令的，給讀者上政治課，如果嬉皮笑臉會有失尊嚴。我認為資產階級新聞學認為報紙應該有益和有趣這句話是對的，要供給讀者趣味，適應讀者的需要，不妨軟些更軟些，和讀者交朋友。比如社論代表報社的看法和意見，如果寫的有說服力，讀者自然會同意。如果都是宣教，還不如傾聽讀者的意見。現在的社論好像只允許讀者接受服從不允許讀者吭氣，這是值得考慮的。人民日報這種嚴師有一位就可以了，其他的報紙良友越多越好。報導新聞是報紙的主要任務，這是天職，而今新聞太少了，都是政治說教和神秘大會

總結等空疏無用的廢話。搶新聞也沒什麼，難道社會主義式的報紙，是不是應該把新聞壓在倉庫裏等發了霉然後才看到刊登呢？是不是應該把記者在採訪新聞時應該彼此拱讓，說您先請，我遲兩天登呢？

增加報紙的趣味，減少說教，為「搶新聞」正名，這些都是儲安平想說的話，也是他在報社內反復向同人提及的內容。他刊登這些文章，既是為自己尋求支持，教育報社裏的那些保守派，也是要呼籲新聞自由，希望報紙能回歸到1949年前的傳統。

第三是北京各學校的學生的鳴放。

5月下旬，北大學生在校園內貼出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成千上萬學生每天聚集在校園廣場上，開始鳴放、辯論。學生在大字報中建議有：允許私人辦刊，取消出版檢查制度；實現集會結社自由，給民主黨派以平等活動機會；改選全國人大，國家大事公開討論；改進選舉制度；取消學校的黨委負責制，實權歸校務委員會；取消政治課必修；公平選拔留學生；畢業生自由選擇工作等等。學生林希翎在集會上發言：「我們要說話！北大這樣做，是個良好的開端……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47] 一石激起千層浪，北京其他學校都動了起來，自由論壇、大字報、民主牆遍地開花。中共當年便是學潮的鼓動者，瞭解學潮具有摧毀性力量。這種情況引起了最高領袖的憂慮。

儲安平意識到這是一個新動向。他親自去北大看大字報，回來指定記者採訪見報。據說，總編室主任高天提出：「北大消息已很不好，各大學報導，在中央報紙登出來，就是向全國宣傳，推動學生鳴放，這樣就要在各地造成混亂，對整風，對國家不

47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第128頁。

利。」儲安平毫不理會說：「這件事你看得這麼嚴重，我就沒放在心上，是事實我就要發表」。高天再次聲明，中央對整風有領導有步驟，希望他考慮有利不利的問題。儲安平說「教條主義就是這樣的！」[48] 儲安平還說，要考驗考驗，擔一擔風險，掂一掂斤兩。不過，從結果來看，《光明日報》仍然只是報導了一小部分。他要求記者，將北京各大學的民主牆活動全部報導。但其他編輯集體以時過境遷為由拖延，最後稿子沒有發出。

黨天下

儲安平在《光明日報》報導鳴放的時候，中央統戰部也從5月8日開始放手召集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召開座談會，以徵求對統戰工作的意見，幫助中共整風。地方座談會的參加者謹小慎微，所談的多是具體事務，中央座談會的參加者都是民主黨派中央高層，大多敢言，談的也都是宏觀層面的尖銳意見。鑒於敍述這段歷史的著作太多，在此茲不贅述，僅以清單的方式對5月8–16日第一階段的7次座談會上比較激烈的發言予以呈現。(見右表)

毛澤東最初似乎希望通過整風來使黨群更加團結，鞏固執政地位，但是沒有料到，黨外知識分子反映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提出的要求越來越讓他無法忍受。出於革命性的對抗思維，他將這些批評和意見視為「右派反動分子」向中共進攻，甚至是一種奪權之舉。聯想到前不久發生的波匈事件，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險些失去政權，再聯想到整風之後大鳴大放導致的學潮和社會不安定因素，毛澤東在5月中下旬臨時改變決定，將整風轉為反右，讓「敵人猖狂到頂點」，最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48 《高天同志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揭發儲安平的反動言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25頁。

時間	發言人	職務	要點
8日	章伯鈞	民盟副主席	國家機關中的行政和黨組職權要劃分。 應為非黨幹部和負責人員創造工作條件。 互相監督要有出版園地，建議知識分子組織出版社。
	陳銘樞	民革中常委	取消學校黨委制。 在機關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重大問題的討論。
	章乃器	民建副主委	共產黨內有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 對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的宣傳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9日	陳其尤	致公黨主席	肅反時不遵逮捕拘留條例辦事。 應該盡快制定民法、刑法。
	王昆侖	民革中宣部長	民主黨派在政權工作中作用發揮不夠。 民主人士有職有責無權。
10日	羅隆基	民盟副主席	民主黨派應該有名有實參加協商。 黨委治校與中國政治制度精神不符。 民主黨派應該在中共領導的前提下擁有相對的獨立自由平等。
	邵力子	民革中常委	改進各級黨政關係。 縣委不應成為發佈命令的機構。
11日	千家駒	民建中委	必須用制度保證民主黨派有職有權，貫徹唯賢唯能原則。
13日	嚴信民	農工中執委	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地位事實上離平等很遠。 《光明日報》對農工黨的關注不夠。
	李伯球	農工中執委	要求在整風中整掉共產黨員的特權思想。
	黃藥眠	民盟中常委	黨群關係不好，黨員恃功驕傲，不甚讀書，靠黨吃飯。
15日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長	官僚、教條、宗派三大主義與知識水平低、業務不通有關。 出版管理太嚴，集中統管沒有理論或經驗根據。
	張奚若	教育部部長	共產黨員除三大主義應該整風外，還有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16日	黃紹竑	民革中常委	整風固然重要，法制更重要，不能只整風不建立法制。 肅反時期黨直接處理案件，不通過人民政府。 加強立法，制定刑法、民法、公務員法。 工作報告一味強調政績掩蓋錯誤的做法有危險。
	嚴希純	致公中常委	有些黨員不懂科學又不學習，把民主人士當點綴。
	葉篤義	民盟中常委	民盟民進九三農工解散，重組為一個知識分子政黨。 高等學校的黨委負責制應該停止。 人大與政協制度需固定為專業化

毛澤東開始堅定認為，同右派鬥爭已經不是整風的一部分，而是與共產黨整風並行的階級鬥爭，這次鬥爭不再局限於思想領域，而是一場政治領域內生死存亡的鬥爭。於是，其後的大鳴大放，便已經是相關部門有意識地誘導，讓「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徹底暴露，以坐實定罪。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休會後的第二階段發言中，章伯鈞、羅隆基再度發言，便是統戰部三番五次相勸的結果。

5月21日，復會第一天，沒有任何戒備的章伯鈞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設計院」：

> 比如確定國家體制這樣重大事件，也只限於黨內討論，黨外人士不少是有豐富的政治經驗的人，是能夠提供寶貴意見的。充分討論，好處很大，而民主人士也有事可作。有職有權的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工程建設在施工之前有一個設計過程，許多工業部門有設計院，但政治設施，卻無設計院的組織。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成為政治上的設計院，通過這些機構多商量，許多問題容易明確。可否現在就開始研究一下政協和人大的工作制度，把政協委員、人民代表的工作，不局限於開會和視察，讓大家有實際工作可做，經常開會研究重大方針政策。開會時，由政府部門負責人去作政策說明和工作報告。

5月22日，羅隆基提出了著名的「平反委員會」：

> 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有關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

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的偏差。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三)鳴放中如果有人受打擊報復，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委員會。[49]

「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的提議，放在民國時期只是溫吞水，卻是鳴放末期最大膽的「右派」言論。這些言論的實際目的，是希望逐步成立一個真正的監督機構，限制肆無忌憚的政治權力。章伯鈞、羅隆基本來分屬民盟中的兩派，私人感情不睦，性質相同的發言卻給了最高領袖靈感，創造出了一個可以將兩人一網打盡的名詞：「章羅同盟」。毛澤東認為，整個整風運動，烏雲密佈，烏雲翻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路線地向中共「猖狂進攻」，一切始作俑者和幕後黑手便是「章羅同盟」。至於儲安平，在章伯鈞擔任社長的《光明日報》擔任總編輯，可謂是替「章羅同盟」煽風點火的急先鋒。可是這位急先鋒，在報紙上手拿最高領袖的令箭鼓動知識分子發言，自己卻拒絕參加任何鳴放座談會，而且一言不發，可謂「狡猾之至」，應該讓他也發言。

5月30日上午，統戰部打電話要他參會，他答應去，但聲明不發言。下午，統戰部彭處長對他說，6月1日將召開最後一次座談會，無論如何務必發言。儲安平與羅隆基見面時，曾諮詢過什麼可談什麼不可談，這說明他有話想說。不過，或許仍有自我保護的考慮，他一直沒有發言。而今是最後一次統戰部高層座談會，再不發言就沒機會了。何況那麼多民主人士都發表了激烈的

49　《章伯鈞五月廿一日發言全文》《羅隆基五月廿二日發言全文》，司法局行政部調查局編：《從「共匪」統戰座談會的發言看匪區真相》，台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57年，第49、57頁。

言論，所謂法不責眾，再激烈一些，談些更重要的大問題或許也沒問題。於是他想到了與羅隆基提到的「小和尚」和「老和尚」的問題。國家如此，難道都是「小和尚」的錯誤？毛、周有沒有責任？然而，向最高領袖提意見，是一種觸犯虎鬚的行為。他不會忘記，當年梁漱溟在懷仁堂向毛澤東要雅量，被最高領袖斥為「殺人犯、偽君子」。他有猶豫，但還是心存一絲僥倖，想試試最高當局的容忍程度，看是否有接受批評的雅量。儲安平終於決定，不再沉默。5月31日下午，他沒有上班，在家撰寫明天的發言稿。擔憂之餘，或許還有一絲竊喜，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明天他的發言必將成為全國最大的熱門話題。

1957年6月1日，統戰部最後一次座談會，儲安平拿出署名《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講稿，逐字宣讀了他的發言：

>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着黨走，但跟着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

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

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這個發言，令在座的人驚呼、叫好、詫異。驚呼、叫好、詫異的不只是民主人士，也是會議的組織者。因為這個發言，坐實了儲安平特大號右派的事實，給大鳴大放畫下一個圓滿的句號。時局倒轉，以後便是陽謀的凱歌高奏，全面勝利。

天下圍攻

6月2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字不易地發表了儲安平的發言稿。當天，儲安平到章伯鈞家中談工作，章伯鈞表揚發言很好。儲說：「要談就談些大問題，放肆得很。」儲安平感覺到放肆，卻沒有完全意識這個發言的危險。他和章伯鈞談了加強報社編輯力量的問題，商討找《大公報》王芸生，希望撥出人力支援《光明日報》，又談了是否讓民盟的陳新桂來社工作的問題。[50] 6月3日，為了給改版儲備稿件，他發出了給周炳琳、費孝通、潘光旦、楊人梗、龔祥瑞、錢端升、黃藥眠、梁漱溟、王造時等88位知識分子的信，在信中說：「我們努力的目標之一是使光明日報能夠成為民主黨派成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一個論壇。為了更好地響應並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大方針，我們誠懇地歡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報來陳述您對於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預出題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願意寫的問題。假如能結合互相監督的方

50 《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71頁。

針發言，更好。」[51] 他竟然想重溫《觀察》時代的舊夢。

然而，就在當天，民主黨派內部已經出現了反對的聲音。民革中央座談會上，女盟員陳建晨發言說，讀了儲安平的發言很不舒服，雖然副總理沒有黨外人士，但人大和各部委有不少非黨人士，民主黨派參加革命不是爭交椅。而且，現在是以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必要退回去搞聯合政府。[52] 6月6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參事盧郁文發言說，儲安平說「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這種提法嚴重錯誤，是對於歷史和現實的重大歪曲。這個歪曲不糾正，會使全國人民失掉了團結的中心和前進的方向。他還公佈了自己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其中指責他過去在民革中央座談會上批評鳴放，是無恥之尤、為虎作倀。[53] 這封攻擊黨外人士的恐嚇信引起了毛澤東的興奮，馬上決定收網反擊右派。

6月8日，《人民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其中說：

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為

51　包括周炳琳、周培源、魏建功、游國恩、馮至、高明凱、楊人梗、翦伯贊、黃子卿、王鐵崖、龔祥瑞、金克木、陳振漢、徐毓枏、季羨林、向達、邵循正、侯仁之、張宗炳、嚴人賡、芮沐、錢偉長、王遵明、吳恩裕、張志讓、費孝通、潘光旦、程希孟、嚴景耀、雷潔瓊、馮符賓、楊東蓴、錢端升、樓邦彥、陶孟和、竺可楨、袁翰青、黃渭川、葉君健、李純青、鄭振鐸、戴文葆、千家駒、薩空了、陳夢家、夏鼐、陶大鏞、黃藥眠、楚圖南、葉篤義、翁獨健、胡先驌、梁漱溟、鄭林莊、陳友松、何永佶、陳體強、吳景超、鄭伯彬、徐盈、彭子岡、李俊龍、錢昌照、林漢達、吳作人、張明養、劉思慕、笪移今、盧于道、王恒守、張銳、沈志遠、王造時、周谷城、徐中玉、傅雷、胡煥庸、袁昌英、楊端六、韓德培、馬哲民、高覺敷、陳鶴琴、吳貽芳、陸侃如、馮沅君、陳序經、梁園東。

52　《民革中央委員繼續舉行座談會陳建晨對李康年章乃器儲安平提出的若干論點展開爭鳴》，《人民日報》，1957年6月4日。

53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第615頁。

> 無恥之尤、為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面目，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麼？……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54]

當天，毛澤東又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下發各地方黨委，全國範圍內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為表示「廣大人民」的不許可，最先被授意組織起來發表反對意見的是「人民群眾」。

同日，一位署名朱寶琛的印刷工人的來信刊登於《人民日報》，以建國後翻身的親身經歷駁斥儲安平，說工人階級不容許儲安平對敬愛的毛主席、周總理這樣無禮！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工人十七人集體致信《人民日報》，聲討儲安平不承認中共的領導，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北京琺瑯廠的張永輝來信說，儲安平發言的態度極不嚴肅，也不符合事實。當日，北京國棉二廠工人座談，表示對儲安平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非常氣憤。次日，北京廣播器材廠職工一百六十九人致信《人民日報》聲討儲安平，表示決不允許他污蔑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據說，還有人寫信、打電話給《光明日報》，責問為什麼會出了這樣一個總編輯。

緊隨其後的是各民主黨派的座談會，瞄到風向的民主黨派領

54 毛澤東：《這是為什麼》，《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出版地不詳，1957年，第3頁。

導人，紛紛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座談會內容由整風轉為反右，主要是揭發批判。

6月8日，民革中央座談會上，王昆侖痛批儲安平說：「儲安平先生認為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共產黨『黨天下』思想，我當時聽了這句話，立刻聯想起解放前反動統治時代『蔣家天下陳家黨』這句話，這是當時人們痛恨反動政權所說的話，我們民革多少同志都曾多年為了對蔣黨天下的誅除異己、壓迫人民，為了要打倒那個黨天下而艱苦奮鬥。可是解放以後，在我們人民民主的中國裏還是一個『黨天下』嗎？是不是共產黨又造成了「清一色」的局面，讓事實來回答！事實是：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政府機關、企業、文教、新聞、出版各機關中，有着大量的非黨人士參加。初解放時，共產黨把留在大陸上的國民黨政府公務人員一起『包下來』。到現在各政府機關中包括着清朝、北洋、國民黨三個時代的人物。各民主黨派都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政權，沒有在朝在野之分，這是不是聯合政府？這是『清一色』的局面嗎？」[55]

同日，九三中央召開座談會，曾被儲安平試探能否讓出宣傳部長的孫承佩發言說，儲安平的發言是混淆是非，從建國以來，九三學社就參加了國家事務的管理，在政府機關中，社員有擔任部長、司局長者，擔任校長、研究所所長者就更多了。社員在這些單位中大部分是頭，其中有人有職有權，很少有職無權或無權者，怎麼能說是「黨天下」呢？10日，民進中央座談會，十六位領導人一致表示，堅決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反社會主義分子劃清界限。11、12日，致公黨、民革中央先後召開座談會，駁斥章羅儲的言論。14日，九三中央再度召開座談會，許德珩將儲安平的發言定性為「企圖取消黨的領導」，並表示將召開常委會討論儲安平的處理問題。次日，許德珩在《人民日報》發

55　《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批判錯誤言論》，《人民日報》1957年6月9日。

表文章，表示「不論地位如何，毒草就要拔掉。」

時為民盟北京主委的吳晗，過去儲安平曾幫他出過書，而今為了劃清界限，跳起腳來抨擊儲安平，批判尤為積極。9日晚，民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座談會，民盟北京市主委吳晗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儲安平的發言。儲的發言實質是脫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一切違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儲說「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此語極為反動。宗派主義是被消滅的對象，儲的意思是，要消滅宗派主義，就得消滅共產黨，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56] 10日晚，民盟光明日報支部開會。吳晗再度出席，指出儲安平的發言違背了民盟和人民政協章程，發言起了破壞作用，號召光明日報社同人與儲安平劃清界限。

光明日報社成員的態度在反右號令發佈當晚就已轉向，貼出了反對儲安平的大字報。在吳晗的鼓動下，更進一步表明態度。武漢鳴放記者丘林說：「政府許多部門有非黨人士擔任首長，儲安平為什麼要抹殺事實？黨從來沒有排斥過非黨人士，儲安平給黨加上『黨天下』思想的荒謬帽子，是對黨的歪曲和污蔑。」上海鳴放記者巴波說，《光明日報》全體同志一定要堅守住社會主義陣地，《光明日報》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民主黨派的報紙。反對一切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反對把《光明日報》辦成資產階級反對黨的報紙。原本支持儲安平的潘文彬為自保亦發言說，儲安平的發言，雖然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名義，卻不能代表報社工作人員的意見。每個人工作總的原則都是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利益為依歸。這一點上，儲安平與大家有着根本的分歧。[57]

總之，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民主黨派或學校、機關、團體，此時話鋒完全逆轉，針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的批判如雪

56 《儲安平黨天下的論調是惡毒的誣蔑》，《人民日報》1957年6月11日。

57 《決不容許把光明日報拉出社會主義的軌道，民盟光明日報支部駁斥儲安平錯誤論調》，《人民日報》1957年6月11日。

片般刊登在報紙上。《人民日報》每天都有最高領袖親自捉刀的大標題社論，諸如《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是不是立場問題？》《不平常的春天》，以掌握反右運動的風向。一時間出現了天下圍攻的態勢，儲安平顯然已經成為少數幾十個全民公敵之一。

《這是為什麼》發表當天，儲安平就已經知道不能再來上班，馬上到章伯鈞家提出辭職。章伯鈞頗能體諒他的困境和苦衷，說了不少安慰的話，並說自己雖是社長，卻無權接受辭職。下午，他又來到許德珩家，談了他在統戰部的發言情況，並說報社同人一夜之間態度全變，貼出反對他的大字報毫無內容，顯然是奉上峰之命。他對許說：「既然黨組織起來排擠我，我只能辭職。」

次日早上，已經不能自保的章伯鈞來看儲安平，問他：「你的負擔重不重？他答：「還好」。章伯鈞說：「有三種情況比較困難，一是身體不好，二是名利心很重，三是生活壓迫。」儲答，自己的名利心很淡，生活負擔不重，只是身體不太好。章說，流行的人物一般看得很近，今天能談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事情的很少，你年齡還輕，可以多在思想方面用些工夫，還是超脫一些好。[58] 同日，袁翰青、樓邦彥找到許德珩，說儲安平的情緒非常不好，約他同去看儲安平。儲安平見到三人，「有點克制不住感情」，表示委屈說「我一向服從組織，過去黨叫我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現在如果黨要我檢討，我就檢討。」但是，他並不認為自己犯錯，仍堅持「黨天下」的看法，說他發言的主要精神是「黨不讓老百姓把自己看做是國家的主人」。[59] 他對袁翰青說，準備檢討，也是檢討「不曉得知無不言本身有個界限，如果曉得的話，就不說了。」他還說，不是沒有人支持他，8日就收到30多封來信。他打算將這些信送到統戰部去，替自己辯護。

58　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最後的貴族》，第68頁。
59　《許德珩主席談儲安平的問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第48頁。

好友樓邦彥在多個場合為儲安平辯護，章乃器也為儲安平鳴不平。《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是讀者來信中支持儲安平的一位。當天他在保定採訪，看到儲安平的發言，馬上寫信支持他，讚揚他有膽量有見識。[60] 北師大附中支持他的學生甚至在校內成立了「安平社」，利用學習馬列主義的小組來專門研究儲安平的言論。[61] 然而，這些行為如星星之火，十分微弱。6月1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指出，《光明日報》的基本政治方向是資產階級的，利用百家爭鳴的口號和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導。最高領袖的定性，使儲安平此時更意識到，自己犯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錯誤。在沒有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他竟然愚蠢到相信偉大領袖的恩賜，未料到一旦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便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的心態何止惶惑、悔恨、委屈！

6月15–16日，《光明日報》召開社務委員會，主要檢討儲安平的辦報方針，並追究社長章伯鈞的失職。儲安平不能再躲，被要求必須出席。會上，總編室主任高天一馬當先地詳細揭露了儲安平擔任主編期間，如何「篡改」辦報方針，將報紙引入「邪路」。副主任張友補充說明了儲安平的辦報方針，認為他使《光明日報》走上了資產階級的方向，打算將其辦成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報紙。不過，他提到儲安平，使用了「同志」一詞，說明其內心頗同情儲安平，也表明這次內部會議並不十分嚴酷。儲安平說，不想講話，越講可能越錯。但對於高天等人揭發的情況，他表示只能承擔一部分事實，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解釋。他澄清了自己與羅隆基的關係，說統戰部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意思，並沒有拿給羅隆基看。[62] 此時，他內心仍不認為自己有錯。

60　張刃：《向黨交心的前因後果》，《炎黃春秋》2010年第12期。

61　《蘇州南京無錫北平等地學生，一致支持儲安平羅隆基立場》，《香港時報》1957年8月22日。

62　《儲安平在6月15、16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的發言》，《右派分子儲安平

儲安平和上海的中央級右派彭文應有很大不同。彭文應同樣認為自己沒錯，而且堅持不屈服、不檢討，強硬到底，其結果是職務撤銷，工資取消，妻子病亡，次子自殺。組織上說，只要檢討認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但彭文應堅決不認錯。儲安平則很快便做出與絕大多數民主人士一樣的選擇，心裏不認錯，口頭上可以檢討認錯。這種屈服，或許是身在北京風口浪尖，或許是顧慮到自己的家庭、孩子，或許也是意識到自己執掌《光明日報》，對鳴放的激化起到不可推卸的作用，或許是知道他提出的「黨天下」真正觸怒了龍顏。他瞭解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處理方式，若不檢討認錯，結局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海外的言論支持，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儲安平的恐懼。《香港時報》發表《儲安平抨擊中共政權，黨員低能人心不服，一黨包辦矛盾根源》，香港《天文台》發表《北平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炮轟毛澤東周恩來》，紛紛為儲安平叫好。[63] 香港《上海日報》則在頭版刊登了儲安平的言論，認為其「有一手」。《中聲晚報》於12日發表社論說，大陸有儲安平這樣的人，體現的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真報》則連續兩天發表了《向儲安平致意》的文章，說儲安平不失有良心有勇氣的知識分子，有輕捋虎鬚的勇氣，並說海外千萬的流亡人士都支持儲安平。《人民日報》收集了這些言論，於6月22日刊登文章稱《台灣和香港反動報刊為右派社會主義的宣傳喝采》，將海外報紙讚揚儲安平的言論公之於眾。這種喝彩，只能更加坐實儲安平的罪名，因為海外將儲安平定位為「反共知識分子」，等於宣佈儲安平與中共是敵我矛盾。他能夠意識到這種定性的嚴重，知道組織上會如何處理敵我矛盾。

的言行》，第52–54頁。

63　《儲安平抨擊中共政權，黨員低能人心不服，一黨包辦矛盾根源》，《香港時報》1957年6月8日；《北平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炮轟毛澤東周恩來》，《天文台》1957年6月10日。

讓他恐懼的還有，各方對其過去的詳細揭露。6月25日，江西進賢縣農民致信《人民日報》，揭發儲安平在土改中消極應付、斥責貧下中農，要其「收斂露骨的狂妄」，徹底檢討反省。化名李兵者翻出舊《觀察》雜誌，提取出儲安平當年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下自由多少與有無的論斷，認為「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便是右派」。作者得出結論：「對於許多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從各方面感染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接受社會主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64] 這些歷史檔案，對儲安平而言是一種原罪。建國後他刻意迴避那段歷史，更絕口不提當年那些文章。如今徹底揭發檢舉，新賬老賬一起算，讓儲安平感到恐懼。

鳴放時，民主黨派中有人擔心，現在是中共整風，會不會之後便開始整民主黨派。當時得到的是否定答覆。然而，6月18日，中央指示各民主黨派內部整風，要求黨盡量少出面，「聽任並且盡可能組織民主人士和群眾揭發右派的重要反動言行和劣跡」。21日，九三學社中央遵命召開第十六次擴大會議，決定開始整風，撤銷儲安平代表九三學社擔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並號召大家嚴肅揭發批判儲安平的言行。徹底孤立無援的儲安平表示要承認錯誤，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23日，儲安平主動去見許德珩，表示願意在九三學社內部做檢討，希望九三學社成立小組幫助他。然而，無論如何檢討，作為最高領袖點名批評的幾個「反動分子」之一，大右派的帽子已經為他備好，他難逃此劫。

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對這些階級敵人內外夾擊，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的打擊，「徹底打斷這個豺狼集團的脊樑骨」，同時指示各單位劃定右派，對右派的數量，不要估計不足，劃得太少，以免把階級敵人當作好人。

64　李兵：《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便是右派》，《人民日報》1957年7月3日。

很快，儲安平與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沈志遠、黃琪翔、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徐鑄成、陶大鏞、潘大逵、馬哲民、謝雪紅、彭文應、陳仁炳等並列為中央級特大號右派。受他邀請參加各地座談會，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言論的陸侃如、高覺敷、袁昌英、韓德培、程千帆、王造時、徐中玉、吳奔星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中山東大學副校長陸侃如，被說成與儲安平遙相呼應，妄圖把九三學社青島分社變成反共司令部。南京師範學院院長高覺敷，被說成參加了九三學社中以儲安平為首的小集團，其中包括陸侃如、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北京師範大學副教務長董渭川等人，這些人妄圖在高校中製造「匈牙利事件」。個別黨內人士也不能倖免，原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徐盈，由於多次與儲安平商討如何辦好《光明日報》，並在統戰部發言後看望儲安平，被污為儲的「生死弟兄」，打入右派之列。

7月7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中央檢討，交代他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係。他說，給老和尚提意見這件事，思想上受到了羅隆基的影響，但他和章羅只是思想上的共鳴，並沒有實際的「勾結」關係。13日，懷仁堂舉行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昔日的座上賓，如今變成人民公敵。他在會上做了《向人民投降》的發言，檢討在《光明日報》的工作和統戰部的發言：

> 我的關於黨天下的發言是絕對錯誤的。
>
> 首先，我說今天是黨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實完全不符。解放以後，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處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黨以真誠的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人民、教育人民、團結人民。就以我們現在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說，這一個成為全國和各級地方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一個民主基礎最廣泛的

政權組織。全國和各地的政治協商會議，更是最能體現黨團結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政策的。無論在政府機關、學校、工廠或人民團體，都有大批的黨外人士負擔着主要的領導職位。黨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遇事和黨外人士協商，徵求大家的意見。我這樣說，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認識，挑撥黨和人民關係。

其次，我們的憲法肯定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黨的政策方針首先要由黨員來執行。黨指派黨員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工作，是黨貫徹黨的政策和履行黨對國家對人民的歷史任務的必要措施。事實告訴我們，凡是沒有黨領導的地方(通過黨員)，黨的政策便不能正確執行，工作便容易發生錯誤。因之，在我們的國家裏，黨員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參加工作，是一個極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現象。不僅憲法裏肯定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就是在全國人民的思想感情裏，也都把黨看成是我們國家中的最大的財富，是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正因為這樣，人們紛紛要求黨選派黨員去領導他們學習、領導他們工作。黨的責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卻把這些情況說成是黨天下，想用這樣一頂帽子來反對黨的領導。不僅如此，我還進一步錯誤地把黨說成是一個宗派組織，企圖分裂黨和人民的關係。……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對黨進行攻擊，從而削弱黨的威信，削弱黨的領導。但是我這種反動的言論經不起駁斥，一經人民揭發，就完全露出了我這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目。

我不僅在「黨天下」的謬論中誹謗了黨，而且我在光明日報的工作中，也做了許多不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擔任總

編輯的兩個多月內，光明日報刊登了許多惡意的、片面的、破壞性的報導，攻擊黨的領導，損害黨的威信。我還派了好些記者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蘭州、瀋陽、長春、青島等九個城市去開座談會，專門找那些對黨不滿的、勇於攻擊黨的人發言，企圖通過這樣集中的形式來損害黨的威信。我又發表了北大學生大字報的錯誤報導，表面上是搶新聞，實質上是點火。我不贊成多發表歌頌黨的社論。我聽到章羅聯盟造謠的黨要在大學撤退的消息，特別感到興趣，並且還刊登了復旦大學取消黨委制的不符事實的新聞。……在我這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報迷失了政治方向，離開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而處處放火的結果首先是燒昏了我自己的頭腦，使我六月一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發出了那篇黨天下的謬論。……

在國外，我的錯誤言論還為美蔣敵人所利用，使他們錯覺地以為中國有很多知識分子反對黨、反對政府。他們以為在大陸上出現了什麼為他們日夜夢想的變亂，於是興風作浪、進行挑撥，還說要向我遙致敬意，實際上無非想造謠生非，挑撥離間。我的錯誤的言論雖然為他們所利用，然而他們的希望只是一個夢想。在今天的中國，即使犯了錯誤的人，在黨的寬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堅決要求改正自己的錯誤，重新做人，爭取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效力。……

我特別認識到，假如不是老老實實跟黨走，個人就要走錯路，工作就要犯錯誤。這次我在光明日報所犯的錯誤，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須勇敢地向自己開刀，剝去我自己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皮，堅決地站到六億人民的一邊來。我決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羅聯盟劃清界限。並在批判我自己的錯誤的同時，積極參加全國反右派的鬥爭。我

> 對我的錯誤還只是一個初步的認識，我應當繼續深入檢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繼續深入批判自己的錯誤言論。我今天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並通過大會向全國人民真誠地承認我的錯誤，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為我自己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一個標誌。我以後一定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的道路。[65]

從這以後，儲安平開始了無休無盡的檢討，在各種各樣的座談會受批鬥。8月1日，新聞工作者座談會，儲安平交代檢討了他與章伯鈞、羅隆基、錢偉長的關係。不過，他只是如實講述，而沒有惡意污蔑。這種態度被認為「避重就輕、吞吞吐吐，避免直接談到章羅聯盟的反黨政治陰謀，極不老實」。[66] 11月11日，儲安平被正式撤銷《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務。11月24、25、28日，九三學社中央與光明日報社聯合舉行千人大會，批判揭露儲安平，許德珩、茅以升、裴文中、嚴濟慈等從各個角度批判儲安平的言論。牟小東、孫承佩、常芝青等以在《九三社訊》或《光明日報》的工作經歷揭發儲安平，又有工人、農民、學生代表被授意出席發言。

儲安平在會後「低頭認罪」，徹底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 我出身於地主家庭，從小就過着剝削的生活，一向輕視勞動人民。在中學大學階段，受的都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後來到了英國，對於以英國巴力門為典型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更是盲目崇拜。我回國以後，曾寫了好些文章宣揚那種英國式的資產階級貴族政治，不僅把那種資產階級貴族政治

65 儲安平：《向人民投降》，《人民日報》1957年7月15日。

66 《章羅同盟如何篡奪〈光明日報〉，儲安平開始吐露了一點事實》，《人民日報》1957年8月4日。

> 顛倒黑白地說成是民主政治，並且把那種腐朽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看成為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由於長期地在這樣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的薰染下，我不僅在思想上和科學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而且還一貫地敵視黨，敵視人民的力量。……我除了誠懇地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以外，並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日趨沒落，而社會主義如日方升，有着光明遠大的前途。通過我所犯的這樣一次嚴重的錯誤，從錯誤中所得到的深刻的教育，我認識到自己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的思想，破資本主義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使自己能夠經過這種徹底的改造，逐步地轉變為一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我除了在思想上應該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的改造自己以外，在政治上更須全心全意地接受黨的領導，老老實實跟着黨走，堅決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決不許自己再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我向全國人民真心悔過，低頭認罪，我決心努力學習，重新做人。[67]

1月24日，九三學社正式決定撤銷儲安平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2月1日，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銘樞、費孝通、錢偉長等三十八名右派因已「沒有資格再代表人民」，人大代表資格被正式撤銷。3月中旬，三十八名大右派被集體送往社會主義學院，集中學習改造。4月11日，組織要求他們交代過去未曾交代過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是為所謂「交心運動」。儲安平交代了二百多條「罪行」，處於中等水平。運動的成果以大字報的形式呈現，並向其他民主人士展示。4月18日，顧頡剛記錄道：「到社會主義學院參觀大字報，諸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皆有，

67　儲安平：《我的檢討》，《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第164–166頁。

獨不見龍雲、章乃器、譚惕吾三人，蓋彼輩不肯學習也。」[68]由於儲安平沒有像章乃器那樣消極抵制，於5月結束學習，放歸家中。[69]

台灣的報紙以為，儲安平成為祭品，或與胡風同等遭遇。[70]然而，對於有影響的高級右派，中共的政策是分六類處理：(一)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二)撤銷職務、監督勞動；(三)撤銷職務、留用察看；(四)撤銷職務，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五)撤銷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降職、降薪、降級；(六)免於處分。[71]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屬於第五種，仍保留政協委員的身份。儲安平屬於第四種，撤銷一切公職，交九三學社看管，每月發100元生活費。

最慘的是無名小右派。《光明日報》不受劃右派的比例限制，學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黨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聞部副主任張蔭槐，鳴放記者鄭笑楓、徐穎、許子美、殷毅、錢統綱、蕭恩元、謝捷、丘林、李笑、范愉曾、韓逸雲等均被劃為右派，其中5人開除公職，交由專政機關處理。次年，國際部主任于友因與副總編輯穆欣不合，被補劃成右派。[72]其中，王少桐被流放到貴州，在貴州群眾藝術館當編輯，文革中被殘酷迫害，1968年自沉烏江。潘文彬被定為極右分子，勞動教養後被送到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勞改，文革中默默死去。記者殷毅、錢統綱、徐穎、范愉曾、許子美撤銷記者職務，送北大荒農場從事超強度勞動，終年不見天日。鄭笑楓亦送北大荒監督勞動，母親受株連上吊自殺，一女精神分裂，一女患病，無錢送醫而亡。

68 顧頡剛：《顧頡剛全集》第51卷，中華書局，2010年，第421頁。

69 章詒和：《雲山幾盤、江流幾彎、天涯極目空腸斷》，《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5頁。

70 《儲安平無音訊，諒以作祭品》，《微信新聞》1957年7月13日。

71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第684頁。

72 王強華：《糾正〈光明日報社的反右運動〉的一些說法》，《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

第十四章　最後的八年

「如蒼兄，我走了，儲。」

——遺言，1966

被國家辭退的人

成為大右派這年，儲安平48歲。他沒有任何職務和工作，每月到九三學社領取100元生活費。為了貫徹「分配待遇較低工作」的處分，九三學社與商務印書館聯絡，分配給儲安平一項長期任務，做不署名的書稿校譯。

家庭亦因之受到連累。長子儲望英是抗美援朝軍官，在部隊教文化課，因父亲是出版总署领导而獲得組織的重點培養，前途一片光明。父親成為大右派後，部隊命令他馬上轉業復員，他選擇回到上海的母親端木露西身边，成為一名普通的小學教師。命運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折，其心中的鬱悶可想而知。1957年6月26日，他給《文匯報》寫了一封致儲安平的公開信，斥責其父反黨反社會主義，污蔑人民領袖，表示要堅決和全國人民站在一起，要求「儲安平先生」好好交代思想根源，以免自絕於人民。[1] 這實際等於宣告斷絕父子關係。次子儲望德，亦被迫與父親劃清界限。長女儲望瑞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較能體貼照顧父親，對父親被劃為右派很不服氣，但經過下放考察和校方多次政治教育，開始認為「黨天下是最反動的敵人才說的話」。[2] 幼子

1　《儲安平長子投書罵其父》，《徵信新聞》1957年7月9日。

2　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204頁。

儲望華有音樂天份，儲安平比較喜愛，曾力排眾議花費1800元為他購置一架鋼琴。父親成為右派後，領導認為將來大家演奏右派儿子的作曲並不合適，命他從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轉到鋼琴系。1963年儲望華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直住在學校。由於父親是大右派，組織上不斷告誡他與父親劃清界限，若流露出一絲憐憫之心便可能自毀前途。儲安平不是家庭型的父親，對子女原本疏於照顧，經反右之後，家庭關係更加疏離。

1959年以後，中国遭遇严重經濟困難。中共意識到反右的打擊面過大，開始逐批為錯劃右派的知識分子摘帽。據統計，1959、1960兩年，有九萬多右派摘帽。當年與儲安平同受毛澤東點名批評的《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便因改造良好而摘去右派帽子，並由組織秘密委以「臥底」他人的「重任」。[3] 儲安平在反右中檢討認錯態度尚可，並非死硬派，按理說希望自己摘帽。戴晴也說儲安平曾私下反復向九三學社打聽自己是否在摘帽之列。然而，這位欽點的右派，毛澤東到1958年還認為「儲安平，那是敵人罵我們」，不可能给他摘帽。[4] 一生從不構陷他人的儲安平，也不可能像徐鑄成一樣甘做「臥底」。這次摘帽註定與他無緣，於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很快走向終結。1959年秋，他與易吟先正式離婚。此事也不能全怪易吟先，做右派的妻子要忍受種種歧視，組織也會不斷動員女方主動提出離婚，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由於女方一時沒有去處，只能暫住儲安平的房子。經人介紹，她和剛剛從戰犯改造營出來的宋希濂開始來往，宋希濂直接出入儲安平的房子，一切都在儲的眼皮底下。1960年，易吟先搬離儲家，與宋結婚，20年後定居美國。

宜興老家的伯父儲南強本以安平為榮，侄子成為特大號右

3　賀越明：《徐鑄成當臥底》，《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

4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出版地不詳，1969年，第180頁。

派，他所受的打擊可想而知。1957年秋天，他委託黃炎培將收藏多年的數件奇珍國寶捐獻給國家。天真的老人或許以為此舉可以挽救侄兒的命運，這當然是一種幻想。1959年9月28日，儲南強在絕望中病逝。儲安平本已「無顏見江東父老」，卻不得不回宜興奔喪。在家鄉，他去太華山中祭掃了祖母的墓，還探望了大嫂俞曼華，贈她象牙筷一副，梳子一把，感謝舊日她資助留學之恩。據云，儲安平氣宇軒昂，一如平日，並無被打成右派之頹唐狀。[5]這是他有意識掩蓋自己的抑鬱。

離婚以後，儲安平一直獨居。過去是請老媽子燒菜，如今是買菜、做飯、洗衣服全部自己動手。儲安平節儉，每天有記賬的習慣，五毛、一塊、兩塊，哪裏花什麼錢都會記賬，非常節省。由於本來便有積蓄，每月仍發生活費，他的右派生活還能維持一定水平。有時，他還自己到四川飯店或莫斯科飯店去吃飯。甚至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他也有經濟能力偶爾帶子女去飯店，只是事先要在家裏用白水煮好捲心菜，到莫斯科飯店，只點一個紅菜湯，就着自帶的捲心菜吃。

儲安平深居簡出，不敢主動見人，別人也對他避之如瘟疫，過去的社會關係基本斷絕。來家中的都是費孝通、樓邦彥等極少數幾個右派。據儲望華回憶，這些人會關起門來一起談話，談政治，談時局，但具體的內容不得而知。他甚至想讓儲望華與費孝通的女兒交往成男女朋友，只是由於當時兩人年紀尚小並無意願，此事遂罷。[6]後來，這些人也不登門了，只有一位地安門教堂的郭牧師偶爾上門，大概是向他傳道。不過，儲安平一生主張無神論，不太可能皈依基督。

1959年，全國政協成立了文史資料委員會，那些改造好的國

5　儲傳能：《儲安平百年祭》，《儲安平的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6頁。

6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民黨戰犯和民主人士都受邀撰寫回憶錄，儲安平也在邀請之列。他寫了數篇文章，回憶學生時代如何去南京請願，領導學生運動，怒斥蔣介石，談他如何辦《觀察》。當年的波瀾壯闊，與今天的潦倒賦閑，真是鮮明的對比。可是，由於其大右派的身份，這些文章都未能發表，只能放在政協文史資料存稿中，至今不見天日。

1960年，本着「廢物利用」的原則，儲安平被九三學社發配到北京西南郊模式口的全國政協勞動基地，進行下放鍛煉。每次勞動的時間是兩三個月，一個月可以回來一次，家人也可以去探望。他在那裏放羊，弄飼料，掃羊圈，還要起來查夜。他還被分配搞蘑菇培植。儲望華還記得當年去探望父親的情景：「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裏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裏只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裏充滿着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麼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之間沮喪的氣氛，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7]

儲安平空有一腔報國之情，一向認為自己能在中國歷史上承擔重任，如今卻在這裏種菜養羊。國家正處於用人之際，這將造成多大的資源浪費？但是，經受過大風大浪，儲安平學會了苦中作樂。據說，在農場中他結識了農工黨的右派李如蒼，兩個人經常在放羊之餘談天說地。章詒和轉述儲安平的說法：「如蒼懂得不少，四書五經不必說，什麼中國醫史、金匱、黃帝內經、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臨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戲劇，周貽白戲劇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獵。我看他這個舊警察局長，比我們現在的公安部長、局長的文化修養都要高。和他相處有話可談，也

7　儲望華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懷念父親儲安平》，《文史博覽》2008年第12期。

融洽。我們都是江浙人，回憶起江南風習，童年趣事，說得津津有味。如蒼的生活能力強於我，處處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從家中帶些自製的滬江小菜，像蘿蔔炒毛豆。我們住的地方潮濕，他還教我練氣功，說這叫以內禦外。久而久之，我們成了朋友。從模式口回到機關後，我也只與他往來。如蒼住在什剎海，銀錠橋側，是個好景致。我從棉花胡同出來到他家小坐，等於散步，鍛煉身體了。」[8] 由於是聽其父章伯鈞轉述，這段記述可能有錯誤。有人批評章詒和的記述，指出李如蒼是四川人，而非江浙人。[9] 但儲安平與李如蒼相識，應該不會完全是虛構。

1961年，儲安平的勞動下放生涯結束。他將養羊的習慣帶到家中，在院子裏蓋了小羊圈，整日餵羊、擠奶，給自己和家人補充身體。據章詒和說，章伯鈞對儲安平的近況非常關心，曾託夫人李健生攜帶糖果餅乾去看望儲安平。儲安平高興得不知所措，非常感激章伯鈞的惦記。數日後，儲安平親自攜羊奶造訪，見到了同樣賦閑在家的章伯鈞，兩人已經是三年未見。儲安平對章伯鈞點評民主黨派諸君，對那些靠別人鮮血染紅頂戴的民主人士嗤之以鼻。儲安平問章伯鈞今後應當如何，章伯鈞答：「拖，混。在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許是你我這樣的人未來的出路。」兩人的交往也只是曇花一現，非常短暫，很快便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再無交集。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導致的三年大饑荒，使儲安平對新中國有了更真切的認識。他本來只是認為中共在政治上有問題，沒想到在經濟上也不是內行。民不聊生，餓殍遍地，他嘴上不敢說，但都看在眼裏。他過去推崇蘇聯的計劃經濟，如今當有了深刻的反省。文化環境也越來越惡劣，他已經沒

8　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最後的貴族》，第80頁。

9　柳白：《尋找李如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686750100jko7.html。

有任何寫作的機會，只能託儲望華從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借書來讀。國內的書已經沒什麼可以看，都是極左觀點，他一遍遍重溫《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等英國經典名著，靠西方人文經典滋養乾涸的心靈。國內的電影也沒法再看，都是假大空的宣傳，讓人反感。1958年英國拍攝了講述泰坦尼克號故事的電影《冰海沉船》，60年代出口到中國，他一遍一遍地看，讚賞影片中表現出的英國人沉穩堅毅的性格，對音樂家們在船沉沒時仍演奏音樂，送別離船者的情節讚不絕口。[10] 他念念不忘的是英國的國民性，一度對通過教育改造中國的國民性寄予厚望。然而，中國人不但沒有吸取到英國的國民性，反而因為政治運動不斷，國民性中惡的一面發展到了極致。

歸途何處

儲安平一生孤苦，據說在60年代最潦倒困苦之時，結識了一位紅顏知己，綽號「四妹」。這位四妹由於歷史問題，建國後在北京一個街道所屬的小工廠當會計。兩人同病相憐，感情很深，但懾於嚴峻的社會環境和輿論壓力，只能暗中來往。後來這位四妹將真相告訴自己的結拜姐妹、小學教師孫某，孫某又轉告給了在湖南工作的雷某。[11] 然而，這種幾經輾轉的道聽塗說，完全沒有真實性。據儲望華講，當時確實有一位女性與儲安平長期交往，但不是什麼「四妹」，而是一位中國科技大學的女教師，小父親十幾歲，相貌漂亮，端莊得體，當時經常來他家，父親讓他叫她孫阿姨。儲望華認為，由於身份和教育水平的差異，儲安平大概不太能同在街道工作的女性來往。

10 儲望華：《懷念我的父親儲安平》，《儲安平的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2頁。

11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第64頁。

時間很快就走到了1966年夏季，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這次非但黨外知識分子全部遭殃，黨內人士亦被打倒，除了毛之外，無人可以保全自己。1966年6月3日，幼子儲望華偷偷回家探望儲安平。之前的中秋節，他已經因為請假回家抓藥給重病發燒39度多的父親，被系團支書批評為「喪失階級立場」。這次，他看到父親的情緒非常差，他也無比恐慌，不知該說什麼。告別時，儲望華緊握父親瘦削的手，說了句保重。之後便再未敢回家探望。[12] 儲安平意識到即將無法自保，警覺地將那些流亡於海外的《觀察》股東存單，託付給他信任的地安門郭牧師。君子一諾千金，儘管那些股東已經不會再向他索取股金，儘管儲安平已經自身難保，卻仍想着不負朋友所託之事。

果然，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命令下，儲安平這個聞名全國的大右派首先成為被衝擊的對象。這次的衝擊並非千人批鬥大會，也非向黨交心檢討，而是肉體衝擊，精神侮辱，火燒、油炸、徹底踩在腳下，永世不得翻身，粉身碎骨。他被紅衛兵罰去打掃街道，不時還遭到毆打，家一遍遍抄來抄去，東西被砸爛、沒收，孤苦伶仃，無人扶助。8月31日，他剛剛打掃完街道，發現紅衛兵又來勢洶洶要揪他來毆打批鬥，從後牆落荒而逃，不知該去往何處。至此，他萬念俱灰，對這個自己曾經千呼萬喚的新中國已經徹底絕望。他想到了死。實際，他在60年代初就曾對兒子說過死的想法，只是一直沒有勇氣死。如今已經不能不死，唯有死，才能結束一切屈辱。三十四年前，他在深山裏對隱居的和尚說，人總要為國為人類作一點服務，當時從未想到有天自己會用自殺來結束生命。他知道，北京西郊有一座青龍橋，那座橋和家鄉北門巷附近的橋同名。年少時，他多次鬱鬱獨行，走過青龍橋前往中央台集市買梨膏糖潤喉。他已經無家可歸，

12　儲望華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懷念父親儲安平》，《文史博覽》2008年第12期。

就在這座青龍橋下的河水中結束生命，權當魂歸故里吧。

附近的民警巡夜，早就看到這個落魄的人在橋邊徘徊，要尋短見。他剛剛跳下河，就被人撈了上來。民警詢問身份後電話打到九三學社，學社派值班的李義將其接回。學社派人去他家取了衣服行李，將他安置在鍋爐工住的小屋之中。九三學社通知了儲安平的子女，但是沒有一個人敢來看他。據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中講，儲安平請求九三學社保護，希望不要回家，就住在社中。社負責人請示統戰部，對方回覆：「大右派，保護起來不合適，放到社會上經受鍛煉。」於是，關押了幾天後，儲安平便被趕了出去。[13] 不過，掃地出門之前，九三學社肯定對他進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大概要他保證不再自殺，好好反省，接受紅衛兵小將的教育等等。不久，社裏還要召開他的批鬥會。儲安平回到家中，大概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已被抄走，傢具已經被砸爛，僅剩四壁。他該怎麼辦呢？該往哪裏去呢？

三十五年前，好友穆時英曾經評價儲安平「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想到，這句話在1966年9月上旬的某天，成為一句讖語。回到家以後的儲安平失蹤了。他的一生本來就曲折而有魅力，最後「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消失，為其一生的魅力畫下一個悲涼而又完美的句號。在那個年代，消失的確比存在幸運。即使苟活於世，挨過常人不能忍的精神肉體雙重煉獄，也迎接不來希望，最後仍不過是落得個壽則多辱、晚節不保的境地。永遠在世間消失，實際就是另一種永垂不朽，比壽終正寢更完美、更讓人懷念。

儲安平去哪兒了？無數好心人為儲安平的歸宿設計了結局，主要包括隱居說、出國說、虐殺說、自殺說四種：

隱居說。謝泳比較傾向於這個說法。他經常引用無錫讀者余允中的一封來信，對方說年輕時曾經在南京湯山中看到一位野人

13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230頁。

似的老者，與其談起宜興人事，講到儲安平時神情怪異。由此他推斷，儲安平有可能隱居於江蘇的深山或寺院中安度終生。這種說法無非是受民間傳說中李自成、順治帝出家的影響，帶有很強烈的武俠演義成份，略知文革時期政治社會生態者便可知，此事不符合邏輯。

出國說。章詒和曾提到，八十年代吳祖光出國時，遇一老作家對他敍述，曾在美國某小鎮街頭看到一人酷似儲安平，便緊隨其後高呼儲先生，那人驚恐飛奔最後消失。儲安平毫無海外關係，在那個政治全面控制社會，幾乎不留任何死角的時代，真可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怎麼可能逃亡海外？章詒和當然也不相信這個說法，提到這個細節，只是與謝泳先生一樣，愛儲安平太切，遂對其結局寄託了一種美好的想像。

虐殺說。此說有一定的合理性。「文革」初期紅衛兵瘋狂打人殺人不受任何限制，很多人被打死後馬上會被秘密運去火化，神不知鬼不覺。已經有數人直接或間接提過，曾經有鄰居聽見儲安平被毆打的聲音，也有友人見過儲家經紅衛兵浩劫之後血跡斑斑、人去樓空的慘狀。像儲安平這種自尊心極強的知識分子，從九三放歸以後，雖不可能再等着紅衛兵上門毆打，卻也難防紅衛兵的突然性襲擊。雖然像他這種著名的大右派，一般不會悄無聲息地被打死，但也決非沒有可能性。

自殺說。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中提到，儲安平失蹤前曾給李如蒼留有一紙條，上寫「如蒼兄，我走了。儲」。儲安平在棉花胡同的新家與什剎海銀錠橋李如蒼家相隔只有兩公里，他喜歡什剎海的景色，過去經常去李如蒼家做客，這個留紙條的情節不像虛構。可以想像，儲安平從九三學社放歸後，再度萌生跳水念頭，遂選擇了兩公里外的什剎海，並順路給李如蒼留下紙條，作為對這個世界最後的遺言。儲望華亦傾向於相信父親是自殺而死，或許他最能感觸到，儲安平在家徒四壁、眾叛親離、絕望至極

的境遇下，只能走向自殺一途。不過，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儲安平到底是不是投什剎海自殺，只能是一個永遠的謎了。

儲安平失蹤之後，據說康生大怒：「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國慶日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的國慶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幹部，要儲望德、望華協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尋找數日，最後毫無結果。1968年，統戰部組成「儲安平專案組」，負責調查儲安平的下落。由於我們無法看到相關卷宗，只能猜測其調查最後不了了之，無果而終。由於不知下落，中央統戰部於1982年正式對儲安平下達「死亡結論」。[14]

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堅持認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對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9月 17日，中共中央發出《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方案決定：「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中央統戰部向中央呈送《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覆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全國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上層愛國人士中，被劃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屬於錯劃，提請民主黨派中央覆查。他們是：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沈志遠、彭一湖、畢鳴岐、黃琪翔、張雲川、謝雪紅、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潘大逵。」對其餘章伯鈞、羅

14　儲望華口述、李菁整理：《父親儲安平之死》，《文史博覽》2008年第12期。

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等五人的處理意見是「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81年，經全面覆查，共改正錯劃右派54萬人，佔總數的99.99%，維持右派原案者3000餘人，但基本恢復政治權利，適當安排工作。[15]

章伯鈞、羅隆基是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位高權重。1980年的《人民日報》上將章伯鈞稱作「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1985年，民盟和農工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會議，隆重紀念章伯鈞誕辰90週年的誕辰活動。其後，骨灰移送八寶山革命公墓。1986年，民盟中央亦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紀念羅隆基誕辰90週年座談會，肯定他是愛國民主人士，對中共建國事業做出過貢獻。民盟上海主委彭文應實際只是地方性右派，情節不算嚴重，只是自始至終拒絕檢討認錯，才未被改正。1989年，民盟中央召開紀念彭文應誕辰85週年座談會，對其給予肯定。民盟上海副主委陳仁炳，其實也是地方性右派，改革開放後被選舉為第五屆民盟中央委員，死後亦有隆重的追悼會。以上四人，雖不予改正，但都等於事實上恢復了名譽。

惟獨儲安平，一生如孤魂野鬼，從未真正屬於過任何黨派、團體。雖然他名列民盟，卻是邊緣分子，不可能被民盟重視。九三學社也從未真正將其當作自家人，沒有任何替他平反之舉。何況，他過去曾經鄙視，甚至希望取而代之的那些御用文人，日後攀上了九三學社的高位，更不會為他召開紀念活動，或為他事實上恢復名譽。其子女全部遷居海外，既無興趣也無能力為其奔走呼籲。最後，儲安平剩下的，只是一紙悲涼的「正式死亡結論」。

2013年11月28日初稿於台北南港
2014年11月25日定稿於滬上櫻桃河畔

15　《新時期的統一戰線(1976.10–1988.7)》，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網站，http://www.zytzb.org.cn/09/theory/lishi/200909/t20090927_575721.html

參考文獻要目

一、檔案、實物

台北，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吳稚暉檔案、一般檔案。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傅斯年檔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教育部檔案。
上海，上海市檔案館，上海聯合徵信所檔案、上海市社會局檔案、上海市教育局檔案、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檔案。
長沙，湖南省檔案館，國立師範學院檔案。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光華大學檔案。
北京，民盟中央，民盟組織部人事材料。
上海，江宏明先生藏，國立師範學院附中端木露西聘書。
無錫，蘇迅先生藏，儲南強信一封。

二、訪談、通信

周有光先生訪問記錄，北京，2012年1月4日。
儲望華先生訪問記錄，上海，2012年10月21日。
沈大川先生訪問記錄，台北，2013年12月7日。
殷毅先生訪問記錄，北京，2014年1月17日。
Pagan Sally女士信，愛丁堡，2012年5月22日。
謝泳先生信，廈門，2012年5月27日。
儲望華先生信，墨爾本，2012年6月6日。
章詒和女士信，北京，2012年10月15日。
儲望瑞女士信，墨爾本，2013年6月16日。
沈昌文先生信，北京，2013年8月27日。

三、報刊、校園出版物

《宜興縣教育會彙刊》，宜興，1918年。
《申報》，上海，1924–1949年。
《晨曦》，上海，1926年。
《光華年刊》，上海，1926–1931年。
《光華週刊》，上海，1928–1929年。
《新月》，上海，1928–1932年。
《中國學生》，上海，1929–1930年。

《私立上海光華大學章程》，上海，1930年。
《大光明》，蘇州，1930–1932年。
《民國日報》，上海，1930–1931年。
《南國月刊》，上海，1930年。
《硬的評論》，上海，1930年。
《創作月刊》，南京，1931年。
《時代評論》，上海，1931年。
《時時週報》，上海，1931年。
《時兆月報》，上海，1931年。
《復旦社會學系半月刊》，上海，1931年。
《再生》，北平，1932年。
《光華大學附中週刊》，上海，1932年
《生力》，南京，1933年。
《文藝月刊》，南京，1933年。
《國聞週報》，天津，1933年。
《西湖文苑》，杭州，1933年。
《自由言論》，上海，1933年。
《中央日報》，南京、長沙、重慶，1933–1947年。
《時事旬報》，上海，1934年。
《人言週刊》，上海，1935年。
《光華大學十週年紀念冊》，上海，1935年。
《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十週年紀念》，上海，1935年。
《文學時代》，南京，1935–1936年。
《國立戲劇學校一覽》，南京，1936年。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概況》，南京，1937年。
《中央政治學校十週年紀念刊》，南京，1937年。
《抗戰行動》，武漢，1938年。
《新新新聞》，成都，1938年。
《中央政治學校校刊》，重慶，1939年。
《蘇州新報》，蘇州，1940年。
《中國青年》，延安，1940年。
《國立師範學院旬刊》，藍田，1940年。
《新評論》，重慶，1940–1943年。
《大公報》，重慶，1940–1944年。
《力報》，桂林，1940–1944年。
《新經濟》，重慶，1941年。
《中央政治學校概況》，重慶，1942年。
《三年來的國師附中》，藍田，1943年。
《新中華》，重慶，1943年。
《國力月刊》，藍田，1943年。
《東方雜誌》，重慶，1945年。

《客觀》，重慶，1945–1946年。
《文飯》，上海，1946年。
《觀察》，上海、北京，1946–1950年。
《文萃》，上海，1947年。
《正論》，南京，1947年。
《益世報》，天津，1947年。
《國立師範學院概況》，衡山，1947年。
《國立復旦大學一覽》，上海，1947年。
《中央週刊》，南京，1947–1948年　。
《光明報》，香港，1948年。
《新民報》，北平，1949年。
《人民日報》，北京，1949–1957年。
《內部通報》，北京，1950年。
《天文台》，香港，1957年。
《九三社訊》，北京，1957年。
《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
《香港時報》，香港，1957年。
《徵信新聞》，台北，1957年。
《南方週末》，廣州，2005–2008年。

四、文獻資料

亞歷山大·勃洛克：《十二個》，北新書局，1926年。
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淚錄》，光華大學，1928年。
諸青來：《三民主義商榷》，箴文書局，1930年。
胡適等：《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良友圖書公司，1931年。
儲安平編：《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新月書店，1931年。
董任堅：《大學教育論叢》，新月書店，1932年。
儲安平等：《四年》，良友圖書公司，1933年。
儲安平：《給弟弟們的信》，開明書店，1936年。
儲安平：《說謊者》，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
儲安平：《英國與印度(1600–1943)》，科學書店，1943年。
儲安平：《行政院與英國內閣之權責比較》，國立師範學院，1943年。
端木露西：《海外小箋》，袖珍書店，1943年。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袖珍書店，1943年。
程其恒編：《記者經驗談》，銘真出版社，1943年。
端木露西：《露西散文集》，商務印書館，1945年。
惲逸群：《蔣黨真相：三十年見聞雜記之一》，東北書店，1948年。
儲安平：《英國採風錄》，觀察社，1949年。
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紀念刊》，人民出版社，1951年。

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編：《鎮壓反革命宣傳學習手冊》，光明日報印刷廠，195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秘書處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彙刊》，人民出版社，1956年。
儲安平：《瑪納斯河墾區》，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
儲安平：《新疆新面貌》，作家出版社，1957年。
司法局行政部調查局編：《從「共匪」統戰座談會的發言看匪區真相》，台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57年。
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編：《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大會發言專輯》，九三學社，1957年。
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編：《右派分子儲安平的材料》，九三學社，1957年。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批判光明日報參考資料》，光明日報社，1957年。
出版方不詳：《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出版地不詳，1957年。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編：《右派分子儲安平的言行》，光明日報社，1957年。
出版方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出版地不詳，1969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
楊愷齡編：《民國吳稚暉先生敬恒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傳》，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周健強：《聶紺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乃翔編：《中國現代文學詞典·散文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江西省進賢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進賢縣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
宜興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宜興縣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楊曉方主編：《宜城鎮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湖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報業》，湖南出版社，1991年。
九三學社中央社史辦公室編：《九三學社歷史資料選輯》，學苑出版社，1991年。
魏華齡編：《桂林抗戰研究文化研究文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6，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1999年。
王文彬編：《中國現代報史資料匯輯》，重慶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新華書店總店史編輯委員會編：《新華書店總店史(1951–1952)》，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任繼愈：《念舊企新：任繼愈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1997年。
陳白塵：《陳白塵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

薛慶時等：《陳維稷傳》，中國紡織出版社，1997年。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謝泳編：《追尋儲安平》，廣州出版社，1998年。
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
梁剛建、喻國英編：《光明日報新聞內情》，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張義德編：《名人與光明日報》，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艾蕪：《往事隨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馬馨麟編：《光明日報50年歷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謝然之：《謝然之教授九秩華誕祝壽文集》，台北：東大圖書，2000年。
舒衡哲：《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
韓石山編：《難忘徐志摩》，昆侖出版社，2001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伍大希：《七十年家與國：伍大希演講實錄》，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胡適：《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張靜廬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現代丁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全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王益：《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發行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
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趙銘彝：《趙銘彝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
聶紺弩：《聶紺弩文集》，武漢出版社，2004年。
葉至善、葉至美、葉志誠編：《葉聖陶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謝政諭編：《端木愷校長紀念集》，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
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劉瑞琳主編：《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常任俠：《春城紀事(1949–1952)》，大象出版社，2006年。
穆欣：《述學譚往：追憶在光明日報十年》，東方出版社，2006年。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趙家璧：《書比人長壽》，中華書局，2008年。
趙家璧：《文壇故舊錄》，中華書局，2008年。
林牧：《燭盡夢猶虛：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孔春暉編：《師範弦歌：從藍田到嶽麓》，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巫寧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2008年。
費孝通：《費孝通全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夏鼐：《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龔祥瑞：《盲人奧裏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張耕華：《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自印本，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陳方正整理：《陳克文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顧頡剛：《顧頡剛全集》，中華書局，2012年。
余英時：《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季羨林：《季羨林日記(1935.1.1–1936.12.31)》，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周琇環、蔡盛琦、陳世局編：《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1946》，台北：國史館，2013年。

五、研究著作

彥奇：《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
謝泳：《舊人舊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謝泳：《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汪朝光：《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中華書局，2000年。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年。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台北：遠流出版，2004年。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
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
王宏志：《魯迅與「左聯」》，新星出版社，2006年。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楊劍龍：《論語派的文化情致與小品文創作》，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
許紀霖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陳永忠：《儲安平生平與思想研究：國共不容的知識分子》，台北：秀威資訊，2009年。
謝泳編：《儲安平和他的時代：紀念儲安平誕辰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2009年。
楊貞德：《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個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謝泳：《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新星出版社，2010年。
張大明：《主潮那一面：三民主義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曹建坤：《中國共產黨與自由主義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衛春回：《理想與現實的抉擇：中國自由主義學人與中間道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Richard Overy, *The Third Reich A Chronicle*, London: Quercus Books, 2010.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譯林出版社，2011年。
孟鍾捷：《德國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
金沖及：《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趙麗華：《民國官營體制與言論空間：〈中央日報〉副刊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年。
任劍濤：《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
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馮兆基：《尋求中國民主》，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范泓：《歷史的覆盤：百年紛爭人與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形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六、論文、期刊文章

汪榮祖：《自由主義在戰後中國的起落》，《傳記文學》(台北)，1979年第36卷第4期。
沈雲龍：《光華大學雜憶》，《傳記文學》(台北)1981年第39卷第3期。
張志讓：《張志讓自傳》，《文史資料選輯》1983年第29卷第85輯。
尚丁：《民主憲政運動的先鋒戰士張志讓與憲政月刊》，《文史資料選輯》1983年第85輯。
王益：《在胡愈之領導下做出版工作》，《中國出版》1987年第1期。

王西彥：《窗口朦朧發白：鄉土·歲月·追尋之十六》，《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俞潤泉：《舊籍重光》，《讀書》1987年第4期。
葛思恩：《記早期的政治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資料》1989年第45輯。
儲建冰：《憶安平叔》，《宜興文史資料》1990年第18輯。
朱壽桐：《以感美感戀心態走出名士傳統》，《文學評論》1994年第1期。
陳儀深：《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
黃昌勇：《新月派文學思想論》，《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
馮英子：《我和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歐陽敏訥口述、譚瑞芝整理：《回憶桂林力報》，《桂林文史資料》1995年第28輯。
陳正卿選編：《觀察週刊社史料一組》，《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6期。
高文龍：《王府井新華書店瑣憶》，《北京出版史志》1998年第12輯。
孫宏雲：《拉斯基與中國：關於拉斯基和他的中國學生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譚文：《5號院的特殊公民》，《縱橫》2005年第5期。
汪朝光：《簡論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的「戡亂動員」》，《上海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王雨霖：《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書屋》2006年第12期。
冉雲飛：《民生公司職員六十年前的日記》，《書屋》2007年第1期。
趙文亮:《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與1936年奧運會》，《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笪移今：《九三學社的源起和在上海解放前的鬥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2007年第124輯。
趙文亮：《猶太人與1936年柏林奧運會》，《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4期。
儲望華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懷念父親儲安平》，《文史博覽》2008年第12期。
張慧：《中央日報副刊與儲安平》，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孫傳釗：《被遺忘的倫理責任》，《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第6期。
Ross Tucker, "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ex Verification in Spor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09 Vol. 21, No. 4, pp. 147–150.
吳心海：《胡適的失察》，《博覽群書》2009年第7期。
張刃：《向黨交心的前因後果》，《炎黃春秋》2010年第12期。
秦賢次：《儲安平及其同時代的光華文人》，《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余天武：《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武漢》，《武漢文史資料》2011年Z1期。
陳建軍：《光華文人志附識》，《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5期。
季劍青：《故都故都奈若何：1930年代北平的現代主義詩歌》，《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4期。
賀碧霄：《新聞範式更替：從民間報人到黨的幹部——以上海私營報業改造為中心的考察(1949–1952)》，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傅宏星：《給儲安平的四封電文及其文獻價值》，《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孔春輝：《以師為本：國立師範學院的歷史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王強華：《糾正〈光明日報社的反右運動〉的一些說法》，《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
賀越明：《徐鑄成當臥底》，《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

七、網路文章

儲傳能：《儲安平故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z4hf.html。
儲傳能：《儲安平一百零一年誕辰懷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70bc20100jqxn.html。
黃惲：《端木新民與葛建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246090100j9o5.html。
黃孝暘：《國師在湖南溆浦》，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19/06/349878_219114212.shtml。
柳白：《尋找李如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686750100jko7.html。
新時期的統一戰線(1976.10–1988.7)，
http://www.zytzb.org.cn/09/theory/lishi/200909/t20090927_575721.html。
袁道之：《家父袁哲與儲安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d0730102eqdk.html。
與吳心海先生的網路對話，
http://weibo.com/1232356762/AhFWa2VoH。

後　記

給儲安平作傳，源於一個偶然因素。2011年秋，我在研究母校華東師範大學前身光華大學校史時，意外發現了儲安平發表在校報《光華週刊》上的多篇文章。於是我對儲安平在光華四年的生平產生興趣，開始蒐集資料，連綴史實，撰寫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儲安平光華大學時期生平考論（1928–1932）》，作為封面文章發表於台灣的《傳記文學》雜誌。鑒於坊間並無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儲安平傳》，我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為這位著名的「大右派」寫一部完整的傳記。我採取一邊蒐集資料一邊讀寫的方式，從2012年夏開始動筆，歷時一年才完成1949年前的部分。2013年秋，我有幸到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訪學，利用南港便利的圖書、檔案資源和研究室，開始寫作1949年後的部分，至11月末完成初稿。其後一年內，經數次局部修改，才有了今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版本。

其實，由我這樣一個未出茅廬的青年為儲安平作傳，是一個不自量力的舉動。由於1949年後的檔案資料並未解密，很多關於反右、文革的情況都不清楚，只能引用公開出版物，大量羅列史料。由於我的學術水平有限，也只能大致梳理傳主一生的史實，很難將其放在近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的脈絡中，作深入的探討。而且，我還在讀博士，寫作這樣一部近25萬字，與博士論文幾乎毫不相干的东西，必定會以犧牲博士論文的質量為代價。當然，這也是一個冒險的舉動。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現狀，為儲安平這個未被官方平反的知識分子作傳，至今仍

是一件有些敏感的事。我在提筆時就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恐怕即使完成亦無法在大陸面世。果不其然，其後書稿在數個出版社之間流轉，無一家成功申請到書號。因此，回想起來頗有些不可思議，當初少年莽撞，竟毫不猶豫地開始了這樣一份冒險的工作。

不過，撰寫《儲安平傳》，對我而言也大有收穫。在寫作過程中，每每感染於傳主那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任心，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以及不怕犧牲的勇士精神。對我而言，儲安平的精神、人格已經成為某種「雖不能至」卻「心嚮往之」的參照樣板。寫作還增加了我蒐集史料、運用史料、解讀史料的能力，更收穫了史學寫作的快樂。如福爾摩斯探案一般，蒐集碎片，排比史實，尋找邏輯，破譯密碼，最後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貫通起來，常有許多驚人的發現，那種成就感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體會。我想，可能我這一生都很難再如撰寫《儲安平傳》一樣，將那麼多心血都傾注在這一項工作之上。那些奔波於海峽兩岸各大圖書館、檔案館尋找資料，數百個坐冷板凳的日日夜夜，對我而言也實在是一種難得的心性鍛煉。

本書的寫作、修改時間斷斷續續兩年多，無數師友都對本書的資料蒐集、思路點撥、出版推薦有過幫助，還有很多師友在他們主持的報刊雜誌上刊發了部分內容。由於曠日持久，難免掛一漏萬，在此僅列所記，向他們致以最真摯的感謝。他們是：周有光、張朋園、陳子善、錢永祥、謝泳、潘光哲、章詒和、楊奎松、沈大川、褚鈺泉、傅國湧、殷毅、于友、趙修義、沈昌文、Pagan Sally、李樂曾、張朝勝、王天根、唐小兵、張彥武、趙崢、陳佳、譚徐鋒、陳卓、饒佳榮、何蘊琪、余少鐳、戴新偉、劉錚、簡金生、林承慧、陳祥、朱桂英、徐偉、張弘、胡悅晗、黃惲、傅宏星、祝淳翔、林建剛、吳李國、段煉、儲望華、儲望瑞、儲俠，等等。尤其是謝泳老師，他一直

關注傳記的寫作，並慷慨地將他當年研究儲安平的資料全部打包郵寄送我，這種提攜後輩的心熱，無私的學術風範，讓我永遠銘記在心。

最應感謝的是許紀霖、林道群兩位老師。我跟隨許先生讀書已經六年，並不是一個認真配合的學生，寫傳記也未徵得其同意。然而當他拿到書稿時，仍給了我最大的肯定，並在兩岸三地積極為我推薦書稿，往返周折，費盡心力。當大陸出版受挫時，他多次鼓勵我說「不怕見不了天日」。最後，許師成功將書稿推薦給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老師。對於我這樣一個新人，林道群老師也毫無猶豫地接納書稿，並迅速進入出版流程，進行了耐心細緻的編輯工作。這種知遇和信任，每次思之，均覺無以為報。

在此將本書獻給祖父韓天策、祖母沈淑清兩位老人。他們二十多年如一日地疼我、愛我、培養我，可惜他們都已離去，不能與我一起分享這小小的成績。亦將本書獻給父母。我將近而立之年卻仍未脫離學校，讓他們較之同齡父母承擔了更多的精神和物質壓力，每念及此便甚覺慚愧。最後將本書獻給曉玲，以紀念我們兩年多來的相濡以沫。她也是此書的第一個讀者，為本書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請允許我在此對她表示謝意。

2015年2月7日於川南旅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储安平传
作者=韩戍著
页数=409
SS号=13864897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